



法兰西的特性

空间和历史

FRANÇOIS FURTADO · 著

王德培 译

商务印书馆

法兰西的特性

空间和历史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顾良 张泽乾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4年·北京

034835

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Espace et Histoire
Flammarion, 1990

据法国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0年版翻译

本书由法国文化部赞助出版

2090/10

FĀLÁN XÌ DE TÈ XÌNG

法兰西的特性

空间和历史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顾良 张泽乾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721-1/K·402

1994年10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80 千

印数2 000册

印张11 3/4

定价：11.70元

布罗代尔与年鉴派

——译者代序

法国国立图书馆馆长埃马努埃尔·勒鲁瓦-拉杜里声称：“总有一天，当我们的同胞在总结20世纪的知识、科学和技术时，他们会发现自己在军事技术、尖端工业或原子物理等领域内，并不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浅薄的法国人或许能够聊以自慰的是，他们毕竟在1930至1965年间，全靠‘年鉴派’的努力，产生了世界上最好的历史学家。”^①眼明人立即就会懂得，这里所说的“最好的历史学家”指的是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三人。

有鉴于我国史学研究的滞后和公众对历史的冷淡，一位人微言轻的翻译匠决心把法国人引以为傲的“年鉴派”及其第二代宗师布罗代尔的著作介绍给我国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和一切怀有求知愿望的读者。就这样，我在近十多年来，首先与挚友施康强先生合译了《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简称《物质文明》）；接着应商务印书馆之请，对《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简称《地中海》）上卷的译文从事通读校订；最后与张泽乾先生联手，完成了《法兰西的特性》一书的翻译工作。

时至今日，《物质文明》已于199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地中海》上卷正在印刷中，《法兰西的特性》即将全部交稿。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这三部被一般法国人视为难懂的“天书”，我想利用这个机

^① 埃马努埃尔·勒鲁瓦-拉杜里：《新史学的斗士们》，见法国《新观察家》周刊第791期，1980年1月7—13日。

会，客观地讲述一点背景材料。对于一位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历史学家，我既不赞成持“拿来主义”的态度，又讨厌那种“戴帽穿靴”式的政治标签。因此，我将着重在自认为值得借鉴的地方落笔，而不在批判方面多费口舌。相信读者会比译者高明，不但能发现这位史学巨匠闪烁着思想火花的真知灼见，而且会对他匆忙作出的某些结论进行独立思考。

一、新史学的崛起

法国是个具有光辉史学传统的国家。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一些法国历史学家往往骄傲地声称：在美国还没有摆脱殖民统治时，法国已培育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历史学派。确实，早在17和18世纪，法国的历史学界堪称人才辈出。首先是以记叙亲身经历为主的“人文派”，他们撰写的“回忆录”不但是脍炙人口的文学篇章，而且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素材。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伯父圣西门伯爵即以其《回忆录》传诸后世。其次是精确记述事实的“博学派”，其特点表现为比“人文派”更加严谨，对社会现象不作渲染，这派历史学家尤以教士居多。最后是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哲学派”，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至今仍被奉为史学经典论著，而《关于历史的新认识》今天还被尊崇为“新史学的蓝本”^①。我们几乎可以说，光辉灿烂的“启蒙时代”在法国不仅是哲学的时代，而且是历史学的时代。

通过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法国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时代要求人们对刚刚结束的社会动乱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展望今后的发展方向。许多历史学家和历史巨著随之脱颖而出。这些历史学家往往也是活跃政坛的头面人物，他们的著作实际上反

^① 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载《史学理论》创刊号第50页，1987年8月15日。

映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如拉马丁、基佐、梯也尔、米希莱、路易·勃朗等。恩格斯曾经指出，早在马克思以前，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已经意识到阶级斗争的存在，并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①。不仅如此，法国新史学派还把夏多布里昂、基佐、米希莱等人视为自己的“祖先”和“预言者”。^②

建立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兰克学派，强调历史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对开展文献档案的考证，冲淡法国史学的浪漫色彩，曾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从而把以激励民族精神、垂训说教为宗旨的旧史学推进了一大步。但这种史学研究在其后期逐渐偏向于对个别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和少数杰出人物的身世言行进行不厌其烦的考证，其题材就局限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的范围之内。在夏尔—维克多·朗格多瓦的《菲利普三世的统治时期》一书中，人们所能接触到的几乎只是13世纪法国的政治制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证史学更走进了繁琐考证的死胡同，法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倡导挣脱纯政治因素的羁绊，务求冲出重大历史事件的框框，从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拓展研究领域。在法国新史学的这个萌芽时期，为幼苗浇水施肥的园丁主要是杜尔克姆的《社会学年报》和昂利·贝尔的《历史综合评论》。作为兼通多门学科、知识渊博的社会学家，杜尔克姆率先发难，对统治法国高等教育、以政治史为中心的传统史学发动了攻击，主张通过对典型史实的考察，认识社会的结构和运动，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解剖一只麻雀”。昂利·贝尔则反对满足

^① 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中文版，第四卷，第245—246页。

^② 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载《史学理论》创刊号，第50—52页，1987年3月15日。

于史料的堆砌，强调通过分析比较，作出综合的解释，而对历史事实的“分析”和“综合”，又有赖于全面运用社会科学各门类的知识。

此外，对新史学的诞生曾起过有益影响的还有：弗朗索瓦·西米安的以价格运动、工资升降为内容的经济史，以维达尔·德·拉布拉什为代表的法国地理学派，马克思的历史观和经济思想。应该看到，新史学的一些杰出代表，包括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内，对马克思主义并不陌生，甚至怀有某些好感。^① 雅克·勒高夫公开承认马克思主义对新史学的影响，强调“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并非互不相容”，“在许多方面，如带着问题研究历史、跨学科、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②

新史学派正式问世的日期要从1929年算起，也就是从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和马克·布洛赫(1886—1944)创办《经济和社会史年鉴》那天算起。这份杂志的名称“年鉴”立即就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年鉴派”至今仍与“新史学派”相混同。这个刊名的两个修饰语，特别是“社会”一词，是刊物的两位创始人考虑到历史的无所不包而特地选定的。费弗尔说：“我们完全知道，在眼下，‘社会’作为一个形容词，由于含义太广而最后变得几乎毫无意义……我们一致认为，正因为该词的‘模糊’，它才根据历史的旨意被创造出来，用以充当一种自命不受任何框框约束的刊物的名称……所谓经济史和社会史其实并不存在，只存在作为整体

^① 参看安德烈·比尔基埃尔的《历史科学辞典》，法国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在一次谈话中，当有人问到他同马克思的关系时，布罗代尔说：“其实，与同马克思·韦伯的关系相比，我的观点与马克思更加接近”，以马克思的跨学科研究精神，他认为可派马克思担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除院长之外的任何一项职务。谈话全文见法国《世界报》1979年12月14日，第23版。

^② 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载《史学理论》创刊号第57页，1987年3月15日。

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整个历史就是社会的历史。”^①

年鉴杂志虽在巴黎由阿尔芒·科兰出版社出版，但其编辑中心却设在位于法国北部边境的斯特拉斯堡。布洛赫和费弗尔两人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应聘担任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历史教授，他们不仅把在该校共事的其他任课教师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学者，如社会学家莫里斯·霍尔巴赫，经济学家安德烈·齐格弗里特，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等），而且在校外乃至国外争取广泛的支持，费弗尔和布洛赫甚至曾考虑请他们极其佩服的比利时历史学家昂利·皮雷纳担任年鉴杂志的主编。从创刊的第一年开始，为杂志撰稿的作者分属英、意、西、比、德以及美国、匈牙利、丹麦、瑞典、捷克、希腊等国家。文章的内容除历史外，还涉及经济学、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广阔领域。

年鉴杂志的两位创办人配合默契，但又各有专长。马克·布洛赫主要是欧洲中世纪史和经济史的专家，他把杜尔克姆的社会学的比较方法移植到历史研究中来，完成了他的两部代表作：《法国乡村史的特点》（中译本作《法国农村史》）和《封建社会》。两部巨著打破了改朝换代、帝王将相这些纯政治因素的框框，对法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了解剖，展示出千百万基层群众和成千上万优秀人物的风采。《法国乡村史的特点》是把社会实体的主要组成成分，即大多数农民，复活成栩栩如生的真人；《封建社会》则生动地刻画了高雅的名门贵族和粗俗的暴发户新贵，以及这两股势力在乡村中组成的附庸体系。

吕西安·费弗尔也是中世纪史的专家，但他的研究侧重在思想、文化和精神状态方面。无怪乎今天在法国流行的“精神状态

^① 吕西安·费弗尔：《为历史而战》，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53年版，第19—20页。

史”即奉他为鼻祖。费弗尔十分重视地理环境对人文氛围的影响。他的博士论文《菲利普二世与法朗什—孔泰》堪称是法国地方史的楷模，其特点是把一个省的地理因素融合到前工业化时代的社会演变中去。《大地与人类进化》写于1922年，在法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保罗·夏吕为该书作序时写道：该书为今后的历史学家在如何处理社会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的关系问题上树立了“样板”。^① 费弗尔的《拉伯雷的宗教》和《马丁·路德的命运》绝非简单的人物传记，而是透过这两位典型人物，“重现”历史时代的精神风貌，并把它们同当前的精神面貌进行比较。

但是，以上介绍的几部代表作其实还并不真正代表布洛赫和费弗尔两人的业绩。他们不单是知识渊博、擅长考证的学者，而且更多是精力充沛、能言善辩的论战家。他们的主要作战阵地就是年鉴杂志。在新史学或年鉴派的草创时期，以索邦大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在法国据有稳固的地位。这份外省刊物虽然足以打破笼罩着史学界的沉闷空气，但要清扫史学研究中的陈腐气息和动摇权力集团的统治，又是谈何容易。因此，两人必须身先士卒，投入战斗。他们在年鉴杂志开辟了《争论和战斗》专栏，亲自撰写大量书评和论文。安德烈·比尔基埃尔在纪念《年鉴》创刊一百周年的文章中指出，马克·布洛赫在刊物的每一期上都有书评发表，“最多的一年竟达200篇”^②。至于吕西安·费弗尔，因担任主编职务比布洛赫时间更长（布洛赫于1939年主动参军，法军战败后又投入地下抵抗运动，于1944年被德国盖世太保逮捕，同年英勇就义），他在年鉴杂志发表的书评和文章数量更多，据国立图书馆的统计，共有1400多篇，约占刊物篇幅的四分之一。^③

① 《大地与人类进化》，法国阿尔本·米歇尔出版社，1970年版，第7页。

② 见《年鉴杂志的诞生》，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79年第6期第1350页。

③ 法国国立图书馆为纪念年鉴杂志创刊一百周年举办的“吕西安·费弗尔生平事业展”；《展品简介》第38—39页。

这些短小精悍、有的放矢的篇章都是犀利的匕首，锋芒直指外交史、政治史、事件史的要害。费弗尔和布洛赫针对埃米尔·布尔茹瓦的《外交史教程》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指出这是用历史舞台上串演的悲喜剧掩盖在幕后进行的真实历史运动。费弗尔断言，历史真实的内在的动因并不在于大人物的脾气和心血来潮，也不在于敌对双方外交官的纵横捭阖，而在于“地理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以及群众的知识、信仰和心理等因素”^①。另一方面，费弗尔1930年为弗朗索瓦·西米安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撰写的书评，马克·布洛赫在年鉴杂志第三期为莫里斯·霍尔巴赫的《自杀：一种社会病兆》撰写的书评，对开展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对史实概念的再认识提供了震聋发聩、启迪智慧的独到见解。他们批评那种筑起高墙、精心种植各自的葡萄园的狭隘观念，鼓励历史学家把目光移向邻居，使互不相认的兄弟进行对话。

年鉴杂志在二战期间，因德军占领等原因，几经更改刊名，自1946年起，称作《经济、社会、文明年鉴》。这既反映着刊物的视野进一步扩大，也标志着在费尔南·布罗代尔加入了编辑部以后，特别是在1956年费弗尔去世以后，新史学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布罗代尔的时期。

二、布罗代尔的早期经历

费尔南·布罗代尔于1902年8月24日出生在法国东部默兹省的卢内维尔村，在这个居民不到200人的小村庄，他跟随祖父母渡过了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长期的乡村生活使他对当地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因此，他在撰写《法兰西的特性》一书有关耕作制度、畜牧活动和工匠行业等篇章时，得以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① 吕西安·费弗尔，《为历史而战》，第63页。

他的大学毕业论文《法国革命头三年期间的巴勒迪克》也恰巧建立在对家乡的调查基础之上。他曾多次酝酿为自己的家乡卢内维尔村写一部历史，这个愿望可惜未能实现。

他的父亲是位小学的算术教师，在巴黎远郊梅里埃镇上任职。父子二人共同生活的时间既短，性情又不尽投合，在生活中往往意见相左。尤其在1920年，小布罗代尔在伏尔泰中学行将毕业，一心指望报考医科，却遭父亲的断然阻止。迫于父命，他索然无味地进了巴黎大学的历史系。全靠天赋的记忆力，他居然顺利完成了学业，并于21岁那年通过国家会考，取得中学历史和地理教师的资格。这位年轻的历史教师于1922年被派往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中学、阿尔及尔中学任教，在地中海彼岸工作达9年之久（除1925—1926年服兵役外，直到1932年为止）。布罗代尔自己承认，他当时从事的历史教学，为参加1928年的国际历史年会发表的《西班牙人在北非》一文，以及从1922年起就着手准备的题为《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政策》的博士论文，仍然停留在政治史和外交史的范围。

但是，长住北非给予布罗代尔“全面认识”地中海的地理景观和历史作用一个绝妙的机会。对地中海的观察，由南眺改为北望，使他产生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仅如此，这位不倦的旅行家利用假期，遍游除埃及以外的地中海各国，而他最感兴趣的地方无疑是沿海城市的各档案馆和图书馆。犹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他走访巴勒莫市立图书馆，本想了解有关西西里贵族的历史文献，却偏偏找到了关于该岛甘蔗种植的大批档案。阅读和抄录档案是项颇费时间的工作，他从一位美国电影摄影师处买下一架旧摄影机，自制缩微胶卷（图书馆正式制作缩微胶卷还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明）。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他的史学眼光变得更加宽广，对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个人的兴趣逐渐淡薄，而对地中海

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浓。他于1927年与创导新史学的旗手吕西安·费弗尔取得了直接的联系，后者在一封信中向他指出：“认识柏柏尔人的地中海比对认识菲利普二世更加令人振奋”。这句话据说拨正了布罗代尔的研究方向。此外，同年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国际历史年会上，聆听昂利·贝尔和昂利·皮兰纳的学术报告，也为布罗代尔走上新史学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启迪。他后来说：“在1927至1933年间，我正不慌不忙地埋头于收集档案资料，虽然论文题目尚未最后选定，但我已经过深思熟虑，决心选择地中海。”^①

布罗代尔于1932年返回巴黎，先后在巴士德中学、孔多塞中学和亨利第四中学任教，接着在1935年动身去巴西圣保罗大学担任历史教授。巴西之行对布罗代尔是“一生中重要的时期”，他说，“正是巴西才使我对地中海的历史得出一种崭新的认识”^②，“远离故土产生的新奇感是认识的重要手段，它能帮助你更加全面地理解周围的事物，距离太近反而看不清楚”^③。正是在巴西，他有充足的时间，把在锡曼卡斯、拉古萨（杜布罗夫尼克）、威尼斯等档案馆拍下的长达几公里的胶卷仔细读完；在这“工作和思考的天堂”，他还与正在圣保罗大学文学系授课的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就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关系等问题交换看法，两人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但友谊甚笃。直到两人分别成为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的“一代宗师”时，他们始终像是一对“欢喜冤家”，总是把对方当作唇枪舌剑的论战对手。1937年10月，在从巴西返回巴黎的途中，布罗代尔与吕西安·费弗尔不期而遇，两人在横渡大西洋的轮船上作了20多天的促膝长谈。这次巧遇在布罗代尔的史学生涯中无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史学文集》第二卷，法国阿尔托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② 《地中海与巴西的撞击》，见法国《世界报》1985年11月30日第8版。

③ 《长时段》，载《史学理论》第4期，第111页。

疑是个转折点。在这以前，他虽然曾与费弗尔有过谋面的机会，但还停留于一般的社交关系。20多天的共同生活使两人达到了“意气相投”、“无话不谈”、“亲如一家”的程度^①。费弗尔对这位比他年轻24岁的后辈十分赏识，不久便推荐他担任高等实验研究院历史系的指导教师，介绍他与年鉴杂志的另一位主编马克·布洛赫认识。从那时起，布罗代尔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已成为新史学派的积极成员，虽然还是默默无闻、初出茅庐的一名小兵。

193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之际，布罗代尔应征入伍，在莱茵河边界服役。法国的马其诺防线于1940年崩溃后，布罗代尔在战场被俘，关押在德国美因兹、吕贝克等地的战俘营里，为时达五年之久。监禁生活是教人懂得耐心的学校，而最能排遣孤寂和烦闷的，对布罗代尔来说，正是他的《地中海世界》。就像“过电影”一样，在囚徒的记忆中，浮现着浩瀚的内海波澜壮阔、层出不穷的历史画面。他就这样在“练习本”上写成了考证精确、卷帙浩繁、内容庞杂的一篇博士论文。练习本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寄到了留在巴黎的吕西安·费弗尔的手里。在1947年，即在布罗代尔获释后不到两年，这篇长达1375印刷页（译成中文接近150万字）和广征博引的论文成功地通过了答辩，在法国历史学界，布罗代尔的这一壮举是前所未见、独一无二的。

法国的“解放”为新史学派和布罗代尔个人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布罗代尔于1946年加入了年鉴杂志的编辑部，同年与吕西安·费弗尔一起创办了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系（经济和社会科学系），任该系的历史研究中心主任。新史学派从此声势大振，并逐渐由“在野派”上升到“当权派”的地位。毫不夸张地说，由布罗代尔领袖群伦的第二个时期也正是新史学派繁荣兴旺的鼎盛时期。

^① 这些话是布罗代尔夫人亲口告诉译者的。

三、布罗代尔的著作

当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于1949年由阿尔芒·科兰出版社正式出版时，吕西安·费弗尔亲自撰写了题为《走向另一种历史》的书评，在《形而上学和伦理学评论》发表。费弗尔指出，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博士论文“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它在这个意义上具有革命的性质。布罗代尔断然把西班牙的大政方针纳入到历史和自然地理的范围中去，首先研究了使人们的意志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和左右的经常性力量，他对这种起着引导、阻碍、遏制、推动、促进作用的力量所作的分析是前无古人的，这种摆布人的命运的力量，轻描淡写地用一个词来说，就叫地中海。在第二部分里，他列举了各种特殊的、但有一定恒在性的力量，这些无名的集体力量能够用年月日标出其存在的时间，也就是说，它们是在16世纪下半叶，即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在位期间，曾经起过作用的和可被捉摸到的力量。第三部分叙述历史事件：一大堆杂乱的、沸腾的和犬牙交错的事实。这些事实往往被第一部分研究的经常性力量所摆布，受第二部分列举的恒在力量的影响，但偶然性也在发挥作用，在总趋势的画面上绣出最引人瞩目和最出人意外的图样。”^①

以上这段引文对全书的内容和重点作了精辟而简要的概括。我们这里只要对历史的三个层次(结构、形势和事件)或三个时段(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再加以补充和解释就够了。首先，《地中海》一书在研究深度上明显地超过了第一代新史学家的成果，更加精确地揭示了长时段结构因素(地理、气候、动植物和文化)对短时段政治事件的隐蔽的决定作用。费弗尔和布洛赫确实强调了

^① 转引自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载《史学理论》创刊号第49—50页，1987年8月15日。

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想以咄咄逼人的“总体史学”吞并各种社会科学，但布罗代尔则把历史的“时期和空间”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根据布罗代尔的时空观，观察和分析缓慢流逝的、有时几乎静止不动的历史，与社会学对现时的摄影相比，可以更加真实地显示社会的结构，更形象地说，社会学的调查尽管翔实可靠，但它们所反映的社会“层面”却像剃须刀那么薄^①，而历史学对总体形象的粗线条勾勒，却能展示社会发展的趋向。这种趋向表现为“经济态势”或经济学家所说的“周期”。可供选择的“中时段”长达10年、25年、50年（孔德拉季耶夫周期）乃至100年（即所谓“百年周期”），例如1791—1817年欧洲物价趋向上升，1817—1852年逐渐下跌。这种循环周期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同样适用。至于事件，在布罗代尔看来，它们只是茫茫黑夜中萤火虫的闪光，或者夜幕笼罩下燃放的烟花，虽然光彩夺目，但却转瞬即逝。因此，对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崭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②

这部著作出版后很快成为“总体历史”和“比较历史”的经典名著，但在1966年再版时，作者不顾朋友的劝告，对全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增删，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彻底重写。1979年再版时又有新的增补。最后，在他的晚年，当有人问及《地中海》时，他声称这已不是自己的著作，而是“别人的著作”，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出现，他对这个历史总体的认识不再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继承了注重考证优良传统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同时也努力超越自己，力戒制造固定的框框或模式，限制历史学家观察昨天的眼界。

^① 《一生为了历史》，布罗代尔采访记录，载《文学杂志》第212期，第22页，1984年11月。

^② 参看《长时段》，载《史学理论》第4期第105—107页。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是布罗代尔的第二部名著。该书的写作计划是在1952年开始酝酿的。当时，吕西安·费弗尔建议与布罗代尔合写一部前工业化时期的世界史，题为《世界之命运》，由布罗代尔撰写物质文明部分，自己则负责精神文明部分。费弗尔于1956年去世，未能完成他的任务，留下布罗代尔单枪匹马，花去与《地中海》几乎同样长的时间，撰写成《物质文明》这部杰作。之所以称为杰作，一方面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布罗代尔个人事业达到了巅峰，另一方面他在该书中使用的关于物质文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三层分立的形象，对经济学家认识市场经济的实质开辟了一条新路。在这以前，不少经济学家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从而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布罗代尔在《物质文明》一书的结论中果断指出：“我认为，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毋庸置疑的区别”^①。他还揭示了混淆二者在政治上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在社会主义国家，为消灭资本主义而压制市场经济是导致商品生产萎缩、比例关系失调和供求矛盾尖锐化的根本原因。如果我国的经济学家能及时读到这部著作，说不定也就没有必要于1991年再对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问题进行争论了。

应该承认，布罗代尔对经济生活的三个层次作了巧妙的、独具匠心的安排。他把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统称为“物质文明”。这个由他发明、创造的新名词在西方国家的语言中容易引起误解：由于文明(或文化)本身属于精神的范畴，从构词学的观点看，“精神文明”几乎是同义反复，“物质文明”则是自相矛盾。实质上，物质文明包括着自给自足、以货易货、直接劳务交换以及家务劳动和“修配不求人”等准经济领域。这些被排斥在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三联书店1993年中译本第732页。

市场之外的活动，即使在今天的工业化国家中，据说至少要占国民产值的30%至40%。这些“日常生活”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建立在基础之上的塔身，即生产与交换的正常机制，与农村活动、摊贩、店铺、作坊、交易会、交易所紧密联系，这就是作者所说的以竞争为基本法则的“市场经济”。具有欺诈和独占性质的，并由少数大商人包揽的不平等交换构成宝塔顶，占着居高临下的地位，根据布罗代尔的定义，这就是资本主义。它的本质表现为：1. 始终建立在开发国际资源基础之上，其存在具有世界规模，其势力向世界各地伸展；2. 始终致力于巩固和扩大其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垄断；3. 始终未能并且永不可能统辖整个经济或全部劳动。这就是说，没有塔基（物质文明）和塔身（市场经济）的支撑，资本主义也就丧失了立足之地。资本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排挤，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挖了自己的墙脚。在这个问题上，布罗代尔承认与马克思关于“剥夺剩余价值”的分析不同，他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完全建立在对工业资本主义观察的基础之上”，“假如马克思能接触到摆在我面前的所有资料，我相信他或许会改变他的一些观点。无论如何，他用长时段观点考察历史实在的方法只能使我为之高兴”^①。更重要的是，布罗代尔从来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不喜欢历史哲学，不相信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会有结束的一天；在他看来，不平等既是社会的普遍规律，人就注定要生活在蜂巢、蚁穴一般的等级制度之下。

布罗代尔在接近70岁高龄时，才下决心撰写一部法国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他“留待晚年享用的一块白面包”，因为历史学家从来只是在叙述本国的历史时，才能真正做到得心应手。写作计划极其庞大，全书共分三大部分：《法兰西的特性》，《法兰

^① 引自布罗代尔的学术秘书玛丽-泰雷兹·拉比涅特小姐保存的一份“访谈记录”，采访者姓名和日期不详。

西的诞生》和《法兰西的命运》。而第一部分包括三个篇章：空间与历史；人和物；国家、文化、社会。阿尔托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的三卷书只容纳了第一部分的前两个篇章。写作计划是在1970年开始付诸实施的。当时，他一边把《物质文明》的手稿陆续发排，一边又在法兰西公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授法国史，留下的讲稿经修改、充实后即付梓成书。译者有幸在这位历史学家的工作室里生活了九个月；见到作者为撰写该书收集的几十箱卡片、几十集剪报和成千册参考书，翻阅经作者夫人打字整理的几厚本讲稿，不由对这种勤奋、诚实的治学作风肃然起敬。

可是，到了1985年，当该书第一部分行将出版时，布罗代尔只来得及在1985年10月20日专门为他组织的夏托瓦隆学术讨论会上介绍了撰写该书的原由。一个月后，他于11月27—28日晚间告别人世，使《法兰西的特性》成为一部遗著。其余的部分，即有关“法兰西的诞生”和“法兰西的命运”两大部分的手稿，至今留在他的工作室里，根据作者的遗愿，将不再公开发表。

除以上三部巨著外，我们还要提到由布罗代尔和厄内斯特·拉布鲁斯共同主编的《法国经济和社会史》（1982年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八卷本的历史著作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同时囊括了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的研究成果，甚至参与编写工作的史学家也分属不同的政治倾向，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由此或许可以表明，布罗代尔关于自己“既不属于左派，又不属于右派”、“不喜欢参与党派的政治斗争”^①的说法并非纯属自我标榜。

布罗代尔还留下两部《史学文集》（分别于1969和1990年由阿尔托—弗拉马里翁出版社出版）和一册《文明史纲》。史学文集的内容比较广泛，除开历史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联系、过去与现时的

^① 布罗代尔接受加拿大蒙特利尔《时事》杂志记者采访的谈话记录，载《时事》月刊1986年第2期第119页。

辩证关系、历史研究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等题材外，还包括作者的自传和他为《剑桥经济史》就欧洲价格史问题撰写的一篇文章。《文明史纲》是这位历史“教皇”专门为中学毕业班编写的一部教科书。布罗代尔毕生为“总体史学”而奋斗，但他从不忘记中学历史教学和青少年的特点，要求教师首先“为孩子们讲生动有趣的故事”。直到他去世前一个月，利用夏托瓦隆学术讨论会开会前的余暇，他还特地抽出时间，为土伦的中学生开了一堂课，讲述1707年土伦攻防战的经过。

四、历史后浪赶前浪

1945—1973年间，法国经历了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大体上也正是布罗代尔个人事业飞黄腾达的时期。在这“光荣的30年”，布罗代尔在著书立说、培育后进、建立机构等方面都取得辉煌的成就。

首先，他被授予一系列显要职务和荣誉称号：1949年接替吕西安·费弗尔，在法兰西公学主持“近代文明史”讲座，直到1972年为止；1956—1972年出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1962年创办人文科学之家，主持行政领导工作，直到1985年去世为止；1956—1972年任国家历史和地理教师资格会考评审会主任；先后获得20多所外国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称号，受任十多个国家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并于1984年当选为法国学士院院士。1976年，纽约州立大学成立了布罗代尔研究中心。

布罗代尔的著作，特别是《地中海》和《物质文明》，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两书现已被译成英、德、俄、西、葡、意、日、阿拉伯、土耳其、瑞典等十几种文字。1977年，《物质文明》三卷本尚未出齐，布罗代尔即应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邀请，在该校作了三次演讲，介绍了该书的梗概。于1984年由纽约哈珀和

罗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本，第一版印数达4万册，创1950年后美国严肃历史著作发行量的最高纪录。北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萨姆·金瑟指出：布罗代尔“是在美国最受欢迎的法国历史学家，三十年来，人文科学的任何一位大人物都没有取得类似的成功”^①。

他主持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为开展跨学科研究和比较研究的重要阵地，本着“兼收并蓄”的方针，这所与正规大学相竞争并以不拘一格培育人材为宗旨的高等学府（学生自由听课，选择指导老师，确定研究课题，不受任何限制）接纳了雷蒙·阿隆、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科、夏尔·贝特兰、阿兰·图兰纳等社会科学各门类的头面人物，发动众人共同推进“文明史”和“文化场”的研究。人文科学之家更侧重于发展国际学术交流，资助外国学者到巴黎参加小型学术会议，借以扩大新史学在国外的影响。布罗代尔对后辈的培育和提携使许多青年历史学家得以脱颖而出：今天业已成为史学名家的乔治·杜比、埃马努厄尔·勒鲁瓦-拉杜里和雅克·勒高夫等人，在认识布罗代尔以前，还都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年鉴杂志在费弗尔和布洛赫苦心经营的时代，读者不过三、四百人，其影响局限在“知识精英”的小圈子内。到了1968年，当布罗代尔把刊物的编辑重任交给由勒高夫、勒鲁瓦-拉杜里、费罗、勒维尔等人组成的班子时，法国所有历史学家要从“默默无闻”转到“崭露头角”，几乎都必须先在这份杂志上发表文章。毫无疑问，刊物在法国乃至世界的社会科学界自然也确立了某种权威地位。

布罗代尔在达到权势的巅峰以后，有感于法国五月风暴所表现的后生可畏，陆续把拥有实权的几个重要职务付托给他的门生。除年鉴杂志编辑部改组外，他于1972年又辞去社会科学高等

^① 萨姆·金瑟：《布罗代尔在美国》，载法国《文学杂志》第212期第38页，1984年11月。

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从此，法国新史学派进入了第三个时期。

在名义上，直到布罗代尔去世为止，他仍被尊奉为新史学的“国王”、“教皇”、“开明君主”或“老板”，但在暗中却逐渐出现了一些与王权挑战的独立领地。首先，人们看到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与人文科学之家（两个机构合占一幢楼房）间或出现摩擦。在勒高夫和孚雷担任院长职务（由选举产生）期间，研究院有时就不听“老板”的招呼；而在布罗代尔去世以后，当选院长的竟是人类学家马克·奥热，而对这位建院元勋的遗孀简直拒之千里之外。至于年鉴杂志，在1979年纪念创刊50周年的长达12页的文章里，安德烈·比尔基埃尔甚至连布罗代尔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在1985年10月夏托瓦隆讨论会出席者的名单上，只见到杂志6位主编中的两位：勒鲁瓦-拉杜里和费罗。这些当然都不是偶然的疏忽。

在布罗代尔方面，他对年鉴杂志和第三代新史学家也有诸多抱怨。他曾哀叹“在精神上感到孤独”^①，又说，“在吕西安·费弗尔去世后（1956年），我甚至想停办年鉴杂志。当我于1970年撒手时，杂志已不再符合布洛赫、费弗尔或我自己的思想”，究其原因，他补充说，“年鉴本应是份无法无天的刊物，但在1968年的剧变后，它已变成极其正统的、为一些人成名成家充当阶梯的大型历史刊物”^②。在夏托瓦隆，他故意把自己的历史观与第三代新史学区分开来，称后者为“新新史学”，“因为门生们没有遵循我的教导……我与我的后继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③。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是两代人之间的一条“代沟”。法国《新

① 《一生为了历史》，布罗代尔采访记录，载《文学杂志》第212期第24页，1984年11月。

② 《史学“教皇”八十岁》，布罗代尔采访记录，载《历史》月刊第48期第75页1982年9月。

③ 《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一堂课》，法国阿尔托出版社出版，1986年，第162页。

观察家》周刊为回顾1975至1985年法国思想界演变过程而组织的一次座谈会打出了“大扫除”的旗号，公然声称“思想宗师寿终正寝，精神领袖踪影全无，意识形态被唾弃，思想体系遭贬斥……新一代迫切要求翻过历史的一页”^①。值得指出的是，座谈会的主持人弗朗索瓦·孚雷正是新史学派第三代巨头之一，他的以上宣言难道不就针对着布罗代尔的吗？这一代新人对他们的宗师的批评表现得如此辛辣和尖刻，使人不能不产生他们尊重作品而不尊重作者的感觉。年鉴杂志编辑部在布罗代尔逝世时发表的社论说得更加透彻：“不必掩盖，15年前，当费尔南·布罗代尔卸职时，他对刊物持有许多不同意见，并逐渐与刊物相疏远。他讲述了何以有所保留和有所批评的理由。他不否认刊物变得多样化了……但他责备刊物分散了兴趣焦点，以至有时不分主次。他的计划是发展兼容人类科学各项成果的总体史学。我们则致力于一些局部性实验，希望更加明确地推行业已付诸实施的科学手段，通过对相关学科的比较，更加注意衡量学科实践的相互促进。”^②总体史学还是“七零八碎”的历史^③，这大概是布罗代尔与他的学生们的的主要分歧所在。此外，由于在当今法国社会中历史研究日益明显的商品化，历史著述越来越被人们当作经商谋利的工具。一些新史学家对商业利益的兴趣超过了刻苦的求知治学。弗朗索瓦·道斯曾画了三张图，展示新史学巨头们在大众传媒部门的众多兼职^④。要求他们再像布罗代尔那样煞费苦心地花20多年时间完成一部

① 《法国思想界十年回顾》，见《当代西方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03页。

② 《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86年1—2月，第6页。

③ 参见弗朗索瓦·道斯：《七零八碎的历史》，法国发现出版社，1987年版。皮埃尔·诺拉在《史学创作》（加利马尔出版社，1976年版）一书中开宗明义指出：“我们生活在历史学四分五裂的时代”。

④ 参见《阅读布罗代尔》，发现出版社，1988年版，第163、168、169页。

“言前人所未言”的著作，自然是不可能的了。人们注意到，由新史学四巨头（乔治·杜比、埃马努埃尔·勒鲁瓦—拉杜里、费朗索瓦·弗雷和莫里斯·阿古龙）于1992年在加利马尔出版社推出的一部法国史，以其可读性和趣味性在公众中激起了一片叫好声，但布罗代尔的风格在书中却已荡然无存。能不能认为这四位作者还是布罗代尔遗产的继承人，确实成了问题。

历史从来都是后浪赶前浪。第三代新史学家的“车轮打滑”，偏离布罗代尔的轨道，究竟对史学研究的纵深发展是好是坏，年鉴派将往哪里去，我们且拭目以待。

附言：本书中译本的图表翻译、译名统一由张慧君同志完成，她还作为第一读者，通读全书并对译文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在此谨向她表示敬意。

顾 良
1993年11月

献给我童年时代的光明——
我的祖母埃米利·科尔诺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编 空间和历史	15
第一章 法兰西以多样性命名	17
一 首先是描述、观察和展示	17
省份——地区和“地方”的集合体	21
去实地亲眼观察法兰西的多样性	30
二 力所能及地解释法兰西的多样性	37
千姿百态的欧洲,千姿百态的法兰西	38
微观气候,微观环境	43
地方经济怎样维护法国的多样性	45
国家和社会容忍多样性和混杂性继续存在	50
有多少城市,就有多少社会方程式	56
各省的地方特权	57
奥克语和奥依语	63
不计其数的方言(18世纪)	69
为史前地理学服务的方言学和地名学	74
文化人类学研究	79
三 距离:可变的度量单位	86
法国的四分五裂终于得到说明	90
多样性与历史	93
今日的情形如何?	97
第二章 人口分布格局:村庄、集镇和城市	98
一 从村庄出发	100

	超越村庄的多样性	101
	村庄的一个模式	109
	森林是“宝中之宝”	115
	森林是法外之地	116
	森林是避难所	117
	村庄力求生产一切	118
	必不可少的开放	121
	人口流动	123
二	解释体系中的集镇	127
	集镇的 模式	127
	1790年的贡德勒库尔(默兹省)及其村庄	131
三	解释体系中的城市	141
	什么是城市?	142
	举几个尽可能简单的例子	149
	贝桑松以及地区首府的问题	150
	位于十字路口的罗阿讷平原	163
	罗阿讷或运输的胜利	168
	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	179
	市内状况	184
	在19世纪和20世纪	185
	拉瓦勒兼得工业和远程贸易之利	187
	卡昂是城市的典型,更是可供参照的实例	195
	大城市的地位	202
	巴黎与其他城市相同吗?	205
	村庄、集镇、城市的结构模式的现状	212
第三章	地理是否创造了法兰西?	215
一	不要夸大法兰西地峡的作用	216
	1850年以前的罗纳河	218
	地峡及法兰西的统一	225

罗纳河边界	230
里昂的命运	235
罗纳河至莱茵河地区的现状	242
二 确定巴黎、法兰西岛和巴黎盆地的地位	246
巴黎盆地的优胜地位	247
巴黎为什么成为中心?	251
三 边界: 至关重要的验证	253
边界由来已久	254
凡尔登条约(843年)	256
四个关键的年代: 1212、1213、1214和1216年	259
“天然的”边界	261
从未征服的大海	266
四 搞些抽样调查是否有益?	271
东北部和东部边界	271
梅斯的地位为什么重要?	277
慢吞吞的战争	279
战争时期又该如何?	285
是否应对梅斯城寄予同情?	287
第二次旅行: 前往土伦	289
有何教训?	303
五 空间和历史: 本卷结束语	308
注释	311

图表目录

一个行省包括几个“地区”: 18世纪的萨瓦省	22
加斯科尼的多重品格	25
勃艮第的“地区”布局	29
法国屋顶建材分布图	36

几种南方植物在北方的种植极限	41
五大包税区	52
方言的缓慢退却	71
南罗曼语中界区	77
公元400年前后高卢中部的古罗马防线	78
多种家庭形态并存的45个省(1975年)	82
宗教战争的战火未能燃遍整个法兰西王国	插在86—87页间
1891年各省乡村(村落、村庄及“市镇组成部分”)分散的 人口布局	102
旧时代末年奥弗涅地区的季节性人口外流:地区分布 和职业状况	126
贡德勒库尔区及其附近地区	插在132—133页间
洛林地区的罗马大道	135
贡德勒库尔区的人口状况: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劳动 力分布	137
18世纪移居艾克斯昂普罗旺斯的外乡人	146
凡尔赛已婚男子的籍贯(1682至1689年)	147
马赛和鲁昂在法国各地市场的发展很不平衡	插在148—149页间
里昂的外来移民(1529至1563年)	151
贝桑松市及其位置	152
贝桑松四周的电话联系(1956至1958年)	162
沙尔略的货运被罗阿讷所夺走	170
18世纪中叶的罗阿讷市	171
卢瓦尔河上的大驳船	173
罗阿讷社会职业状况的演变	181
卡昂的辖区	197
中世纪末巴黎的食物供应路线	209

里昂附近的罗马道路系统	228
罗纳河的岛屿	231
罗纳河航道疏浚工程计划(沃邦奏折1686年的附本)	235
罗纳河20世纪的整治工程	244
公元843年凡尔登条约对查理大帝帝国的划分	258
东部的要塞	273
边沿区	275
梅斯省驻军状况	280
1707年的土伦市及其防御	300
1707年土伦围城战	301

导 言

“历史自成而不自知”

——让-保尔·萨特¹

一言以蔽之，我怀着与儒尔·米希莱同样苛刻、同样复杂的一片真情热爱着法兰西，不论是它的美德还是缺陷，也不论是我乐于接受的还是不易接受的东西。但是，这种感情不大会流露于本书的字里行间，我将小心翼翼地不使它见诸笔端。感情可能会给我设下圈套，也可能对我突然袭击，我要时时对它严加防范。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或许还会表现出对他的偏爱。因此，我竭力要像介绍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那样来介绍法国，就当它不是我的祖国。夏尔·佩吉曾经说过：“观察法国，就要置身于法国之外。”²此外，历史学的演变正越来越迫使我们这些历史学家变得冷酷无情。否则，离不开其他人文科学的历史学就不会像其他人文科学一样，发展成一门科学，即令是并不十分完善的科学。

历史学家作为尽可能超脱的“观察家”，应该强制自己保持沉默。我以往从事的著述工作对我作出这样一种努力或许会有所裨益。在我撰写的关于地中海和资本主义³的两部著作中，我只是从远处，有时甚至从异常遥远的地方，瞭望法国，把它当作许多现实中的一个，并且与其他现实同等看待。正因为如此，我很晚才回到这个近在咫尺的圈子，而且显然感到高兴。事实上，历史学家只有研究本国的历史才能真正得心应手，他几乎可以本能地了解它的迂回曲折、独特品格和薄弱环节。对于异国他乡，无论他怎样

博学，也永远不会拥有这些王牌。因此，我没有先挑可口的白面包吃，而留着在晚年享用。

所谓摒弃个人的感情，也就是超脱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激忿或留恋，我们的“本能反应”，我们的毕生经历以及时代给予我们的种种影响。这正是伊波利特·泰纳在他的《现代法国的起源》一书中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用他的说法，这种观察就像是昆虫脱壳⁴；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那部令人刮目相看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①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⁵。至于我自己，但愿也能够做得差强人意。

可是，法国历史丛书已多不胜数，额外再加上一部是否明智？乔治·科罗泽于1583年去世，1615年出版的他的遗著《法国历史的瑰宝》未免令人失望。但在15世纪末，罗贝尔·加甘不是早已把他的文集称之为《法国历史的明镜和编年史的大海》吗？到了今天，更应该说是大洋了。所有这些唾手可得的史著述都很不错，有的甚至相当出色。米希莱的作品可谓无与伦比⁶，拉维斯的鸿篇巨著为历史学家所必读⁷，至今一版再版⁸。罗贝尔·菲利普的著述⁹则是绝好的知识宝库。对我来说，即使一些提纲挈领的简史也各具价值。我将不时援引它们，从中汲取教益。同样，我为雅克·马多尔¹⁰在《法国历史》中持论公正所倾倒；吕西安·罗米耶¹¹、尼古拉·约尔加¹²、欧内斯特·居尔迪斯¹³、欧仁·卡芬雅克¹⁴的论著也不例外；还有于连·邦达1932年发表的《法兰西民族形成史概论》；还有吕西安·费弗尔未正式出版的《光荣与祖国》书稿，原系1946年和1947年在法兰西公学的教材，我手头保存着他于1956年8月完成的手稿。我能利用这份手稿，实属幸运。近十年来，有关我国往昔的论文、书籍、专著和文章更是不计其数。使我们的

① 该书中译本已于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冯棠，校者桂裕芳、张芝联。——译者

历史知识大有拓展，对此无需赘述。

此外，我还腾出时间，阅读了不少在考证方面颇有争议的其他作品，大部分论著都有助于进行长视角的透视，把我们从“历史事件”无穷无尽的片段中解放出来。出于偏爱也好，是种癖好也罢（对此姑且不加评判），我甚至还收集了一定数量的论战性文章和有悖常规的论著，它们有助于我们跳出确信和习惯的圈子，激励我们展开争论，提出有益的疑问。即使它们并不能彻底推翻我们的见解，但它们至少可以改变我们认识问题的角度，或对我们的见解作出细微的修正。

让我们还是重复一遍提出的问题：在这不计其数的论著中，是否有必要再另加上一部新著？其实，30年前，吕西安·费弗尔就计划撰写一部《法国史》，但可惜没有时间认真去做；我深知此事困难甚大，但出于与吕西安·费弗尔相同的理由，终于经受不住诱惑。近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的职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历史的形象和问题也已彻底改观。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会重新提出，但将改变方式。此外，我们还应该弄清楚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尤其因为，前事既是后事之师，又是现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确定法国历史的特性也就意味着确定法国人在其自身生活中的地位。史学界一位朋友对我说：“许多历史学家把历史封闭起来，我们的任务却要让历史走出高墙。”¹⁵我想更为恰当的说法应该是摆脱牢笼。

这一革命性的突破首先是防御薄弱的历史学领域遭受各种人文科学侵入的结果，即地理学、政治经济学、人口统计学、政治学、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心理学、文化研究、社会学等等侵入的结果。历史学就这样受到多种多样观点的冲击；它同时也接纳一系列新问题。困难恰恰在于历史对任何学科都不能拒之门外（历史学家并不始终意识到这一困难）。实际上，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一种

本事,但我们又不得不谈论整体性,谈论“历史的无所不包”¹⁶,断言“无所不包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¹⁷,或如米希莱已然指出的

那样:“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就是历史”¹⁸。

无夸张地写道：继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之后的“四、五个世纪在时间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²³。他确实有些夸大其辞，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绝不会荒唐地用短尺去丈量历史。有鉴于此，我毫无保留地欣然赞同今天的历史学家放手拓宽他们的历史时间尺度，一心追逐“人类生活中许多不被重视的、鲜为人知的方面”（这是我从马林诺夫斯基²⁴那里借用的表述），并且像皮埃尔·博诺一样津津乐道地谈论“源流的重力”。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拥有丰富的原料，也就是必须拥有充裕的历史时间。长时段强制我们要花费力气。

我在上面刚刚提到了伊波利特·泰纳的《现代法国的起源》和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对于这两部我所欣赏的作品，恕我冒昧直言，它们的通病正是认为法国孕育于18世纪的“启蒙时代”，并且在法国大革命的风暴中经受悲壮的考验而终于诞生。用大写字母R开头的革命不久前依然被奉若《圣经》，依然是一项政治承诺或意识形态信仰。显然，我反对这种虔诚，正如反对其他形式的盲从或将往昔理想化一样。但是，我更反对由此而缩小历史空间：旧制度、法国大革命，这些都是很近的事件，几乎可以算是现代的事件……只要伸出手，我们就能够触摸到它们。有待我们扎扎实实地去研究的应是从罗马征服高卢前直到今日的法兰西的厚重的全部过去。毫无疑问，路易十六治下的法国已是一位年迈的老“人”。在此顺便提一句，泰奥多尔·泽尔丹的鸿篇巨著《法国情爱史》²⁵竟从1848年写起，这实在令人遗憾。难道我们真是如此年轻吗？难道我们以及我们的情爱是刚刚诞生的吗？我们同样不能容忍，像罗贝尔·福沙尔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竟把法国的过去当作手风琴一样随意压挤。他写道：“如同上帝羔羊一般神秘的高卢与我们的国家几乎没有关系，我国没有经历洪荒时代，它在历史过程中诞生。”²⁶

依他之见,仿佛历史不可追溯到洪荒时代;仿佛史前史和历史不是单一的过程;仿佛我们的村庄并非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在我们的土地上扎根、仿佛高卢没有预先勾画出法兰西将要成长的空间草图;仿佛那些日耳曼人,那些远离高卢的和不受其魔力影响的小群体,那些因而有幸保存自己语言的小部落,他们五世纪时越过莱茵河大举迁徙,在经过若干世纪的沧桑之后,竟没有在现代留下明显的烙印(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比利时就分为两个语言地区);仿佛在我们的血液中和生活里,历史血缘学²⁷没有显示出遥远的“蛮族入侵”的任何标记;仿佛信仰和语言并不从极其遥远的蒙昧时代逐步演变至今……然而,确切地讲,本书的目标正是在可能的条件下揭示这一潜在的、深层的、长命百岁的历史。

同样地,目前法国的地域,即“六边形”的国土,并不是应予参照的唯一尺度:在它下面还有一些较为细小的尺度:地区、省份以及长久以来曾经保持并且现在依然拥有某种自主性的“地方”;在它的上面有欧洲,欧洲之上还有世界。马克·布洛赫断言:“没有法国史,只有欧洲史”²⁸。但是,如果再想起他的另一句名言:“唯有世界史才是真正的历史”²⁹,我们可以补充说:“没有欧洲史,只有世界史”。保尔·莫朗写道:“我只能设想镶嵌在地球仪上的六边形”³⁰。

事实上,欧洲、世界都曾参与了我国的历史活动:它们把我们推来推去,一有机会就把我们碾得粉碎。可是,难道我们对欧洲和对世界就清白无辜了吗?埃德加·基内下面的话,从他1827年写下以来,其含义变得愈加模糊:“近代人类的一项殊荣便是他们构想了万国史”。³¹但是,不言而喻,对任何民族来说,不得与世界进行越来越多的对话并不意味着其自身的历史就此消失。只有混合,没有融合。泰奥多尔·泽尔丹问道:“难道法国出现的最根本的变化,竟是法国人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控制吗?”³²绝非如此。

因法国历史与欧洲和世界的命运犬牙交错而在局部的表层和内涵造成的混淆，在我构思这部著作之前，曾经使我大伤脑筋。——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在撰写过程中，我发现法国史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通过它的切身经历，可以揭示出欧洲和世界的进程。

因此，长时段（首先是它，尤其是它）、六边形、欧洲、世界，这些才是我将探究的时空范围。这些范围使我能通过时空进行必要的比较，从事某些“实验”。我说的是，依据一项事先准备好的计划，通过变换有待审视的成份，可以随意反复进行的实验。这样，我们就像置身于一个实验室中，对往昔的法兰西进行“跨时空”³³的比较和实验，这些比较将使我们得以瞻前顾后地统观全局，找出带有倾向性的规律（我说的不是法则），正是多次反复的规律性现象才使深层的历史成为一种追溯性的同时也是对整个人文科学不可或缺的社会学。让-保罗·萨特斩钉截铁地说：“辩证法和人类实践正是通过历史而臻于完善。社会学本身不过是历史整体的瞬间而已。”³⁴ 艾米尔·涂尔干也曾预言：“总有那么一天，历史学精神与社会学精神之间将只存在细微的差别。”³⁵ 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一步。然而，要想使二者会合，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旨在寻找相似点的比较史学，任何社会科学舍此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我试图从不同人文科学的角度，来分别考察法兰西的全部历史。让我们再次按顺序排列：地理学、人类学、人口统计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或政治科学、文化和心态研究（是否可以称为文化学呢？）、社会学、国际关系（法国在国外的活动）……

当然，这并不是一项顺理成章的计划，而是需要冒点风险的一种选择。每门人文科学各有其自身的领域，都有它需要解释的一系列问题。然而，每门科学都势必与整个社会现实有牵连，也就是说与一切其他人文科学的实质内容相联系。每门科学既由自身

所决定，又受到外部的制约，它所阐明的领域也会涉及其他领域。从蒙巴纳斯塔楼和巴黎圣母院的高处鸟瞰巴黎，并不是为了发现地平线，而是为了展望城市的全貌。实际上，观察的每一个局部——对真实的每一种探索都具有整体性，正如罗贝尔·福沙尔所说，它必定牵涉到社会整体³⁶。因此，说到底，不存在不具有汇总能力的人文科学。那么，既然由所有社会科学针对现时提出的问题，要单独由历史针对过去提出，历史学怎么能不比任何社会科学更具有整体性呢？

这一选择使我们处于既有利又有弊的地位。事实上，每当我们阐述某个特定领域时，我们都面对法国的全部历史，都冲破预先划定的框框。因此，各章之间不免有些重复、累赘，即使已经讲过的话在重说一遍时都从不完全照搬；即使在以不同的方式重新陈述相同的过程时，观察都前进一步。但到头来，我不得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我所看到的東西，以及在看到以后我自以为理解的东西。比如，在谈到地理学时，我怎么能不涉及经济、社会、政治、人类学或其他相关领域呢？可以观察到的一切形成一个整体，一个必须耐心地、反复地予以阐明的整体。为此，我没有过多犹豫，专心致志地去进行观察和抒发直感，而不考虑这样做是否符合我们的科学范畴，因为无论如何，科学范畴也都是人凭空制造出来的。

另一个难点，对于读者来说尤其如此，就是我的阐述不断把远古和近古、过去和现在混杂在一起。虽然过去和现在被丘陵、山脉、断裂和差异等障碍物所隔开，但过去终究经由大道、小路乃至通过渗透而与现在相会合：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的过去在我们周围飘浮，我们也就莫名其妙地被它粘住了。一位社会学家写道：“它像潮水一般向我们涌来，一旦离开了它，任何现象也就变得不可思议。”³⁷我试图搜索和追踪的正是这些潮水，这些来自法国历史深层的涌泉，进而判断它们怎样像江河汇入大海一样汇合到现时中

来。

一部著作的标题从来就不是完全中性的。那么，我有没有理由将本书称之为《法兰西的特性》呢？这个书名对我具有诱惑力，但它也使我伤了几年脑筋。书名本身从侧面提出了我刚讲到的那些问题，另外又加上其他一些问题。其模棱两可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系列的质询，你刚回答完其中的一个问题，新的提问就接踵而至，而且永无止境。

那么，法兰西的特性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品性，是事关全局的核心，是法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是绵延不绝的往昔慢慢垒积而成的结果，正如不见天日的海洋冲积层在年深日久以后形成了地壳坚硬的外表。如果不是如此，又该是怎样呢？总之，这是残存、交混、添加、混合的过程，是旨在求得永存的针对自身而进行的一场战斗。战斗一旦中止，一切也就随之坍塌。一个民族为求得存在，只能对自身进行无穷无尽的探寻，朝着合乎逻辑的演变方向实行自我变革，坚持不懈地与其他民族对抗；认同本民族最优秀的和最基本的品质；从而在高贵的形象前，在仅为局内人（杰出人物也好，国家的全体民众也好，尽管后者并不总在此列）所知的暗语中看出自己的特性，在成百上千种验证中，在各种信仰、言词、借口、默契、汪洋大海般的无意识暗流中，乃至在意识形态、神话和幻想中认出自己的特性。此外，任何民族特性势必以具有一定程度的民族统一为条件，后者可谓前者的反映、位移和前提。

上述见解事先就要求谨防任何简单化的表述；把法国仅仅归结为一种表述、一则方程、一个公式、一种形象、一个神话，肯定是徒劳无益的。例如，雷蒙·吕多尔夫那部令人失望的著作就犯有以上的毛病，它把我们的国家说得很坏，却没有说出究竟坏在什么地方。

的确，身为法国人的我们，在过去和在此时此刻，有谁不向自己提出有关这个国家的许多问题？更不用说我国在其前进途中不断经受灾厄的悲惨时刻。对我们来说，每一次灾难都是巨大的历史裂口，就像今天我们乘坐飞机旅行时，在厚厚的云层中突然出现的那些光洞和光井，在它们下面，我们发现了陆地。我们的历史充满了沉重的灾难、深渊以及阴郁的光井：不用上溯到很远，就有1815年、1871年、1914年……而在1940年，丧钟再次在色当四郊敲响，敦刻尔克的悲剧以前所未闻的大溃退而告终……确实，这些极其深重的创伤随着岁月流逝逐渐愈合了，消失了，遗忘了——这是任何集体生活无法抗拒的规则：一个民族并非某一个体，不是某一个“人”。

我曾亲身经历过那次大溃退，因此，我同许多其他人一样，曾在1940年夏季思考过上面的问题。命运是多么作弄人！就在那年夏天，到处都是阳光明媚、百花竞艳、生机勃勃的景象……我们这些不幸被俘而遭监禁的战败者，我们代表着战败的法国，犹如一处沙堆上被狂风扬起的尘土。真正的法国，幸存的法国，深层的法国还在我们的身后，它九死一生，总算还是活了下来。假如人们在明天不滥用其魔鬼般的摧毁力量，法国将比我们的焦虑、比我们的个人生命、比我们经历的充满曲折事变的历史寿命更长。而在这部历史中，每天出现的危险像火焰一样在我们眼前闪闪发光，让人揪心，然而转瞬即逝……从那个已经变得遥远的时期开始，我就没有停止过对埋藏在深处的法国的思考，它不顾一切地依据自身历史的倾向性规律继续前进。本书模糊的标题便由这种迷恋而产生，而我慢慢也就觉得习惯了。

有个例证伴随着我的整个写作过程。西班牙（读者也许知道，它在我的生活中有着多么巨大的影响）也同样历尽沧桑、九死一生。1898年对美国进行的非正义战争给了它异常猛烈的打击；战

争使它重振帝国威风的打算顿时化为乌有，使它不再用励兵图治的托词硬撑门面。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被称为“1898年的一代”的知识分子，猛然面对国家的命运，作出了强烈的反应。米盖尔·德·乌拿穆诺的回答便是他的《西班牙的本质》³⁹一书；昂热尔·加尼维则在他的《理想的西班牙》⁴⁰中寻找象牙之塔；奥尔特加·伊·加塞后来更把西班牙视为“无脊椎”动物，这个悲观的形象显然是站不住脚的⁴¹。

在精神上，我乐于与这批卓越的文人为伍，赞同他们作出的反应。然而，我决不想拜他们为师。再说一遍，我不相信法国有一种本质可言（西班牙也不例外），我不相信任何简单的公式，也不相信过时的词语和概念的价值。我只想陆续登上几个已知的观测所，进行一番合情合理的和不带任何先入之见的调查，为的是弄清法兰西悠久历史的深层结构，研究法国和世界的发展趋向。我将不在其中夹带过多的个人感情……

《法兰西的特性》共分四大部分（出版者注：在这四大部分中，作者只完成了我们以三卷形式出版的前两部分）：第一编《空间和历史》（以地理学为主）；第二编《人和物》（人口统计学和政治经济学）；第三编《国家、文化、社会》（涉及政治学、文化研究、社会学）；第四编《法国在国外》，这最后一编将突破国际关系史的惯常范围，并将作为本书的结论。

鉴于以上的顺序排列，别想在本书中找到过分合乎逻辑的思路。然而，本书的计划将同书名一样，不可能保持真正中立的立场。难道人们可以像传统几何学中的循环排列那样，不受惩罚地移动历史成份吗？乔治·古尔维奇认为，任何研究所遵循的或应该遵循的途径，都是从易到难，从不言自明的东西过渡到慢慢才能领悟的东西⁴²，换句话说，也就是从简单到复杂，从表层到深层……

在研究法兰西的特性时，我是否有意无意地使用了以上的方法呢？地理学是最具体的一种观察手段：睁开眼睛，从人们看到的、每个人都能看到的事物出发，一般而言，这毕竟不是件天大的难事。人口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有其自身关注的问题，但也不难被人弄懂。经济学在人文科学领域具有最强的科学性，它的一大套规律也是好学的历史学家完全能够学会的。说到国家，事情就复杂化了。关于文明以及无所不在的文化渗透和扩散，麻烦显然更多，至于社会，我们人文科学家抓不住摸不透的社会，面临的考验更要严重得多。不过，到了本书的最后部分《法国在国外》，我的脚跟不又可以站稳了吗？这个题材不是早就被传统史学家挖掘一空了吗？一点不错，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再用往日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了。就我本人而言，我甚至逐渐意识到法国的命运首先是世界命运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不仅在今天是如此——今天，不论我们是否乐意，世界力量正在我们的身边聚合和凝固，并且把我们紧紧捆住——，而且在昨天已然是如此。请想一想被罗马帝国征服的高卢，照斐迪南·洛特的说法，那是“我们历史上最大的灾难”⁴³；想一想和欧洲一道投入十字军东征的法国；想一想为资本主义经济——它于16世纪前已在欧洲立足生根——所席卷、所改造和所奴役的法国；再想一想在风雨飘摇的当代世界中破浪前进的法兰西航船……

就这样，过去和现在成了一对分不开、折不散的伴侣。还应加上未来。于连·格拉克写道：“历史本质上是以未来的名义对当代提出的警告”⁴⁴。用让-保罗·萨特的话来讲：“如果时间不具有辩证的特性，即是说，如果人们不准未来对现时施加影响，那么，以现实运动出现的辩证法也就随即垮台。”⁴⁵简而言之，当我们跨过“今日的大门”⁴⁶时，现时只有在能向明日延续的条件下才是稳固可靠的。

因此，我们就请历史不再四平八稳地追溯往昔，而去“展望风云变幻的未来”。恰如约瑟夫·夏佩伊所说：“从有形的历史向无形的历史”⁴⁷过渡（无形的历史即未来的历史），难道不正是历史沉思的必然运动吗？当我首先通过观察法国深层的历史来研究法国的特性时，我为之困扰、进行思忖的难道不是法国的未来吗？昨日和现今矛盾着的力量彼此交织，不断地生发演化，成为一部深刻的历史，法兰西正是它的衍生物。这些力量明天仍会存在，一切将在其中建构，或出于不测，一切也可能在其中毁灭。对于这种前景，人们很难推断真正的原因，更不用说预测其发生的准确时刻了。

值得庆幸的是，计划撰写的两部续卷——《法兰西的诞生》和《法兰西的命运》并不要求预先作出解释或评价。在这两部著作中，我将按照历史的顺序，重新论证所有史学前辈已经阐述过的那些问题，即使我的回答将与他们的回答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游戏规则不正是如此么？无论如何，对我来说，这将是利用各种法国史积累起来的“财富”的一种方式。我将为之付出心血。我将竭尽全力完成这部宏篇巨著的基本篇章。因为，倘若法兰西的特性——我们的研究将通过它而展开——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法国的命运的话，倘若它能够构成这一命运真正的基石的话，那么，我也就胜券在握、或几乎稳操胜券了，而我为之奋斗的准则至少也就得到了确证。

1981年10月2日

于蓬蒂约（上萨瓦）

在撰写一部书的前言时，作者对读者要讲的话真是没完没了。

这难道是为了把书留在身边更长一些时间？让—克洛德·布兰基耶为准备作一次长时间的电视采访(1984年8月)，向我提出了一些友善而执着的问题。我不得不承认，我着手撰写这部法国史，不仅是出于上面列举的那些理由，也是为了向自己证明，我所倡导的史学形态能根据一个为广大公众所接受的实例而证明其正确。只有正确的或至少是合理的问题体系仍然是不够的，还必须让它接受事实的考验。正如一位年轻的史学家所说：“系统论者对经验论者退避三舍”⁴⁸，在我看来，这种表述方式是一清二楚的。照这样去做，我或许可能从两方面把我的意图交代清楚：一方面是通史和理论史，另一方面是法国史，我将努力同时兼顾这两个方面。

1985年7月11日

于塔耶

第一编 空间和历史

《法兰西的特性》第一编由三章组成，它们所论证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在着手论证前，我想先向读者说明本编的指导思想。事实上，我力图解释的乃是法国的历史与领土之间多种多样、错综复杂、难以把握的关系；领土容纳着和承载着历史，并且以一定的方式解释历史，尽管还远不可能对历史作出完美的解释。

地理研究显然存在着多种途径。人们可以根据地理自身的问题或根据它与其他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之间的交融关系去研究地理，关注现时问题的地理学家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地理将主要是重新理解、重新衡量、重新阐明法国的过去的一种方式，这当然是就我们自己关注的问题而言。何况，地理学也无保留地愿意为我们帮忙。自然景观和地理空间不单是活生生的现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过去的延续。不复存在的地平线展示在我们面前，并通过崭新的场景再现出来：土地像皮肤一样注定要保存各种旧伤的瘢痕。

此外，只要略加注意或稍富想像，环境就会在我们眼前重新展现昔日的风采，在这方面，一些城市要比其他城市保存得好些，如在韦泽莱，在奥坦……在今日世界尚未加以完全改观的许多农村，如福雷兹¹、比戈尔地区²、卢埃格³、普瓦图的加蒂纳⁴、塞纳河畔巴尔地区⁵以及上百处其他地方，历史的陈迹仍顽强地显示着生命力……请大家且把今天忘却；以往的莱茵河和罗讷河不像今天那么听话和驯服，而是充满了野性，在这两条航行不便的水道，无畏的船夫拚力逆流而上。请在思想上暂且离开现时……

然而，本书的宗旨不仅是对往昔的追溯，而且还是在古今之间进行反复的比较。事实上，地理观察的价值恰恰在于堆积起来的历史现实的深厚、久远和丰富。我们必须加以分辨，然后进行比较。地理将向我们展示昨日和今日之间的联系，提供必要的解释。“土地”、“人文氛围”、“自然环境”、“生态系统”，这许多词无不确指地理学对历史学的贡献，地理比较给予我们的教益完全可以同最丰富的历史档案相提并论。

以下三章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首先，我们将要考察法兰西的多样性：组成法兰西的一系列独立地区酷似镶嵌画上那些色彩和形状各异的玻璃。我在第一章中力图要“显现”的正是这种多样性。

不过，这些玻璃已由水泥牢固地粘合在一起，出自迫不得已或填空补缺的需要，随着交换和道路的发展，地区和地方、村庄和集镇、集镇和城市、行省和国家终于被缝合成一个整体。这也正是第二章《人口分布格局：村庄、乡镇和城市》所要解释或开始解释的内容。透过城市和乡村的景色，我们将寻求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而展现几个大小不等的相当严密的整体形象。

这是一些在未来的民族国家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整体。因为，统一的法兰西，总体的图象，毕竟已经形成，并且历时已久……空间和环境对法国的统一甚至起了促进的作用。这个法国在自己的地域范围内建立了起来，屹立于欧洲和世界的一角。因此，我给最后一章所取的标题便是《地理是否创造了法兰西？》

用我学生时代的“教育学”术语来说，比较空间、人、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将成为统帅本编各章的一条主线。请读者原谅，我在阐述过程中未能做到径情直遂，而是绕了好多的弯，举了好多的例子，力求使交响乐的所有音符能够同时被人听到。

可是，谁又能抗御得住这样的诱惑呢？

第一章 法兰西以多样性命名

作为开始,介绍事物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一眼看到的东西如实地讲出来。但刚要从事这种最初的观察,我们立即就发现法兰西的统一躲了起来。人们原以为一把就能把它抓住,可它偏偏溜之大吉。无论在远近的过去或是在今天,都有成百上千个法兰西的存在。我们且接受以上的事实,承认它们大量地、顽固地存在着,这对我们并不是件不愉快的事,甚至对我们也并无太多的危险可言。

一 首先是描述、观察和展示

法兰西的千姿百态说来已是老生常谈。同样还可以说,它的地域“斑驳陆离为世所罕见”¹,顽强地显示其令人惊叹的“乡土特性”²,犹如一幅“风景镶嵌画,其复杂多变竟是绝无仅有”³。“远行人足迹所至……景色始终在变化”⁴。每座村庄,每个山谷,每个“地区”,莫不如此。“地区”是个范围不大的地理单位,如布赖地区和科城地区等。其名称由高卢时代的pagus(“地方”)一词演变而来。每座城市、每个区域、每个省份更各有其鲜明的特征:不仅是别具一格的自然风光,不仅是人打下的各种烙印,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习俗,“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确定基本人际关系的一整套准则: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朋友之间和邻居之间的关系”⁵。所有这些差异在昨天比在今天更加明显:名目繁多的地方特权、俚语

方言、地方风情、传统民舍(石块、砖瓦、灰土和木材)、地方服饰在昨天不是还原封未动保存着吗?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度量单位之多更达到离奇的程度。据拉瓦锡(1787年)说,仅佩罗讷财政区一隅之地,“就有17种不同的‘弓丈’,每种‘弓丈’的丈量单位和跨度各不相同”⁶。

五花八门的度量单位曾经使行政当局大感头痛。以葡萄酒桶为例,是否能定出一个相同的容量呢?有人于1684年向普瓦图巡按使提出这个问题。他回答说,这种想法实在荒唐,并立即举出一连串令人头晕目眩的“酒桶”,它们从名称到容量全都因地而异,并且竞相使用。这里还不算在普瓦图市场上出现的来自贝里、利穆赞、波尔多等地区的酒桶。可以说,统一度量单位简直就像化圆为方一样极不现实⁷。

我们可以想到,即使要提供一份同一地区的谷物价目表,也会复杂到何等程度;这要把在不同城市或集镇出售小麦、黑麦、燕麦使用的计量单位一一列出,然后“折算成重量”这个唯一可比的单位。这些根据事先印好的表格每两月登记一次的“谷物价目表”,有的至今还保存在档案馆里。

同样,即使在相距不远的地区,人们的穿着也各有特色。以布列塔尼人为例,科努瓦耶地区喜欢红色;莱昂地区偏爱蓝色;在特雷戈尔,紫色倍受青睐⁸。在距今一个世纪的1878年,莫尔旺地区“一成不变的”穿著是:“无论是年轻姑娘还是老年妇女,全都身披一块宽条纹的粗呢,脚上穿着清一色的白色毛织长袜和鞋头包着一块方羊皮的木屐,头上戴的是又宽又厚的印花布帽,头发在帽后盘成发髻”⁹。

民居也随各地的传统而异。在汝拉山区,用一句至今还说的老话来讲,“每个山头各造其自己的房屋”,意思是指房屋各具特色¹⁰。

当然，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或正在发生变化。但差异还远远没有彻底消除。吕斯蒂格大主教（原任奥尔良主教，现任巴黎大主教）谈到：“我一用奥尔良教区（即现今的卢瓦雷省）这个词，加蒂纳的人就对我说，‘我们可不是奥尔良人’¹¹。

吕西安·费弗尔反复说：“法兰西以多样性命名”¹²，这句话值得我们加以重复。我甚至喜欢说得更明确：“多样性就是法兰西”，尽管这个说法显得比较平淡。因为多样性不仅是一个表面现象，一种称谓，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具体的现实，是多、杂、异、别诸特性的鲜明体现。严格地说，英国、德国、意大利或西班牙也都可以冠以多样性的称号，但它们的多样性就不如法国那么强烈和鲜明。一位名叫欧根·韦伯的外国历史学家于1900年考察法国时发现，“她的多样性是如此错综复杂，使人在形形色色的法兰西之间无所适从，它们可以随时互相分离，不会为互不相认而抱憾”¹³。

人们可以先验地想像，所有这些如同绊脚草般根深蒂固的对立，已被雅各宾派宣布的统一和不可分割的法兰西¹⁴所冲淡和消除。雅各宾派憧憬的这个法兰西迄今已存在了几乎两个世纪——这是多么不寻常的两个世纪啊！——且不算在这以前的家长式的君主制统治也小心翼翼地推行了中央集权的政策。尤其随着交通运输的飞速发展和法语的广泛传播和居主导地位——法兰西岛的方言从公元1000年起已开始取代其他方言——随着19世纪工业的勃兴以及1945至1975这“光荣的30年”¹⁵的空前繁荣，人们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这些巨大的力量即使未能消除一切差异，至少也在由成百上千块彩色玻璃拼成的镶嵌画上盖上了厚厚的一层油彩。然而，事情几乎丝毫也不是如人们的想像。埃尔韦·勒布拉和埃马纽埃尔·托德于1981年正确指出，“工业社会没有根除法兰西的多样性。这可通过几百种指示数据和图解分析所证实[两位作者出色地进行了图解分析]，分析涉及到许多方面：从家庭结构

到自杀,从私生子出生率到离婚率,从结婚的平均年龄到酗酒的恶果”¹⁶,甚至还包括精神错乱造成的伤害……其他指示数据,甚至是普通的文字描述,也使人得出相同的结论:多样性淹没并吞噬着单一性。伊夫·弗洛雷纳得出的结论滑稽有趣,他说法兰西是“统一而又可分”¹⁷的国家。吉奥诺声称,他只能描绘“处在四周景色包围中”的农民,我们对此完全可以相信,因为他们同这些各具一格的、熟悉的景色已融为一体。无论是在普罗旺斯的上阿尔卑斯山区,还是在卡马格的平川地带,这些农民都“依靠树木、野蜂、砂砾、牛羊、马匹……勉强维持生计(包括爱情)”¹⁸。那么,是否应该相信,那些振振有词地声称法国境内各种社会即将归于一统的预言家,同司汤达一样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呢?司汤达早在1838年就已认定:“在法国,各种细微的差异将逐渐消失。过50年后,可能再也没有普罗旺斯人,也不存在普罗旺斯方言了”¹⁹。这一回,司汤达大错特错了。

但是,即使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评论家、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一致确认法国的多样性,即使他们对此津津乐道,那也只是说过就忘,转身就只对统一的法国产生兴趣,就像在看过次要的、初级的东西以后,便把目光转向基本的东西去一样,似乎基本的东西不是多样性而是统一性,不是现实物而是理想物,不是与巴黎格格不入、甚至敌对的力量,而是终究已被纳入民族统一轨道的法兰西历史。两位青年历史学者妙趣横生地写道:“我们的国家以其多样性著称于世;法国的景观、精神、种族、屋顶乃至奶酪,其门类之多令人叹为观止”²⁰。这个头开得不错,虽说开列的清单并不完整。但是,扇面刚打开很快就合上,接下去所讲的法国历史又重新在其习惯的轨道上行进。一位评论家向法兰西致敬,说“祖国的统一和不可分割正是因为它多种多样和绚丽多彩。在过去的那些世纪里,法国吸引了与其迥异的许多因素,这是

她创造的奇迹。她善于把它们融为一体，同时又使这些因素依然保持各自的特性”²¹。我不否认祖国渴望实现统一并且取得了成功。但是，阻碍实现统一的因素和力量不仅仅是外国移民（任何国家都通过同化移民实现统一），而且更在于一向多样、却必须保持完整的法兰西自身。如果说必须把几个各不相同的法兰西“融为一体”，那肯定是言过其实了。

无论如何，在多样性和单一性的对立中，回避前一个方面显然是不可能的。假如不能恢复多样性的本来面目，我们将永远不能抓住我国民族形成的根本问题，不能看到各种潜在的分裂、对抗、紧张局面、互不理解或相辅相存（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以及各种纷争、积怨和嘲弄。埋下的火种随时可能将房屋烧成灰烬。宁静的历史学家马克·费罗甚至断言：也许唯有打内战才是法国的拿手好戏。

省份——地区和“地方”的集合体

实际上，又有哪个法国人会不喜欢千姿百态、不落窠臼的法国景色呢？每隔20、30或40公里，生活方式、自然条件、聚居类型乃至形象和色彩全都发生变化。尤其，我们每个人都对某个地块格外依恋。在我们的心目中，不仅对个人出生的省份的偏爱超过了其他省，而且在这个省份内，我们又有自己最喜爱的地区……这至少是我们自身特性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是否应该替那些并非来自外省，而是在巴黎土生土长的人感到惋惜呢？这就很难说了。这不仅因为昔日的巴黎市区和郊区就是村庄、乡镇的混合物（至今仍留有某些痕迹），而且因为巴黎内部有着阶级的划分，无论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传统。达尼埃尔·罗什在题为《巴黎的人民》一书中写道：“我是巴黎人，再往前追溯，已有五代人的历史。”²²他这样说也就意味着他仍有属于某个外省的资格。

这些地域特性渗透到平民百姓的心坎里去，并且如我前面所说，始终保存下来，每一个地区都力求标新立异，使自己不与邻近地区相混同。现今的地理区划令人惊异地证明了这一点：随着日新月异的普遍进步，每个地区发生的变化都有别于邻近的其他地区，或者变化的方式各具特点，从而造成了界限分明的新差异。七零八碎的地区分割终于从遥远的过去一直保存至今，或者其痕迹依稀可辨。对于我比较熟悉的某些“地区”，如默兹河流域的奥恩地区，萨瓦的福西尼地区，鲁西永的瓦勒斯比尔，位于维桑堡和阿格诺森林之间的北阿尔萨斯，每当它们的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每当我想起阿格诺森林中的那些小河缓缓向东流去，汇合成莱茵河的洪流，我觉得它们向我展示的正是极好的历史见证。通过这些景观，我对现时的全部生活得以一览无遗。由于眼界较近，我不难把各项活动全部考察一遍，借以认识一切(或几乎一切)和理解一切(或几乎一切)。现时的景物也为自身以外的东西充当见证，使我们联想起往昔的状况，帮助我们得出对过



一个行省包括几个“地区”：18世纪的萨瓦省

任何行省均可分为若干个相当稳定的行政单位，这些单位大多数仍保留至今。

原图见保尔·吉肖纳：《萨瓦史》。转引自费·布罗代尔：《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3卷第242页。

的新差异。七零八碎的地区分割终于从遥远的过去一直保存至今，或者其痕迹依稀可辨。对于我比较熟悉的某些“地区”，如默兹河流域的奥恩地区，萨瓦的福西尼地区，鲁西永的瓦勒斯比尔，位于维桑堡和阿格诺森林之间的北阿尔萨斯，每当它们的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每当我想起阿格诺森林中的那些小河缓缓向东流去，汇合成莱茵河的洪流，我觉得它们向我展示的正是极好的历史见证。通过这些景观，我对现时的全部生活得以一览无遗。由于眼界较近，我不难把各项活动全部考察一遍，借以认识一切(或几乎一切)和理解一切(或几乎一切)。现时的景物也为自身以外的东西充当见证，使我们联想起往昔的状况，帮助我们得出对过

去的全面了解，并且使旅行家留下的片言只语有了充实的含义；不论他们是否名闻遐迩，旅行家在我们之前，已看到了几乎相同的东西。正是这些似同又不同的细微差异使我们还要埋头研究从前的生活。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法国，撰写任何一部“诚实的”法国史都应该从这里下笔。潜在的“多样性”将不断与统一性相对抗，后者控制和限制着前者，并且利用传统史学对自己的偏爱，试图抹煞地方的特性。实际上，法兰西不是只有一个，而有几个。正如吉奥诺所说，布列塔尼不是有一个，而是有几个；普罗旺斯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几个；勃艮第、洛林、法朗什—孔泰、阿尔萨斯也全都有好几个。

我对法朗什—孔泰地区相当熟悉。1926年，我与三位一起服役的战友结伴同行（其中一位地理学家今天已经作古）²³，曾首次步行和骑自行车穿越了这个地区。我们从位于贝桑松城后面的瓦尔达翁兵营启程，这次长途旅行的路线是从格朗维尔的故乡奥尔南出发，沿卢河河谷向上游前进，然后穿过狭长的楠蒂阿横谷，抵达瓦尔瑟里纳河，并在贝尔格拉德见识了罗讷河“断流”的奇景。接着，我们还在热克斯地区游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的秀丽景色足以和阿尔萨斯相媲美。最后我们缓缓地向着镰刀山口攀登，向东眺望，日内瓦城尽收眼底。

后来，我几乎每年都要从不同方向穿越汝拉山，并且每次重新见到它，心里总是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在阿尔布瓦，在沙隆堡，在蓬塔利耶，在圣克洛德，在圣阿穆尔，在莱鲁斯，在圣普安湖和小小的西朗湖……到处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甚至相信单凭草的颜色就可以认出汝拉山来。这里的牧草浅蓝色中夹杂着刺眼的深绿色，而在附近的阿尔卑斯山，草场因绿中泛黄，色彩显得较为柔和……当然，地理学家又进一步把这里划分为：索恩河平原，呈平顶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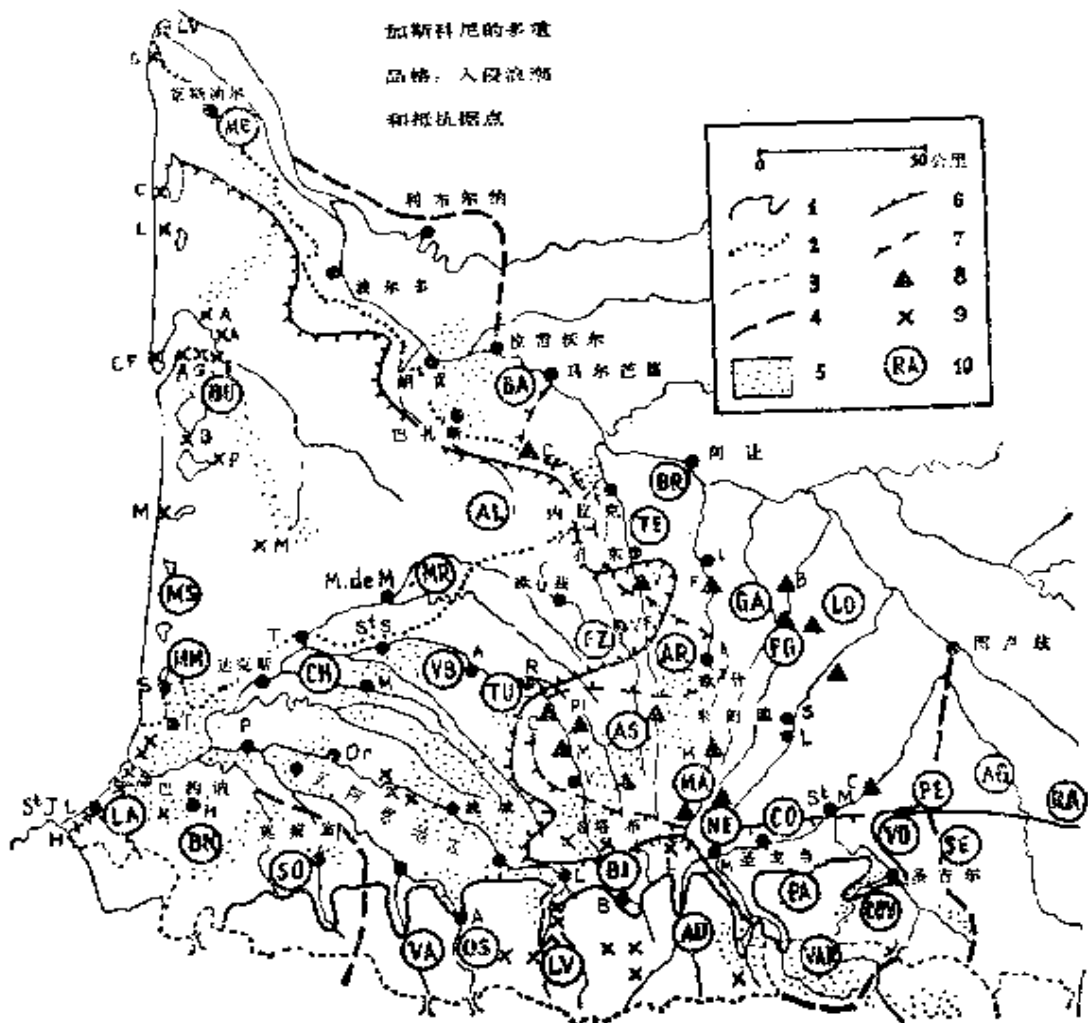
汝拉山西段，呈褶裥状的、带有葱绿的坡地和长廊般的牧场的汝拉山东段——请想一想景色秀丽的安河河谷——等等。在上述区划范围内，由于土壤、气候、物产、居民分布状况的不同，还必须划分出更小的地区。以杜河上游和安河上游地区为例，就有罗梅谷地、米茹谷地、米埃日谷地……这些规模较小的地区互不相同，但又互为补充，有时还互相依存²⁴。

普罗旺斯也不是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如果就气候、天空、耐旱的树木和植物以及无人的旷野而言，普罗旺斯当然具有共同性，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但它在地理上又被分为地中海沿岸、罗讷河流域和阿尔卑斯山区，往北向阿尔卑斯山区伸展的内陆竟占全省地域的一半以上。

普罗旺斯内陆由相同的成份所组成：石灰质的山梁和山壑（一种又厚又硬的石灰岩），尚未完全被风化的岩石岗岭，相当狭窄的河谷和平原，以及在古老的双重山脉莫尔山和埃斯泰雷勒山周围的凹陷洼地。但是，这些成份受到变化莫测的地形的干扰，它们随心所欲地构成了彼此迥异的景色。大体上说，这个地区又可粗略地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是资源贫瘠的山区，另一方面则是大小平原、盆地、河谷等从事农业耕作的地带。

山区覆盖着原始森林（橡树和松树）、灌木林和名为“咖里哥”^①的地中海植被；有的灌木林已因人力开发而遭破坏，后来，“因再度撂荒，沦为草木稀疏的荒原；在这些土地上，大戟科植物和阿福花淹没了低矮的禾本科植物”²⁵。然而，在普罗旺斯以往的经济生活中，山区曾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当地的林木一再遭到毁坏就是一个证据。直到1938年，一位地理学家在描述这一地区的面貌时曾这样写道：“在圣维克托瓦山以北，桑布克地区的青橡树和

① 原文为garrigue，系指法国南部灌木丛生的石灰质荒地。——译者



从地理学、历史学、人种学和地名学等方面举例说明“地区”的起源。

本图摘自皮埃尔·博诺，《土地与语言》，第2卷第364页。

图解：

1. 比利牛斯山的边缘
2. 生长有林木的荒原的界限
3. 国界
4. 与国界或与加隆河界不相吻合的加斯科尼省界
5. 以“os”和“ein”结尾的地名主要分布区

6. 以“ac”或“an”结尾的地名密集区的界限
7. 中世纪初期大小城堡和其他封建城镇密集区的界线
8. 构成城镇网的大小城堡
9. 今日的城市、乡镇及各种中心(工业、旅游点……)
10. 缩写字母所代表的地区名称:

AG: 阿加纳格	AL: 阿尔布雷
AR: 阿马尼亚克	AS: 阿斯塔拉克
AU: 欧尔河谷	BA: 巴扎岱
BI: 比戈尔	BN: 下纳瓦尔
BR: 布卢依瓦	BU: 比什地区
CH: 沙洛斯	CO: 科明热
COU: 库塞朗	FG: 费赞萨盖
FZ: 费赞萨克	GA: 戈尔
LA: 拉布尔	LO: 洛马涅
LV: 拉韦当	MA: 马涅克
ME: 美多克	MM: 马雷纳
MR: 马尔桑	MS: 马朗桑
NE: 内布赞	OS: 奥索河谷
PA: 阿斯普地区	PE: 佩达盖斯
RA: 拉泽斯	SE: 塞卢纳斯
SO: 苏尔	TE: 特纳雷兹
TL: 图尔桑	VA: 阿斯普河谷
VAR: 阿兰谷地	VB: 维克比尔
VO: 沃日韦斯特尔	

上面这张地图列举加斯科尼省37个“地区”的名称(至对有关的各项细节, 读者请参见皮埃尔·博诺的著作)。正因为它相当的复杂, 这张地张才有其意义。它不仅显示出地理的区划(纵横交错的高山深谷隔开各山地, 使之互不融合; 切断内地与大海之间的联系; 荒原; 阿基坦平原), 而且还显示出由历史留下的区分人种和语言的印记: “阿基坦人种独具一格的特性”曾受到了一系列“来自北方和东方的压力”: 高卢的渗透, 罗马的入侵, 伊比利亚难民的涌入, 中世纪时代以图卢越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的同化作用”, 以及后来“法兰西体系的经济投资”。因此, 加斯科尼省各地区就同它们的史前时期联系起来, 而它们的多样性正是“众多的内因和外因水乳交融的结果”。

白橡树丛林每到春天便呈现出一片生机, 由山林经营者雇佣的一队队工人便忙碌不停。他们有着明确的分工: 伐木工砍伐树木, 清理工收集零星枝杈, 供面包炉和石灰窑使用, 手执小槌子的妇女敲

敲打，剥去主枝的树皮，由烧炭工锯断烧制木炭，赶车人把木炭和树皮装车运往容克或佩罗勒的鞣料磨坊”²⁶。目前正日趋消亡的这种古老的经营方式，证实了皮埃尔·古卢对普罗旺斯地区山村所做的异乎寻常的解释：这些村庄远非如人们一直所说的那样位于山顶上，而是选择在半山腰；山下是作物种植区，山上是林木生长区²⁷。由于对尚存的森林停止采伐，村庄陆续向山下延伸，告别栖山而居的方式。个别村庄则处于适宜在山坡地上生长的葡萄园和地势较低的粮食作物种植地带之间²⁸。

普罗旺斯以往的经济像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经济一样，以种植小麦、栽种灌木作物（橄榄树、巴旦杏树、葡萄等）和饲养小牲畜（特别是绵羊）为主，它们构成了当地经济的三大支柱。这些灌木作物性喜松软、多石和干燥的土壤；春雨有利于小麦的生长，秋雨则对荒原的禾本科植物有益，从而“为小牲畜提供饲料”²⁹……总之，每个地区大体上可以自给自足，而这正是古代普罗旺斯各地区之间互相分隔的状况所要求的。

但是，从18世纪开始，普罗旺斯的这种地区分隔逐渐消失，转而出现以单一经营为主的经济，如阿尔克盆地以小麦种植为主，阿尔勒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而在从卡西斯到土伦的地区，则不断扩大葡萄种植。

就以普罗旺斯邻近拉哈涅的阿尔卑斯山区为例，让·吉奥诺非常喜爱这个位于吕尔的万图和西斯特隆之间的奇特的地方，他讴歌它，游历了它的每个角落。作为现时代的象征，专业分工也起着作用。吉奥诺写道：“人们或许会感到惊异，当地的农民不再经常手握犁柄，这是因为他们以畜牧为生。他们被排除在机械化的历史进程之外，毕竟人们现在尚未发明牧羊的机器……他们仅为养家活口才种植必不可少的小麦、大麦、土豆和蔬菜，正因为如此，许多农民过着独身的生活；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极少，因而在一年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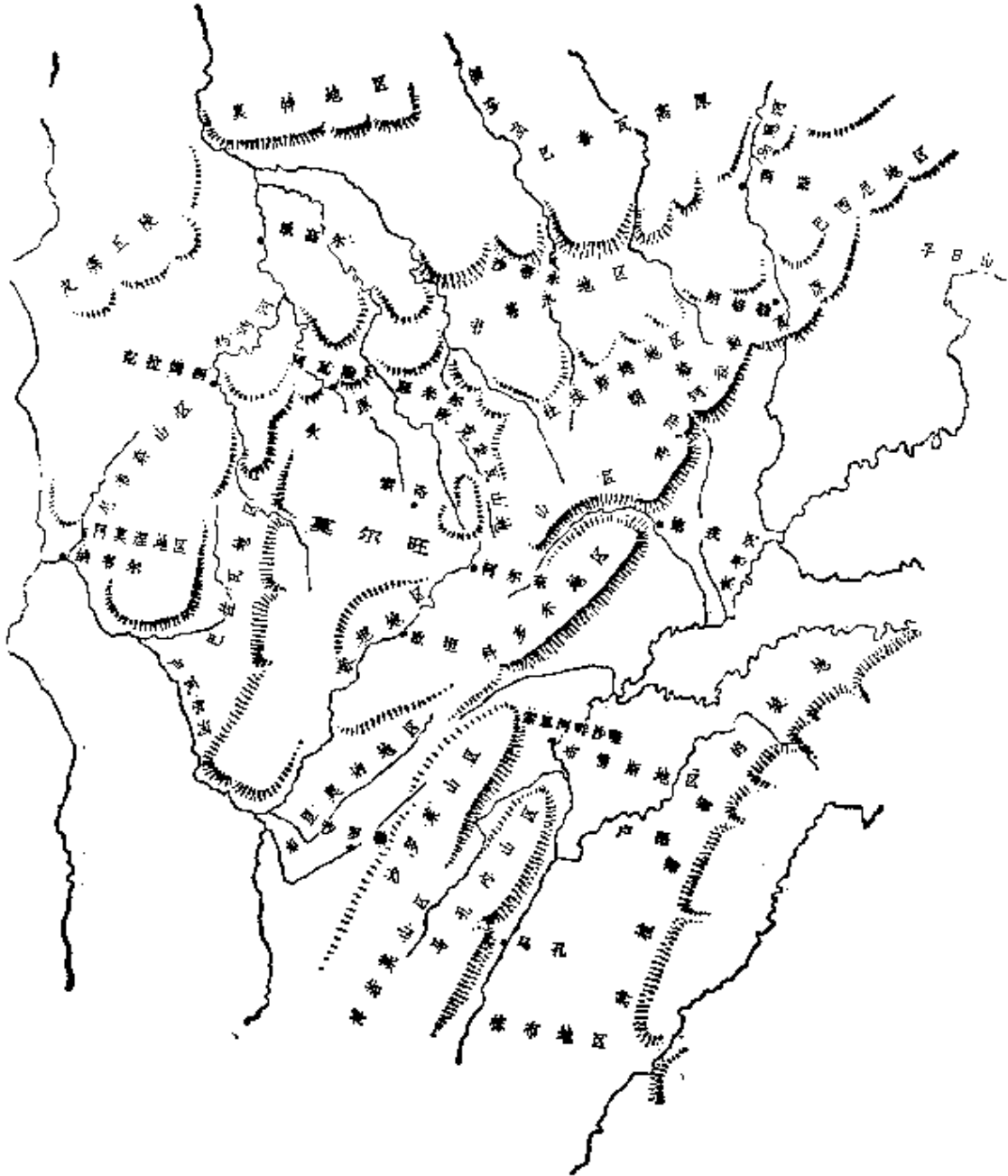
只用一个月的时间同土地打交道”³⁰。牧羊是未开化地区对外开放的典型特征。

同样，诺曼底也不是只有一个，至少可以说有两个：面向鲁昂和大海的上诺曼底，由卡昂城及其富庶乡村组成的下诺曼底。此外，奥日地区的富饶牧场，塞纳河曲的森林，奥恩河和维罗瓦河流域的“篱村”，科唐坦的荒原，科城地区和韦克桑地区的麦田也各具特色³¹。这是弗雷德里克·戈桑在评论阿尔芒·弗雷蒙所著的不同凡响的著作《诺曼底的农民》(1981年)时发表的见解。我们立即就会想到十几个地区的名称：小科地区、布雷地区、博韦地区、马德利、纳布尔、卢默瓦、乌什、贝桑、乌尔姆、塞乌阿、阿朗松平原、法莱斯平原、希埃莫瓦、帕赛、卡昂平原、阿夫朗欣、波托瓦、科尔洛瓦……弗雷德里克·戈桑说得好：诺曼底的每个地区“都产生一种特殊类型的人和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都要求撰写一部自身的历史”³²。这种论断颠倒过来说同样也能成立，这是因为每一个地区的历史都造就出一种特定类型的人和一种独特的景色，从而也保证了一个地区的实际存在。今天，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正使昔日的某些地区差异显得模糊，但这常常并不意味着有多少实质的变化。

如果我们想计算每个省份究竟由多少“地区”构成，那么，除了加斯科尼以外，有资格排在前位的恐怕就是香巴尼省了。香巴尼省内的各地区布局紧凑，呈珊瑚状，其总数不少于30个。正如埃尔韦·费利帕蒂所说：“虽然某些地区还保留着人所共知的名称和地界(如波尔西安、佩尔托瓦、雷姆瓦、塞诺奈或巴西涅)，而其他地区则再也不能被视为各具特色的、有活力的实体了。今天又有谁还会提到阿尔塞、布里艾诺瓦或阿特诺瓦”³³，以及普罗维奈或瓦拉日这些地区呢？难道像一些已被遗弃的村庄一样，也存在着一些被遗弃的“地区”吗？如果确实是如此，我们就必须确定它们的地

域范围，并立即进行认真的调查。

那么，最小的地区是否还可以再分呢？当然可以。珀河流域的山区盆地拉维当地区位于比利牛斯山主脉及其前山地带，由七个不同的“地方”组成。它们是：巴雷日河谷、科特雷河谷、阿赞



勃良第的“地区”布局
(雅克·贝尔坦绘制)

谷地、萨尔的阿斯特雷姆、巴特絮盖尔、达旺台格和卡斯特鲁邦³⁴……

因此，不要过于轻信那些急于得出结论的作者，在他们看来，从前的省区的协调一致性是不成问题的。亨利·弗西翁在谈及罗马式艺术时指出，“在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勃艮第既是一个又是三个地区”³⁵。从罗曼式教堂的风格来看，说勃艮第有三个地区，这是可以讲得过去的。但是，这种观点无论是从地理的还是历史的角度看都是错误的。勃艮第可分为许多各具特性的地区，这在亨利·旺斯诺设计的草图（见第29页图）中可以看出³⁶。如果说勃艮第的统一性，那只是与法国的统一性相对而言才有意义。勃艮第和法兰西都是多层次结构的建筑；统一性位于建筑的顶端，多样性则是建筑的基础。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再次强调指出：“不要忘记法国的多样性”，正如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对他的学生反复重申：“不要忘记英国是一个岛国”。

去实地亲眼观察法兰西的多样性

在理论上侈谈法兰西的多样性无济于事，必须进行实地考察，亲眼看到这种多样性的色调，闻到它的味道，用手触摸到它的存在，甚至还要在货真价实的乡村小店里咀嚼它、品尝它，以便深得其中三味。用罗兰·巴尔特³⁷的话来讲，米希莱吃得津津有味的东西不仅是法国的历史，而且是法兰西本身。米希莱在落笔撰写他的著作前，不断在法国各地游历，从未停止过咀嚼和吸取营养，吕西安·费弗尔同样也乐此不疲。我曾分享到费弗尔的这种热情，当然是用自己的方式。

今天，汽车——姑且不说在万里高空翱翔的飞机——为人们周游各地提供了方便，但其前提是不能过分迷恋在高速公路上急驰。即使在高速公路的两侧，也可看到优美秀丽的景色。例如，从

日内瓦前往安纳马斯，经福西尼到博讷维尔，然后在高山的陡坡悬空盘旋，抵达勃朗峰的沙莫尼山谷和峰下的隧道……可是，总的说来，与其在高速公路上行车，不如去光顾二等公路：这些精心修筑的小路，蜿蜒曲折，美不胜收，充分显示出地形地貌的千变万化。

不要走马观花，要经常驻足停留。如果我们意趣相投，我们尤其应对那些突变，也就是对边界地带具有敏锐感：留意观察什么时候民宅屋顶变了形状或材料，什么时候水井换了模样，水井是很少为人注意的民俗沿革的见证。还须辨认那些驱邪的镇物，它们保佑房舍免遭恶运（或者并不具有这种含意）：在阿尔萨斯，这些镇物几乎到处悬挂。还要揣摩为什么在香巴尼地区，房顶上竖着那么多奇形怪状的风向标，而在洛林，风向标则意味着房宅主人不是贵族就是富绅——在我的家乡，当时只有一处风向标。在香巴尼，风向标是否表示小农庄主和小手工业者的一种姗姗来迟的报复行为，抑或是在显示其职业特征的同时，昭示社会平等的一种方式？那么，它们为什么大量出现在香巴尼，而在其他地区又颇为罕见呢？

因此，我的建议是：探寻地区间的差异、反差、突变和边界。因为如果说“就小型地区而言，边界概念对我们已然（变得）陌生，并且这一概念看来似乎十分牵强……可是，在乡下人的心目中，概念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毫不含糊。农夫们终日劳作在田野上，正是依据周围的景物变化，他们能够确定不同地区的分界线：例如，在小河的对岸，穿过小树林，到了山坡下方，就是另一个地区了”³⁸。以上援引的是埃尔韦·费利培蒂的一段话。他写的那部讲述农民房舍的著作图文并茂，堪称再现古代法国风貌的佳作。因为，作者在其中揭示了不同地区的边界，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同地区的外貌。今日法国农村的景色依然显现这样的外貌。作者把房舍同当地的

环境、土壤、气候和唾手可得的材料，以及同村镇的社会结构和农产品的种类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真正的起死回生术。

当你告别汝拉山区黝黑的松林、坡地的牧场和蜿蜒曲折的公路再往西去，你看到的便是布雷斯地区低洼平坦的田野：放眼望去，但见芳草萋萋，池塘罗列，树木成行。与此同时，汝拉山区低矮结实的平房，高大的石墙和有着宽阔的拱形门柜的粮仓也就让位于布雷斯农庄特有的砖房；木质的梁柱突出在墙体之外，屋顶铺瓦，屋檐上翘，一串串玉米棒悬挂在屋檐下。蓦然间，你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如果你从巴黎前往奥尔良；在过了埃唐普以后，你便离开了郁郁葱葱的瑞讷河谷（瑞讷河昔日可通航运，沿途磨坊林立），再往前去，博斯地区辽阔的地平线将出现在你的眼前。这里，精耕细作的麦田和绛红色的三叶草牧场交相辉映。难道这是世界上最美的景色么？或许是的。然而，博斯的村庄“闭塞、破败，（如今）人烟稀少”³⁹，紧紧地围在钟楼的四周，它们肯定算不上是法国最美丽的村庄。

有时候，只要驱车行驶十几分钟，眼前的景色也就全部改观，时间之短就像剧场的幕间休息。作为一名士兵，你也许同许多其他士兵一起，或者随他们之后，曾在位于贫瘠的香巴尼境内的玛依兵营生活过，甚至十分熟悉那里的生活。你曾在那里行军和操练。每当淫雨时节，没有植被覆盖的白垩土便变成一片奶白色的泥浆，踩在上面一步就是一个脚印。此刻，我不禁回想起当年我们所穿的旧军靴以及靴钉在泥地上留下的灰白色的痕迹……在这上香巴尼地区，从18世纪⁴⁰起，旅行的人已经注意到，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既没有树木，也没有或很少有清泉。直到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往日的景色。来自香巴尼葡萄之乡（位于西部，在法兰西岛地区索姆河谷的陡壁边缘）的人对此感触尤深。连绵不绝的白垩土简直像

是“一片沙漠”；身临此境，人们怎能不为之“神伤”⁴¹？可是，在这贫瘠的香巴尼地区，仍有几个河谷贯穿其间。河谷中的村落或与涧水为邻，或与水井相伴，或与土质松软的冲积土相傍依，或以白垩地带的野草为倚托。在这些遗世独立的村落中，阴郁的房屋排列成行，它们或是木架结构，或以土坯垒墙。这里的生活过去十分艰苦，但是，在昔日的法兰西，哪里的生活又不困难？农民缺少烧柴，他们“在收割后的小麦地和黑麦地（当时用短柄镰收割）捡拾茎秆，用以烘烤面包；或者精打细算地从布里地区或篱村地区买回二、三十捆木柴；最穷的农民不得不以‘秸叶’、苜蓿根、菊叶、荞麦叶和萝卜茎……取暖。老一辈人还记得，他们蜷缩在贮藏室和牲口棚里宿夜避寒的情景”⁴²。过去几乎不值一文的荒草地，如今已砍掉了在19和20世纪种植的低矮瘦弱的松树，经过反复改良土壤、施肥、机械翻耕，终于被改造成肥沃的麦田⁴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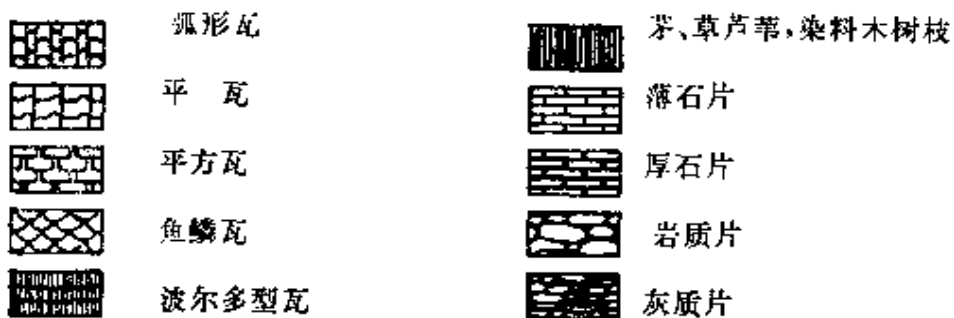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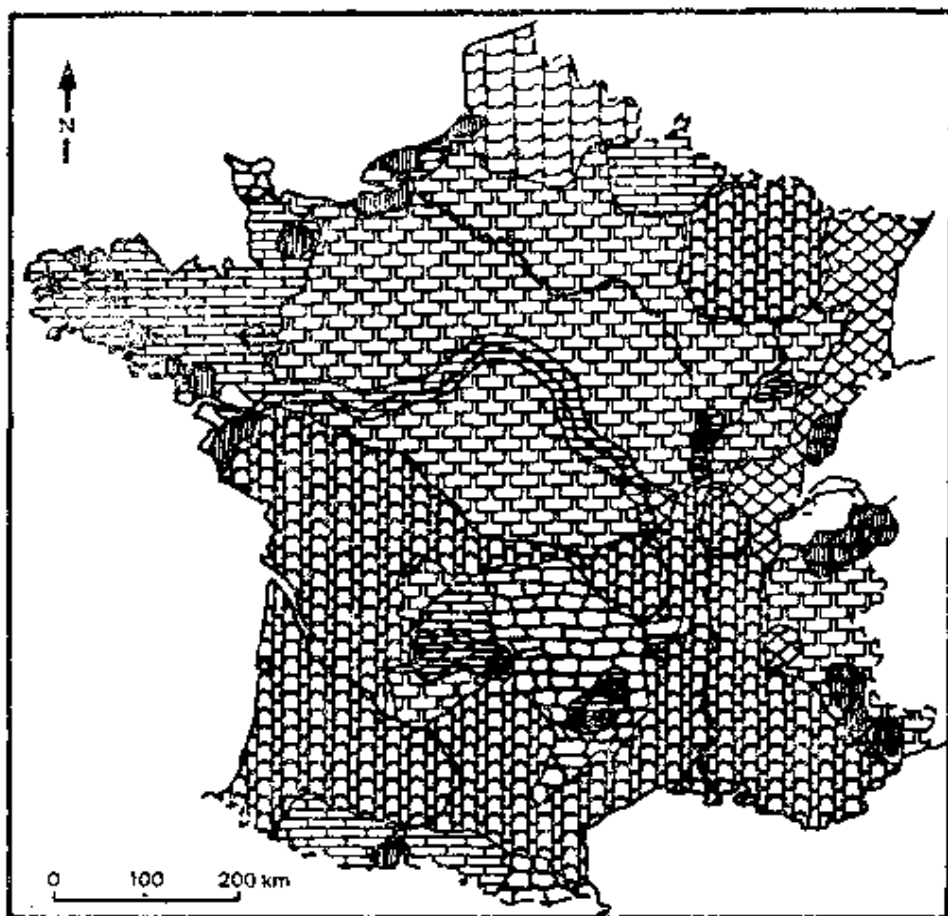
然而，香巴尼依然是一个呈现强烈反差的地区。只要离开这片单调的白垩土带，向东迈出几步，你就来到该地区的粘土带，或称潮湿的下香巴尼地区。这里有葱绿的牧场和树林，众多的河流及其河岸，终年积水的大片沼泽，足以证实潮湿二字名不虚传。为了防潮，这里的房屋通常以奇形怪状的木条和木片覆盖墙面，或者采用屋檐外伸的大屋顶。如果再往前走，阿戈纳地区就在眼前。这里林木茂密，遮天蔽日，只能看到低矮的林中小屋，俨然是保护法兰西的一道屏障。但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保护法兰西的温泉关今天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为了寻觅急剧的变化，你可以朝北走到阿登高原，或者向南直达奥特森林。或者朝巴黎方向前行，到达布里地区的边沿，即我在前面提及的、被称为法兰西岛的河谷地带。这里是素负盛名的葡萄产地，丘陵起伏，景色优美，村落中房屋成群，而且都用石料建造。

从渺无人烟的、空旷的白垩土高地（放眼远望，间或可见一棵

孤树)来到河谷地带,你一路上将目不暇接,惊叹不已。史前时期的人类曾选择这片河谷作为他们最初的栖息地。在这一条条巨大的绿色长廊里,林木纵横,死水淤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法兰西就是以索姆河流域这一片片沼泽地作为疆界的。然而,要实行闭关锁国,这条边界是太脆弱了!1557年,西班牙人夺取了法国将军科利尼困守的圣康坦城。1596年,西班牙人又偷袭亚眠,翌年,亨利四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将该城收复。1636年(三十年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年),西班牙占领了科尔比城。告急警报如火药的导火索,一直传递到巴黎⁴⁴……的确,在当时,那里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要塞,一阵炮轰,一次突击,一场猛攻,就能使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敌方的炮弹甚至能落入城市广场的中心。事实上,防守边界的不过是一些哨兵,他们充其量只能守上几天,其作用不外是发出报警信号而已。

我最近作了一次旅行,从博斯前往韦兹莱,途经奥坦,穿过莫尔旺国家公园,一路上从容不迫。就我所知,博斯坡地是世界上最美的葡萄园,它们不仅使人赏心悦目,还能提供其他乐趣。刚刚接近诺莱(那里有一座古老的市场、一座教堂以及16世纪建造的一些房屋),中央高原就展现在面前。那里又是另一个天地:葡萄园渐渐稀少,有的是辽阔的牧场。一排排树木和篱笆把牧场分隔成片,成群的沙罗莱白种牛在牧场上吃草,这里的生活仍保留着古朴的风情,奥坦悠闲安适的旧城区更是显得古色古香。在我离开奥坦前往塞通湖后,当地居民的坦率和富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在库尔河上人工兴建的塞通湖过去曾是把大批木排顺流漂送巴黎的发送站……即使在十月金秋的晴朗季节,进入莫尔旺国家公园,人们便在浓荫密布的森林世界中穿行,成片的针叶林随时打破阔叶林的一统天下……寂静无声的森林,人迹罕见的道路,时至9月已呈现绛红色的路旁蕨草,这一切是否表明

林区尚未得到开发呢？我没有见到伐木工人，只是在堆积如山的木柴垛旁发现一台停着的机械设备。在一些开阔地带，一些山岗脚下，不时会出现几片耕地，几块屋旁园地。每块园地的附近都有一座小村落，居住着三、四户人家。越往北走，农舍的屋顶越来越多地以石板代替了瓦片。除了几个不大的村庄以及几块麦田、荞麦田和土豆地以外，满目所见只是牧场连着牧场，一排排灌木树篱构成了它们的边界。的确，整个景色同法国西部为来自大西洋的雨水所浸润的无数“篱村”如出一辙。这里没有经济重镇，可能发挥作用的一些城市，如奥坦和阿瓦隆，都把目光转向外部，而对莫尔旺腹地几乎不屑一顾。无怪乎雅克琳·博纳穆尔⁴⁵在她撰写的有关该地区的精采论文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幸的莫尔旺难道竟是个“横遭天谴的地区”？在这篇论文发表前的半个世纪，也有一篇同样精采的论文⁴⁶触及到这个问题。这样，我们就有了论述莫尔旺两种状况的文章，可以考察这个地区最近出现的人口急剧下降的过程。当地的居民多半已经外流，如今似乎只有大自然依旧安之若素。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曾认为，唯有站在韦兹莱山丘（它是许多位于莫尔旺地区边缘地带的石灰岩山丘中的一个）上登高远望，莫尔旺山的真相便不言自明：它虽然具有山的形态，但实际上却不是一座山（顶峰的高度仅海拔902米）。但是，如果你在



法国屋顶建材分布图

引自让-罗伯尔·比特所著《法兰西风景史》第1卷，并参见《法兰西农村探秘》一书。

罗旺斯, 冬季洪水猛涨, 夏季河床干涸。橄榄树在这里逐渐消失; 当普罗旺斯的葡萄架依然果实累累时, 这里的葡萄树竟与北部地区一样开始枯萎”⁴⁷。

对于不久前的两次新奇体验，我只能简略提及。第一次是去年在鲁西永地区孔弗朗山的泰特河谷的经历。经过数公里长的地中海干旱地带之后，我穿越长满低矮树丛的乱石山岗，那里辟出了一方方葡萄园。转过一道山路，上萨瓦省的景色突然展现在眼前，树篱围隔的大片牧场和稠密的田野伸向远方……第二次体验是从让·吉奥诺所写的某些精采章节中读到的。作家描写的是卡马格低地的南部风光。那是一处蛮荒之地。我们从阿尔勒市驱车出发，由于车速过快，我们看不清外面的景色，有时几乎什么也看不到。然而，这是一个充斥着昆虫、爬行动物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鸟类的世界；这里有大量的积水，广袤的沙地，还有众多的野兽和成群的牛马。最后还应该说，这是野蛮人或者被看作尚不开化的人生活的世界，整齐的矮小房屋呈四方形，看去像是洁白的“方块糖”^{48°}说实在的，我的好奇心更多地被卡马格低地的原始景色所吸引，因而对新近引种的甜瓜地或葱绿的稻田熟视无睹；当地的水稻种植正迅速衰退，成群的红鹳不断前来骚扰，破坏稻田的收成。

让我们就此搁笔，尽管还远没有漫游整个法国；布列塔尼、卢瓦尔河沿岸地区、普瓦图、吉耶纳都还根本没有提到……其实，即使谈到这些地方，也只会挂一漏万。此外，读者肯定会有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奇异感受。读者的记忆大概不会因我的记忆而成为多余，恰恰相反，只会充实我的记述。我只是想提供问题的一般情况。可是，我是否充分做到了这一点呢？

二 力所能及地解释法兰西的多样性

我们下一步的任务将是解释法兰西的多样性——大小不等的割裂，急剧的突变，以及七零八碎的隔阂……这项任务十分艰巨，因为只有把一系列因素全部搞清之后，解释才能得以成立；这

里包括地理因素，文化因素等。然而，所有的人文科学都同时涉及到好几个领域，每一门具体的人文科学又都最多只能把握住现实的一个局部。无论如何，我们暂且将仅限于进行一次初步尝试：充其量只能找到基本问题，提出初步的、言之成理的解释。真正的答案——如果能够获得的话——还有待在通读全书过程中加以求证。

千姿百态的欧洲，千姿百态的法兰西

法兰西位于欧洲的一端。欧洲是法兰西的外围，法兰西是欧洲的延续，二者在地理上融为一体。界于北海和地中海、黑海之间的欧洲大陆在东欧和中欧一带地域十分辽阔，地理空间的差异在这里渐次产生，但又因距离遥远而渐趋淡化。抵达法兰西这块土地时，欧洲大陆变得格外狭窄，各种对立的密集使反差显得更加强烈。

例如，阿登山脉、孚日山脉、中央高原和阿摩里卡丘陵便是欧洲古老高地板块向我国的延伸，形成一系列陡峭的峰峦和一望无际的高原台地。这些高原过去海拔很高，经过千万年的风化作用，“不断冲刷”，沦为“准平原”状态。这里的土地饱经沧桑，缺少肥力，自然条件相当恶劣。随后，在第三纪“新生代”地壳运动的强烈挤压下，这些高原出现了众多的断层、凹陷和隆起，形成了一些高山深谷，富饶的冲积平原以及在奥弗涅和沃莱地区的火山口。“不妨说，几乎整个中央高原都是火的杰作”⁴⁹。沃莱火山大概在公元580年依然喷发过。在拥有深厚冲积层的广大三角洲地带，十分肥沃的巴黎盆地就是这种地层的典型（这块盆地面积达1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

在这些古老的台地中，最重要的是中央高原（总面积为8.5万平方公里），“几乎位于法国的正中央”⁵⁰，不仅是各条河流的分水

岭，也是道路和人群的集散地，在涉及法国的形成、防御等问题时，我们也许应更经常地提到中央高原，虽然历史学家通常对此有所忽略。中央高原在以往曾把法国分隔成不同的地区，但与此同时，它又以大量的移民充实这些地区，把它们联结在一起。让·昂格拉特在谈到这块高地时深有感触地指出：“不错，它确实是移民的古堡。外流的人群有赶驴骑骡的，有坐车的，有在阿列河（或卢瓦尔河）上搭杉木船的，有在洛特河上搭货船的……但是，人们主要还是靠坐‘十一号车’，即用两条腿走路”⁵¹。总之，出乎我们的想像，正是由于中央高原的存在，法兰西才成其为法兰西。同样地，由于高地的障碍，法国才出现了被分割、被封锁和受保护的局面⁵²。百年战争的最后阶段，查理七世国王在绝望中退守中央高原。这个例子难道不是十分说明问题的吗？

第三纪最后一次地壳褶皱活动不但改变了这些古老高原的地形，并且还波及到整个欧洲，从而在我国国境线上耸立起汝拉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等高大的屏障。然而，经济生活具有强大的渗透力，贸易早就克服重重阻隔，横跨屏障的两侧。这些高山既不让人望而生畏，山区的生活环境也并不十分艰难，也许横贯意大利半岛的荒凉、贫瘠的亚平宁山是个例外，但那是在法兰西的境外。我国在第三纪时形成的这些山脉无疑是地球上最富人情味的山区。阿尔卑斯山尤其如此，那里的雪橇、牲畜和驿村，不但没有延缓反而加速了山区的交流活动。我曾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一次乘坐火车，三次乘坐飞机，越过终年积雪的安第斯山脉。我曾在法海罗讷亲眼见到阿尔卑斯山冬季滑雪站的欢乐情景，也曾领略了安第斯山的皑皑白雪和莽莽黑岩以及那寸草不生、荒无人烟的荒漠景象；后者给我留下的伤感的回忆，更使我对生机盎然的阿尔卑斯风光倍感亲切。

由此可见，法国具有三种地形类型：漫坡起伏的古老高原，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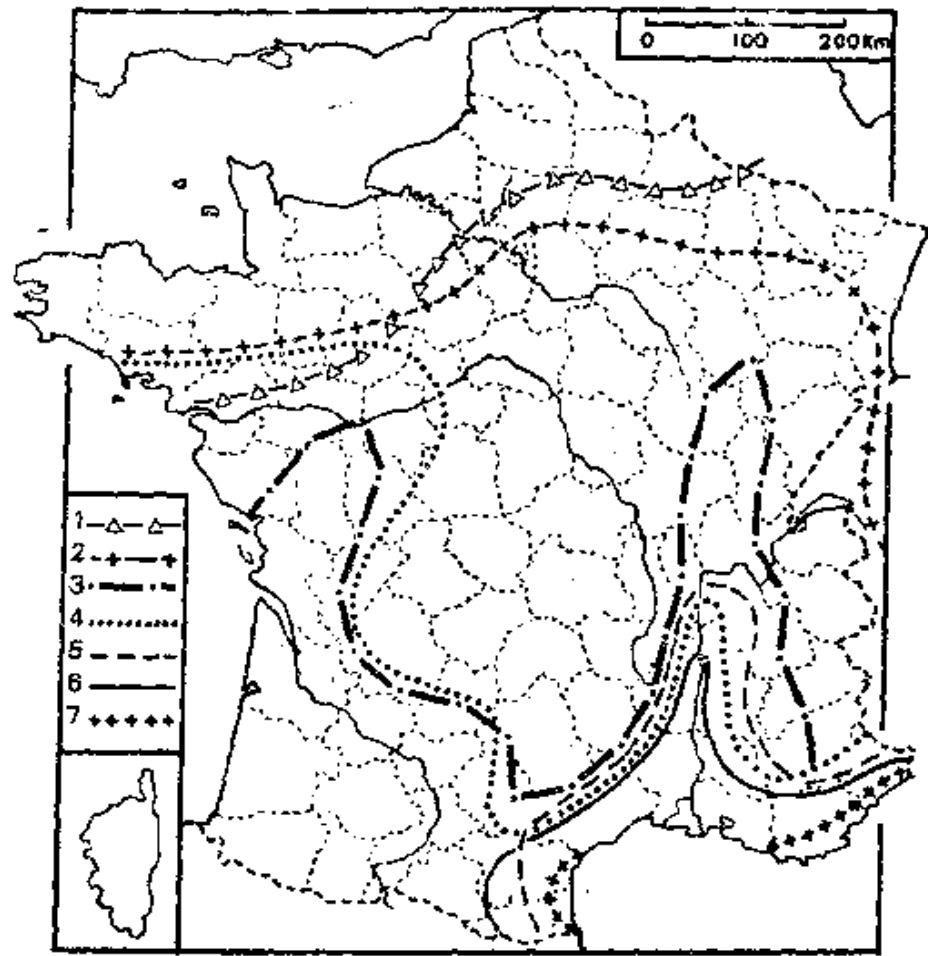
积平原；阿尔卑斯型的崇山峻岭。但是，这种初步的分类只能勾勒出我们的问题的轮廓。把法国划分为三种地形类型显然是不够的。

气候的多样性丰富了地形的多样性。法国东部同德国一样属于大陆性气候；濒临大西洋的西部则与英国相同，属于海洋性气候；群山环绕的法国东南部地区属于地中海气候。众多的复杂性和形形色色的差异性正是由此产生。我们可以设想，气候、土壤、地形三者合一，不仅决定着农业、住房类型、食物、生活方式、道路、能源，并且决定着一切。皮埃尔·德封丹说得好：法兰西是“气候同各种植物交战”的产物⁵³。在保持其语言风格的情况下，如果把这句话变通一下，还可以说法兰西也是地形、土壤，外加历史事实和切身经历对垒的产儿。

一谈到气候，每个法国人立即会想到北方和南方的截然不同。这种人所共知的基本差别鲜明地表现在典型的南方作物所不可逾越的北方极限，葡萄、橄榄、栗树和桑树是如此，从美洲引进的玉米也是如此，只是它在法国落户较晚而已。从史前期起就在法国安家的小麦这里不说，因为它有充分的时间适应气候，可以在各种土地上生长。

罗马人于公元前120至100年夺取了纳尔榜南锡斯，自那时起，葡萄的栽种就奇迹般地向北迁移。人们嗜酒的需求，富人追求奢华的愿望，高级神职人员的怂恿——不应忘记连做弥撒也要用葡萄酒——，都促进了葡萄种植的推广。就这样，种植葡萄的地区最远一直伸展到索姆河沿线⁵⁴。罗马商人早就鼓励高卢人喝酒。当时，一瓮葡萄酒可以换一名奴隶。一位历史学家为此戏称：葡萄酒为罗马军团打通了征服高卢之路。正如英国人和法国人后来用烧酒和朗姆酒⁵⁵恣意支配可怜的美洲印第安人一样。

其他的南方植物因不适应北方的自然条件而未能取得同样的



几种南方植物在北方的种植极限

1. 葡萄 2. 栗树 3. 玉米(非杂交品种) 4. 绿橡树 5. 桑树 6. 橄榄树 7. 柑桔树
引自皮·班什迈尔:《法国的自然环境、人口与政治》。

成功。没有一种作物(新培育的杂交玉米当属例外)能在我国全部领土上生长。但这岂不更好?倘若一个北方人朝着地中海方向前行,当他到达罗纳河边缘的瓦朗斯南部⁵⁶,沿着阿尔卑斯山某个河谷尽情向上攀缘,并发现第一棵橄榄树向他表示欢迎时,他怎能按捺得住当时的惊喜之情?这棵橄榄树所预示的乃是层层梯田,香气袭人的植物,用金黄色石块砌筑并且盖有平屋顶的南方农舍和阳光灿烂的天空。无论如何,这些景观的出现总是令我心潮难平。

但是,时至今日,北方人依旧很少能立即适应南方的生活,这与他们所熟悉的一切有着多大的不同。1787年5月,一位大名鼎鼎的英国人阿瑟·扬来到蒙特利马尔,除了橄榄树外,他还谈到了南方其他树种。他说道:“你会第一次看到石榴树、紫荆树、棕榈树、无花果树、绿橡树,此外还有讨厌的蚊虫。当我穿越奥弗涅、沃莱和维瓦赖山区时,我在普拉代勒和蒂埃之间同时发现了桑树和苍蝇。这里所说的苍蝇,我指的是南方气候条件下大量繁殖的令人深恶痛绝的昆虫。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法国的橄榄之乡,这些种类繁多的昆虫是最折磨人的了。撇开咬人、叮人或伤人不说,最烦人的是它们在你面前嗡嗡作响,密密麻麻地落在你的嘴巴、眼睛、耳朵和鼻子上,聚集在菜肴、水果、糖块和牛奶上。它们攻击所有的东西,其数量多得惊人。如果没有人不停地驱赶,你就根本无法进餐”⁵⁷。在这以前一个世纪,1662年,让·拉辛对南方同样没有好感可言。那时,他远离瓦卢瓦的家乡,在于泽斯城等待教会给予的一份赏赐,但最终没有得到。不错,他发现明眸皓齿的朗格多克姑娘长得都很漂亮。但她们所说的朗格多克方言却与下布列塔尼方言一样,带着浓重的“外国”腔,听起来极少有“法语”味。拉辛担心,如果长期耽在这里,他的写作风格和表述方式会因此而走样。此外,他又怎能忍受炎炎夏日的煎熬?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您在这里将会看到一群群收割庄稼的农夫,他们在酷日熏烤下像魔鬼一样干活。累得喘不过气来时,他们顾不得烈日当空,倒地睡上一觉,然后爬起身来再去干活。我只是从窗户里看到这些情景。因为哪怕在室外耽上一会儿我也受不了。蒸人的暑气和炙人的炉火简直没有区别”⁵⁸。拉辛惊愕之余,无论对那里的三伏天或者对蝉鸣都不适应,甚至对“被酷日晒得黝黑、穿着木屐在打谷场上为小麦脱粒的庄稼汉,以翩翩起舞的姿态向人致意的礼节”⁵⁹也看不顺眼。

微观气候，微观环境

以上的气候分类过于笼统，不足以使读者了解全部情形。只说生活在阿尔卑斯山或中央高原，而不确切指出生活在其中的哪个区域，这样做并没有多大的意义。经过马克西米利安·索尔的反复强调以后，我国的地理学家开始谈论微观气候，认为“这是一个大有裨益、最切合实际的概念之一”。马克西米利安·索尔解释道，说到气候，“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个性，甚至与最邻近的地区的气候个性也不能混为一谈。海拔高度的微小差别，同一山丘两个背向的坡面，平地向高原的过渡，日照时间的长短，气流的干扰，温度，雨量，这种种因素无不使气候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植物景观以及我们自身机体的反应……也随之发生改变。地方性气候是气象学的基本现实和唯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⁶⁰。

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切身体验。我只谈自己经历过的情形：在阿尔卑斯山的上福西尼地区，或者说在该地区的蒙茹瓦河谷。博南河穿越并造就了这一河谷，两侧的米亚日山和阿尔布瓦山隔河相望，这是在群山环抱中形成一块隆起的台地。结果是高山地区的干旱与山脉西麓平地的多雨形成鲜明对照。事实上，这一狭窄的地区具有排泄雨水的特殊功能。雨过天晴，土地可以“重新翻耕”，道路迅速变干。得天独厚的微观气候的另一个例证是我所住的瓦莱斯皮尔山村，该村位于阿斯普勒境内，与塞雷和比利牛斯山遥遥相望。从地图上看，它属于地中海的北风区。大家知道，每当刮地中海北风的天气，风在屋顶上呼啸，在院墙旁盘旋，把橡树吹得瑟瑟发抖（橡树想要留住被秋色染红的最后几片树叶，但也纯属徒劳），折断过分纤弱的树枝……然而，在我的住地却是另一番景象，地中海北风已近强弩之末，平息了狂怒。在离山村不远的塞雷小镇，情况也是如此，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地中海北

风成了当地好天气的预兆。

无独有偶，在普罗旺斯，山丘和河谷均足以使一座村庄或一片河滩受益，免受地中海季风的肆虐。而在很短的距离内，绕过一条公路，往往依然是狂风劲吹，其威力与风暴无异。在阿尔萨斯北部，春天转瞬间突然降临大地，这一美妙时光的提前到来曾使歌德惊喜不已。作为居住在法兰克福的莱茵人，他的故乡近在咫尺⁶¹。此情此景岂不让人不可思议？

然而，可惜的是，微观气候的现实“及其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很少为地理学家所接受”。我们还感到遗憾的是，微观气候的概念至今没有得到推广，学者们尚未想到根据地域的划分，把微观气候和微观环境结合起来，从而对当地的微观生物学进行研究。

土地也具有生命力，即使在某个狭窄的地域范围内，从一处到另一处，地表和地下的土质很少完全相同。如果是石灰质土壤——这种土质在巴黎盆地屡见不鲜——经过犁、锄多次翻耕的表土始终保持疏松状态，雨水不断渗入深土层，地面的积水很快被排泄，土地翻耕几乎不受影响。遇到干旱天气，植物的根系就会发生作用，地下的水分会沿着毛细管升到表层。这与粘土地带有着多大的不同！粘土板结瓷实，耕地的犁一陷进去便动弹不得。积水的淤泥带更构成重重难关，使人畜不可逾越。你若是从科城（该地属自垩土带）往北稍走几步，布雷地区就会出现在眼前。地理学家们

境为人提供演出的场地和各种方便的条件。

作为鲜明的对照，我不禁想起北欧许多地区的景色竟是何等的单调。在那里，皑皑白雪铺天盖地，大地像是被涂上了一层永不褪色的白颜料。我还不禁想起马达加斯加和巴西热带地区的景观，想起那里的红土带，粉末状红土把一切都最大限度地染成红色。连树木也不例外。如果你在那儿旅行，你的衣服、脸庞和头发同样也会被染红。在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坐火车旅行，你会觉得十分乏味，火车一连几小时行驶在同一景色中，使人享受不到因景色变化而激起的惊喜之情……相比之下，你就决不会认为地理对我们并非有所偏爱了。

地方经济怎样维护法国的多样性

在工业革命前，法国境内的每一块地方无不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经济的多样性使地区的多样性更趋加剧。在一定程度上，前者适应并说明后者。

显而易见，整个法兰西地域是经济潮流大显身手的舞台；这些突发的洪水泛滥，这些波涛滚滚的浪潮，它们的所作所为都在通史所热衷光顾的高层次展开。但在这里，我只想考察趋向于自给自足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的地方经济。每个地方经济好歹都要维持当地居民的生计，其数量时多时少，并不稳定；这些地方经济同时随着可供支配资源的状况，随着农业收成和市场价格的变化而上下浮动。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里有一个生活水平（衣、食、住）的问题，低于这一水平，任何个人便无法继续生存。很明显，保持这种水平乃是关键所在，无论如何，必须努力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把某些明显的例外撇开，在法兰西地域范围内，基本生活水准过去很少发生变化。如果生存平衡得以维持——或者虽然失去平衡，但或迟

或早又能恢复——，即使某个不大的地区也能养活其居民，保存其习俗，维护其稳定。不过，一旦出现严重的考验，必须百折不挠地奋起抗争，这时，人们有可能寻求多种出路，许多办法常常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因此，当人口呈现增长时，就要着手开垦荒地，相应扩大种植面积，或引进新的作物品种（荞麦、玉米、土豆），这些措施可以改善农业生产，并可使居民人数逐步增加；我们还能设想，可能扩大高收益的作物的种植，例如葡萄，尽管官方明令禁止扩大种植面积，但其占地始终有增无减；或者种植染料作物；或者转而经营某种效益较高的饲养业。

总之，所有上述措施都与利用天然资源有关，但是，有时也可就地利用人力资源，诸如商业、运输业和工业。就以贸易而言，一些交换为日常生活所不可缺乏，另一些交换则使人有利可图，并创造剩余价值。车辆运输使农民兼营货运或充当流动商贩。至于工业，由于邻近的城市可以从中获益，对农村具有经常的刺激作用。这种乡村工业，不论是原始的制造业或是初级的手工业，都是在贫穷的驱使和逼迫下产生的。在北方，诺曼底的篱村地区曾出现了维勒迪约—莱波埃勒这个早期的锅炉制造中心⁶³。在南方，地处中央高原中央的热沃唐地区道路崎岖，交通阻隔，当地曾制造一种名叫加迪布的粗绒布，其价格十分低廉⁶⁴……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成千上万。成千上万个偏僻“地方”，不正是依靠纺纱织布和辛勤劳作才维持生存的吗？也有一些地区的居民主动适应恶劣的自然条件，通过晚婚限制人口增长，从而保障生的权利。

所有这些措施都挽救了和维护了过去的微观经济，进而使不同“地方”顽强地保持各自的多样化。因为这些地方从来没有真正地对外敞开门户；它们只是从外部获得必不可少的东西，却竭力保留着各自的特性。

但是，每当危机旷日持久或周而复始，每当人口出现过剩，几

乎所有的地方都不得不求助于对外移民，无论是永久性的，临时性的，或仅仅是季节性的。正因为人口外流的必要性与地方经济的封闭性背道而驰，后者在前者的烘托下显得更加突出。起初，人口外流只是涓涓细流，逐渐变成潺潺小溪，后来几乎汇成滔滔江河。从总体上看，人口迁徙就像一个完整的“水文”系统遍布整个法兰西。多少世纪以来，这个体系始终存在着；中世纪行将结束时，它在我们眼中变得清晰起来。但是，它的形成无疑可追溯到更远的过去。无论如何，随着时光的流逝，人口外流的趋势愈益明显，规模越来越大，成为波及整个国土的普遍运动。19世纪时，迁徙的浪潮更达到了最高峰，铁路出现前后的那些年代成了真正的“动荡”的时代。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国内人口流动的势头才有所收敛，才失去了往昔的规律性，其流动路线和原因也变得与以往大不相同。

过去，需要主宰一切，贫困左右一切。移民的潮流来自不同地区，各地移民规模可以依其人数递减顺序排列如下：中央高原，阿尔卑斯山区，比利牛斯山区，汝拉山区，巴黎盆地的某些外围地区，其实还应该加上它们的周边地带，即今天仍可被称之为“贫困的法兰西”的地区。

回顾往日的人口运动，考察移民当年如何涌向建设中的或重建中的城市工地，了解移民如何涌向富饶的农业平原，在那里收获庄稼，采摘葡萄，从事运输活动或为谷物脱粒，这一切都毫无困难，但我们这里所关心的并不完全是人口的流动路线及其抵达地点，而是这种人口流动对维系贫穷地区的平衡所做出的贡献。离开那里的移民终究还会返回故里。恰如一则谚语所说的那样：“圣诞节回家过年，复活节出门求生”。人口的流出和回归对于家乡的作用就像给气球充气：流出是为了减少吃饭的嘴，回归是要带回节余的钱。无论是纳税、购买生活必需品或推动小型农业活动的开展，这

笔收入都是不可缺少的。

人口外流并不始终是个万全之策。它有时成败参半，有时只是权宜之计。我认为，很早就向西班牙移民、而且长期坚持这一传统的上奥弗涅的奥里亚克取得了真正的成功。事实胜于雄辩。由于移民，上奥弗涅的山村由于较向广阔的世界开放⁶⁵，比下奥弗涅的农村生活更加富裕，尽管后者的自然条件要比前者优越得多。在上萨瓦地区，移民取得了成功或一半成功，特别在福西尼的最偏僻的地区——蒙茹瓦山谷。从14世纪开始，圣热尔韦、圣尼古拉·德维罗斯和莱孔塔米纳三个市镇不断向阿尔萨斯和德国南部移民。一些萨瓦人后来仍经常前往这些天主教地区，有的甚至在那里发了大财。再往后，从摄政时期（1715—1723年）开始，成群的移民涌向巴黎。但这一次，移民们充当脚夫和佣人，或为居民搬家、擦地板和清扫烟囱。他们吃苦耐劳，拚命攒钱，并且结成团体。移民生活虽然清贫，但给家乡带回大笔积蓄，据1758年的统计，总额高达15250金法郎⁶⁶。

但是，其他地区的移民并不一定都有这种好运。位于利穆赞和奥弗涅接壤处的于塞勒地区，“峡谷（由河流冲刷而成）和荆棘丛生的大片荒原并存”，当地的生活相当艰苦。直到1830年左右，“里昂—波尔多公路方才开通，成了一棵摇钱树……”⁶⁷。在这以前，年轻人曾纷纷涌向锯木厂和建筑工地，但这种人口流动（从圣米歇尔到圣让），无论是永久性的还是临时性的，却不一定带来富裕⁶⁸。据1789年三级会议陈情表记载，留在当地的居民一日三餐“只有汤和面包可吃”⁶⁹。位于上利穆赞地区的圣帕尔杜—拉克洛瓦西耶村的村民于1762年向他们的巡按使杜尔哥递交了一份报告，语调也十分凄凉。报告称：“老爷，在我们的大部分堂区，每年都有许多人因缺衣少食和迫于贫困，不得不离乡背井，去富庶的地区做工。例如，西班牙就从我们这里招走了许多人；而其他人则在国内的不同省

区,长年累月地当泥瓦工、盖房工和锯木工。人们指望他们会挣些钱回来。但是,在十名回乡的工人中,只有两人能达到目的。疾病、旅行和挥霍把他们的钱财吞噬一空。即使有一些现金能从外地带回本省,难道这抵偿得了人口外流对农业进步所造成的损失吗”?⁷⁰

实际上,离家外出从来都不是以同一种方式进行的。更何况,很多外出活动几乎属于某种行业的习惯,并不单纯为了摆脱穷困而临时采取的救急措施。马格朗地区的一名萨瓦人经过长途跋涉,在德国南部兜售手表,这是因为他的父亲、祖父生前都做这种生意⁷¹。归根到底一句话,无论其性质、动机和路线如何,人口迁徙都使法国的不同地区得以恢复平衡,并使这种多样性始终延续下去。

这里的原因显然是,居高临下地主宰一切的普遍经济,无论是否愿意,都对人口迁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的情况不是几乎依然如此么?不过,今天主要是大批的外国移民在填补我国经济的巨大空洞,其中有北非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来自黑非洲的劳动大军(这些人随处可见)。当然,只有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容许的前提下,甚至是在对他们发出召唤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在我国发挥作用。在过去,人口迁徙势必受一般经济条件的制约。当这些条件在本世纪初不复存在时,旧的人口运动必然会中断。事实上,这种运动确实也停止了。

但是,人口流动远没有因此而完全停止。实际上,其他需求接踵而至,使我们不能不正视它们。其中最主要的是,自1950年以后,原有城市的巨大扩展无限制地加快了步伐,从而导致了法国农村人口的锐减,以致到70年代,人们已开始习惯于把巴黎和荒芜的法国加以对照,将“图尔市和荒芜的图尔地区……克莱蒙费朗市和荒芜的奥弗涅地区”⁷²相对照。在我国某些农村地区,很早就出现了

人力资源枯竭的现象，这是城市无计划地吸收劳动力造成的恶果，有关的实例数量之多令人触目惊心……例如，“在克勒索周围的勃艮第农村，在冶金工厂四周的洛林农村，在特鲁瓦周围的香巴尼农村……无一不是同类景象。在吸收农村劳动力方面，任何城市都无法同巴黎一争高下。巴黎居民来自法国的各个省区：自19世纪中叶起，三分之二的巴黎市民并不出生于巴黎”⁷³。在这以后，形势更加朝有利于城市的方向倾斜。城市今天对劳动力的需求与昔日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农村劳动力一旦进城，再也不想重新回去。

尽管如此，这股强大的人流并未像有人所想的那样，神奇地抹去我国根深蒂固的多样性。恰恰相反。留在农村的居民，包括新来者在内，虽然人数比过去有所减少，但分享着既存的财富。他们甚至拥有更多的条件，加快发展当地的经济。1981年，在巴斯克地区的艾斯普莱特村，“一方面农业人口急剧减少，另一方面农业的经营规模取得了进展，经营质量有了明显改善，以致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增长”，300多公顷荒地得到了开垦，耕地面积增加了40%。当然，这要归功于拖拉机的购置⁷⁴。与此相反，位于大城市附近的郊区则出现了放弃农业耕作的现象，在机械化难于应用或根本无法推行的地方也莫不如此。在高山地区，畜牧业也经常被弃之不顾。尽管现代经济深刻地改变了法国农村的面貌，但它那古老的、犹如镶嵌画一般的布局在总体上还是保存了下来，其多样性依然一目了然，甚至显得相当突出。

国家和社会容忍多样性和混杂性继续存在

理应达到完全统一的国家“权力”居然也没有实现统一。国家政权的任何机构都未能把具有充沛生命力的多样性统一起来。多样性能抗拒任何冲击，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所强加的统一充其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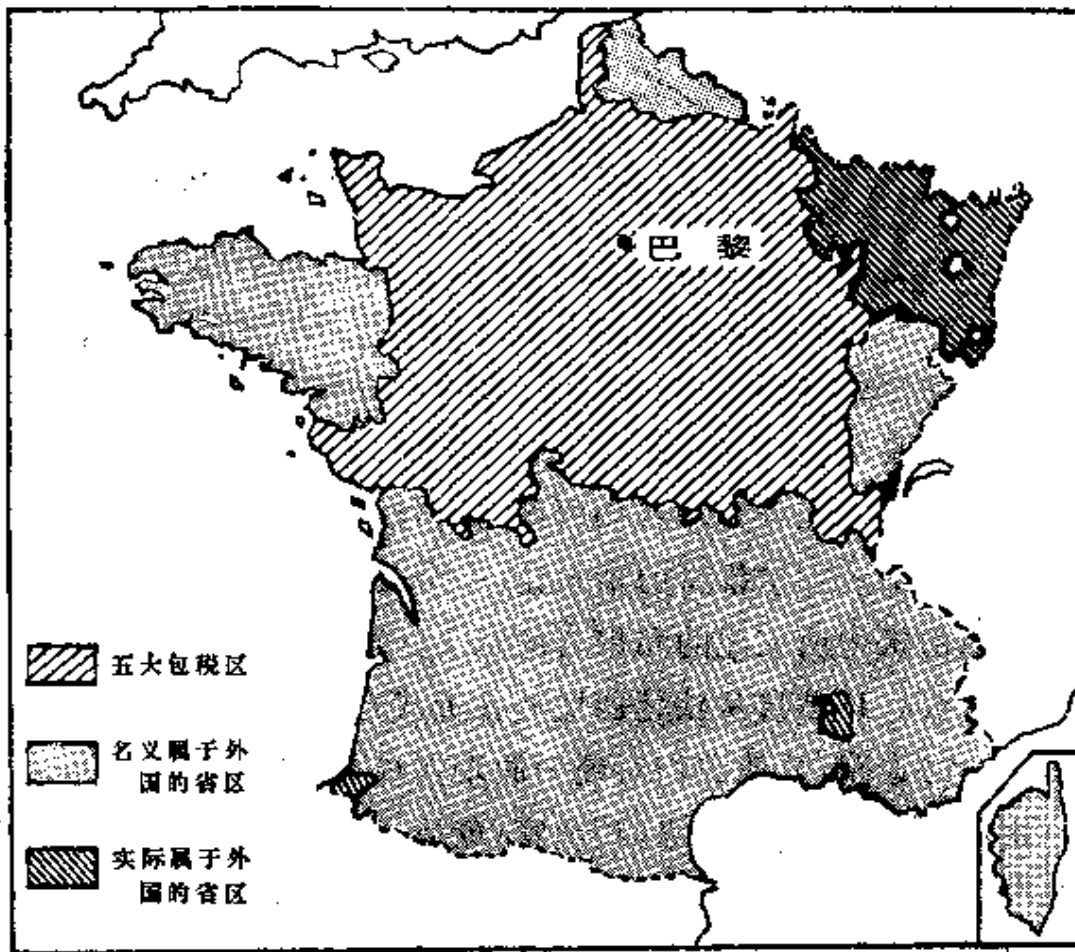
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在革命前的“旧制度”下，为了实现王国的统一，国王曾力图强化政治和行政机器。他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时，遇到了多少困难、障碍、抵制和反抗！“旧制度”是世袭的产物。在漫长的几百年间，法国始终陷于组织涣散、机构混乱和政出多门的状态，行政机构的不协调往往伴随着国家的软弱无力。法兰西社会当时还远没有被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阿兰·图雷纳说得有理：当今的法兰西社会不过是“其主人的喉舌”⁷⁵。但在“旧制度”下，任何人都不会这么说的。即使在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社会仍然不是一个“整体”⁷⁶，用乔治·古尔维奇的话来讲，一个受许多相似的规则、约定俗成和政治机构所支配的和聚合的社会，或者至少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社会。只是自从法兰西民族在近代形成以后，我国社会才走上统一的道路，才使我们对统一的现实怀有巨大热情。

由此可见，无论从“纵向”观察（就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或是从“横向”观察（旨在突出社会根深蒂固的异质性），法国社会都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好几个。

人们或许可以夸张一点说，任何领土区划在过去同时也是社会区划，因为规模不等的每一个小社会都在一块领土上栖身，都有自己的边界和存在的理由，并且首先依赖自身的内在联系而生存。这些领土区划便是村庄、集镇、城市和省区。无论如何，各种社会的明显标记就是它们的等级制。任何社会都不是平等的，都以金字塔的形状而出现。统治阶级高踞在每个金字塔的顶端，并与当地特殊的下层社会相联系。下层社会支撑着统治阶级，前者说明后者，并为后者所说明。

村庄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规模最小，历史也最悠久。村庄的出现要比教会和封建制度早得多。一个村庄作为一个单位，拥有一片土地和一些集体产业（公产受到精心的照管和保护）。村庄几



五大包税区

法国大革命前，除去柯尔倍尔于1664年建立的实行统一税收制的五大包税区外，法国始终被其内部的各种税卡所分割。

乎全靠自给自足。它有自己的习俗、节庆和歌谣。甚至方言也未必与邻村相同。村庄设置村民大会，选举名称不尽相同的村长、理事、执事等人员，并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雷蒂夫·德·拉布雷托纳在谈到位于勃艮第地区的萨西小村时说：“村庄的治理犹如治家”⁷⁷。村庄受领主管辖，神甫在村内也享有一定的威望。伊波利特·泰纳写道：“人们可以想像出以下的情景：在一平方里的范围内（“旧制度”下的法兰西），大约在1000名居民中，总有一家贵族及其插着风向标的宅邸；在每一座村庄，住有一位神甫，建有一处教

堂，每隔七、八里路，就有一所男修道院或女修道院⁷⁸。”

除了地位举足轻重的领主以外，村庄内部还存在着一定的等级阶梯。村庄的日常生活和季节性生产便是依据这种等级制进行组织的：一边是富裕的农民，有时还是教区的“首户”⁷⁹；另一边则是穷苦的农民。大约至1789年时，家境优裕的农民在巴黎盆地和法国东部被称为“自耕农”，在普罗旺斯则被称为“庄主”，有时也被人用讥讽的口吻称作“有产者”。所谓“自耕农”有时也向“殷实富家或有权势的宗教机构”租地，但从不是分成制佃农，而是独立经营的农庄主，他们通常拥有“好几套马拉车或牛拉车，至少有十来头奶牛、50来只羊，有带轮的犁铧、钉齿耙、磙子、长柄镰刀和铁轴手推车”，当然还有雇工、女佣。此外，据一位也许过于夸大其词的历史学家说，他们拥有10公顷，有时20公顷，甚至更多的土地⁸⁰。与此相反，小农仅拥有一小块土地，既没有牲口和车辆，又没有犁铧。他们必要时向富有农户借用大型农具；作为交换，他们在收获季节为富有农户提供劳力。直到1914年，在法国东部地区，这种联系小农和大户的互助形式仍然存在着。当我回忆起家乡的这种情景时，我至今仍然感到忿忿不平。互助关系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小农和富户的数量比例准确无误地显示出乡村社会是处于紧张还是平衡状态。例如，1790年，在默兹省⁸¹，二者的比例为1比1，这就等于说，一家富户雇有一名小工，一名雇工为一家富户干活。但在1768年的梅斯周围⁸²，比例却是2比1，两名雇工为一家富户干活，这使人想到，梅斯乡村明显地比默兹南部地区富裕，财产更加集中，因而社会关系也更加紧张⁸³。

但是，我们万不可将上述情形过于简单化。法国拥有成千上万个村庄，它们从来都不是一副模样。由于时间和地点不同，这些小社会有的和睦稳定（我想说的是经济繁荣），有的矛盾重重；村民的生活水平和相互关系各不相同。农村常常处于领主制的重压之

下。在贫穷地区，领主制更顽固地保留着自己的统治。就以热沃唐地区为例，芒德的主教也是当地的领主，其权势“几乎与国王无异”⁸⁴。但是，那里的村社组织仍然存在，有权审议地方事务并作出决定。相反，有的地区演变较快，经济比较富庶，同大城市几乎没有太大区别。例如，在博斯或布里地区，资本主义势力很早开始抬头，并取得节节胜利。我们还要考虑到各省法律制度的不同（法国南部使用成文法，北部使用习惯法）。最后还有经济活动的多样性。

城市的情况尽管更为复杂，但结论与农村社会并无不同。

依据1787年的官方统计，法国共有大小城市1000多座，确切地说，是1099座，它们程度不同地摆脱了领主制的羁绊（领主制在11和12世纪遍布法国各地）。城市的解放与遍及全欧洲的“市镇运动”齐头并进。这一运动的进程无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十分复杂，并无规律可循。即使在进展十分顺利的城市，如卡昂或阿拉斯，人们所能看到的更多地是运动的结果，而不是发展的进程。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城市一劳永逸地摆脱了领主制的长期束缚，因为与领主相比，城市的力量毕竟太弱小了。

指出城市在“建立市镇”以后依旧保存着领主制的残余，这似乎并不困难，大家对此也不会感到兴趣。领主制到处留下了痕迹，有时甚至留下了桎梏。罗阿讷城不得不迁就其公爵——拉菲亚德公爵——的种种要求，而在拉瓦勒城，市政当局及其终身市长，还有我们称之为公职人员的其他官员，曾长期依据拉瓦勒的领主——拉特雷穆瓦依公爵——制订的规章行事。当该城于1722年提出市政会议有权选举市长时（许多其他城市已根据惯例或宪章享有这项特权），这项要求于1729年被王国大臣会议的决定所驳回。幸而，领主后来慷慨允诺，赋予拉瓦勒人此前曾拒绝给予他们的这一权利⁸⁵……但他继续在城市各区行使封建权：征收现金或

实物杂税和财产转移税，强制城市居民必须在由他指定的烤炉烤面包，这些烤炉由他交面包商承包经营，如此等等⁸⁶。

城市挣脱领主的束缚，从长远来看，还算比较容易，然而，要想躲开国王的控制，可又另当别论了。王国税收制度不断地钳制和约束城市，迫使城市就范。王国政府始终入不敷出，因而对城市的财富和资金自然垂涎三尺。挂一漏万，请看以下的例子：1647年12月21日，政府宣布把城市的货物入市税增加一倍，增收部分全归政府所得；1771年，又决定恢复市政官职的捐纳制，城市为保留其选举市政官吏的自由，被迫对这些官职实行赎买。

尽管如此，王权有时却不得不向领主特权退让。国王反对领主征收各种通行税，但始终无济于事。早在1437年，查理七世就取消了滥设的各种通行税，即由河流两岸的地主擅自开征的过境税。然而，同一问题于1669年、1677年和1789年又多次提出，要求征收通行税的地主出示他们的权利凭证。正如1789年的一份报告所解释的那样，这场斗争之所以异常艰巨，是因为“附属于领主权通行税使领地身价倍增”。这里涉及到“当地领主的地产”和收益⁸⁷。另一场斗争同属徒劳：1683年春，普瓦图巡按使拉穆瓦尼翁·德·巴费尔准备在普瓦蒂埃市内开征“住房税”。经过估算后，巡按使为岁入超过7000里佛的这笔税金而深感庆幸：“这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假如市内将近一半的住房不属圣伊莱尔、蒙斯提埃纳夫、昂基塔尔等历来为国王承认的小封地“的范围之内，税金收益还将更加可观。任何人也别想触动既得利益⁸⁸！昂古莱姆1695年发生的事肯定更加离奇：问题不在于谁将取得收益，而是谁承担支出！市内的城堡已破败不堪，必须立即“维修”，可是，“人们不知道此事应由谁处理：是去找国王，还是去找吉兹夫人”⁸⁹……

有多少城市，就有多少社会方程式

以上例证为城市状况提供了初步概念。在巡按使、领主、税吏以及与领主裁判权并行不悖的国王司法机构的监视下，城市成为多种权力之间进行争斗的舞台：正在衰落但仍由许多特权维护着的领主权；正在上升但不得不与古老的传统、习俗和豁免权相妥协的王权；由有财有势的资产阶级所代表的市镇权力。市镇权力的发展有时一帆风顺，有时遇到挫折。人们往往认为城市的自治从一开始便受到民主运动的支持，这种看法未免过分简单，因为城市政权很早就已为几个强大的家族所操纵。这种政权无疑由选举产生，但这只是掩人耳目而已。几个沆瀣一气的大家族不断支配着马赛、里昂及几乎所有城市的命运。巴黎的选举程式确实是一部编写得很好的电影脚本，知道其底细的人随后无不为之捧腹大笑。特权阶层在选举中稳操胜券，他们的地位始终十分牢靠。等级制无处不在，凌驾于没有专长的劳动大众之上，凌驾于行会组织之上；地方上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出类拔萃之辈，也就是这一等级制中的顶尖人物。

因此，如果认为这批精英分子不掌握权力，不对城市的日常生活起支配作用，那显然是错误的。从路易十五当政开始，拉瓦勒的富商和产业主不惜耗费巨资，修缮他们的住宅，通常是重修门面和增开窗户。但是，即使要进行这么一点工程，他们也必须获得本地市政当局的许可。尽管你也为今天领取建筑许可证而大伤脑筋和叫苦不迭（并非没有理由），但请你不要忘记：法国人碰到的这些烦心事历时已久⁹⁰！我这样说并非夸大其词！1689年12月1日，巡按使德·贝卢尔在一封信函中——这是揭露里昂大贵族仗势欺人的最有力的文件——为我们提供了以下的细节：“昨天，一位市民前来告状，说他住所的大门侧柱在关门时坍塌，请人前来修理门柱，

派来为他加固房屋的人结果却要拆除大门的侧柱，因为他事先没有取得城市官员的准许”。在这种场合，就连巡按使也是爱莫能助⁹¹！

城市可以有相似之处，但是，一般地讲，有多少座城市，就有多少种格局，有多少个“社会方程式”。在盛产毛料的蒙托邦城，兼营制造业的大批发商（原系新教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拥有豪华的宅邸、卓越的文学沙龙、狩猎场和乡村别业，并且给当地画家提供资助和保护，大摆阔气。雷恩首先是个省城，是行政机构和高等法院的所在地。图卢兹既是行政中心，也是富庶的农村地区的核心。卡昂四周的乡村十分繁荣，财富主要来自地租收入。巨大的港口城市鲁昂、南特、波尔多、马赛，作为兴旺的贸易中心，将触角伸向大海，尽可能远离中央政权的控制。敦刻尔克享有自由贸易港的特权，当地免征人头税、盐税、印花税，发号施令的是十几户富有的家族⁹²。至于巴黎以及受巴黎遥控和限制的另一个首都——里昂，又该作何评价呢？总之，我们所观察的这些城市的情况表明：每座城市都各有其特定的社会地位，独立的品格和特殊的命运。

各省的地方特权

由于城市分布在各省，各省强烈的地方主义使城市的特性变得更加复杂。在王国实现统一——这种统一是持续不断的征服、联姻、继承、裁决的产物——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无论是否愿意，君主在他所兼并的领土上，都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同他的臣民达成一系列“历史的妥协”。因此，各省在并入法兰西后远没有形成统一的体制和结束各自的割据局面。每个省都保持各自的特权、传统和“自由”（也可以说是自卫手段）以及历史遗留下来的地方主义。

君主制没有铲平各省之间的差异，这是合于逻辑的结论。国王曲意迁就，相机周旋，籍以实现必须达到的目的：谋求国内和平，维护法制，取得粮食供应，建立税收制度（虽然想尽了办法，但始终遇到抵制），不断设置并出售公职。君主制已习惯于——例外恰好证实规律——尽可能尊重特权，不破坏约定俗成的传统和必须遵循的体制；至少从柯尔倍尔时期开始，甚至在这以前，旧传统和旧体制对君主或对百姓造成的显而易见的危害，国王自己也往往十分明白。但是，用刀去捅这个伤口不但无益，而且要冒风险。简单的办法就是让既有的体制原封不动，听任它们自生自灭，就像诺曼底（1655年）或奥弗涅（1651年）的省三级会议一样。此外，为了同中央政权作斗争，各省采取了许多相当精明的自卫手段，或互相结盟，或轮番作战。多勒地区审计院玩弄的权术，贝桑松高等法院使用的手腕，无不反映了他们在按法律程序行事时所表现的狡猾和机智，我承认我对这类表现深感钦佩。

外省各树一帜，与中央对抗；某些省保留了三级会议及其财政权和应征税款的分配权。在纳税人和国王之间的这一实力较量中，始终存在着讨价还价的可能。更加咄咄逼人的高等法院扮演本省地方利益捍卫者的角色。既然国王让古老的制度原封不动，我们不能忽视一些处于半昏睡状态的制度重新苏醒，甚至开始行动和互相对抗：保留选举三级会议的省区，各级司法区（高级司法区，中级司法区和初级司法区）以及由胥吏组成的几十个小团体。胥吏既然用钱买下了自己的职位，便一心维护自身的利益和职位；这些小团体几乎自行其是，为王权所不能左右。

在17世纪的危机期间，国王决定任命巡按使为国王的直接代表，原则上，他们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他们的官衔“司法、警察和财政总管”不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吗？约翰·劳声称，当时是30位巡按使治理着法兰西：“没有高等法院，没有三级会议，没有省督，我

几乎可以说没有国王和大臣，各省的兴衰完全取决于30位划省而治的通政大员”⁹³。不过，一般地说，他们都为国家尽忠效力，虽然人们对他们建立的勋业没有给予充分的评价。尤其在1750年后，当经济繁荣带动整个法兰西广泛的现代化运动，并开始兴建许多公共工程时，这些巡按使越来越与他们所在的省区采取相同的立场，并且成为与凡尔赛宫分庭抗礼的代言人，这不能不使我们格外感到惊异。但是，他们舍此能有其他的选择吗？1703年，布列塔尼的巡按使贝沙迈依·德·诺安代尔大声疾呼：注意，“该省的民心与它省不同，不能采用相同的治理措施”⁹⁴。当时，埃斯特雷元帅决定对在省三级会议上猛烈抨击政府的两名贵族予以严惩，布列塔尼的巡按使指出元帅的这一举措实属愚蠢。同样，1708年，梅斯巡按使认为有必要提醒凡尔赛宫：梅斯城“并未忘记它只是在签署明斯特和约时才失去了自己的主权”⁹⁵。言下之意是说，尽管亨利二世于1552年占据了梅斯，该城并入法国的日期却在1648年。

这一切并不妨碍在18世纪，在处于活跃沿革之中的法国，地方的既得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失去任何意义，而抱住这种权利不放只会产生显然荒谬的后果。革命时期的中央集权之所以破除了政出多门的陋习，这肯定是因为在大革命前，行政机构的庞杂早已引起了普遍的不安。1782年，一份奇怪的报告以相当长的篇幅解释了“小法兰克”不可思议的特权是怎么回事。“小法兰克”位于里昂以北的小城特雷沃沿索恩河两侧的一块狭长地带。备忘录的匿名作者经过思考得出结论说：“倘若……人们只考虑政府的普遍原则，秩序和统一理应成为任何良好的行政管理的基础；在此条件下，人们理应认为，同一个国家的臣民应该遵循相同的法律，应该享有相同的权利，承担相同的负担；设想在王国的腹心之地，居然有一个方圆不超过二里半的领土却获得了独立封地的特权，这种情形毕竟是十分罕见的，这只能激起邻近教区的嫉妒……造成

接二连三的纠纷，甚至依靠当局的铁腕力量，也未必能够加以防范”⁹⁶。

人们将会承认，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情形。但是，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各省会对一件可能推动普遍进步的事如此抵触？我们应把某种地方民族主义的因素考虑在内，因为在法兰西“民族”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各省便成了法兰西的替身，从而助长了今天我们称之为地方分裂主义的倾向，这种感情在大革命前夕十分强烈，法国大革命毫不迟疑地结束了这一奇异的冲动。但是，对“旧制度”末年王国政府对各省的控制，我们究竟应该作何评价呢？是否应赞同托克维尔以及一些十分熟悉情况的历史学家们的意见，认为中央集权当时业已取得了某些进展？

确实，行省很久以来已不再是官方确认的行政区划了。“作为政治实体”，它已被由巡按使管辖的“财政区所取代”⁹⁷。因此，在原有的行政区划之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区划，这一过程使我们不能不想起后来制宪会议为表明与过去一刀两断而作出的划分新省的决定。然而，硬要把这两个过程作一比较也许不尽恰当。我们不如认为，随着1750年以后法兰西的飞跃发展，君权有所加强，但与此同时，各省的特性也有所发展。这是因为，每个省区都继续促使一批人数不多、实力雄厚、并占有统治地位和各种特权的社会精英汇集到本省的首府，他们以全省普遍利益的名义捍卫着自己的特权。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组织伴随着它和支撑着它，地域组织也就不可能存在，这难道不是一条普遍规律吗？

勃艮第的情形就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例证。如果不存在第戎高等法院这个特权阶层，勃艮第怎么可能保留自己的地方特权和利益？为了保住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高等法院不免要与审计院、省三级会议发生权利斗争，尤其省三级会议的权欲有时使高等法院十分恼火。但在另一方面，它与威权显赫的省督却和睦相处，双

方的合作关系要比人们通常所说的好得多，尤其在1754年至1789年间，省督一职由孔代亲王担任。只要稍加留意，高等法院对辅佐省督治省的地方驻军司令的所作所为便了如指掌。最后，高等法院与巡按使没有严重的或是不可调和的冲突。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高等法院的法官实际上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声望和财富；他们拥有的产业——土地、森林、葡萄园、不动产、炼铁炉、年金——几乎遍布勃艮第各地。他们通过合伙和联姻，维系着一个由家族王朝组成的、对外封闭的关系网，并防止发了横财的商人和市民挤进他们的行列。这些法官过去原是市民出身，他们早就顺利地越过了界线，成为所谓“长袍贵族”。他们中间也有些人出身名门世家，如著名的德·布罗斯院长（1709—1777年），祖上就是在1495年弗尔努之战阵亡的一名贵族。

因此，存在着一个特权阶层：“法官们不仅把他们的官职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且把自己的兄弟、姻兄、女婿和侄子……拉进这个团体”。这是家族集团的胜利。这些对外封闭的家族集团在其内部长期相安无事。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碰头见面，频繁地通信联络，积极地交换看法：“舞会、音乐会、演出、游艺活动、大摆排场的节庆、百人宴席”，对他们来说都是进行接触、协调一致的大好时机。1785年3月30日，为了庆祝诺曼底公爵即未来的路易十七的诞生，大教堂的钟敲得震天价响；约利·德贝维院长举行了有110人出席的盛大晚宴，在灯火辉煌的官邸前，“他设了两个葡萄酒池，招待当地居民”⁹⁸。

这些统治集团首先捍卫的是自身的特权，同时也注意维护各省的地方特权。为了测出它们的脉搏，我们本可以去雷恩、图卢兹、格勒诺布尔和波尔多等地考察。对于格勒诺布尔，我们似乎应给予更多的关注。这也许因为该“省”地处王国边缘，较为完整地保存着它的特权和习惯。格勒诺布尔的高等法院是个格外注意维

护自身特殊利益的团体，它把本市的市政厅以及本省城乡的市镇机构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679年，德·艾尔比尼巡按使写道：“每天我都想着要（在格勒诺布尔）设立一名治安法官，以使高等法院对市政厅的活动不再进行干预。这是王国中抱团最紧的集团，其目的在于相互支持，确保他们在省内的一切权威。当这伙人中有一人对某件事情发生兴趣时，他所袒护的那件事就决不会吃亏”⁹⁹。就拿德·泰赛元帅的遭遇来看，巡按使关于格勒诺布尔高等法院的专制独裁所讲的话并不过份。在1707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这位元帅指挥的法国军队在都灵遭到败绩后艰难地撤回法国本土。国王决定任命他为东南方面军司令，凡尔赛宫通知元帅，任命书应由格勒诺布尔高等法院登记生效。当他直接从宫廷抵达该市时，他的表现大概不够谦逊。因此，他立刻遇到高等法院德·格拉蒙院长的刁难，后者对他出言不恭，指责他想凌驾于高等法院之上。元帅在他的信函中不无惊异和愤慨地陈述了事情的原委。但是，在他出发对萨瓦驻军进行三天巡视返回原地时，高等法院认为他的权力太大，决定削减他的权力范围。他获悉后怒不可遏。无论如何，他的权力是得到国王确认的，任何人也不能削减这些权力。他要求国王“主持公道”，国王后来作出了对他有利的裁决，德·格拉蒙院长不得不为此向他赔礼道歉。尽管如此，这场荒唐的礼仪战确实令人回味¹⁰⁰。

在波尔多，强大的、傲视一切的高等法院把当地阔绰的富豪聚集在一起，他们掌握着传统的收益来源：波尔多葡萄园。1608年，亨利四世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个手段高超的特权阶层的所作所为，他所说的话至今使我们为之神往。他说：“你们说我的百姓受到了践踏。然而，除了你们以及你们的同伙，又有谁在践踏百姓？……在波尔多，如果不是腰缠万贯的人，谁又能打赢官司？……农民种植的葡萄园不是都属于高等法院的院长或参议的

吗？可怜乡居贵族哪有什么土地？只要一当上参议，立刻就可以发财”¹⁰¹。在里昂，1558年时，教会人士指责只有30来人才是城市的主宰，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商人”。在蒙彼利埃，人们在成功的阶梯上又登上了一层，因为朗格多克的金融商在路易十五时代已经进军巴黎。在那里，他们把包税所几乎居为已有¹⁰²，换句话说，他们把法国相当一部分财富装进了腰包。多么了不起的本领！

奥克语和奥依语

法兰西在地理、经济、社会等方面不够统一，它在文化方面是否具有统一的方便条件呢？或许有吧。毋庸置疑，人们事先已经知道，虽然在最上层存在着统一的、群英毕集的法兰西“文明”，它力争囊括一切，统治一切和约束一切，在各方面达到光辉灿烂的巅峰，但也不能不看到，在我国领土上，若干世纪以来，至少存在着两种互为对抗的、各有其语言王国的潜在文明形态——奥依语文明和奥克语文明；前者赢得了胜利，后者由命运所决定，大体上处在近于殖民地的地位。北方以其物质生产的成就压倒了南方。

鉴于我同样热爱这两种文明，尽可能去理解它们，尽可能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去看待它们，我将作为民族统一的拥护者而出现，虽然在追溯历史时，我试图不夹杂这方面的主观因素。

因此，在北方和南方之间，在长长的语言边界两侧，存在着裂缝和敞开的伤口。这条语言分界线的走向是从加隆河畔的拉雷奥尔直到瓦尔河流域，穿越中央高原和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大部分。历史地理学不久前对地名学和方言学素材提供了新的解释，如果采纳它所提出的检验标准，接受它的估测，我们或许可以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文化分界线甚至上移到比这条语言裂缝更往北的地带。皮埃尔·博诺认为，界于奥依语地区和奥克语地区之间的这条线

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划定的。这里有一个中界区，一个界线可变的古罗曼语中界区，无论是向北或是向南，都存在着众多的伤口瘢痕，而最明显的结果便是从奥克语地区挖出了一大块地方作为中间地带，即人们通常认可的利穆赞、奥弗涅和多菲内（参阅本书第78页的地图）。

不过，让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毫无疑问，法国的历史总是在这个中界区的两侧一分为二的。北方发生的事通常并不以相同的方式在南部出现，反之亦然：文明方式（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喜笑怒骂、思想信仰、衣食住行、待人接物乃至划分田地等各种行事方式）在奥依语地区和奥克语地区几乎从来都不相同¹⁰³。南方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都存在“另一个”法国。

北方人不断地发现另一个法国的存在，不停地为此大叫大嚷，简直毫无顾忌，甚至多次莫名其妙地大发脾气。这可是咎由自取！

拉辛——我们已提及他在于泽斯时的那些非难之词——从他过了瓦朗斯后再往南去，因听不懂周围的人所说的一切而大为恼火。不过，上帝知道，在当时的法国，哪个地方讲的不是方言俚语！当然可以相信，一个北方人在进入奥克语地区前，对各种方言大致还能听懂。拉辛在给拉封登的信中写道：“我向您发誓，我在这里需要有一名翻译，就像莫斯科人在巴黎需要翻译一样……昨天，我想要一些平头小钉……便打发叔父的仆人进城，嘱咐他去买二、三百枚钉子，他立刻给我送来了三把火柴！请想一想，这类误会简直让我生气”。“我听不懂这个地方的法语，当地人也听不懂我的法语”¹⁰⁴。

这是名符其实的两个不同的世界。卡米扎尔起义的一位赞颂者于1707年在伦敦出版了《上帝奇迹新说》。他在书中提到，他在塞文山区看到的“上帝附身之人”是些质朴、“诚实的人”。他们“在

上帝附身时”竟能用法语宣讲“神诫”。这可真是一个奇迹，因为“对这一地区的农民来说，用法语讲话就像一个法国人刚到英国时用英语讲话一样困难”¹⁰⁵。但是，这个奇迹可以得到解释，因为在塞文山区，人们读的是法文版《圣经》，唱的是马罗用法语撰写的赞美诗。

普罗斯佩·梅里美是个原籍在诺曼底的巴黎人，也是目光敏锐、智慧过人的观察家。我们对他事先就可寄予信任。当他于1846年乘坐小火轮，沿着湍急的罗纳河顺流而下，在阿维尼翁登岸时，开口便说他自己简直就是到了外国¹⁰⁶。其实这也并不妨碍他后来重返这里，并于1870年在戛纳与世长辞。他之所以这样做，如果说有什么理由的话，那就是他把地中海的女儿科西嘉岛融入了法兰西文学；他的名作《高龙巴》于1840年问世。

吕西安·费弗尔1878年生于南锡，但就其家庭出身和个人情感而言，他应是孔泰人，在他穿越西南部的一次旅行中，曾感受到一次冲击——另一种文明的冲击。1938年7月20日，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取近道来到了这里（指他要去接受治疗的科特雷城），走的路线是利摩日—佩里格—阿冉—穆瓦萨克—欧什—卢尔德。这条路线穿越了法兰西许多景色秀丽的地区。但是能对它们冠以‘法兰西’的称号么？在我们这些来自北部和东部的人的眼里，这些地方该是多么遥远，多么富有异国情调！……到了佩里格，圣·索菲大教堂猛然映入眼帘，它出现在法国最迷人、最雅致的景观之中，简直就是库尔贝画笔下伊斯尔地区周围的汝拉山脉景色的再现；葡萄之乡穆瓦萨克竟为一筐葡萄，不惜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环境的平庸令人失望，圣彼得大教堂的雕塑和钟楼均已破败和废弃；对欧什这样一个城市，人们可猜到它那非同凡响的灵魂——今日缄默无语的石砌堡垒显然曾被狭隘的宗教狂热所吞噬，曾是动辄以兵戎相见的战场。所有这一切都使你困惑迷惘，使你产生

生活在异国他乡的感觉”。至于利奥泰元帅这位“洛林亲王”¹⁰⁷，他言简意赅地说：“我在贝齐耶感到很不自在”¹⁰⁸。

一代接着一代，惊愕接着惊愕，始终延绵不绝。1872年，登台亮相的是恩斯特·勒南，但他的表演令人作呕。他大言不惭地说：“我不知自己是否搞错，但我越来越确信有一种历史人种学的观点。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英国与法国北部具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性格中的鲁莽轻率来自南方。如果法国没有把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拖进自己的怀抱中来，我们今天或许会成为踏实肯干、彬彬有礼的新教徒”¹⁰⁹。多少美德因此而丧失！多少大胆的假设因此而得以成立；既然大家知道巴黎和布列塔尼由于地处北方而在16世纪拯救了天主教事业，人们对尼姆和塞文山区又该作何解释？尽管勒南聪颖过人，甚至正是由于这种过人的聪颖，他的这篇文章才令人讨厌，如果说不是令人惋惜。

但是，北方人往往厚颜无耻地夺人所爱，贪天之功为己有。他们所依靠的与其说是自身的美德，不如说是政治和经济的优越性，他们的领先地位是历史造成的，唯有历史赋予了法国北方这一优越的地位。

作为补偿，能否举出一些更为热情的见证呢？人们想到司汤达，他曾高兴地说：“我让自己变成了南方人，事实上，这对我来说毫不困难”¹¹⁰。不过，你或许会说，司汤达出生在格勒诺布尔（1783年），他从呱呱落地那天起，至少已具备了一半南方人的资格。格勒诺布尔确实不属于北方，何况司汤达就是司汤达，他对于另一个艳丽的南方——意大利又是那么迷恋。法国南方“与意大利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¹¹¹。

人们是否能以梵高为例呢？回答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在巴黎过了两年穷困潦倒的生活后，这个地道的北方人于1888年2月来到了阿尔勒。立刻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令人眩晕的大自然和它

的万般色彩：“硕大无朋的岩石，葱绿的花园，玫瑰花丛中的小路，蔚蓝色的天空……”他在给自己的兄弟的信中写道：“我毫不怀疑我会永远喜爱这里的自然风光。直至目前，我并不特别感到孤独，强烈的阳光及其对自然界的作用给了我无穷的乐趣……啊，不对这里的阳光崇敬的人，真是大逆不道……”甚至“猛烈的西北风”，刮得让人如此难受，也是“值得观赏的”。此外还有那些当地人以及他们纯情的天性。“不会讲普罗旺斯土话实在使我受害不浅……我在交往方面至今几乎毫无进展……多少天过去了，可我无论吃晚饭或者喝咖啡都不能对任何人说一句话。从一开始起就是这种状况”。透过字里行间，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画家本人将会发生精神错乱的可悲迹象，而且还有他真正感到无所适从的蛛丝马迹。1888年3月，在他到南方后不久，他写道：“我还要诚实地告诉你，看到那些朱阿夫兵和妓女，看到初领圣体的、可爱的当地女孩，身穿白色长袍的活像一头危险犀牛的牧师和狂饮苦艾酒的酒徒……我觉得他们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¹¹²。

有人或许会用南方的嘲笑、批评或讥讽同“北方人”的谩骂、失望和偏见作对照，这是完全合理的。人们会对此拍手称快。但是应该承认，在这方面——虽然我请教过几位熟悉奥克语的行家——我们的收效甚微：除了戏剧中的一句名言、一个谚语，或者某种嘲弄以外……我们几乎找不到比较突出的例子。丝毫听不到16世纪时代旅居尼德兰或英国的西班牙人的快言快语。这些西班牙人以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发泄不满，咒骂因奶油制作的菜肴，带着惶恐的心情和恶劣的心绪喝啤酒¹¹³，或者跟当地人赌气，例如天主教国王派驻伦敦的大使竟因讨厌与当地打交道而闭门不出。1673年，热那亚共和国的一位官员在谈到这位大使时曾经写道：“他对英国的习俗格格不入，始终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一点也不喜欢和他人交往……”¹¹⁴。事情固然如此，但西班牙毕竟是个典型的

南方国家，而伦敦地处北方，而且在所有北方城市中具有最鲜明的特点。

至于我国的南方，难道它能习惯、忍受和坦然接受这些语言差异吗？说奥克语文化今天正在苏醒、长出新芽，或许是言过其实。那么，难道南方人因他们在北方土地上早已取得了成就，因他们在知识、政治、行政和商业等领域建立了功业，而不再对此斤斤计较了吗？更为可能的是，南方充分地意识到北方的地位与首都的声威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使南北之间的对话改变了性质。当马里·拉丰这位捍卫奥克语文化传统的鼻祖于1842年发表《法国南方的政治、宗教、文学史》一书时，他并不嘲笑“法国人”，就是说不嘲笑卢瓦尔河以北地区的居民。但是，他向中世纪时崇尚礼仪、酷爱自由的南方人揭露了“卢瓦尔河另一侧的骑士们”的“野蛮暴行”¹¹⁵，这些骑士依靠劫掠、残暴和狂热取得胜利，就像“山岳派”用恐怖战胜了“真正的革命者”吉伦特派一样，后者与南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里·拉丰只是提出了控诉，进行了揭露。但要嘲弄战胜者，那又谈何容易。南方人对“法国人”的怨恨，即土伦人所说的对“法国佬”的怨恨，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外来占领者的怨恨。

只是在司汤达的笔下，才有对自命不凡、拘谨和刻板的法国北方恰如其分的嘲讽。“幸福好像随着南方口音一起消逝了”，他不无感慨地说。当他沿着罗讷河顺流而下时，他高兴得情不自禁：“纯朴、天真……在瓦朗斯……展现得一览无遗。我们完全是在南方。我无法抑制这种欣喜之情。这儿的一切与巴黎的拘泥虚礼截然相反，它首先要你在同别人讲话时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这里每个人在讲话时“只想抒发他的情感”，丝毫不考虑“在对方的心目中树立崇高的形象，更不因对方的社会地位表现低三下四。这种情况恰如德·塔列朗先生所说：‘在法国，人们对一切都无需尊重！’”

司汤达继续旅行,在博凯尔交易会停留三天,置身于欢乐人群之中。他说:“在博凯尔,很少听得见巴黎的那种一本正经的说话腔调……很少看得到在里昂或日内瓦的大街上(常见的)……那种生硬、呆板和怀疑的脸色。其原因也许是集市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主要是南方人”¹¹⁶。

传统的差异今天并没有消失殆尽。就在几年前,朗格多克地区的一个小镇阿尔米桑的镇长就曾对我的一位历史学家朋友说:“洛热尼先生,自您踏进诺鲁兹门槛之日起,您完全可以对自己讲,您离开了法兰西。您是在讲奥克语的土地上,您已不再是在法国了”。当然,今天在我们国家,从南到北人们讲的都是法语。不过,我刚才在电视上(1985年7月31日)还是听到了一句刺耳的话。米歇尔·奥迪阿尔声称在他编写的许多电影脚本的对话中从未用过俚语,他所使用的只是“巴黎人”常用的通俗语言。他的对话者当即提醒他,有人在谈到他的影片时曾经说过:“别忘了为卢瓦尔河以南的观众在影片上加字幕”!在北方和南方的通俗语言之间,难道还存在这么大的差距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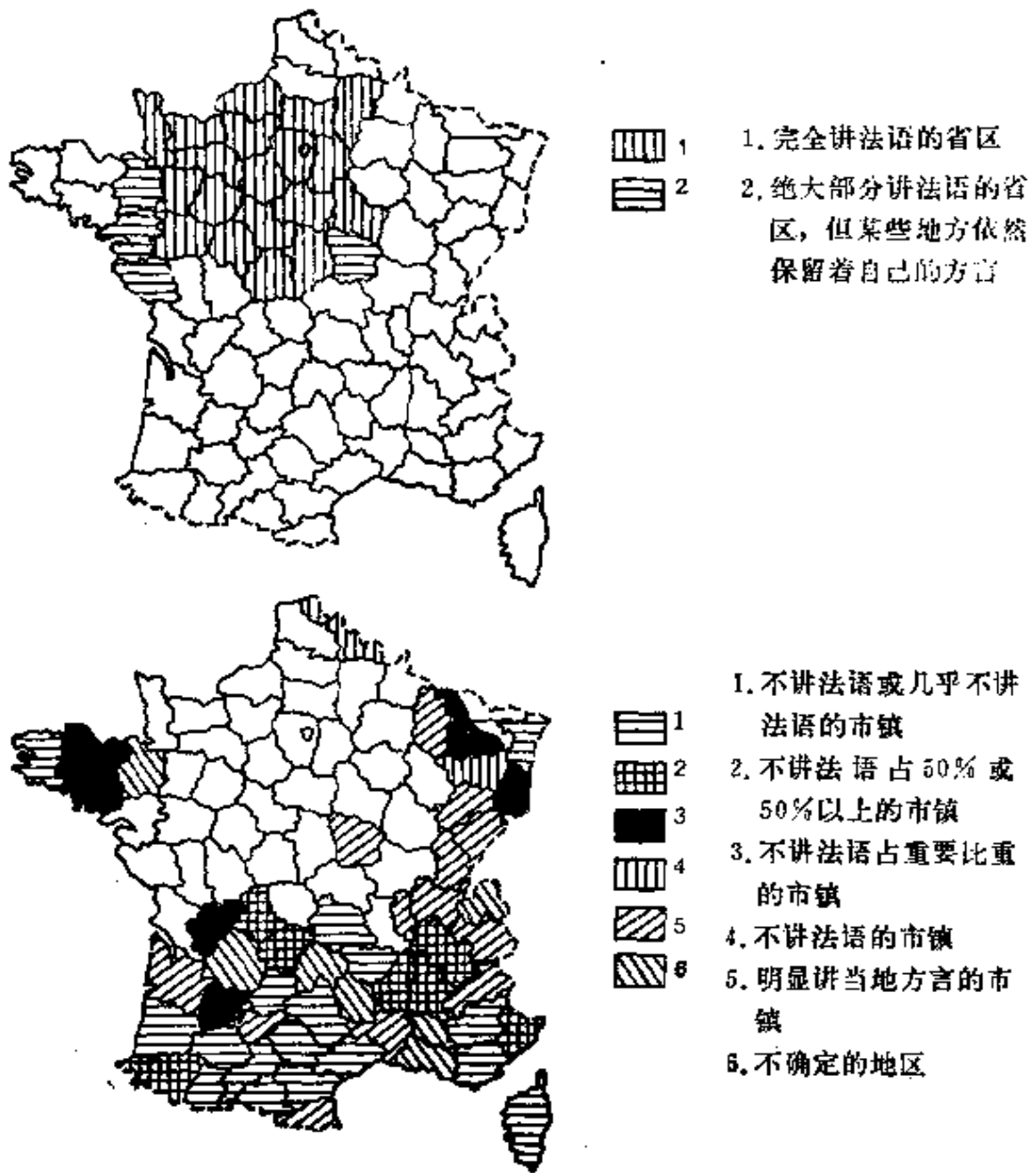
不计其数的方言(18世纪)

问题显然远不是那么简单。法国的南方和北方地域十分辽阔,它们本身又各自暴露出众多的文化差异。如果更进一步进行观察,那么,形形色色的地方主义就会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其数量之多会令人目瞪口呆。大家知道,在相当短的距离内,习俗、民情、衣着、谚语,甚至财产继承方式(尽管成文法对此有各种规定),就像彩虹一样异彩纷呈。尽管如此,1790年,格雷古瓦教士曾对各省的方言状况作了一番调查,而调查的结果竟完全出人意外。巴雷尔看来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些方言构成了当时传播革命思想和“公众意识”的一项障碍。调查报告用大量确凿的实例证明,在法国不

仅有一种奥克语和一种奥依语（还要加上王国周围人们所讲的几乎是外来语言的巴斯克语、布列塔尼语、北部的佛兰德语和东部的德语），而且无论是在卢瓦尔河以北或以南，各省方言还有自己的特殊体系，它们还可以几乎无穷尽地分门别类，因而格雷古瓦教士在致国民公会的报告中对其调查材料作了归纳，指出法国当时存在 30 种不同的方言¹¹⁷。在这些方言内部，从一个集镇到另一个集镇，从一座村庄到另一座村庄，每种方言又分别因地而异。为此，科雷兹省省政府于 1792 年 12 月 1 日对是否有必要把政治文书译成方言表示怀疑：“家住瑞雅克乡的译者尚且抓不住邻近各乡的人讲话中的细微语气差异，而这些差异在七、八里路之外就变得相当大了”¹¹⁸。原在波尔多高等法院担任律师的皮埃尔·贝尔纳居然自命不凡地写信告诉格雷古瓦教士：“以我对周围乡村情形的熟悉，我想可以用一种界于各乡俚语之间的中性语言来翻译神圣的《人权宣言》……”¹¹⁹。这种中性语言岂不是一种尚未问世的世界语！

不妨举些确切的例子：科斯加尼方言（包括吉耶纳和科斯加尼地区）与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的方言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它本身又被加隆河一分为二，河流两岸分别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言”¹²⁰。再往下，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方言，从欧什到图卢兹或到蒙托邦，人际交往会遇到困难。一位行家说，在波尔多县境内，“方言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细微的差别这里故且不谈！在朗德省，“从一个教区到另一个教区，人们经常难以互相沟通”¹²¹，方言差异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在北方，情况是否有所不同呢？勃艮第地区特有的方言家族，从第戎到博讷、夏隆、布雷斯、莫尔旺……，也有千差万别的变化。在马科奈，“无论是语调、发音还是词尾，从一村到另一村都各不相同”¹²²。在萨兰四周，每个村庄的差异之大“几乎难以辨认”，而“更加奇特的现象”是，“在长不过半里的萨兰城本身，两个城区的用语



方言的缓慢退却

法语于1835年已在从前的奥依语地区立足生根。1863年，根据国民教育部所作的一项正式调查，在相当大一部分国土上，人们仍讲方言。

上图：1835年使用法语的省区。资料来源：阿贝尔·雨果《景色如画的法兰西》（巴黎，1835年版）第1卷，第16页。

下图：1863年讲方言的市镇。资料来源：国家档案馆的卷宗，编号为7¹⁷ 3160，摘自国民教育部的《各地情况统计》。

地图均引自欧根·韦伯：《乡土情趣的结束》，1983年版。

和习俗竟是泾渭分明”¹²³。我们切莫以为，布列塔尼语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都以统一的民族语言形式而出现。然而，特雷吉耶的布列塔尼语与莱昂的布列塔尼语大不相同。适用于前一地区的语法规则却在后一地区不再适用。发音方法尤其变化多端。即使对本地人来说，“不费一番功夫，就别想听懂离家乡20里远地方的人所讲的布列塔尼语”¹²⁴。

在昔日的法兰西各地继续进行这项乏味的语言考察实在没有必要。可以肯定，法语当时尚未在全国占统治地位，正如《百科全书》所说：“各省几乎普遍使用方言……只是在首都才讲规范的语言”¹²⁵；此外，方言因地而异，而且层出不穷。1708年，拉谢塔尔迪¹²⁶在谈到宗教教育时曾说道：“有多少个堂区和学校，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教义书”¹²⁷。然而，在卢瓦尔河以北和以南，差别十分重大：在河流的北岸，除布列塔尼、佛兰德和东部地区外，即使有人不说法语，至少也能听懂法语；契约文书，乡村神甫的布道以及学校教学（尽管学校还很简陋）也都使用法语。北部地区的方言只是农民和城市平民的日常语言。并且，正是在这个讲奥依语的法国，方言消失得最快（参阅前一页附图）。相反，在几乎所有讲奥克语的地区，方言仍大行其道。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镇，不分社会阶层，人们所讲的都是当地方言。阿韦龙省的一名作者¹²⁸进一步说，“就连学者和富人也不例外”。虽然有钱有势的上层市民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讲法语，但普通百姓大多对法语一窍不通。在科斯加尼地区，欧什的一位无名作者写道，“习惯法以及契约文书几乎都使用拉丁口语”¹²⁹。

上面提到那位作者认为，由于法语在当时还没有成为交流的工具，人们从欧什前往蒙托邦，“遇到语言障碍”¹³⁰乃是十分自然的事。语言障碍可以造成十分滑稽可笑的误会。出生于阿尔卑斯山南麓的一位名叫阿尔贝的教士就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几年以前，在

奥弗涅的利马涅地区旅行时，我始终无法让我沿途碰到的农民听懂自己所说的话。我先跟他们讲法语；再跟他们讲阿尔卑斯方言，然后又跟他们讲拉丁语，可全都无济于事。最后说得口干舌燥，还是不能让他们明白我的意思。于是，他们再用当地方言跟我讲话，而我自然也听不懂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¹³¹。因此，15世纪时，南部阿尔地区或塔拉斯贡地区每当教会指派一名出生在布列塔尼或马恩河畔的夏隆的教士前来担任本堂神甫或主教时，教民们发出的愤怒抗议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因为他们将根本听不懂星期日的布道词¹³²！

不过，人口混杂对法语的渗透起了促进作用。例如，仍是在15世纪，北方的移民越来越多地来到阿尔城，尽管开始时他们不懂当地的方言。由于他们的出现，法语便同时通过杰出人物和普通民众在这里生根。“因此，阿尔城之所以能在1503年，即远在维莱科特雷敕令（1539年）颁布之前，已成为普罗旺斯地区第一个用法语记录市镇会议决定的城市，这绝非事出偶然”¹³³。

总之，到18世纪末，由于人口的混杂，大量的法语短语已经渗入并改造了各地的方言。向格雷古瓦教士提供信息的所有调查人员从全国各地寄来的材料无不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在城市中，由于受贸易的推动，讲法语已逐渐蔚然成风。波尔多的商人过去都讲科斯加尼语，“如今，方言只出现在鱼贩、搬运夫和女仆的嘴里”。甚至连工匠也都讲的是法语¹³⁴。

对这一缓慢完成的变革，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它大约需要50年时间，其他人则认为30年足够。所有人都把这种变化与贸易的发展以及大规模的筑路工程联系在一起。道路建设至少彻底改变了城市与乡镇之间的交通状况，但是，我国公路和桥梁建筑工程师引以为傲的这些18世纪道路工程，若与下个世纪的工程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创办各种学校对法语的普及，其作用远胜于公路甚至

铁路。然而，乡村的“法语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皮埃尔·博诺指出：“直到1850年前后，在奥克语区，农民的法语水平还很低下”¹³⁵。脍炙人口的小说《金银岛》的作者罗伯特·路易·史蒂文森于1878年“骑驴”在上卢瓦尔地区旅行，与当地人的聊天并无多大困难，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已不再使用方言。同年8月，他到达离勒皮城40公里远的大镇勒莫纳斯捷，他碰到一些制花边女工，她们向这位外国游客打听有关本国的情形。“‘英国人使用方言吗？’一次有人这样问我。由于我作了否定回答，他们便说：‘那么，是讲法语了？’？‘不是的，不讲法语。’我回答说，‘那么’，她们得出了结论，‘那里的人自然是讲方言了。’”¹³⁶

在某些地区，使用法语的时间更要晚些。1902年时，许多布列塔尼教士置巴黎的命令于不顾，拒绝用国语布道。在卢西永地区，加泰罗尼亚语至今还很流行；当地人即便并不全用加泰罗尼亚语讲话，但都能听懂这种语言。1983年，在接受让·洛热尼的采访时，葡萄种植协会的前领导人安德烈·卡斯特拉认为朗格多克方言的消失只是本世纪50年代末的事情。他并不把这种感情上的“裂痕”归罪于小学教师历史悠久的教学活动，却说这是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推波助澜的结果，还有就是当地人希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而力求获得作为城里人和有产者的显著标志。

为史前地理学服务的方言学和地名学

方言(或不如说，地方性的俚语)不仅反映着18和19世纪的现实。方言学、地名学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分支为考察我国悠久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的知识源泉。对于这一宝藏，传统的地理学和最新的历史学都还没有进行勘查。年轻的地理学家皮埃尔·博诺的功绩就在于，他为把这些丰富的资料纳入到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解释范围中来作了初步的、严肃的尝试。

因为方言(或者剩存的俚语)和地名,作为语言的地方变种(这种变异不但清晰可见,而且可以充当见证),都是历史的方位标。它们的确难以驾驭,很难恢复原来的位置,但它们除说明法语的普及进程外,还有助于我们搞清许多在近期出现的现实,从而使我们得以进一步认识我国最遥远的深层的历史。

皮埃尔·博诺的研究方法确实非同凡响,需要付出耐心,取得众多相关学科的配合。他首先把古今以来的一些零散资料加以收集和整理:某一地名早于另一地名,某一方言区沿某一狭长地带划界,如此等等。但是,这么多的信息不会自动地在同一个坐标上排列得整整齐齐。林木专家用类似的方法研究树木的年轮,他们也拥有确切的地点以及一系列相对的时间(不是绝对的时间)。他们先把这些地名和时间纳入历史年表,甚至纳入史前期的年表,然后,根据取得的结果,对历史的形象作出必要的、不同程度的修正。皮埃尔·博诺耐心的工作同样是要透过众多的语言符号找出“种族”的起源。这些异常古老的“基本细胞”,从最初占有土地那天起,便分别成为一个大小不等的“领土单位”,并同时自然景观和深层文化两方面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无论它们后来经受多少波折,“它们的核心都将在狂风暴雨过后获得重生”。这就是我国经久的多样性的关键所在。尽管国家以巴黎盆地为基础,不断利用民族语言对多样性进行侵蚀,力求实现其缓慢的兼并和统一使命¹³⁷,而这些多样性却依然是人所共见的事实。

皮埃尔·博诺的研究,使我们就像通过X射线进行透视一样,加深了对多样性的认识。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建立在土地基础上的农村的历史。我们在长达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时间跨度上,满怀激情地倾听着人和环境永无休止的对话。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一研究成果,我们势必要掂量人和环境的辩证关系。这是因为,不论是否遇到环境的抵抗,既存的社会经济结构总是在不断

发生变化，决定变化的各种因素也随之处于反复的变化之中。在经过千百年之久的颠沛流离以后，人群终于实行定居，并坚持不懈地在土地上进行劳动，“人征服地域”的深远渊源从此可以被追根究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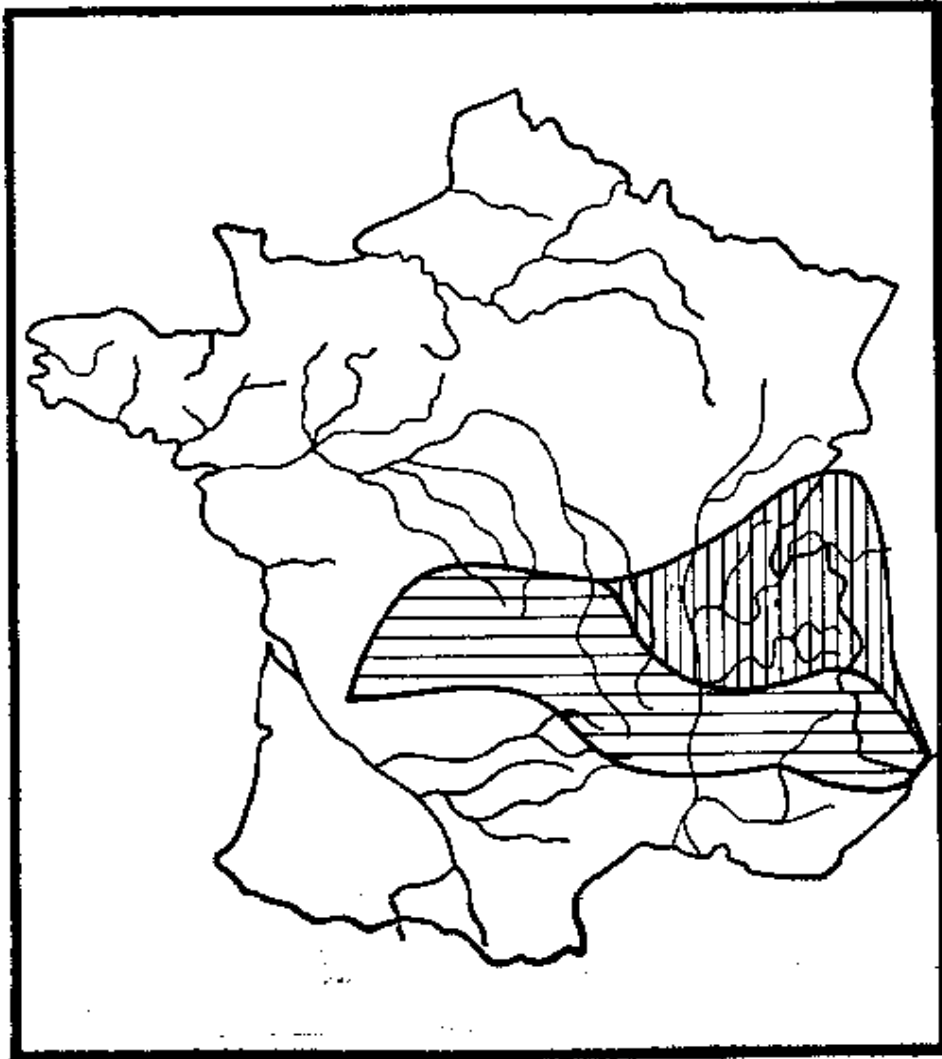
但是，如果认为人征服地域是件一劳永逸的事，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土地上“安居”的人并不就此不再“思迁”，他不断与环境作斗争，顺从自然界的要求和生产的需要，否则便不能适应生存环境。

直到加洛林王朝时代，直到最后的“蛮族大规模入侵”时期，法兰西地域很可能仍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处在半游荡状态；由史前期来自中欧的移民在我国开垦的耕地开始种植粮食作物，并于后来取得决定性的成就；广大地区依然以游牧活动为主，而在平原和山麓的交接地带，则以季节迁徙为主。

换句话说，法兰西的多样性——我国自然景色的“镶嵌画”——虽然是在几乎静止不动的时间中改变形态和结构的，但它毕竟是在变化着。皮埃尔·博诺说：“现在的居住网再不具原来的形态，任何地方概不例外”¹³⁸。遥远的过去把形态各异的法兰西强加给我们。这个说法就作为基础细胞的“地方”而言是正确的。对于由不同的“地方”组合而成的“地区”来说，这也同样是正确的。但在结合的牢固程度不尽相同的各大地区的边缘，也还存在五花八门的地方差异。在皮埃尔·博诺的著作中，地处法国中心的利穆赞和奥弗涅完全以与众不同的面目而出现。我已经说过，这两个地区自西向东构成了独具一格的法兰西中界区。它们不完全属于讲奥克语的法国——尽管人们过去一再肯定当地讲奥克语——但同时又与北部奥依语地区的侵犯相抗衡。罗伯特·斯佩克兰¹³⁹在南北法国之间不可思议地划出了一个分界区：在罗马帝国时代乃至在罗马帝国以前设有防御工事的这个界区，西起普瓦图海湾，东接日

内瓦湖,在奥弗涅北部拦腰切断了今日法国的领土,它在某种意义上对奥依语的渗透起到了阻隔作用。我真想知道皮埃尔·博诺对这个台阶状的界区作何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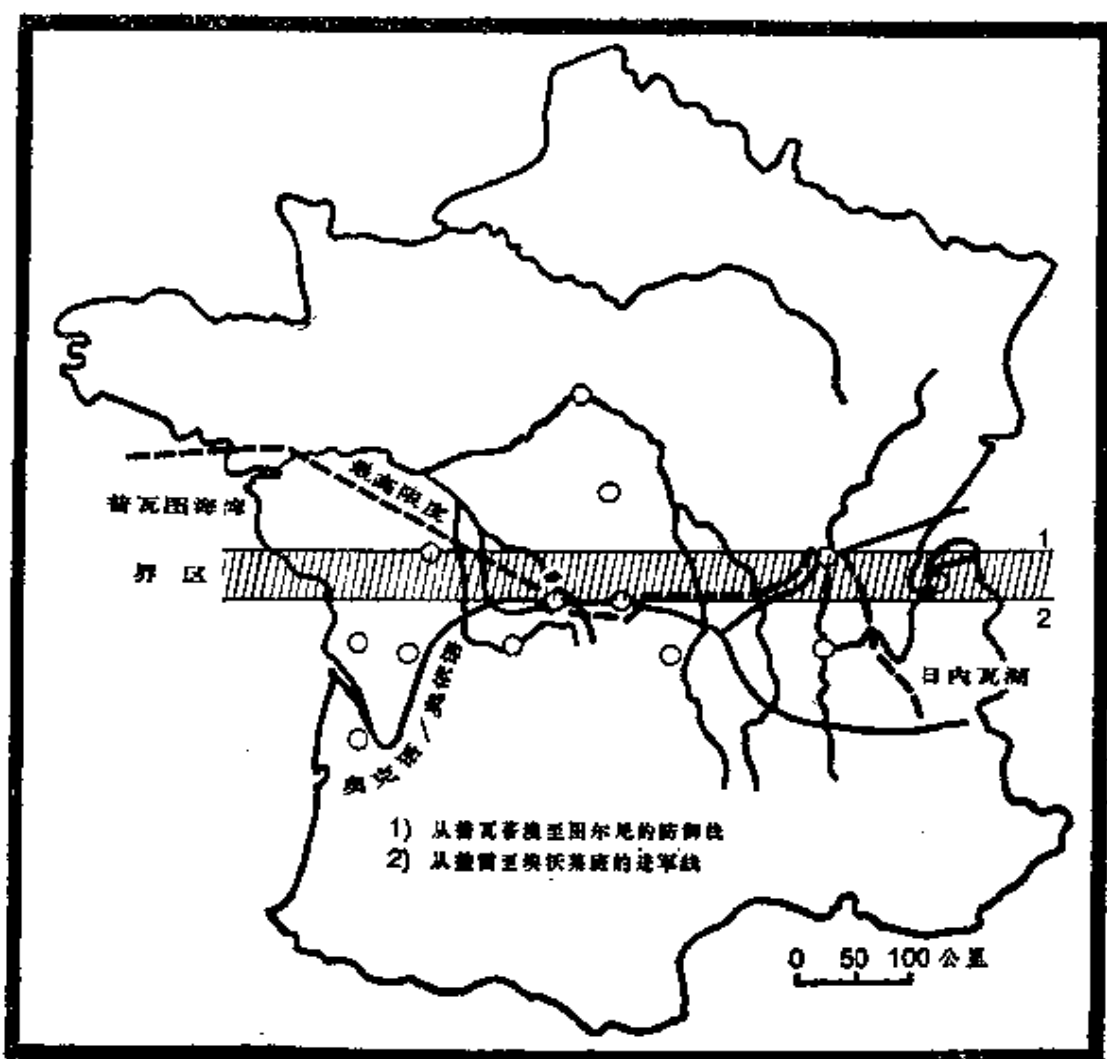
当然,皮埃尔·博诺的眼光并不局限于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证,在他看来,整个法兰西都可作出相应的修正。因此,我将有



南罗曼语中界区

引自皮埃尔·博诺前书第二卷第118页。

横向条纹区是博诺从“奥依语区”内划出的一块“南罗曼语中界区”,即利穆赞、奥弗涅和多菲内。它的上沿线也就是奥依语地区和奥依语地区的通用分界线。竖向条纹区是法语与普罗旺斯语交汇区。



公元400年前后高卢中部的古罗马防线

引自罗伯特·斯佩克兰绘制的《地图集》，1982年版。

利用地名研究、历史和考古资料以及航空摄影，罗伯特·斯佩克兰在地图上绘制了宽50余公里、横贯高卢的古罗马防区。罗马人于公元四世纪在这里构筑了防御工事，使用萨尔马特人进行防守。后来，到公元六至七世纪时，这条防线成了法兰克人南进的跳板。

机会把他这部杰作中许多构思新颖、栩栩如生的形象移入到我的《法国史》里来。

皮埃尔·博诺随后借助我国史前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对多样性作出详尽的解释：史前期的“法兰西”同时受到中欧和地中海的两大浪潮的冲击。前一股浪潮的传播是由于东方因谷物种植推广较早较快而具有经济优势，在皮埃尔·博诺看来，在中石器时代，中欧应是典型的“农民大陆”，耕作技术以及掌握这些技术的农民纷纷从中欧向西扩展。至于发生得更早的地中海浪潮，则是穿越呈现在自己面前的无人区，向法国北方送去兼顾采集和零星耕作的畜牧业。

至今为我们熟知的法国南北两大部分，可见早在迈进历史门槛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皮埃尔·博诺仔细加以划界绘图的那些古老的“基础细胞”也同样早已存在。弗朗索瓦·西戈写道，“据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院的统计，在今日法国的国土上，存在着473个‘农业区’（昨天的‘农业区’也许为数更多……从波旁内到西永，从欧尼斯到博日，昔日法兰西拥有的耕作制当不少于100余种〔请注意这一断言，我将在下文另行阐述〕……因此，只要我们还没有找到确认这种多样性的科学手段、观念和方法……我们的概括将永远是无效的。”¹⁴⁰与那些不畏艰险、想方设法实现王国统一的国王一样，我们的努力也将纯属徒劳！

文化人类学研究

我们对法兰西多样性的考察至此仍不能告一段落。这尤其因为由文化根源产生的多样性像难以数计的斑点布满了法国的脸庞。法国怎么可能在这种四分五裂的状态下生存呢？

为了追溯古老的文化根源，近年来十分风行的人类学可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这当然不是指从前旨在测量颅骨和研究“血统”的体质人类学，而是最近已成为中青年历史学家关注热点之一的所谓文化人类学。

他们家庭有了新的发现。恰如让-路易·弗朗德兰所指出的那样，当今社会的演变正使家庭生活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这种演变可能也促使人们加强了对家庭的重视，因为在任何社会中，家庭都是充满痛苦的基本单位。社会的一切都以家庭为出发点，几乎一切社会问题都可通过家庭获得解释。在一个秩序井然的蜂巢里，如果工蜂寻找配偶和繁殖后代，那还有什么秩序可言么？历史学家们明白这个道理，而且先于人类学家，先于精神分析学家。但在今天，由于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比过去认识得更清楚了。结果，我们成了他们的俘虏，即使并不完全心悦诚服，但也不得不接受他们从现今的统计数字和图表出发而对遥远的过去进行的追溯性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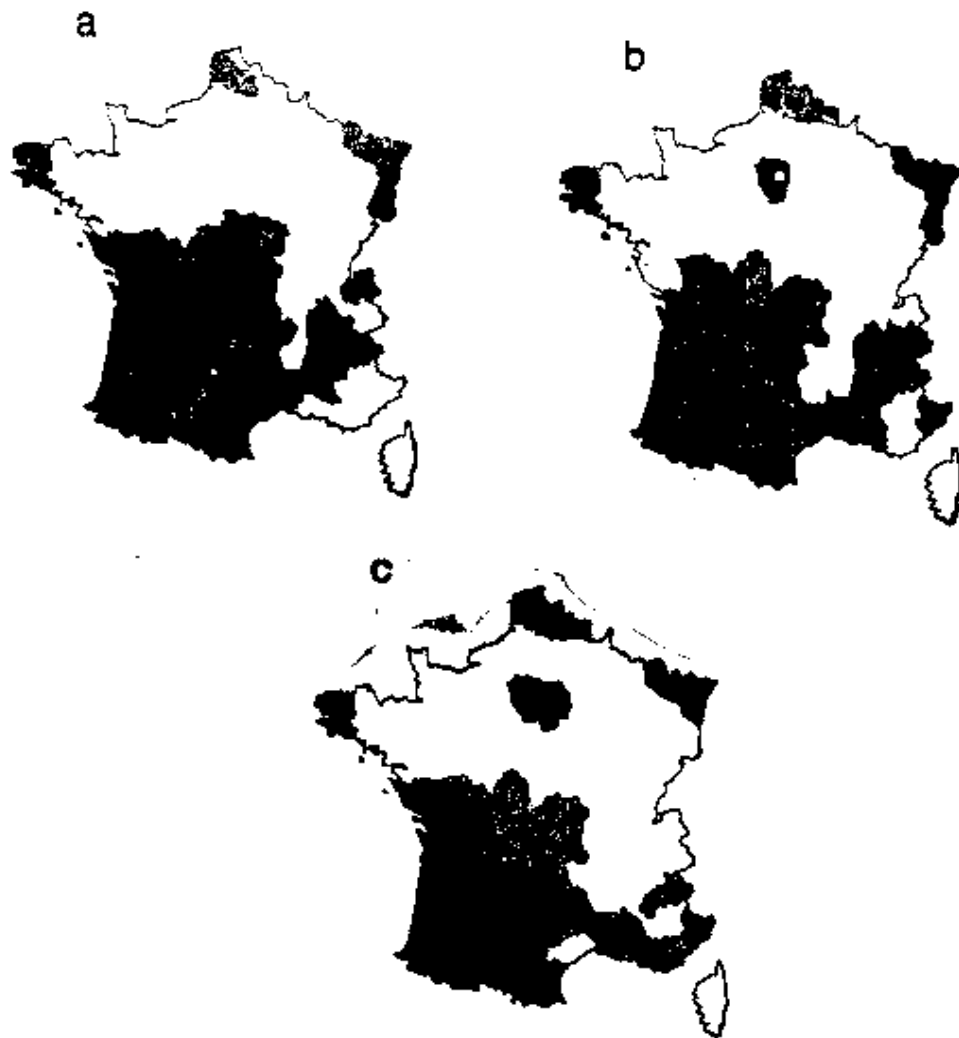
为了了解这种研究方法，即埃尔韦·勒布拉和埃马纽埃尔·托德在《法兰西的构想》一书中使用的方法，我们还必须先确认几方面的事实，然后再定出几条规则。

在西方，家庭至今可分为三大类：一种仅由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小家庭，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胞核型家庭”，再加两种不同类型的大家庭。在世系制家庭中，父、子、孙几代人共同生活在一起，这是专制式的家庭，所有的成员都对家长唯命是从。在这种类型的家庭里，结婚受到限制，并且往往较晚，每一代都只有一名子女在婚后继承遗产，其他子女则只能独守终身或者另谋生财之道。第二种类型是宗法制家庭。这种家庭朝横向发展，所有的子女不论结婚与否都留在长辈的身边，他们陆续结婚后组成一个由同胞手足相结合的家庭群体。这种家庭结构的扩展，甚至可“促成一个真实的部落或村社的诞生”。在这两种类型的大家庭之间，最突出的区别是婚姻的平均年龄：第一类家庭实行晚婚，独身率也较高；而在第二类家庭中，结婚较早也较容易，独身率则相当低。因此，“在人类学领域，婚配作为家庭体系中繁衍后代的活跃因素，也是

一个基本的社会事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斗争学说几乎有同等的地位”¹⁴²。这个不足挂齿的发现说来不免会惹人讥笑。

上述三种家庭组织形式把欧洲区分为几个相对鲜明的地区：胞核型家庭遍及整个英国；世系制家庭统治着德意志世界；宗法制家庭是意大利社会的支柱。唯有法国广泛地包容了这三种家庭形态。事实再一次表明，法国是欧洲的缩影和集中体现。在邻国作为民族特征而存在的东西，在法国则演化为各省间的对立。大体上说，南部法国盛行大家庭，而北方却是胞核型家庭，布列塔尼、阿尔萨斯和佛兰德外围地区的情况另当别论（参见第82页图）。南方的大家庭通常属于宗法制的类型，阿尔萨斯和布列塔尼的大家庭则属于世系制。

值得注意的是，很久以来，上述家庭类型始终占据着同一地理空间，处于相对固定的状态，人类学家在这里遇到的乃是稳定性和“刻板性”，是文化现实的长时段。尽管如此，在这些相对稳定的地区的边缘，往往随着市政建设的加速发展或工业文明的推广，而成为解构活动的天然舞台。一旦出现这类解构现象，界于几种文化类型之间的社会将受到严重的损害，人们因此感到悲观失望，沉沦在迷茫彷徨之中，甚至抑郁消沉，精神错乱，造成自杀和酗酒流行。由于人们寻求安全和解脱，天主教在19世纪再次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并在“制造独身者”的世系制家庭中找到狂热的信徒。同样，共产党也在盛行宗法制家庭的社会阶层中得以发展。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之处，正在于它具有高度的宗法制结构，因而把那些迷茫彷徨的人接纳到它的行列中去¹⁴³。然而，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凡在家庭体系出现崩溃或至少发生动摇的地方，取代家庭观念的宗教或社会信念却始终保持着既往的多样性而顽强存在。在旧伤平复以后，又出现新的裂口，如此反复，乃至无穷。



多种家庭形态并存的45个省(1975年)

a) 图， 农民 b) 图， 乡村 c) 图， 城市

大家庭地区与小家庭地区的分界至今仍清晰可见，它大体上与我国历史上可以辨认的一系列对立相吻合，这些对立表现在语言、扫盲程度、生活水平、所有制形态和城市建设、宗教和政治倾向等方面。

引自埃尔韦·勒布拉和埃马纽埃尔·托德：《法兰西的构想》，1981年版)

问题是具有不同家庭形态的这些地区又产生出众多的相辅相承的关系。我刚才谈到，天主教和共产党因与特定的家庭组织形式相适应而欣欣向荣。更加令人惊奇的是，1974年的选举结果以及1978年或1981年的选举结果却显示出这样的相互关系。在原则

上,宗法制家庭盛行的地区支持左派,而世系制家庭盛行的地区则支持右派。至于胞核型家庭——弗雷德里克·勒普莱坚持称之为“不稳定的家庭”,则在二者之间游移不定,有时倒向一方,有时又倒向另一方¹⁴⁴。

当然,我国“家庭”的区域界线并不仅仅由选举结果所揭示。人们可以根据许多因素在地图上标出这些区域的位置,尽管各种因素施加的影响有大小的不同。这些因素包括性别配比,移民倾向,对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态度,儿童数量,宗教信仰,卖淫状况,土地轮作,耕种制度,继承方式,建筑特征,自16世纪末兴起的巫术,甚至文盲的多少,等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国历史千差万别的基础,法国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塑造自己的形象,并且每一次都在专注的观察前显示其潜在的结构。在北方,在富饶的巴黎盆地,在利穆赞和普瓦图,村庄组织只是徒具形式,几乎不起任何作用,而往南去,在多菲内和奥弗涅,村庄所起的作用就比较显著,更不用说在吉耶纳、加斯科尼、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村庄组织简直就像遍地开花¹⁴⁵。看到这一切,历史学家怎能不感到惊奇呢?

事实再一次证明,法兰西的四分五裂是由其历史所决定的。这对不断变化中的历史时间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攻击。埃尔韦·勒布拉和埃马纽埃尔·托德在惊异和赞叹之余,对此感到饶有兴趣。他们认为至少在公元500年前后,在克洛维时代,随着蛮族的入侵和若干“种族地区”的形成¹⁴⁶,法兰西的这种四分五裂已经清晰可见。但是否应该相信他们呢?

如果文化人类学立足于今天,以充分的资料为依据,上溯千百年来的悠悠岁月,它就能够为我们历史学家提供帮助。在这方面,我以为有一系列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借鉴。就以巴黎盆地为例:从一张当今的地图上看,这是典型的胞核型家庭的聚集区,而米什莉娜·博朗却发现,在16、17和18世纪,在位于上述地区心脏地带的莫

城四周,也已经存在胞核型家庭;在谈到这座城市周围的农村情况时,她甚至使用了“七零八碎的家庭”¹⁴⁷的说法(这是一种时髦的表达方式,源出乔治·弗里德曼轰动一时的书名《七零八碎的劳动》)。这种家庭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在完全不注意社会保护的世界上暴露无遗。家庭在一方丧偶时便立即崩溃,随之出现的乃是空虚、孤独、破产、悲剧和无法继续生活下去。米什莉娜·博朗提醒人们注意鳏夫和寡妇匆忙再婚的高频率,仿佛男人或女人从中可以寻得必不可少的拯救。“尼古拉·皮卡尔分别于1739年6月、1741年8月、1744年5月生了第八、第九和第十个孩子;〔在这期间〕她曾两次寡居,又两次再婚”¹⁴⁸。

如果再往前追溯,我们也许将一直追溯到中世纪。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要重新考虑:说胞核型家庭是近代经济和社会变革的结果,这个结论是否真有理?我们不妨以英国为例作番尝试。皮特·拉斯赖特十几年前曾经指出:从16世纪起,英国的家庭基本上属于胞核型家庭¹⁴⁹。阿兰·马克·法尔拉纳不久前则证明,中世纪时代的英国不存在大家庭。由此可见,英国千百年来始终都盛行“胞核型”家庭¹⁵⁰。

如果在11和12世纪巴黎周围的情形与英国相似,我们对卢瓦尔河、塞纳河和索姆河之间的地区封建制为什么早熟,就会有更好的了解。封建制在当时发展迅猛,大概是由于家庭体系业已分解,便于控制,不会产生太大的阻力。封建制的起源不能仅仅归结为土地的使用;土地确实被当作货币和报酬而一再使用,但是还不能忘记人,不能忽视习俗和文化的作用。

相反,在卢瓦尔河以南,大家庭(无论其产生的原因或以什么形式而出现)却顽强地存在着,保持着内部关系的亲密无间。在维护个人所有制(“自由地”)的同时,在捍卫城市和村庄的自由的同时,大家庭阻碍了“封建主义”的成长。在这方面,卢瓦尔河南北之

间的情况也还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产生了巨大的后果，因为“不稳定的”、代代更新的胞核型家庭本质上较少依附于传统，较易接受“现代化”的变革。北方因此较早出现变革，并且在与国家对敌的实力较量中，抵挡不住国家的冲击，因为国家和家庭历来就是竞争的对手¹⁵¹。从这一观点出发，是否应该把英国家庭结构小型化看成是黑斯廷斯战役(1066)和诺曼底人武力征服英格兰的结果呢？

把胞核型家庭的特征归结为脆弱性与开放性，这个观点似乎言之成理，但只是一种假设。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塞纳不是持相反的见解，认为它是社会变动的重大障碍吗¹⁵²？乔治·杜比则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促成了传统家庭的破裂，其原因恰恰正是为了解放生产力”¹⁵³。这就意味着胞核型家庭出现较晚。由此可见，在对习俗惯例和对大量公证文书进行抽查从而取得证据以前，人们对这个命题不能作出任何定论。兰斯城的一位市民1632年在日记中写道：“祖父要我完婚。我回答他说：要结婚的是我，而不是我的祖父。”¹⁵⁴难道这是17世纪的一名男子的“新派”言语，或者只是因为他出生在香巴尼地区，根据传统对家庭享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个问题还有待作出答复。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人类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已经说明，过去与现时为敌，几乎无所不用其极。面对法兰西这些古老而强有力的分裂倾向，埃尔韦·勒布拉和埃马纽埃尔·托德惊呼：“法兰西还算不上是个客观存在”，必须先把性质各异的人群和文明拼凑在一起，然后才能“创造法兰西”¹⁵⁵。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两人的感叹。实际上，法兰西不得不克服重重障碍，消除各种分裂倾向，带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和难以解脱的矛盾，步履维艰地沿着统一的道路前进。

三 距离：可变的度量单位

在此之前，我一直把地域当作一个不变量来看待。然而，它显然在变化着，既然测量距离真正的单位是人迁移的速度。昨天，人的迁移十分缓慢，地域便成了阻隔和牢笼。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六边形”的法国只是个很小的地域单位，但在过去却是个广阔的空间，道路之长永无尽头，障碍之多层出不穷。

小普林尼在《图拉真颂》一文中曾谈到“几乎无边无际的高卢”¹⁵⁶。直到路易十一时代，情况依然如此：当时人们穿越大胆查理统治下的勃艮第，要比1982年周游法国多花十倍、二十倍的功夫！

因此，对百年战争任何时候都没有在全国蔓延，对延续30多年之久的宗教战争（1562—1598年）同样未能笼罩整个法国，我们并不感到惊异。距离本身就是阻隔、防卫、保护和禁锢。查理五世皇帝曾经有过切身的经验，因为他在这个无形敌人的面前两次碰壁：一次是1536年7月，他入侵普罗旺斯，由于长途行军，联系中断，部队疲惫不堪，在马赛城下吃了败仗¹⁵⁷；另一次是1544年，他一举攻克了圣迪齐耶的小要塞¹⁵⁸，在打通了马恩河的陆路以后，他沿河进军，直达莫城，将该城储存的物资劫掠一空。由于精疲力竭，他不得不就此掩旗息鼓，赶紧缔结克雷皮和约¹⁵⁹……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经历了相同的遭遇：在圣康坦一战（1557年8月10日）击败蒙莫朗西元帅以后，敌军望风披靡，巴黎大门洞开；就在这时，留守西班牙于斯特的老皇帝却为他的儿子担心，不知他是否会乘胜进军巴黎，难道他不明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吗？这支获胜的军队后来果然留在原地，不再前进。

两个半世纪之后，距离的逻辑仍未发生什么变化：如果不是距

离起了作用，拿破仑率领的重建军队1814年在法兰西战役中就不会有出色的表现。当时，反法联军沿着巴黎外围的河谷慢慢向前推进。拿破仑利用这一间歇，率部从埃讷河谷以急行军赶往马恩河谷或奥布河谷，由于他的行动比敌人迅速，他在这一空间中得以出敌不意，脱离接触和保全部队……后来，敌人如潮水般的推进才迫使他退往巴黎。塔列兰事先就看出了这个策略的弱点。据拉都尔·杜班侯爵夫人的记述，当她问起拿破仑时，“塔列兰回答：‘噢，别再对我提起您的皇帝了，这个人完了。’‘怎么？完了？！您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追问。他答道：‘我是说这个人只好躲到床底下去了！’……我向他提了无数问题，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他丢失了全部装备，他已回天乏术，仅此而已’¹⁶¹。至于他的装备，那就是大炮、辎重、军需和车辆。当然还有他的部队。

1870年，普鲁士大军利用铁路这一了不起的新发明。然而，在思考这场战争失败的悲剧时，曾经参加过战斗、当时只是年轻军官的福煦元帅后来一再固执地说，如果那时他是统帅，他会选择一直打到比利牛斯山区的作战方略，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国的空间。1914年的情况仍不例外，由于运动战当时是以步兵的行军速度展开的，法国军队也就有可能在马恩河战役之前实行远距离的撤退。而在1940年5月至6月间，德国的摩托化部队则能在几周时间内把我国打败。

在我们看来，从前的法国是一块难以驾驭的空间，因为它过分辽阔，不易穿越其全境，不易监视其动向。对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各种社会新闻和小插曲甚至平淡的日常生活，都可以提供可靠的证据。我不妨给您讲述波旁元帅仓皇出逃的经过。1523年，由于国王派人四出追捕，波旁元帅落荒而逃，并克服困难，躲开监视，终于渡过了罗讷河。另一个故事较少戏剧色彩，但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它说的是德·埃佩尔农公爵1619年的一次冒险行动。这位

公爵早在年轻时代就很不安分，经常挑拨离间，制造事端，曾是亨利三世手下的一名宠臣。进入老年以后（他生于1554年），他担任梅斯军政长官的职务，但仍不甘寂寞。国王勒令他不得擅离该城，而他居然敢于犯上抗命。1619年1月22日，他带领50名贵族和40名武装侍卫于拂晓时分上路。“几名厨师和仆役骑马随行，最后是15匹满载行李的驮骡”。他们这次远行的目的是要把被囚禁在布洛瓦城堡的玛丽·德·梅迪契王太后解救出来。他们为此必须从东到西横穿法国，但是，我们这里感兴趣的并不是政治策划本身，而是旅行的进展居然相当迅速。当时正值严冬，道路坑洼不平，驮骡行进不快；他们途中还要休息，穿过难以逾越的河流，同时必须绕开像第戎这样的大城市，因为打那里经过必然会惊动吕伊纳和路易十三。即令如此，他们每天的行程仍然平均不少于40余公里。奇迹在于这支不小的队伍竟然能不被人发现，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消失在王国广阔的大地上，就像一根针掉进了柴草垛一样。他们在罗阿讷和德西兹之间涉水渡过了卢瓦尔河，在维希从桥上穿过了阿列河。2月21日至22日深夜，王太后终于翻窗而出，越狱成功。¹⁶²

我承认这类情节就像直接出现在眼前的日常生活场景一样使我着迷。路易十四派往马德里的特使尼古拉·梅纳热于1708年春匆匆赶赴西班牙，他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他写道：“经过九天的奔波，我于30日晚抵达巴约讷；道路的恶劣和驿站的混乱是缓慢的原因。我还要前往马德里，由于在个别驿站找不到骡子，此行尚需12天。”¹⁶³一位公路督察于1800年出外巡视，他的马车在500公里内翻了6次，修理费了很长时间。他有11次陷进泥坑，只有找牛来拖才能摆脱窘境¹⁶⁴。

我完全相信再没有比骑马长途旅行更累人的事了¹⁶⁵。但是，坐车旅行是否比这舒适些呢？农业委员会一位倒霉的官员1794年

外出征集储备粮。他写道：“我真是出门不吉，驿车的车轴在桑利附近折断。为了不误事，我只好步行到贡比涅，再从那里搭另一辆车去努瓦永。”¹⁶⁶

内河航行又是另一种磨难。1799年，马尔博将军前往意大利军团出任师长。离开巴黎后，他在里昂与波拿巴交臂而过。后者刚从埃及回国，到处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正春风得意地前往首都。马尔博将军和他的儿子则一起乘船沿罗讷河下航，开始了灾难性的旅程。他们几乎因此丧命，被迫在阿维尼翁上岸；在过了埃克斯昂普罗旺斯之后，又在涨水的杜朗斯河前驻足停留；乘渡船过河是不可能的……他们只好耐心等待，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¹⁶⁷。在卢瓦尔河上航行总是险情迭出，船只在沙滩或沙洲搁浅在当时十分常见。1675年9月，塞维尼夫人“在奥尔良乘坐木船”（这是那时的一种时尚）去南特。她在漫长的旅途中写信给女儿说：“啊！真是荒唐！水位低极了，我的船经常搁浅，我对没有跟自己的车马随从一起走后悔不迭，他们根本用不着停留，可以顺利地前进。”一天晚上，她跟同船的旅客在河畔的一间小板屋的草秸上睡了一宿。150年后，1838年，司汤达在图尔登上新发明的小火轮去南特。他在记载这次旅行时写道：十分钟以后，“我们便在卢瓦尔河的一处沙洲前束手无策地停了下来”。他们在浓雾和严寒中动弹不得，差一点与另一艘船相撞，“那艘大船正由一溜小跑的八匹快马拖着逆卢瓦尔河而上”¹⁶⁸。1842年，在阿列河上，一艘处于同样惨境的蒸汽轮，也是让12头牛拖着走的¹⁶⁹……

自1750年以后，道路建设在法国各地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可是，在我们眼里，这些进步又算得了什么？以描述精确著称的司汤达就曾记载，1838年，他从巴黎到波尔多共用了71小时又3刻钟¹⁷⁰。两年以后，“从巴黎到马赛，送信人仍需14天的时间”¹⁷¹。直到1854年，由于巴黎至马赛间的铁路尚未竣工，被派往参加克里米亚战争

的部队必须在里昂下车，再步行到瓦朗斯后，才能重新乘坐火车¹⁷²。然而，谁又能相信，1917年，当同盟国的军队在科巴里德惨遭失败，法国增派援军开赴意大利时，就碰到了铁路运力不足的困难：部分援军只能徒步翻越阿尔卑斯山¹⁷³，竟然和查理八世、弗朗索瓦一世或波拿巴时代没有区别！

上述情节果真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吗？难道应该以数字为依据，说明1765年至1780年间“道路建设的剧变”使穿越法国的距离有时缩短了一半？依我之见，各种社会新闻再好不过地说明，旅行的缓慢和困难影响到人们的全部日常生活。它们让人不由得注意一些限度，这些可能的最大限度只能首先被铁路，然后被汽车、卡车、高速公路、飞机……以革命的方式所打破。

法国的四分五裂终于得到说明

我所要达到的目的至此已一目了然：在往昔的历史空间中，村庄、乡镇、城市、“地方”、地区、省区、制度、文化、语言乃至许多历时已久的特性，几乎互不干扰地各守其成和各司其职。它们都有条不紊地发展成长，即使最小的单位也都奇迹般地被保存了下来。这尤其因为，君主制国家为通衢大道的建立和大动脉的畅通提供帮助，而对乡间小道则置之不顾。它能不这样做么？因此，“我们称之为乡间小道的农村道路”¹⁷⁴十有八九将长期处于破败不堪的境地。位于德拉吉尼昂附近的双堡村是普罗旺斯地区的一座小村庄，该村在1789年的陈情书中曾表示希望：应允许远离要道的任何乡镇和村落，分别在各自的地界内修筑道路，并互相连接，使商业贸易臻于繁荣¹⁷⁵！至于比乡间小路高一级的中等道路，即所谓区间道路，照1787年法兰西岛省三级会议一位议员的说法，路况也强不了多少。他解释道：“在雨季里，就是说，至少在一年之中一半的时间里，向城市市场运送食品的车夫或农夫不得不使用多一倍的驮畜或力

畜，这就不但增加消费者必须承担的运输成本，而且又减少销售者或生产者的实际收益”¹⁷⁶。

1792年，在科雷兹地区，30多公里（即七、八古法里）就足以构成村际联系的巨大障碍。一旦超过这个距离，语言的差异就会变得相当突出。当然，除了路程本身以外，更严重的是人际交往发生了困难。一位历史学家于1783年曾就昂布兰地区的居民状况发表了一部人类学著作，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说在平原地区几古里就可以“看出语言和衣着的某些差异”，“那么，在这里〔上阿尔卑斯山区〕，只要走出一个小山谷，再进入另一个小山谷，就能够发现”，两地的语言和习俗“有着天渊之别”，“这大概是因为在崇山峻岭的阻隔下……山谷中的居民较少与其他地区居民进行交往”¹⁷⁷。同样地，布列塔尼是一个几乎不对法语开放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禁区。当地的教士用布列塔尼语布道，甚至在城市也经常如此；在那里的乡间学校里——如果有学校的话——只用布列塔尼语教学生读书识字（很少教书写），间或也教一点拉丁语。然而，除了住在城市四周的人以外，还有些乡下人也“会用法语讲话”。有人可能会问，这大概是指昂茹的边界一带吧？不是的。这是指“沿海一带”¹⁷⁸。大家知道，布列塔尼的大小船只很早便从事活跃的贸易活动，他们一直远航到西班牙和地中海。只讲布列塔尼语又怎么能够经商呢？

上萨瓦地区的情形与布列塔尼地区大同小异。18世纪时，在最难到达的那些地区，在福西尼、沙布莱、莫列讷、塔朗泰斯等偏僻山区，旅行家们偏偏会意外地听到当地人讲法语，并因此而感到惊异万分。尤其自1720年开始，学校在当地日渐普及，有时甚至深入穷乡僻壤。追根溯源，这是一种新时尚的产物：乐善好施之人的捐赠不再以慈善事业为对象，而是为萨瓦的儿童提供教室和教师。为了让孩子们学会用法语读书讲话，父母每月只需缴纳六苏或八苏，

要学会用法语写字，再付四个苏也就行了……孩子上学十分踊跃：每个班级约有四、五十名学生……出现这种热情并非不可思议：大部分来自山区高地的移民懂得，要想在里昂或巴黎、甚至在德国找到合意的工作，学会说法语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几乎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人们都讲这种语言。博福尔附近的普拉村1750年提交的报告对此作出了解释¹⁷⁹。

总之，萨瓦人因需要出外谋生而愿意多学会一种交流的工具。方言俚语只能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经久不衰。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派希望把法语“变成共和国的通用语言”；下普瓦图当局为摧毁各地方言主张首先采取什么措施呢？“必须贯通乡间小路，使村庄与村庄、乡镇与乡镇、城市与城市加强联系。”¹⁸⁰还有什么能比这说得更透彻的呢？但是，请不要忘记，直到1947年，在比利牛斯山的阿斯普尔河谷，在拉斯坎附近的莱尔村，人们还要“用绳索把死者捆绑在骡背上”，再下山到阿库斯公墓去安葬。那里没有任何公路¹⁸¹。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也就不会感到惊奇，当他看到法国几百年间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只是细胞的简单堆砌，而几乎不构成有机的整体”¹⁸²；是个“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能够自给自足的微型世界的集合”¹⁸³；是“由许多村庄、城市、‘地方’拼凑而成的一幅镶嵌画；它们即使同属一个政治和宗教体系，仍各自拥有一定的独立性……每个文化群体的相对独立，对保证群体的结构严密，使每个人对世界取得大体一致认识，从而武装起来迎接生活的挑战，是不可或缺的”¹⁸⁴。

在这个狭窄的小天地里，人与人的社会联系势必十分密切。雅克·杜帕基耶说得对：“从前的法国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能从脸上一眼认出对方是什么人；他们自己同样也为别人所认识，也被对方所一眼认出，他们在教堂里共作祈祷，在喜庆婚礼上同声

喧闹。他们既互相帮助又互相监视。由姻亲、戚谊、友情、仇隙所结成的关系网紧束着村庄。法国乡村可能成为许多遗世独立的分散个体，只是迫于以下三个原因，村民们才把眼光转到比钟楼更远的地方：他们必须取得用以缴纳税款和地租的现金；为剩余劳动力找到工作；不在姑表近亲间嫁娶。教会对近亲结婚严加管束，轻易不予特许¹⁸⁵。总之，留在村里，就是同自己熟悉的人打交道，不管是你喜欢的人，可以容忍的人，甚至讨厌的人。雷蒂夫·德·拉布雷托纳神父是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佬，他到巴黎后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的反应很能说明问题。“噶！这里人可真多！”他说，“多得叫人谁也不认识谁，即使住在附近，住在同一所房屋里，也不例外！”¹⁸⁶

整个欧洲的情形与法国大同小异。无论是在瑞士各州还是在西班牙，是在英国还是在德国，您都可能发现类似的地区分割。比萨的乡村是个典型的多样性地区¹⁸⁷。历史学家乔万尼·泽尔丹向我们介绍的加尔达湖四周的一系列小地区也具有多样性，这位史学家对被威尼斯的光辉历史所淹没的地区性生活作了仔细的考察¹⁸⁸。他顺便还谈到了“纵向的历史”。他认为在历史的厚层中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深井，对史学家来说，重要的是下到井底去看个究竟。

多样性与历史

多样性是距离的直接产物，是辽阔地域的直接产物，正是由于地域的辽阔，积年累月形成的地方特性才得以保存。但是，这种长时段的多样性反过来又成为历史的一股动力。我坚定不移地相信，古老的“地方割据”和闭塞状态有利于形形色色的统治尝试，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全国性的。居统治地位的上层结构之所以迅速扩展，这是因为它碰不到实力相当的对手，决定性的障碍以及组织

完善的抵抗。在君主制实现了领土兼并后，至多只是一个省，甚至只是一省的部分地区起来反抗；他们只是单枪匹马、星星点点地进行战斗……同样，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的反叛（1793年）虽然波及不少省份，但只是浮在表面，没有深入民心。北部和东部因有军队驻守，也就毫无动静。不论在法国的什么地方，给政治、社会和宗教冲突火上浇油的，并不是群众的借题发挥，反而是他们的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

任何民族都是四分五裂的，并且都靠分裂过日子。法国称得上是这条规律的最佳范例。范例在法国层出不穷：基督教对天主教；冉森派对耶稣会；蓝党对红党；共和派对保皇派；右派对左派；德雷福斯派对反德雷福斯派；法奸对抵抗战士……分裂在法兰西大厦根深蒂固，统一却只是一个躯壳，一种上层结构，一项赌注。法国的多样性必然导致凝聚力的不足。直到今天，一位随笔作家最近写道，“法兰西不是个步调一致的国家”，“它在行进中像是四蹄不按同一节拍移动的一匹马”¹⁸⁹。我很喜欢这个极而言之的形象，它既不全对也不全错。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分裂因素——地理的，文化的，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加在一起，便造成了互不理解、敌对、不和、猜疑、争执和内战。内战停歇后，一有机会又死灰复燃。一位历史学家指出，“与其说法国会打仗，不如说它擅长打内战。除1914年外，法国从未经历过一场长期的、真正的爱国主义战争……这个最以武功自诩的民族历次进行的战争几乎无一不夹杂着内战的成份。1939—1945年的战争显然是如此，大革命和帝国时代，圣女贞德的抗英斗争和勃艮第的战乱，亨利四世登基、‘神圣同盟’和黎塞留掌权，也都同样是如此。甚至在1870年，也还有过一个秘密地或公开地希望本国统治者失败的派别”¹⁹⁰。因此，我们应该接受米希莱作出的极其深刻的判断：“法兰西犹如一盘散沙，爱闹不团结和内部不和”¹⁹¹？于连·邦达的话说得尖刻，但也不

无道理。他指出，从许多方面看，“德雷福斯事件自始至终地”¹⁹²贯穿于法国历史的全过程。是否可以说，法国打内战的本领胜过打外战，因而国土和人民迟迟不能统一？这正是让·盖雷诺的见解；有一天晚上，他为此同我争得面红耳赤，而我却竭力为佩吉在1914年的投笔从戎进行辩护。让·盖雷诺后来写道：“这场战争（1914—1918年）不是我的事情”。命运把他投入到战争中去，但他从未能够“在内心深处完全相信”这场战争“的确是他自己的事情”¹⁹³。我承认，我的切身经历使我对这一看法难以理解。我不懂内战。原因可能是，作为布列塔尼人，让·盖雷诺把“故乡”的地位置于“民族”之上，而我则相反，站在东部地区人的立场上进行思考，东部地区以统一的法兰西为后盾，它的自由取决于国家的统一以及由此要求的警觉。我并不为自己的立场辩解，我只是指出，两人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环境和个人经历不同的结果。

这些经验无疑还说明，我在引述下面一大段文字时为什么会感到十分激动，为什么每当我重读它们时会感到心酸。这段文字是在16世纪由弗朗索瓦·德拉努这位感情十分丰富的新教徒写下的。

那是在1562年6月。卡特琳·德·梅第奇太后、纳瓦尔国王和孔代亲王组织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一次会面，“碰头”的地点就在博斯地区的图里附近。主要由贵族组成的两支精锐部队分别由唐维尔元帅和拉罗什福科伯爵指挥，在相距800步处停止前进。“然而，在面对面地对峙了半个小时以后，每个人都迫切希望见到自己的兄弟、叔侄、朋友或从前的伙伴，于是请求上级允许他们进行探望，勉强取得了同意。在这以前，双方不得互相靠近，怕会引起对骂，乃至发展到动武。实际上，不但没有发生争吵，两边的人反而互致问候和拥抱。他们原本就有亲戚关系，或者早是朋友之交，尽管服饰标志与对方不同，仍禁不住向对方作出友好的表示。当时，

陪伴纳瓦尔国王的队伍¹⁹⁴穿深红色丝绒制作的外套，配戴红绶带，而孔代亲王的队伍则是白外套、白绶带。天主教徒们认为新教大势已去，告诫对手要替自己着想，不要再固执地卷入这场迫使亲友互相残杀的可悲战争；新教徒则回答说，虽然他们同样憎恨这场战争，但是他们确信，如果不进行自卫，他们就会像一些地方的异教徒那样惨遭杀戮。总之，每一方都规劝对方实现和平，鼓励对方说服大人物听取忠告。他们扪心自问，无不明白这些公开的冲突将遗患无穷，因而深感哀叹。一旦上级下令投入战斗，他们之间的一切亲热便会化为腥风血雨，他们将重新戴好头盔，突然降临的愤怒将蒙住他们的双眼，兄弟间将不再互相原谅，想到这里，他们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当时居于新教一方，再说我在对方的营垒中就有十来个情同手足的朋友，他们对我也怀有同样的爱心”¹⁹⁵。六个月以后，德勒战役于12月19日打响。对敌双方狭路相逢。弗朗索瓦·德拉努接着写道：“双方都严阵以待，但在内心深处却想到，迎面冲来的敌人不是西班牙人、英国人或意大利人，而是法国人，甚至是最英勇无畏的法国人，其中就有自己的伙伴、亲戚和朋友，并且再过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必须互相厮杀。他们顿时对作战产生某种本能的反感，虽然他们的勇气并不因此稍减。就这样对垒了一段时间过后，两军终于以兵戎相见，拚个你死我活”¹⁹⁶。

这篇饱含悲剧色彩的文章，人们难道不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套用到别的地方去吗？它对我国历史中充满同样苦难的其他许多场景难道不是也适用的吗？今天的现实姑且不论，一位老贵族的话语在我的脑海里重新浮现。眼看大革命即将爆发，他对玛丽—安都纳德王后从前的侍从亚历山大·德·蒂伊伯爵预言悲剧必将来临。由于后者听了不予置信，他便说：“先生，我们是个注定要同悲剧打交道的民族。”¹⁹⁷

今日的情形如何？

辽阔无际、四分五裂的昔日法兰西已被空前快速的进步压缩、禁锢、幽居在日渐变小的“六边形”框架内。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目标至今尚未完全达到。随着殖民帝国的瓦解(1962年)，法兰西失去了一大块空间。我国的战略家们由此产生了怀旧之情，他们对法国飞机不能随心所欲地在乍得的土地上，在辽阔的非洲大陆的“心脏”着陆深感惋惜。

一切还在继续发生急剧的变化：飞机用一个半小时时间可从巴黎抵达阿尔及利亚的“白宫”机场；在50年前，我曾乘一架小型飞机在那里降落，当时的机场规模还不小；飞机的航速每小时为200公里，降落时灵巧地利用机翼向左右缓缓滑翔……从巴黎到日内瓦，如今不用一小时时间，飞机已把汝拉山脉置诸身后，波光粼粼的莱蒙湖以及湖畔的阿尔卑斯山和勃朗峰随即迎面而来。从巴黎到佩皮尼昂，只需1小时10分钟，就可以感受到另一块大陆的气息……也许正是由于感到法国空间狭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爱出门的法国人今天才几乎倾巢而出，疯狂地四出周游世界。

正当我在案头写下以上的文字时，法兰西文化电台传来了一篇关于洛泽尔山区的牧羊人及其羊群的广播报导(1981年2月8日)。凑巧的是，这篇报导与我以上所说的情形完全相反：系在羊脖子上的小铃叮当作响，护羊犬在吠叫，牧羊人在大声吆喝，在奇妙的音乐声中，羊群缓缓前进，终于消失在静寂之中。所有这一切都是以昔日的时光速度进行的。法兰西依然存在——至少暂且存在——从慢速到快速，从较快速到最快速的几个不同的发展层次。不论最快速如何光彩夺目和咄咄逼人，今日的法兰西仍不是它的一统天下。确实，独自在山坡漫步，倾听洛泽尔山区牧羊人的吆喝，亲身体验昨日的时间和空间，那该是件何等惬意的事呀！

第二章 人口分布格局： 村庄、集镇和城市

法兰西自过去至今依旧在多样性和单一性之间摇摆；它的多样性具有野草般的生命力，它的单一性不仅是力求统一的倾向，而且也是自发的本能和深思熟虑的决心。如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法兰西在这左拉右扯之中无所适从，因而它的大多数弹簧都绷得太紧。

历史学家不得不同时看到法兰西的双重形象，不得不防止产生片面的认识。埃尔韦·勒布拉和埃马纽埃尔·托德故意逗趣说：法兰西还算不上是个客观存在，它有待我们去创造。可是，法兰西毕竟存在已久，它决不是虚无飘渺的神话，而是早已建成的国家。让-保尔·萨特灵机一动，居然声称法兰西是“不可统一的”¹，这话说得既对又不对；虽然它的确很难统一，但它从不甘心陷于支离破碎的境地，过去是如此，将来恐怕也是如此。至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法国在欧洲即使不是率先实现，也是最早实现的国家之一。成千上万种力量，性质不明的和无意识的力量，可能对此起了推动作用，甚至历史也未必都能分辨清楚。

就连我自己也乐于承认，我本想从一开始便指出，法兰西的名字叫做多样性。这是法兰西最优美的面貌，我所喜爱的面貌，只要我一眼看到这种美丽的面貌，所有可能产生的忧伤也就全部打消。

但从这第二章起，应该是从多样性转到单一性的时候了。我们

就来观察法兰西的另外一面，趋向统一的一面，如果可能的话，深入到法兰西的现实和力量中去探索这种统一性。因为，法兰西不仅是“40位国王千年兴邦立国”的业绩。国王诚然声名卓著，但创建法兰西的伟大事业不能完全归功于他们40个人。

在一定程度上，法兰西几乎是自动形成的。地域的分割不断产生出互为补充的需求；在产粮区和畜牧区之间，在谷物生产者和葡萄酒生产者之间，联系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可以说，割裂也是促成统一的因素。同样，当“不同的人群在语言、文化、物质文明、技术水平等方面”²展现出文化差异时，这种差异带有爆炸性，并能冲破各种阻力。总之，各种人群，不论他们有多大的差别，甚至互相敌对，都从不真正像蜗牛一样困守自己的小天地。完全的自给自足实际上是从来没有的。为着求得生存，必须对外开放，哪怕开上一个小缝。

根据1721年8月的一份公告，由于从马赛传来了鼠疫，“在整个普罗旺斯地区，只剩下十个村庄，疫病尚未侵入……但因无从取得食品供应，村内的居民忍饥挨饿，苦不堪言，村外的路口均〔由部队〕严加看守，禁止行人出入，违者处死”³。然而，鼠疫（这是法国最后一次鼠疫流行）仍四处蔓延，并于当年夏天传染到普罗旺斯以外的多菲内和朗格多克地区。法国军队全部出动，为同这一顽固、狡诈的敌人作斗争，几乎疲于奔命。抵御的唯一办法，就是设立防线和路障，限制疫病的扩展。于是，村庄、城市乃至整个地区的正常生活都受到威胁。1721年夏季，多菲内地区怨声载道：防疫路障切断了与外部的联系，经济生活简直一蹶不振⁴。几个月后，当贝尔维克公爵接到宫廷的命令⁵，要在上朗格多克和下朗格多克之间设立防线，把两个地区隔离开来时，全省居民叫苦连天；省三级会议出面干预，以两个地区将“无可挽救地”出现饥荒相威胁，终于使这项措施得以撤消。

上述事实足以提出我们的问题，我的这个想法难道没有道理吗？法兰西为维持其日常生活，必须对外开放，与外界取得联系。法兰西悠久的历史，也贯穿着这些静悄悄的、连续不断的运动。实际上，这些有规律的运动不受任何外力的支配，它们自动穿过地域，把法兰西的各个部分粘合成一个整体。

村庄和集镇的基层居民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在法兰西各地，根据一个几乎不变的模式，这些集合体不断繁殖，乃至无穷。在一个集镇的四周，中间相隔一定的距离，团团围着几个村庄，就像一些小行星环绕在太阳四周一样。集镇和村庄加在一起，通常同我们现今的一个“区”差不多大小。作为集中居住的基本单位，这些“区”又环绕在一个相当活跃的城市的四周；由此形成的面积不大的整体，我们随吕西安·加卢瓦时代的地理学家的说法，称之为“地方”⁶。这些“地方”又分别纳入到一个区域、一个省的范围之内，其成功和顺利的程度取决于中心城市是否有足够的向心力（中心城市并不始终胜任其职）。建筑的构架逐渐趋向完善，最终形成统一的民族和统一的民族市场。

这个民族市场还必须拥有一个财力雄厚、环境适宜的大城市。巴黎因其宏大规模很早便成为城市的巨人；但它未能立即带动整个法国。发动机尚能胜任其使命，而车辆在前进中却左摇右晃。抚今追昔，法兰西的历史难道不正是这样一个反复无穷的过程吗？

一 从村庄出发

在确认了法兰西具有一个严密的构造体系以后，首先要做的事显然是对体系的各个部件分别进行论述。然后，再撇开我在第一章所作的初步介绍，试图恢复体系的运动，进而观察它怎样把法兰西的不同特性汇集起来。我说的不是抹去这些特性。我们预先

就能断言，这个体系将不会完全取得成功；很多的线或者太短，或者太脆。绷得太紧，就会出现断裂。

超越村庄的多样性

人们说不出典型的法国村庄该是什么样子。显然，村庄的类型很多；在这里，多样性仍然适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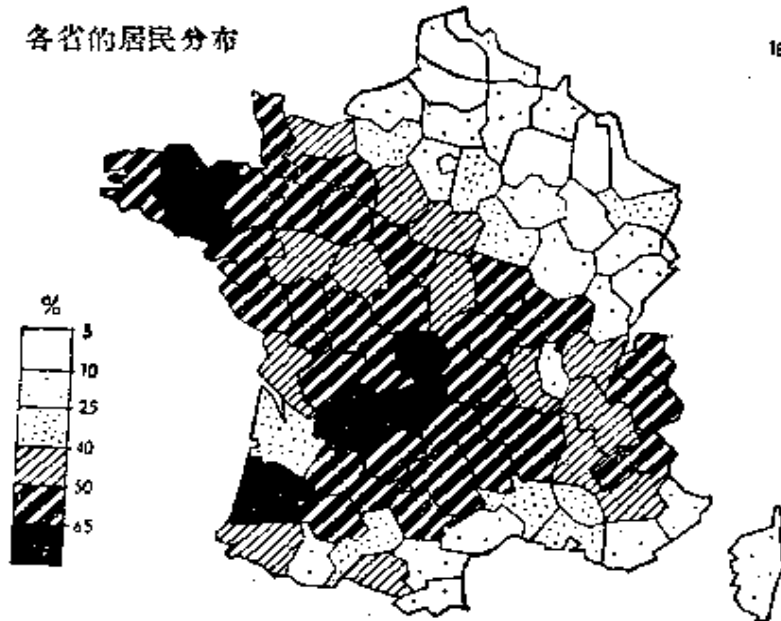
这有成千上万种理由。首先，村庄随其主要生产活动的不同而不同，或从事畜牧业，或种植小麦，或栽培葡萄树、橄榄树、桑树、栗树和苹果树，或经营小工业，如此等等。随便举个例子，葡萄种植者的村庄难道不是一眼便可认出的吗？“为节省昂贵的土地，村庄尽量压缩建筑用地，哪怕挤进阴冷的地窖，也在所不惜。相反，谷物种植者的村庄则在平原上随意辅展”⁷。此外，织匠、鞋匠或皮匠人家的门户都面对他们的作坊……还有建筑传统的多种多样（整幢的房屋，由院子围起的房屋），使用材料的各不相同，以及为适应气候条件、为取水方便等原因而产生的地方特点。普罗旺斯的村庄居高临下，村内的街道都很狭窄，以免风吹日晒；在洛林的村庄里，房屋沿一条宽阔的街道紧挨着排列成行，街道也就成了饲养家禽的农家院落；与此相反，布列塔尼村庄的布局显得分散，孤零零的房屋在村里各据一方。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最后两个例子——布列塔尼的村庄，洛林的村庄——提出了房屋布局集中和分散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经常被涉及，其实是很模糊的，甚至是不可解决的，我想说的是，我们对其大部分根源弄不清楚。这里要请广义的历史为我们作尽可能全面的介绍。

“散居”和“集居”，安德烈·德莱阿热宁可称之为“远居”和“近居”⁸。卡尔·兰普雷茨（1878年）在谈到撒利克法典的古代时，使用“村庄体系”与“农庄体系”相对立⁹的说法。根据我的理解¹⁰，既然二者各成体系，它们势必早在撒利克法兰克人在埃斯科河以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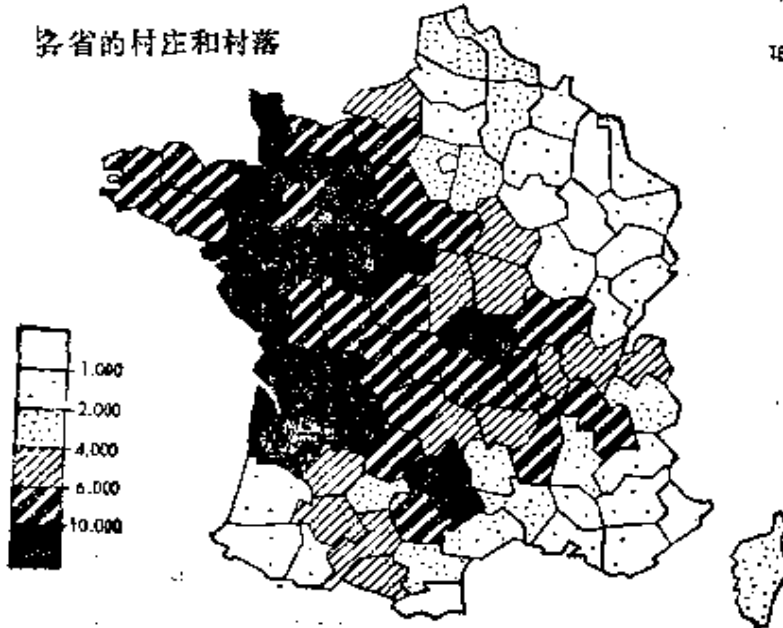
各省的居民分布

1891



各省的村庄和村落

1891



1891年各省乡村(村落、村庄及“市镇组成部分”)分散的人口布局

上图:按百分比计算 下图:按绝对数字计算

材料来源:1891年法国人口调查的结果。图表由弗朗斯瓦兹·韦尼奥制作。

地区立足前已经出现¹¹。最含糊的和最难捉摸的词是界于村庄和农庄之间的“村落”,那里至少有几间房屋,不论是否聚在一起。在

某些土地贫瘠的山区，“村落”也许是掌握可耕地的一个基本途径，农庄或农舍则是适应只有分散的小块土地可资利用的山区的要求，我所居住的鲁西永的阿斯普勒山区正是这样。据1891年的统计，法国共有市镇（大小不等的城市、集镇或村庄）36 144个，而“人口分散的地理单位”，分属不同市镇的“零星村落”，却为数达491 800个。可见，在集居的市镇周围，平均约有13个偏僻的村落¹²。这个平均数本身没有意义，因为在各地，散居的人口分布很不均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隔一会再谈（参见第102页的地图）。

首先应该说明，分散与集中的对立并不始终鲜明地表现为这样一个形象：一方面是以教堂为中心的密集的建筑群，另一方面是许多孤零零的农庄，二者各有自己的领域。分散至少有两种类型（只多不少）：第一种是在一个村庄之外有几个分散的小村落（主要是农庄）；第二种是农庄和村落呈星云状分布，居中心地位的村庄也可能很小。

即使像洛林地区那种居住相对集中的村庄，也包括若干偏僻村落，至少有几个农庄，间或还有一个小屯。从15世纪起，在法国东部地区，居乡贵族备受货币贬值之苦（领地的杂税因按现金计征，他们的收益大大减少），有的村庄便在本村土地范围外寻找并找到了补偿。一些新地块于是得到了开发，例如领主的“保留地”，村庄之间的无主空地，以及某些撂荒地。

香巴尼的贝里一带就这样“开垦了百年战争期间已被撂荒的土地”¹³。后来，到了19世纪，由于农业人口在该世纪上半叶急剧增长，农村出现了劳动力过剩，应运而生的资本主义农庄也纷纷开垦荒地，从而在第二帝国期间使法国一些地区的乡村生活和农业经营达到繁荣的顶峰。在皮卡底的西部，诺曼底的某些地区和“普瓦图平原”，由于相同的原因及其他原因，也开垦了大量荒地。那里的村庄规模相当大，派生出一些农庄以及“中间村庄”¹⁴。

其他村庄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村庄简直像是集镇，四周的农庄与中心保持相当距离，形成一个几乎连续的花环。位于罗讷河下游的普罗旺斯滨海地区的情形就是如此（深入阿尔卑斯山区的上普罗旺斯地区的情形放过不谈，那里只是在巴斯洛内特高原，分散居住才显得比较突出¹⁵）。在下普罗旺斯地区，“场屋”、“农舍”和“草棚”这三个不同的词其实具有相同的含义：一块耕地团团围着一家农户，户主往往就住在附近，这同托斯卡纳的分成制租地或同遥远的新大陆的种植园都不无相似之处。

《普罗旺斯历史地图集》以罗涅为例作了很好的说明，这个大村庄位于埃克斯以北迪朗斯河左岸的下方，“几乎紧贴吕贝龙山光秃秃的山岗”¹⁶。罗涅村于1954年总共还有居民973人，其中610人集中住在村内，363人则四散分布。在过去，那里的人口较多（1575年有1652人，1855年有1561人，1952年有1052人），因而在法国东之可算是个集镇（即便不起集镇的作用，也具集镇的规模），其面积都大足以为证（8166公顷）……集镇也罢，大村也罢，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沿着下普罗旺斯的“山峦”，一些土岗从东到西排列成行，而在土岗的下侧边缘，逐渐新建了一系列“农舍”：1485年有5个，1500年有15个，其数量后来还在陆续增加。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演变使住在城里的地主得益匪浅；13世纪佛罗伦萨四郊发生的事与这颇为相似，但规模更大；据我们猜想，别处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演变，至少在梅尔勒博士不久前仔细考察的普瓦图地区的加蒂内一带是如此¹⁷。

另一个见证，仍然在普罗旺斯地区，加雷乌也是一个大村，位于布里尼奥勒以南15公里处。我们拥有关于该村的一份非凡的考察报告¹⁸。在16世纪，加雷乌村才刚开始“外迁”，就是说，开始向村外扩建农舍。通过这个活生生的见证，我们能否从头开始观察村庄的扩展过程？我们能否从这个例子出发举一反三？农舍和草

棚是村庄分解的产物，是村民开垦荒地、向外扩展的结果；它们往往设在与村庄相邻的荒野或附近有牧草的草场。因此，扩展活动显然与养羊的村民有关，他们也往往对此最感兴趣。不论情况如何，这些分散的居民点从来都不完全脱离村庄。与农舍、草棚这些小居民点相比，村庄毕竟是个庞然大物。事实足以证明，为兴建一个孤立的农庄，总是要有附近的城市提供资金，这在加雷乌村是如此，在其他村庄往往也是如此。此外，农庄还必须从村庄和集镇吸收剩余劳动力，才能维持下去。每到夏季，住在村里或镇上的劳动者清晨就等着附近的农庄主或地主前来挑选雇工。由此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常现象：农业工人几乎在城镇的环境中生活，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而在普罗旺斯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地主却反而过着乡村的生活。总之，农舍井然有序地排列在村庄的周围；普罗旺斯的这种情形难道不是特别容易理解的吗？

在其他地区，居住的分散有时使中心村几乎不复存在，只剩下呈星云状分布的、孤零零的村落或农庄。中央高原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1703年3月29日，正值卡米扎尔战争期间，一位军官奉蒙特勒凡尔元帅的命令，“捉拿米奥莱市镇的全体居民，该市镇共有7个村落，包括教堂所在地在内”¹⁹。阿尔摩尼克高原或下利穆赞的所谓“篱村地区”也属上述情形。

阿尔摩尼克高原有许多“由树木围隔的耕地”，它们的面积有大有小，地埂上种着树木，正中间是几间孤独的房屋。这些最基本的经营单位以自给自足为主；不久前，那里的农民不仅自己制造农具，而且连衣服、鞋子等物品也靠自己供给。与此同时，在几个村落的中心，有一个村庄或集镇。但在法国各地，“集镇”一词（“村庄”也是如此）的含义不尽相同。

这个中心历来是教堂的所在地（又称“堂区”），住在这里的少数几家人家通常属于特权阶层。赶上每周举行的集市，镇上就变

得热闹和活跃起来。举行交易会时,更是喧哗嘈杂。在集镇的特权阶层和零星村落的农民之间,势必存在重大的社会分化。1790年2月26日,法乌新堡(菲尼斯泰尔省)有人写信检举,说让目不识丁、“远居城外的农民”²⁰出任镇长,此事很不妥当。同一时期的另一文书指出,布列塔尼的“农民生活在穷乡僻壤,使用很少人能听懂方言,这将长期阻碍他们提高知识和文明程度”²¹。

至少在曼恩地区,由树木隔围的“篱村”是否构成一个典型的体系?罗贝尔·拉图什²²告诉我们说,篱村体系在16世纪随着欧洲人口的普遍增长而形成。但是,在阿尔摩尼克西部同巴黎盆地北部和东部的产粮平原之间,却有着巨大的差异:一方面是乡村世界的联系相当松散,中心村镇长期局促于一隅之地,农民的房屋离中心村镇往往很远;而另一方面,房屋密集的大村庄则矗立在一马平川的田野上。原因究竟何在?

罗贝尔·拉图什认为,典型的篱村地区早先曾是森林密布的所谓“无人区”²³。在这荒凉的土地上,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建立的大庄园(菲斯特尔·德·库朗日特别喜欢研究的大庄园)简直屈指可数。因此,领主和教会机构很晚才在那里开辟领地,而且是从无到有,白手起家²⁴。他们起码也要遇到重重的困难。

确实,西部篱村地区的自然条件往往十分恶劣,光是板结的粘土就阻碍农民形成相对集中的大居民点。“潮湿的洼地上小路密布,把耕地分成小块”,由于修不成大路,行走都很困难,粘土地又不便于使用农具,这些原因都最大限度地限制了“农民在其住地四周的活动范围”²⁵。更何况,布列塔尼的道路路面下凹,车辆很难通行。“到了19世纪中期……在科努瓦耶地区的许多村镇,偏远的农户赶集,如果碰上坏天气,往返需走一天时间,路上坑坑洼洼,极其耽误功夫”²⁶。如果不慎掉进深坑,还有淹死的危险。“在19世纪,经过疏导排水和建造石路,粘土地的这些不便已大有改

善……但乡村中适应当地自然条件而形成的居住状况却早已固定了下来”²⁷。

总之，空旷荒野的大量存在说明了布列塔尼地区各堂区占地面积的巨大（法国的平均数为12至13平方公里，布列塔尼的平均数为25平方公里）。根据我们的计算，拥有2 000至5 000名居民的村镇有时可不甚恰当地挤进城市的行列。克罗宗于17世纪约有居民5 000至6 000人，分散在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²⁸；这显然不是一种“城市型”结构。

下利穆赞地区——与现今的科雷兹省大体相当——具有类似的特点。由于土地贫瘠，这里的居民点势必相隔甚远。自然条件虽然相同，但适应这些条件的办法却别具一格。市镇或“堂区”的形状像是小型的群岛，一些小岛不规则地分布在本身很小的镇区的四周。“乡村组织的细胞”²⁹与其说是集镇（或大村庄），不如说是分散的小村庄。阿兰·科尔班解释说，有的小村庄由10至20所房屋组成，“房屋布局分散，朝向各异，四周均有院子环绕，又有泥泞小路可通；有的则由四、五个农庄组成，面对面地排在十字路口或路边”。个别村落“规模可超过市镇，但不具有市镇的职能；市镇机构、学校和教堂有时分设在组成该市镇的不同村落”³⁰。

这种奇怪的布局，是一种独特的乡村文明残存的真正见证，而这种乡村文明又是“小村落”（用以往人口统计使用的术语来说，“市镇组成部分”）特有的产物。每座农舍都是一个各自为政的宗法制家庭，而村落却还保留某种集体生活方式，因为各村都拥有一些集体财产（但不能说是市镇公有财产）。这些财产通常是不可分割的贫瘠地，可供放养畜群和短期开荒之用；此外也包括一些公用设施：洗衣池、鱼塘、面包炉、粉碎黑麦（农民的主食）的磨坊……在这个环境里，古老的文化及其特点长期得到延存，例如每年9月半的安息日，直到1914年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仍然隆重举行守

夜庆典。守夜庆典持续3小时之久，只是当主人“把未烧尽的木柴塞在火灰下”时，客人才陆续离开³¹。

已被久远的时间所淹没了的往昔岁月，就这样由一些见证流传至今。正因为如此，要想追根究底，那是很困难的。历史学只能从后来的和稀少的现象中进行发掘，那也是谈何容易。村庄、村落、集镇以及孤立的农庄早已由广义的历史（即在历史自身的期限外，再加上长达几千几百年的史前史）创造出来了。这一必要的回顾不能使我们真正达到目的。我们只是停留在假设的阶段。

我赞成皮埃尔·博诺的设想，认为乡村的人在实现定居前，曾经历了千百年的游荡或半游荡生活；在法国的某些地区，这种人口流动直到公元八、九世纪左右方告停歇。此外，他们还曾在几百年内经受过程度不同的群体生活的束缚，这种束缚在某些地区一直延续到20世纪。

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杜里和安德烈·齐斯贝尔不久前发表的文章指出³²，由厄镇至日内瓦的直线或由圣马洛至日内瓦的直线所划定的接合线具有双重意义。它把一个居住不太分散的区域同孤立村落众多的另一个区域截然分开（参见第102页的地图）。这条直线具有分界线的作用，任何人都不会对此感到惊奇。法兰西的全部历史都沿着这条界线一分为二，1891年的人口普查已对这种人口分布状况作了记录。在法国的东北部和东部，以圣徒命名的村庄几乎凤毛麟角，而在其他地区，这类村庄却比比皆是；人们会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其实，以圣徒命名的村庄出现较晚，约在八、九世纪左右，但在公元1000年后，随着近代欧洲的诞生，逐渐变得多了起来。法国北部和东部的村庄不以圣徒命名，显然与其历史悠久、起步较早有关。

我们由此可以说明今天的史前史学家的一个中心论点——与皮埃尔·博诺的方言学研究殊途同归——就是说，早在公元前

4000年,巴黎盆地的广大地区已被来自中欧的农民所开发利用。他们率先引进了以谷物种植为主体的先进农业,考古发掘业已证明,他们保持了发源地的居住模式:房屋集中、居民多达50至200人的大村庄。法国南方的地中海地区,农业虽然出现很早,却丝毫也见不到以上的情形,那里的农业没有使当地居民迅速改变半游牧的生活习俗³³。

可见,乡村中存在多种多样的居住方式,其原因主要是广义的历史不但发展曲折,并且有早有晚。居住点的布局是为适应环境而逐渐形成的,但环境本身也在变化,因而任何居住形态一旦在确定以后,必要时还会出现演变和变迁。

村庄的一个模式

如果撇开村庄的形态不谈,而只考虑它的作用,各种差异便渐趋淡化,一个模式也就应运而生;不论是集中的或分散的村庄,是大村庄或小村落,甚至是独处一隅的农户这种小单位,我们的模式大体上全都可以适用。

任何村庄都占有一块地域,皮埃尔·德·圣雅可布说过,它是“耕种的林间空地”³⁴。村庄是“开垦土地、从事生产的生物细胞”³⁵。这块土地,这块“乡土”或这块“可耕地”,实际上比成群的房屋更加重要。房屋可能会倒塌,而土地却不会因此而消失;在这情况下,留下的土地便为邻近的居民点(城市或乡村)所兼并³⁶。

一个村庄的土地往往约在1000公顷左右,像是屠能设想的“孤立国”³⁷;这个遗世独立的世界处在距离的束缚下,出外费力、费时又费钱,形成一圈又一圈的同圆心式的生产地带。耕地随距离房屋的远近而不同,农民每日往返,历尽辛苦。“耕作区的边缘离中心越远,就越有必要让最贫瘠、最不费工的田地留在外圈。”³⁸保尔·杜富尔耐在谈到一个萨瓦村庄时说:“由于厩肥不多,路况

恶劣，车辆破旧，役畜很少，精耕细作的土地总是位于村庄的附近，轮作的周期也比较短。”³⁹

耕作最勤的田地沿村庄围成一圈，像是紧贴房屋的“一条腰带”；在这个区域里，有菜地、麻田、果园，间或还有篱笆。每当春季来临，洛林的村庄被杏树的“团团白花”所簇拥⁴⁰。巴黎四周的乡村也是如此，村里的果树沿着墙根排列成行，并在野地的树木开花前，花朵早已覆盖了村内的房屋。此事于1787年3月中旬在阿尔克伊和卡尚曾有记载⁴¹。

无论何地，人们对菜地和果园总是不辞辛劳地精心照料。一有空闲，打开大门多送一车厩肥，用树剪整枝，挥小锄松土。园圃总是试种新作物的天然场所。来自海外的玉米、土豆、菜豆等都首先在园圃发芽生长，然后再去大田推广种植，形成作物的革命。

园圃的外围是一个相当宽广的地域，拥有全部可耕地，即我所说的“乡土”，构成整个村庄的区划。

在法国的东部和北部，可耕地不久前还把村庄围成一个圆圈，而圆圈又分割为三“轮”或三“季”，按三季轮作制的节奏，轮番进行更替：一轮小麦（或黑麦），一轮燕麦或大麦，一轮休闲。在洛林地区，休闲又称“休耕”，是让土地休养生息，不事生产。第二年，圆圈自行转动，休耕地种植小麦，小麦地改种燕麦，燕麦地实行休闲。在旧耕作制出现故障前，每当夏秋之交，从远处望去，轮作地分别呈现三种颜色：金黄的小麦、翠绿的燕麦，休耕地上留下犁耕的痕迹，准备于10月和11月播种小麦。所以，有时候，休耕地被形象地称之为“色泽深沉的土地”。

在实行两季轮作制的广大地区，“乡土”仅分为粮食种植区和休耕区，两个互为交替的部分各占可用锄镐耕作的土地面积的一半。

但在过去，耕地总是不断蚕食四周的荒地和树林；看到这些荒

郊野地，旅行家和经济学家莫不黯然神伤。昂热·戈达尔每当想到国土的一半沦于荒芜，深感痛心⁴³。这个区域构成第三个、往往也是最大的圆圈。人们在那里只开垦少量的土地，每隔10年、20年乃至30年耕种一次。

总的说来，荒地也就是“野地”(saltus)，该词从拉丁农学家那里借用而来，与“耕地”(ager)相对立。历史学家已经养成了习惯，用这两个词叙述历时已达千百年之久的这种对立。至于英国人，他们则用“远离宅地的田地(outfield)”和“宅边田地(infield)”作出区分。

“野地”一词兼有上百种含义：荆棘丛生的荒原，野草葱茏的土岗；已被撂荒的葡萄园，两行葡萄藤之间通常长着几棵果树，有时还结果实；几排原来的篱笆，如今早已荒废，杂乱纷陈，枝叶疯长，高度竟与东欧要道两侧的经过精心整修的树木不相上下……此外还有成片的灌木林，“低矮的树丛中杂草盛长”⁴⁴。最后，尤其是森林。

这种荒野显然随着土地和气候的不同而不同。在古罗马以后不久的中古时代，野地“同时包括荒地、大小树林、沼泽、江河湖泊和沿海的潮间带”⁴⁵。在罗讷河流域的萨瓦地区，荒地至今“包括山岩、峭壁、坑塘、砂岩、灰瓦岩、寸草不生的火成岩、牧草地和荆棘地”⁴⁶。当然还有森林或其他野地。奥弗涅地区的荒地像是个硕大无朋的光轮，“在人们的心目中，所谓‘野地’(saltus)是由大片荆棘丛生的荒野包围的‘山峦’，是野兽横行的和令人恐惧的山林地带，而‘耕地’则意味着平原和安全”⁴⁷。

市镇在过去并不特别关心为位于市镇之间的空地划定界线。例如，只是在1789年秋季，博内(默兹省的大村庄)的居民才要求在奥尔南河谷附近丈量土地，“确定博内村和沃修道院之间的树林的地界”⁴⁸，这一要求得到了满足。就在大革命的初年，各地几乎普遍

进行了这类划界。至少，在卢瓦尔河上游，确定市镇区划于1790年已成为势在必行之事⁴⁹。

实际上，“野地”与其说是相邻村庄之间的界限，不如说是一个村庄内部的耕地与非耕地之间的界限。每当形势所迫，作物往往就侵犯这条内部的边界。村民便开垦荒地。例如，在1500至1640年这个时期，尽管收成相当好，朗格多克地区把部分灌木林改造成为村边的耕地，种植葡萄⁵⁰。又如，在经过冬季的冰冻以后，普罗旺斯地区1709年灾情严重，庄稼遭到毁坏，饥馑随之蔓延，农民于10月就不断开荒和播种。难道这是人的本能反应吗？巡按使勒勃雷写道：“我甚至认为，今年的播种面积会比往年多，可以肯定的是，在去冬被冻死的松树林里，人们已开荒播种，虽然那里碎石众多，土质极差。”⁵¹

相反的情形也经常可以看到，尤其在今天。“野地”自动扩大。吕西安·加松在谈到奥弗涅高原时说，荒地“就像麻风病一样扩展”⁵²，而且举目可见。荒地的扩展“是乡村破产的见证。场院失修，磨坊坍塌，几乎比比皆是，不再兴建新的房屋”。随着土地荒废，村民外流，这些地区便被荒草野木所覆盖。对渡假的孩子来说，这是他们追奇猎胜的好去处。那里有绵羊，山羊，蜂巢，榛树丛，扩展中的森林外围，有在暗处藏身和闻风而逃的野物，还有蜷伏着的蝰蛇……

但在过去，“野地”却是村庄垂手可得的后备资源，长期同野地打交道已使村民学会了使用这些资源。埃斯康多格是个狭小的火山岩山岗，位于拉尔扎克以南，滨临洛德沃河，那里可供采集的东西之多令人惊叹：铺填畜厩所用的草茎和枝条，山羊和绵羊吃的草料，喂猪的橡栗，还有榛子、巴旦杏、山茱萸、甜樱桃、毛榉果、花楸、草莓、蘑菇、蜂蜜，再加上许多野菜和调味品：蒲公英、花椰菜、野菊苣、香叶芹、牛舌草、金花菜、芥菜、芦笋、鸦葱、野葱等。我们

且不要忘记各种猎物：烤野兔是一道传统菜肴，烤叉架在“榛树枝上，用一个空心的圆锥形铁器烧烫后在肉上浇热猪油……食用时添加由血、肝泥和大量蒜汁配制的调料”⁵⁵。

总之，以往的荒地尽管表面上似乎满目疮痍，但并非完全不被利用（森林的情形自不待言），采集活动不断进行渗透，畜群在部分荒地就食；橡树林和山毛榉林中经常放猪，牛、羊、马等各种牲畜在休耕地以及荒原和林区自由放牧，几乎处于野生状态，为时达数月之久。例如，在普瓦图的沼泽地和布列塔尼地区，马匹无人看管，任其自生自灭！每到冬季，当冰雪覆盖大地时，它们就用蹄子刨开吃草。公马与母马混合放养，繁殖任其自由。马群在公马的保护下密集行动，防止狼群的侵袭。这些牲畜如此无拘无束，简直就像野生动物一样。古贝尔维尔先生（1556年5月17日）在其日记中谈到，为在梅尼—昂瓦尔（瑟堡附近）的树林中找回他所需要的马匹，他约了几个朋友组织一次搜捕活动，这在当时似乎是件习以为常的事。他说：“我们逮住了一头黑色马驹，交希莫内和卡托兹带回家中，但德鲁埃却让他的母马跑了。这头母马朝着文圣特·帕里猛冲过去，擦着他的肚皮一溜烟地往远处飞奔。”⁵⁵

这种生活方式是否由畜群所创造？孚日地区的山顶上没有树木（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或因人为的砍伐），但茅草生长茂密，4月至10月期间，成群的牛羊前来这里聚集，一般都由牛倌或羊倌看管，其中以瑞士人居多。然而，据1698年的一份见证材料说，“牛群也能在春季自己上山吃草，于10月自己返回”⁵⁷。那么，季节迁徙难道不是由人，而是由牲畜首先创造的吗？还是让·昂格拉德在谈到中央高原时说得对：“究竟是人或是牲畜首先到达中央高原，此事没有人能够知道”⁵⁸！

鹿、麝、狼等真正的野兽滋生繁殖（狼害直到19世纪中叶乃至以后仍时有发生），只能通过捕猎来保护庄稼。例如在巴黎四郊，

唯独国王和大领主才有权打猎(不幸的是,他们有时却忘记行使这一权利),太多的野兽在平原四出骚扰。巴黎巡按使费利波多次指出,在该省的森林里,“野兽充斥”,泛滥成灾,牝鹿结群活动,多达三、四十头⁵⁹。农民为守护土地所支出的费用,“比向国王缴纳的什一税更多”⁶⁰。还是在首都附近,在阿尔让松侯爵的住地色格雷(埃罗纳省,阿尔帕戎县),“人们把野物视为大害,尤其是野兔,不但毁坏葡萄树,而且啮食谷物以及各种可供采集的野生果实”(1750年3月25日)⁶¹。1787年3月,在芒特附近的利曼,由于布荣公爵已多年不事狩猎,当地村民对野兔危害曾有同样的抱怨⁶²。马索尔先生的处境值得我们同情,他在阿歇尔、加莱恩和弗隆维尔拥有几块地产,夹在塞纳河和圣日耳曼森林之间;这位不幸的地产主说:“近几年来进入这里的野兽(bêtes fauves)竟大量繁殖……毁坏我的土地”。由于庄稼失收,佃户都要一走了事。正当他束手无策之际,国王发了慈悲,把他的土地买下!(我们顺便指出,在上一段引语里,修饰语“野”字(fauve)也作“褐色”讲,“野兽”一词指的是“褐色兽”,与野猪等“黑色兽”,狐狸等“棕色兽”相对照。)

祸害遍及整个法兰西。1789年的《陈情书》往往提到这个问题。普罗旺斯地区有一个名叫勃罗沃的小村庄,位于德拉基尼昂附近,曾请求国王“允许每个普通百姓,至少在其耕地的范围内,使用套索、陷阱或枪枝,捕杀破坏庄稼的各种动物……允许不给牧羊犬套上颈勒,尽管这有违普罗旺斯高等法院的禁令”⁶³。

当然,准许也罢,不准许也罢,农民总是在捕捉猎物。但在过去的法兰西,偷猎是个要受严厉惩罚的罪行。农民把护林员看作死对头,诺曼底的一份《陈情书》斥之为“游手好闲,因而行为卑劣”⁶⁴。

森林是“宝中之宝”⁶⁵

我们今天往往容易忘记森林在过去的经济价值。我曾讲到森林可供放牧。同样，人们也去森林采集树叶，橡树叶、榆树叶在草料不足时可喂养牲畜，山毛榉叶可填塞垫褥，枯树叶、黄杨叶可充当肥料……森林还提供家庭做饭和取暖的燃料。工业消耗（冶金业、铸造业、酿造业、精炼业、玻璃制造业）更是个无底洞。树木又是制造日用器材、犁耙、车辆、闸瓦等许多工具的原料，房屋、船舶以及压榨机、抽水机、卷扬机等机器也都离不开木材。

农民都兼顾樵柴，每到秋季，村里的闲空劳力纷纷出动去砍伐树木。1900年前后，在勃艮第山区，土豆刚刚收完，一年的农活到此结束，“人们天不亮就出门，花半小时抄近路爬山，争先恐后地来到采伐区。向右喊一声‘喂！奥古斯特！’或向左喊一声‘喂，德尼！’奥古斯特或德尼也以‘喂’声相应。接着，砍木断节所发出的低沉或清脆的斧声此起彼落地响个不停”。与此同时，炭火上正煮着一大锅“猪油炖土豆和菜豆”⁶⁶。

由于大批农民的砍伐和开荒，木柴急剧减少，价格不断上涨。从16世纪起，柴价已变得相当昂贵，森林更成为“宝中之宝”。出身于商人世家的皮埃尔·塞吉埃于1554年出任巴黎高等法院院长，这位为扩大本家地产而作出了毕生努力的精明人，对购买森林更有特别的偏爱。从他的帐目足以看出，林木收益何等可观！有谁还会对此感到惊奇⁶⁷？1715年以后，木柴价格加速上涨，在旧制度的最后20年内几乎直线上升。巴黎仅取暖用柴一项，当时每年平均消耗200万吨⁶⁸。

可见，森林处在人的支配之下，人对森林的渗透过去比今天更加深入。许多人在考察过去时，认为森林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赐资源。这种看法只有一半正确。从路易十四时代至今，林区

边缘的相对固定性很可能让人上当受骗。因为，任何事物都不是经久不变的。更何况，“地图上的一些地名有助于我们确认，林木密茂地区〔以往〕的景观与我们〔在学校〕学到的简单概念大不相同”⁶⁹。人对森林施加沉重的压力。密林之所以作为密林而存在，只是因为它们与人的需要和活动相一致。阿尔戈纳森林保存至今，靠的是地下埋着泡状硅质岩。此说固然不假，但人们所以没有像对奥尔良森林那样滥施砍伐，原因还在于“地形艰险、交通不便和运输困难，砍下的树木除了供当地消费，别无它用”。阿尔戈纳因此出现了许多玻璃制造厂⁷⁰。最后，我们不要忘记，林区周围的村庄经常滥伐树木，国家则试图阻止这类行为的发生。

森林是法外之地

森林也是法外之地，是盗贼等不逞之徒的天堂。巴黎附近著名的蓬迪森林——萨德侯爵讲述的关于朱斯蒂娜的故事就在这里发生⁷¹——只是在第二帝国期间才被大量砍伐。在暗无天日的阿登森林，“盗匪出没无常”，“色当至布永之间的过往行人”于1715年1月仍心惊胆战，“随时有遭抢劫的危险”⁷²。位于梅斯和圣默努尔德之间的森林同样阴森可怕，杀人越货之事经常发生⁷³；据说，在诺曼底的这些王家森林，由于“行人常遭抢劫和杀害”⁷⁴，人们经再三考虑，决定于1712年开辟几条大路。诺曼底当时还是王国境内治安状况最好的省份之一！伊厄—勒沙代尔是皮蒂维耶附近的一个设卡小村，据当地的一位刑事警官说（1694年），即使在离巴黎较近的地区，也是同样情形。他为此深感哀伤，“除了他在枫丹白露和奥尔良的森林中业已捕获的许多杀人犯和拦路抢劫犯以外，还有大批罪犯依旧逍遥法外”。那么，就让他放手办事去罢，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不得不以偷盗和行为不轨的罪名，把手下的某些差役也监禁起来”⁷⁵！

邻近村庄的森林是罪犯的好去处，也历来是私盐贩的藏身地；私盐贩往往原系逃兵，与农民相勾结，借用农民的马匹，在森林的保护下悄悄活动，迅速从一地向另一地转移。一旦被发现，他们只是为了逃命，才使用武器。

然而，也有些私盐贩大胆妄为，例如在1706年，一帮私盐贩分成几伙，推着满载盐包的小车前进，强迫村庄和小城市的居民买盐，并以焚烧房屋相威胁。一位包税人（他一直追到塞纳河畔的诺让附近）于1706年7月写道：“他们如此放心大胆，竟不再躲进树林，而是沿着道路迤迤前进，甚至逼近城市的门口。”⁷⁶

森林是避难所

每当战争发生，事情就颠倒过来：森林充当弱者的避难所。我们可以想到旺代地区的朱安党人以及上次战争期间韦科尔地区的抗德战士。1814年，当哥萨克来到法国东部，挥刀砍断圣女贞德故居的房梁时，村民们就像他们的祖先在三十年战争时期那样，逃到森林里去躲避无休止的抢劫。在洛林地区，由于三十年战争的灾难旷日持久，长期离家出走的农民变得粗鲁野蛮，成为“林中之狼”。他们肆无忌惮地劫夺为国王服役的军官和士兵的财物。为了根绝这些劫掠行为，费尔丹—塞恩泰尔元帅于1643年⁷⁷组织了清乡围剿，许多农民因此被处决。

另一种类型的避难者是穷人、乞丐和游民；他们无家可归，就在村庄边缘的“公有”林带落脚；他们拖儿带女，挤在用树枝、草茎和泥土盖起的棚屋里。村里的人通常容许他们这样“借宿”⁷⁸。其中，也有少数人通过开荒而发家。随着砖木房的兴建，定居的农民便开始演有烦言，甚至提出诉讼和施加威胁。昂热地区卢瓦尔河流域的滩地和“沼泽地”过去曾是一片森林，后来也因不宜耕种而被撂荒，这块荒地18世纪就曾引起很多争执。“在200年前偷偷盖

起的这些小屋群，如今已改造成为相当像样的村落，如果它们不是沿用旧时的名称，人们不会想到它们原来的穷困。这些村落有的就以‘木屋’〔在18世纪，‘木屋’一词是指樵夫或烧炭工在森林中搭的棚子〕命名，有的名称带着殖民地的色彩，如‘新大陆’、‘加拿大’‘密西西比’、‘卡宴’等。”⁷⁹这些微型的美洲实际上就是新开发的垦区！

村庄力求生产一切

村庄力求生产自己所需的一切。在人口密集的村庄（居民超过500人），单靠当地的未婚男女青年已足以维持世代繁衍。不然，邻近的村庄便互通婚嫁以弥补不足，在个别情况下，还可接纳外来的移民。总的说来，是以独力支撑为主：例如位于巴黎近郊、种植葡萄的罗曼维尔村在18世纪仍受内婚制的影响⁸⁰。

村庄趋向于“遗世独立”⁸¹，各有其机构、领主、村规民约、集体产业、人际交往、习俗、方言、民间故事、歌曲舞蹈、谚语以及对邻村的讥讽。我们还可以看到，科多尔省城乡居民被冠以一系列颇为不恭的绰号：“小羊羔”，“青蛙”，“猪”，“狼”，“空口袋”，“草包”；后两个绰号送给蒂耶河畔伊镇的人⁸²。挖苦讽刺、嘲弄逗趣乃至结怨成仇促使村庄之间没完没了地打官司，有关的证据至今还留下一小部分，其中也同样有种种夸张及恶毒的不实之词。“酒铺里动辄闹事”的年轻人每年总要打上几次群架，甚至造成流血事件。1780至1790年间，上利文哈克和弗拉尼亚克两村的居民竟不顾罗德兹主教的一再干预，斗殴达10年之久。在阿韦龙省，这类争斗直到1890年仍未绝迹⁸³。

村庄受仇恨或恶意所驱使，势必标新立异，以示与众不同。因此，为了博得好名声，它们互不相让，争着比哪个村庄的钟塔最高，教堂最漂亮，祭台的装饰最美⁸⁴。每个村庄全都渴望独立自主，都

要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无论是建造房屋和谷场，抽干池塘捕鱼，或为车轮装铁箍，本村的人都互相帮助。烧得火红的铁箍套在木轮外面，扔进水里后，因冷却而急速收紧⁸⁵。

力争自主还有赖某些不可忽视的条件：村庄往往拥有草地、森林等公产，有粉碎粮食的磨坊，烤面包的烘炉（有时由居民向领主赎买），以及根据不同地点用以压榨橄榄、葡萄、核桃的榨坊。为保证本村的服务，村内经营五花八门的副业，名目之多远非人们凭空所能想像。约瑟夫·克雷索在一本书里回忆起他家乡（朗格勒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当时还种植葡萄）1900年前后的工匠。他写道：“工匠名目之多绝非十指可数：磨坊工、缩绒工、锯木工；鞋匠、车匠、马蹄铁匠、粗细木匠、泥瓦匠、榨油匠、织匠、制桶匠……甚至还有以‘接骨疗伤’闻名的庸医。”⁸⁶所有的工匠勤恳劳作，经验丰富；泥瓦匠“对盖房的各道工序，从在采石场选配石料直到房顶铺瓦，全都得心应手”⁸⁷。尽管如此，工匠仍有自己的田地、菜园以及几头牲畜；否则，他们又怎能维持生活？

这里还要单独说一说铁匠的作用；大概从12世纪起，铁匠因其地位凌驾于所有工匠之上，往往扮演坏头头的角色；他们佩戴铅耳环，以示高人一等⁸⁸。面包师傅出现较晚（19世纪前十分少见），宣告白面包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小酒馆主是促进民间文化和传播消息的活动家，是集体娱乐的组织者，有时也放债收取高利贷；“小酒馆是村里人通常的聚会场所”⁸⁹，地位几乎与教堂相当。

人们的确觉得，这些“活动分子”保障着村庄的独立地位，似乎独立地位必须大力加以维护。在下利穆赞的村落中，同样的努力也举目可见。一些有点专长的人，除从事他们的日常劳作外，还为村里人帮忙出力，如杀猪，诊治猪丹毒，剃头，或当土方郎中，用草药治病⁹⁰。

一个村庄里工匠或所谓工匠的人数，有谁能够搞得清楚？我们

只好以其数量级为依据。在18世纪，距蓬图瓦兹17公里远的埃尔蒙村⁹¹的居民，大部分是耕地的农民和葡萄种植者，以及“季节工”和“零工”（后两种人系指家仆，别处又称“佣人”），村里除住着几名箍桶匠外，还有一名铁匠，一名屠夫，几家肉铺、杂货铺和小酒铺，几名“代书”（村庄的公证人），一名接生婆，一名教师……门类这么齐全，人们几乎可说埃尔蒙是个集镇；居民达500人，其中不但有商人，还有在当地拥有地产的几名巴黎市民。埃尔蒙至少也称得上是个大村庄了。

莫尔旺省阿鲁河畔的圣迪迪耶也属同样的情形⁹²，但我们对此还有点犹豫。圣迪迪耶耕地面积达3 000公顷，按每人占地3至4公顷计算，这个小集镇的居民理应在700和1 000之间，但实际上，1865年仅有950人，1975年为353人。在本世纪初，镇上却有50多名工匠。数目似乎不小。这是否表明圣迪迪耶具有集镇的职能呢？圣迪迪耶确实有四、五个附属的村落。但在进行深入的考察前，我们怎么能下定论？从北向南穿越莫尔旺高原的阿鲁河谷是条重要的通道，但圣迪迪耶夹在欧坦（往南约20公里）和阿鲁河畔土伦（往南约15公里）之间；欧坦是个大城市，土伦是个大集镇，它们控制着近在咫尺的圣迪迪耶。在这个地区，饲养业十分发达，牲畜交易会接连不断；如果考虑到以上的地理位置，无疑可以认为圣迪迪耶是个村庄。欧坦于1813年举办过13次交易会，其中有一次从7月31日开始，历时达一月之久。土伦同年曾举办7次，但圣迪迪耶仅有2次。显然，除了这些热闹嘈杂的交易会外，平时仍照常进行贸易，但成交额很小。到了后来，即在1874年，圣迪迪耶创设了定期的家畜交易会。无论如何，圣迪迪耶当时毕竟是个普通的村庄，并且比较孤立和被迫自给自足，事情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

必不可少的开放

任何村庄都力求自给自足，却又永远不可能真正做到。它必须向邻近的集市出售其“剩余产品”，那怕只是为了取得缴纳领主税和国税以及“购买食盐”所必需的现金；在旧制度下，仅仅“购买食盐”一项就是外力对乡村经济强行打开的一个缺口。一份回忆录在谈到利穆赞省（18世纪）的畜牧业⁹³时说，为了“凑齐税款”，人们在赶集的日子把黄油、蔬菜、鸡蛋、家畜、活牲畜、羊毛、木柴等物送往集镇或城市。行人和小车成群结队。镇上面包铺里的面包，肉铺里零售的肉，也供人们选购。直到18世纪，莫尔济纳（在今天上萨瓦省的阿尔卑斯山区）的山民竟不辞艰辛，前往瓦莱省的马蒂尼堡赶集买肉。集镇上还可买到调味品、纺织品、工具和小五金；高利贷者在集镇放债，虽然他们的地位在19世纪逐渐被各村的乡绅和旅店主所取代⁹⁴。

在因产品过少不能从事这些交换的农村，最好的出路多半是根据城市或集镇的包买商的定货，从事家庭劳动。这种加工方式于18世纪在乡村广为发展，如制造呢绒，或如在福雷平原的圣于连莫兰—莫莱特那样，利用泰尔奈小河的水流，为榨油、磨面、磨刀、粉碎铅矿石或缫丝等机械提供动力⁹⁵。

另一个门路是从事运输。地里的农活一停，农民便带着牲口和车辆出门跑运输。这些往返活动渐趋正规化和专业化；巴鲁瓦（直属法兰西国王的领地）有个名叫朗贝库尔—奥波的村庄，毁于1914年战争初期，华丽的教堂令人想起往昔的繁荣；该村的“小货车”早在16世纪已参与尼德兰至意大利的国际运输活动⁹⁶。同样，矗立在汝拉高原的奥热莱古城堡，以其教堂而闻名遐迩，当地人驾着马拉货车走遍整个法兰西。上比利牛斯地区锡约塔和奥桑的居民专门把康庞山谷的奶制品运往图卢兹等地。萨勃、伯兰和桑吉

内的牛车把阿卡雄湾的鲜鱼送到波尔多⁹⁷。

还有些人专门从事短途运输。例如下科雷兹地区的“采办”，“牵驴或推车进城，每周一至二次，代客采购各种用品”⁹⁸。又如兼营代购代销业务的萨瓦农民，又称“车把式”，不久前还把黄油、奶酪、家禽、牛羊等农产品集中运往邻近小城市每周的集市，返回前负责完成客户的各项“委托”：用绒线团换取羊毛、咖啡、糖、煤油等。只是到了最近，每周一班的公共汽车建立了山村间的联系，这些活动才彻底停止⁹⁹。

农民的车辆仍被当局所征用，经常为部队运送物资。不能以任何理由违抗下达的命令，那怕收割十分紧迫。1695年，1400辆马车从凡尔登启程，把必要的小麦和燕麦运交阿尔萨斯军团¹⁰⁰。1709年夏季，为保证北方军团的供应，农民运输队冒险出动¹⁰¹，“不愿淫雨连绵和道路泥泞”，向朗德勒西进发。“好几匹马因此丧生，其他的马也都疲于奔命。据说，农民被迫把物资一直运到瓦朗谢讷，这使他们在返回后不能再运第二次”。1744年前后，多菲内和普罗旺斯地区的农民应征充当挑夫，为阿尔卑斯军团输送给养¹⁰²。

十分自然，离大城市不远的村庄容易放弃自给自足。它们专门生产奶制品或种植蔬菜和果木，并因此富裕起来。在18世纪，巴黎菜场清早就摆满了来自近郊乡村的成车蔬菜。大城市附近的土地分成小块，农民在菜地用锄镐劳作，犁铧则仅在大田使用。还有其他的谋利途径：沃苏勒附近的昂德拉尔村以采石致富¹⁰³；我刚谈到的埃尔蒙村同巴黎近郊的其他村庄一样，村民专门在首都当保姆，照管尚未受洗而极易不幸夭折的初生婴儿。

阿尔芒格河谷的阿让特奈、莱济讷、帕西、维罗等村庄，位于托内尔东南方10公里处，自16世纪起已与巴黎有直接联系，村民出外当保姆、园丁、家仆、女佣、或赶车运葡萄酒，有的就在首都成家立业，开办小酒铺。在巴黎或在托内尔举行的洗礼或婚礼上，经常可

以看到他们的身影¹⁰⁴。

人口流动

在村庄、集镇和城市之间，也存在人员的交流。流动人口不计其数。在普罗旺斯出门旅行、“游历”或外逃的人员中，工匠多于农民，男子多于女子，穷人多于乡绅。流浪者有时在途中停下，就地定居和婚娶。这就在村庄体系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空气。我曾 在香巴尼和巴鲁瓦之间的一个小村中渡过了童年，就在我经常要谈到的这个村子里，1914年间约有居民200人，工匠9人，其中4人不在本村出生，即木匠、铁匠、马具皮件匠和面包师傅，5人是本村人，即车匠、磨坊主、旅店主以及2名杂货商。至于真正的农民，外来者都先当雇工，据我所知，至少有2名雇工在当地扎根落户。

朝相反的方向，流动商贩和工匠纷纷拥向农村。1914至1920年间，默兹省的一个村庄有2名屠户在广场设摊招揽顾客，一人在星期六上午开业，另一人则在星期天上午，人们实际上仅在这两天吃肉。那怕只买一小块肉，男女顾客都耐心挑拣，讨价还价，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份：买肉本身不就是生活宽裕的表现吗？此外，还有磨刀匠、补锅匠也都走村串乡，且不说收购时鲜蔬菜、鸡蛋、牛奶的商人，以及喜欢唠叨、到处打听消息的兔皮收购商；最后一类商贩比其他商贩与乡村生活结合得更加紧密，在本世纪初的奥尔南河畔雷维尼，他们也收购“破铜烂铁，旧垫褥，废弃的破锅旧炉、散架的壁炉台、折断的钳子、脱底的炉灶和碎成两片的锹锄”¹⁰⁵。

无论在哪个地区，到处都是相同的景象。第二帝国期间，在迪瓦山的诺尼埃耶村，“刀叉都用白铁皮制成，铁皮很快发暗。锡匠定期来到村里，在公共烘炉前摆下小炭炉，炉上有一只装满熔锡的锅子，从锅中取出的刀叉重新变得锃光闪亮，这种变化让村里的孩子看得目瞪口呆”¹⁰⁶。我的一位朋友1914年曾在莫尔旺的一个山村

中渡过了童年，锡匠给他留下了回忆：“身材的高大像是伏尔甘神，皮肤的漆黑和多毛又像是一头大熊……他总是穿着那几件衣服，厚厚的，杂七杂八的，布满了补丁和窟窿，被炉火烫破的地方比磨破的更多……大家知道他很少喝酒，从不洗濯，衣服只在穿破后方才脱下，比公山羊还更膻臭，但为人十分正直。他一边拿着去掉污垢的刀叉给我看，一边在说：‘瞧它们怎样变得漂亮起来，比银质刀叉更加漂亮。’”¹⁰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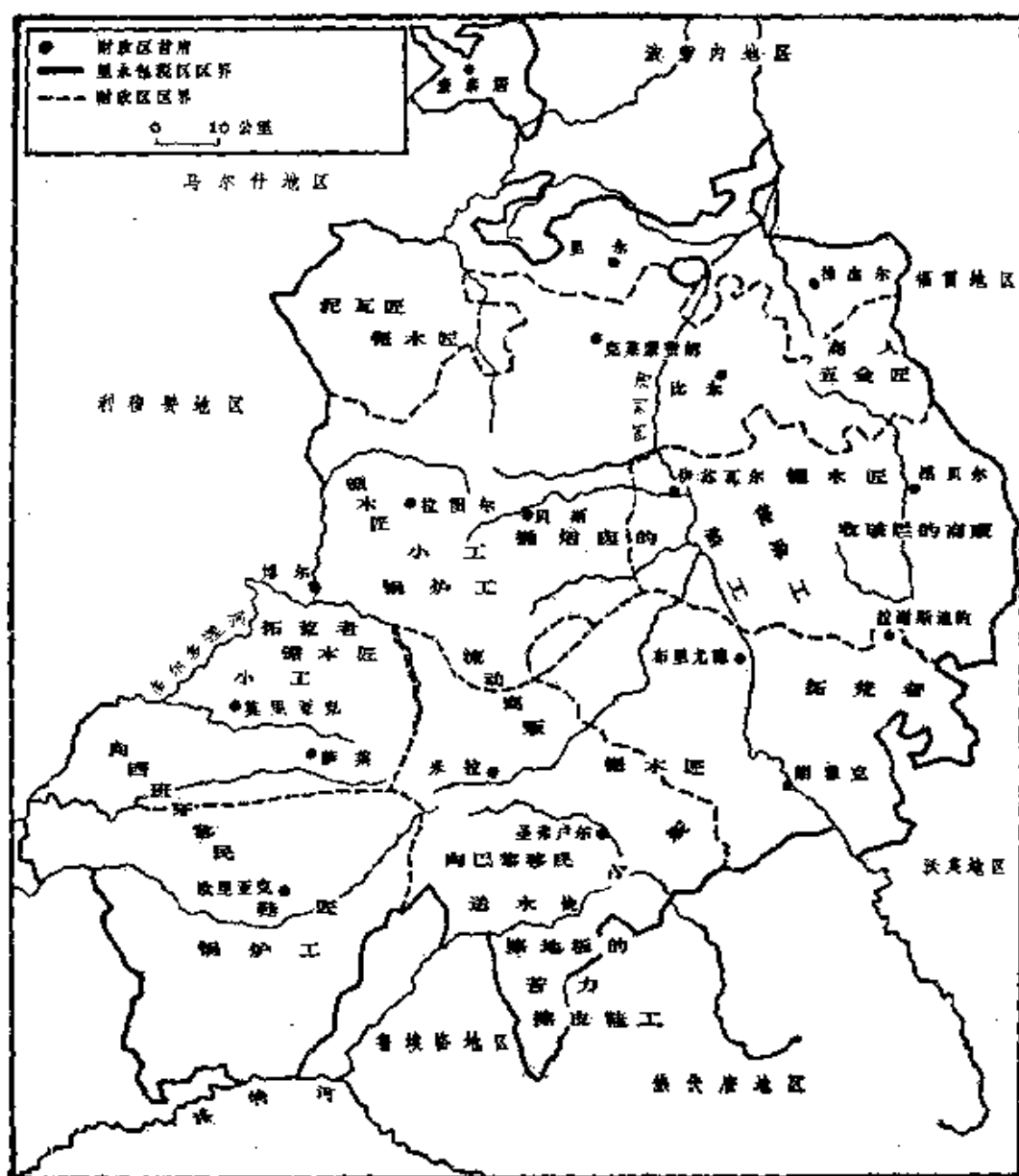
在昔日的法朗什—孔泰地区，还有什么工匠能比梳麻工流动更广呢？经“浸沤”、“切碎”后的粗麻先送往河边，由水动杵槌击打，最后才交给梳麻工进行整理；这些“苦汉子往往是萨瓦人，他们一路进村，备受孩子的嘲弄和居民的不信任。他们三五成群，挨门逐户地加工火麻，赶上小村庄，三人就足以应付活计……工钱算得很抠；1812年，如果管饭，加工每公斤苧麻付15生丁，不管饭则给20生丁。村里的麻在几天内梳理完毕，他们便把工具扛上肩头，前往邻近的村庄”¹⁰⁸。其他的流动服务有设伏捕捉鼯鼠或擒杀蝥蛇¹⁰⁹。不久前，在阿尔卑斯、比利牛斯、中央高原等山区，还有流动商贩的“货车”携带少量商品上门服务。这种景象如今是否已绝迹了呢？今天，在利穆赞省南部佩里戈尔林区的一个小村庄里：“每天早晨汽车喇叭一响，是收牛奶的人来了。军号声响总在星期一午后4时，是光顾食品杂货商的时间；猎号声响则在星期三午后3时，应该赶紧去买面包……”¹¹⁰

我不准备在这里一一列举在大忙季节帮助割草备草、收割庄稼、采摘葡萄或冬季脱粒的各种临时工。例如，上阿尔卑斯省的“自由伙伴”每年都去普罗旺斯平原打工（早已学会了喝葡萄酒，并且以此为乐）。又如迪瓦山区的收割者，又称“麦客”，利用因纬度造成的收获期差异，从一个地区赶往另一地区：“他们深夜赶路，争取在黎明时好找一份新工作”，一面穿过沉睡的村庄，一面放声歌

唱¹¹¹。维里是今天上萨瓦省的一个小村庄，据当地的本堂神甫介绍，1845年还有“成帮结队”的零工在收获季节赶来，每“帮”都有一人走在前面，“全队所有的镰刀捆成一捆，由他扛在肩上”，大家照例不停地唱着喜庆收获的歌曲。在收获季节，“小酒馆整日开门，不顾教会和国家的禁令”。社会风化因此被肆意践踏¹¹²！自古以来，中央高原的山民每年都去盛产谷物和葡萄的朗格多克地区打工，朗格多克总是焦急地等待他们的到来。没有这些零工补充劳力，奥利维尔·德·赛尔（1539—1619）怎么可能收割维瓦赖地区普拉台尔领地的庄稼？他写道：“至高无上的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忘……上帝让无数山民从高寒地区〔中央高原〕来到炎热的平原收割小麦……这些可怜的人……由于本地活计不够，难以养家糊口，便出门挣钱谋生，求得冬季的温饱……”¹¹³再举最后一个例子：直到19世纪，莫尔旺的“牛倌”每年都驾牛车出门，于3月抵达邻近地区，于11月返回。今天的某些传统节日可再现昔日“牛倌”出门时的风采：“蓝大褂，木屐和圆帽”，在手摇弦琴演奏的乐曲声中，人们翩翩起舞，跳当地的民间舞蹈¹¹⁴。

还有更加令人惊奇的事：在布里昂松（上阿尔卑斯省）的外流人员中竟有小学教师，他们跟着下山，“写字的笔插在帽沿上”，或短期出外，或永远离开¹¹⁵。我还丝毫没有谈到吉普赛人、“波希米亚人”或茨岗人的流动帐篷，关于这些流浪者，耳闻之事往往胜过目睹。

所有的村庄都势必要对外开放。1787和1788年间，一位旅行家在下奥弗涅地区作了长期的逗留¹¹⁶。在梯也尔附近，他除了见到几个普通村庄外，还发现几个奇怪的村落，村民“由同一家族的不同旁系所组成”。他们互相通婚，共同享用财产，并有自己的法律和习俗。他们实行某种共和政体，以一人为领袖。所有的个人一律平等。皮农村据说成立于12世纪，村内住着4户人家，共19人。



旧时代末年奥弗涅地区的季节性人口外流；地区分布和职业状况

引自A. 普瓦特里诺的文章，见《近现代历史杂志》1962年第9期。

由村民共同选出的村长(又称“男主人”)管理货物买卖、金钱出纳等一应事项……另又选出“女主人”一名，掌管妇女事务。“女主人”的人选从不与“男主人”是一家人。财产从不平分。村落总共有“3对公牛，30头母牛和80头绵羊”。家具、衣服、鞋和其他日用品都由本村制造。唯有盐和铁必须购买。可是，即使像皮农村这样

一个自给自足的绝妙例子,也并非完全与世隔绝;不管它对外开放的程度是多么低,它毕竟还要缴纳盐税和其他税收。更何况,为了买到本村缺少的盐和铁,它必须仰求他人¹¹⁷。

二 解释体系中的集镇

从村庄出发,集镇(取其广义,即从大村庄到小城市全都包括在内)是通向真正的城市道路上的第一级台阶。对乡村社会来说,集镇单独往往就代表着整个外在世界:行政、司法、贸易……毫无疑问,大型贸易正是通过这些“小动脉或小静脉的末梢”向偏僻的乡村渗透,但集镇“所起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远不是与其很小的货物周转量成比例的”¹¹⁸。

集镇的由来已有很长的历史。乔治·杜比¹¹⁹写道,从十世纪起,集镇与村庄(及其附属村落)的区别已可辨认;马孔内“最低级的司法区又是低级的行政管理区(Vicaria)……它在中心镇(Vic-us)方圆一法里的范围内,集合十五、六个村落,中心镇一般位于大路或小河的旁边;每个村落花半天功夫可去管理区所在地对簿公堂,并于当天返回。这个管理区是个地理单位,以江河湖泊、野林荒地等天然屏障为界;最初也是个人口分布单位(考古发掘表明,中心镇是最古老的居住中心)和宗教单位(教堂所在地)。”但是,如果没有交换和集市,即使在遥远的过去,在货币尚未出现、集市贸易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这个单位是不可想像的。

集镇的模式

确实,集镇的存在只是因为四周的大小村庄利用其规模不一的集市,使之成为服务和聚会的中心。集镇既是村庄不可或缺的补充,它又“从交流活动中吸取财富〔以及它的存在理由〕,并因此

而兴旺发达起来。集镇通常设在十字路口,设在河谷的出入口,始终〔或几乎总是〕位于两个不同的生产地区的交界处,附近的居民前来集镇交换各自的劳动果实。归根到底,集镇的职能在于它是当地各个村庄共同的‘市场’。在两次集市之间,集镇的活动多半停歇。集镇的中心有一个广场,周围有许多旅馆,在固定的集日,旅客往来盈门,热闹非常。一些店铺主和法律界人士也在镇上住着”¹²⁰。此外,还有开小酒铺的,放高利贷的,以及善于弄虚作假的中间商……

集镇或小城市也是举行重大民间节庆活动的场所。1583年5月,塞纳河畔巴尔一带久旱成灾,四围各村庄为求雨而组织的游行队伍纷纷向城市进发。结果照例闹出了乱子。据当时的人记载:“我坦率地说,这些白衣女士〔刚参加游行的〕大多是仆佣,到傍晚时简直如痴如醉,天黑后就在麦地里与人接吻拥抱,干尽各种伤风败俗的苟且之事”¹²¹。大型集市的庆祝活动也往往这样结束。

集镇居高临下地支配着整个管理区的乡村,乡村需要集镇的服务,但集镇又赖乡村为生;没有乡村,集镇便不能存在。集镇以控制乡村为其基本特征。在方圆5至10公里的范围内,各村庄如众星捧月,簇拥在集镇的四周;最大的距离可以说在事先已经确定,即农民从村庄到集镇,又从集镇到村庄,在一天内可以往返一次所走的路程(步行、骑马或坐车)。共和五年风月一日(1797年),刚设立建制不久的卢瓦尔省就以这种方式进行人口统计。圣桑福里安这个小镇“12岁以上的居民”共有1936人;周围的四个村庄:纳乌(462人);富尔诺(445人);旺德朗日(275人);圣普列斯特—拉罗什(323人)¹²²。1850年前后,上迪瓦省的首府沙蒂永城是个阿尔卑斯山区的小城市,6600名居民分散在周围的十个集镇:博讷瓦勒、布尔克、沙蒂永、克雷耶、格朗达日、吕斯—拉克鲁瓦欧特、芒格隆、勒韦埃费里耶、圣罗芒、特雷什努。小小的省城中有的有邮政所、税务

所、宪兵队、治安裁判所，有几名公证人，一名医生，有每周一集的小集市，每年举办多次的大集市；一年一度的主保瞻礼节更吸引各方商人和工匠的云集；“此外还有杂货铺、面包铺、咖啡店、肉铺，一名车匠，一名制桶匠和几名裁缝……”¹²³。安茹地区的迪尔塔勒与七个村庄的关系也大致相同。1962年的人口数字可为当时的人口水平提供进行对比的筹码：迪尔塔勒3 102人；巴拉赛420人；多默赖1 106人；埃特里歇887人；乌依雅526人；蒙蒂尼埃397人；莫拉讷1 694人；莱赖里810人¹²⁴。

集镇和村庄之间的这种依附关系，可举的范例真是成千上万。集镇一方面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表现为高于村庄，另一方面却是地方当局的最低梯级；在旧制度下，基层的司法机构，至少是低级管理区，以及屡经改组的骑警队，都设在镇上。到了城市一级，司法机构就变得庞杂和臃肿起来，律师、检察官、法官等法律界人士的人数大大超过合理的限度。至于在村庄里，领主行使治安裁判权。有时在同一个区内，令出多门也会引出种种矛盾和扯皮。

每个集镇各自控制一块势力范围，并随着当地具体情况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在阿尔萨斯的孚日山区，坦恩的领主在中世纪扩大了领地，于1344年兼并了老坦恩、埃本海姆、下阿斯帕克和上阿斯帕克等村庄，1361年又兼并了罗德朗、拉梅斯马特、奥岑维勒和莱姆巴赫等村庄；1497年，更取得了在塞尔奈、斯坦巴克、维特尔塞姆、卢特巴赫、雷南格、施韦格豪兹、埃亨维勒、米歇尔巴克、比奇维莱等滩地牧羊的权利；这一扩张损害了贝尔福、劳夫、桑坦、格文海姆、瑟温的利益；坦恩因此除掉了两个潜在的对手：圣阿马兰和达讷马里。所有这些成就有力地促进了坦恩的繁荣。其表现一方面是大兴土木，1518年兴建大教堂和贫民收容所，1519年兴建菜市场，1550年兴建市政厅；另一方面则是大事奢华，举办火枪射击比赛，优胜者可获巨奖¹²⁵。但是，坦恩当时是否已越过了集镇的界限，上升

为城市呢？尽管历史文书都断言城市不同于集镇，但真要把二者区分开来，却往往遇到困难。因此，费康和埃尔伯夫竟被称为集镇¹²⁶。罗阿讷也是如此¹²⁷。

在多数情况下，一篇文章、一种暗示或一个细节足以使集镇的作用自动暴露。默朗看来是个集镇，因为它扼守位于巴黎下方的塞纳河大桥；格雷是个集镇，它位于索恩河上，从格雷开始，索恩河真正可通航运；离洛里昂约30公里的欧赖是个景色优美、古风犹存的集镇，过去曾是“下辖19个堂区的大司法区”的首府；至于奥布河畔巴尔，据一封官方信件（1720年3月6日）¹²⁸说，“尽管这个城市本身规模不大，它却是香巴尼财政区中最大的司法区之一……附近的农民都来这里零售谷物和其他食品”（虽说贸易十分兴旺，但同昔日香巴尼交易会的盛况相比，无疑相去甚远，奥布河畔巴尔曾在香巴尼交易会中占一席之地）。在圣阿弗里克（今阿韦龙省）及其四周的十来个市镇，18世纪那时，新教的商人和工人虽已离乡它去，但粗呢制造工业仍得以保存。

集镇的地位不难辨认，人们只要看那里是否能找到医生或公证人，是否存在农民所光顾的集市。直到本世纪初，在汝拉省的鲁日蒙，赶集仍是一件大事。黎明时分，流动商贩的货车同当地的肉食商（在当地的商人中，只有肉食商才在露天营业）一起，陆续来到广场摆摊，与此同时，“种类繁多的各色车辆——敞篷车、大板车、双轮轻便马车、四轮货运马车等——以及提着篮筐步行的农妇纷纷向集镇汇聚”。村姑们“身穿黑色衣服……头戴白帽，站在椴树下出售鸡蛋、黄油、子鸡、家兔、蔬菜等农副产品”。在打着五颜六色的布篷的货摊前，在广场周围的店铺里，顾客往来不断，出售的货物应有尽有：长柄叉，耒耜，镰刀，家用器皿，锅碗瓢盆，衣料服饰，糖果点心，香肠火腿，等等。集市上还可见到接骨疗伤、拔牙、兜售真假成药的江湖郎中¹²⁹。

时至今日，集市仍是集镇的基本属性，虽然人口的“杠线”（关于这个大问题，我在下文再谈）已提高到一、二万人¹³⁰；在中世纪，一、二万人就是个大城市了。这里试以阿普特为例。该地共有居民11 612人，与卡瓦永（居民为21 530人，离阿普特31公里）和卡庞特拉（居民为25 463人，离阿普特48公里）两城市相邻，它仍行使过去集镇的各种职能。我们可从大村庄佩拉讷动身，在该村的一位历史学家的陪同下，前往阿普特赶集；集市在每星期六上午举行，沿袭至今已有400年的历史。请听历史学家的介绍：“市内所有的广场都被商人的摊位所占。街道上和店铺里摩肩击毂，简直可以说，四郊的人在那天全都出动……候诊室内挤满了人……药房生意兴隆。如要买药，必须排成长队，等在15至20人的后面。律师事务所顾客盈门。公证人和委托人在咖啡馆会面，市长和市府秘书也常光顾咖啡馆。每家咖啡馆都为几个特定职业阶层充当聚会场所。”在广场上，“农民们出售野兔、斑鹑、熏衣草香精、蜂蜜和蜂蜡”，还有块菘、水果和蔬菜。毫无疑问，这样的景象，从前是如此，今天仍然是如此¹³¹。

1790年的贡德勒库尔(默兹省)及其村庄

我们已考察了集镇的体系，下面再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利用相当丰富的文献资料，对集镇的现实从容不迫地进行深入的研究。由于凡·肖皮对卢河上游地区的可贵考察，我一度曾想举卢河河谷为例；这一河谷夹在汝拉高地的峭壁之间，沿着贝桑松至蓬塔利耶的直线伸展，并以奥尔南这一景色秀美的小城市为中心。但是，卢河河谷盛产葡萄，工业发达，运输繁忙（特别是食盐），贸易十分兴旺（1800年后，奥尔南每年有24个集市，于每月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二举行），它的情况比较特殊；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后面再谈。我也曾考虑以欧克索讷为例；索恩河畔的这一小镇是个军事要

塞，位于勃艮第公爵领地和伯爵领地之间的一个独立地区的中央。这个微不足道的地区长期享有特权，至少国王的税吏在当地不得强征暴敛。欧克索讷镇坚持不懈地维护其免税权，为了摆脱税吏的纠缠，又以“土地贫瘠”作为新的理由¹³²。这恰恰使它离我们的标准又太远了一点。我还想到过热克斯镇，但那里的地产主多系日内瓦人，这使经济和社会状况变得比较复杂。我最后选了一个平淡无奇的，因而也更容易普遍推广的例子：默兹省的贡德勒库尔。在1790年那时，默兹建省不久，我们可以看到，贡德勒库尔区所辖的奥尔努瓦村、布卢瓦村、伏依特村、沃村、瓦拉日村、巴西尼村都是些各居一方的小村庄，虽然相互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贡德勒库尔是默兹省南部最贫瘠的小区之一。该区地处高原（离贡德勒库尔423米的阿芒蒂灌木丛是默兹省的制高点），气候偏冷；18世纪末，葡萄仅在乌德兰库尔、圣汝瓦尔、特雷沃顿（距贡德勒库尔16公里）一带生长。而真正的葡萄园则位于该区北方界线以远的奥尔南河两岸，那里地势低洼，气候比较温和。例如在利尼（海拔为220米），尤其在巴勒迪克（海拔184米）。

这个很不起眼的小区位于两个不同土质的石灰岩高原的交接处：东部是默兹高原（又称默兹坡地）；北部和西部是巴鲁瓦高原（又称巴尔坡地）。两块高原的接合并不完全严丝合缝，中间留下一块粘土质的或泥灰质的洼地。包括贡德勒库尔在内的各个村庄就设在这里，从厚厚的灰土层中渗出的地下水在这里汇合成为水井、小溪和河流。经过筑坝拦水，小溪可为水磨提供动力，卢梅维尔—昂—奥尔诺瓦的水磨于1261年业已存在¹³³。这里还有无数石灰岩采石场；因此，这些村庄都由石料建成。来自邻近的香巴尼地区的人见后总会感到惊奇。在18世纪初，潮湿的香巴尼地区的房屋依旧是土木结构，屋顶用茅草铺盖¹³⁴。

在这石灰岩高原，几乎到处都是不大的丘陵。土岗的顶端长

着成片的山毛榉、千金榆和栎树，但在森林之下并不形成真正的灌木丛，西面的树木也不如东面的密集（朝着默兹河方向，默兹高原的地势逐渐上升，树木几乎遮天蔽日；人们今天还会在森林中迷路）。位于树林和低洼地区之间的多石坡地往往适于种植作物：耕地时犁铧翻出地面的石子，其数量之多简直呈现一片白色。据说，一架犁要用4匹、6匹乃至10匹马牵引。清除石子纯属徒劳，下一次犁耕还会翻出其他石子。结果十分明显：放牧的草地位于村庄的相同水平，而生产谷物的农田则分布在居高临下的山坡上。每当收获季节，满载小麦或燕麦捆的四轮马车往往紧刹车闸，勒住马套，吱嘎作响地朝着村庄驶去。

这些土地并不特别富庶。按面积为100公顷计算，耕地（全部实行三季轮作制）至多占一半，荒地占十分之一，林木占三分之一，剩下的是菜园和草场。1730年以后，真是全靠上帝保佑，土豆种植在当地以及在邻近的洛林地区开始得到了推广。

总的说来，当地人的生活十分艰难，但也还能过得下去。全区的居民数从1796年的6 903人，1803年的8 263人，达到1851年的11 668人；人口随后有所下降。1796年的人口普查（曾提到有253人从军，133人战死）还指出了人口分布状况（成年男子1 605人，成年女子1 629人，男孩1 589人，女孩1 515人）以及牲畜的数量（公牛、母牛和小牛共3 680头，各种马1 633匹，绵羊7 181头，山羊625头，猪939头，没有驴或骡）。牧畜都不属优良品种：马和牛的体格不大，母牛套犁耕地，绵羊瘦小，但羊肉还算可口，猪则是在集市上从商人那里购买的。根据我的计算，小麦产量平均每人约在3公担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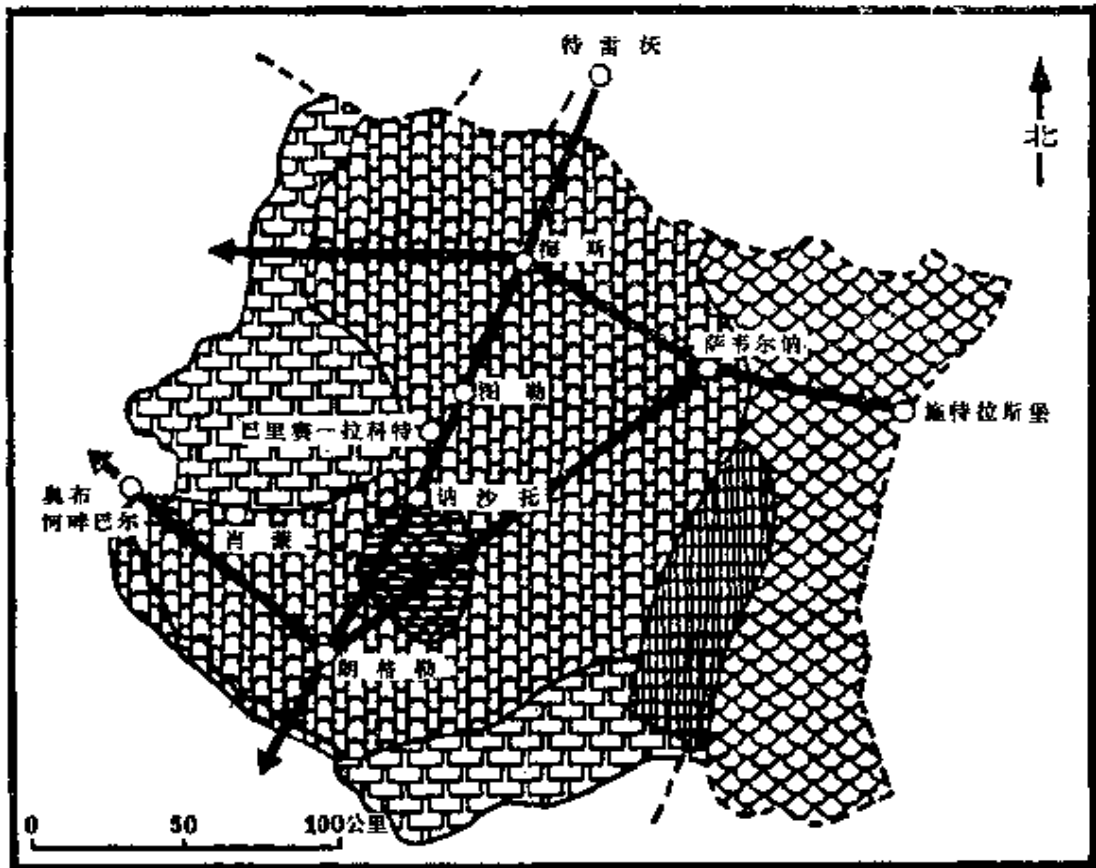
与默兹省的其他地区一样，贡德勒库尔区拥有冶金工业、矿山、高炉（18世纪时，高约6至7米）、锻铁炉以及粉碎矿石的水磨。由于不停工作的高炉消耗燃料过多，由于夏季的劳动力和水动力相对不足，冶金工业不能常年开工。如果把水位提到不正常的高

度，试图把冶金活动延长到冬季以后，农作物就会有受淹的危险。铁矿石并不缺少，木柴（燃料是冶金业的大问题，每炼100公斤铁需消耗100立方米木柴）幸而充足有余（但还必须运输）。树木可在巴鲁瓦高原（贡德勒库尔以西）采伐，尤其还在贡德勒库尔以东面对默兹河的高原采伐。上武东林区深处的居民专以“伐木”为业。高炉和锻铁炉势必要利用水磨的动力，因而设在接合两块高原的低洼处，即在奥尔南河及其小支流的沿岸。

总之，这个森林众多的地方，如同典型的洛林地区一样，有着独具一格的方言和村庄。在低矮、宽敞的搭接式木屋（谷仓、畜厩、住所）的背后，有狭窄的小门与菜园相通；在房屋的正面，可通车马的谷仓大门面对大街开着，两侧则杂乱地堆着车辆、犁耙和肥料。屋顶上盖的是圆形瓦片，俗称罗马瓦，虽然人们今天不再认为这种瓦片是古罗马时代的遗物。

贡德勒库尔1803年有居民1 139人，1851年有1 692人。该镇势力范围内的各村庄也受其他集镇或小城市的影响，有时甚至比贡德勒库尔的影响更加强烈。在西北部，有利尼昂巴鲁瓦（1803年和1851年的人口分别为2 800人和3 234人）；在北部，有沃伊（人口与贡德勒库尔大致相同，过去曾是默兹河附近的水陆码头）、沃库勒尔（也位于默兹河岸，人口与利尼昂巴鲁瓦相当）、讷沙托（1788年有居民3 380人，也在默兹河畔），因而默兹河谷几乎完全不受贡德勒库尔的影响，后者的控制范围最远可达上武东或莱鲁依斯。

朝西和朝南的方向，还要提到蒙捷（1803年有居民1 257人，位于索河河畔，小河深陷在山谷之中，地势比奥尔南河更加陡峭）、茹尔维尔（位于马恩河畔，1788年有居民2 210人）以及昂德洛（位于马恩河支流罗尼翁河畔）。这里提到昂德洛，仅仅因为贡德勒库尔区的部分土地在旧制度末年曾划归昂德洛管理区管辖，并在更大的范围内受肖蒙司法区的辖治。



洛林地区的罗马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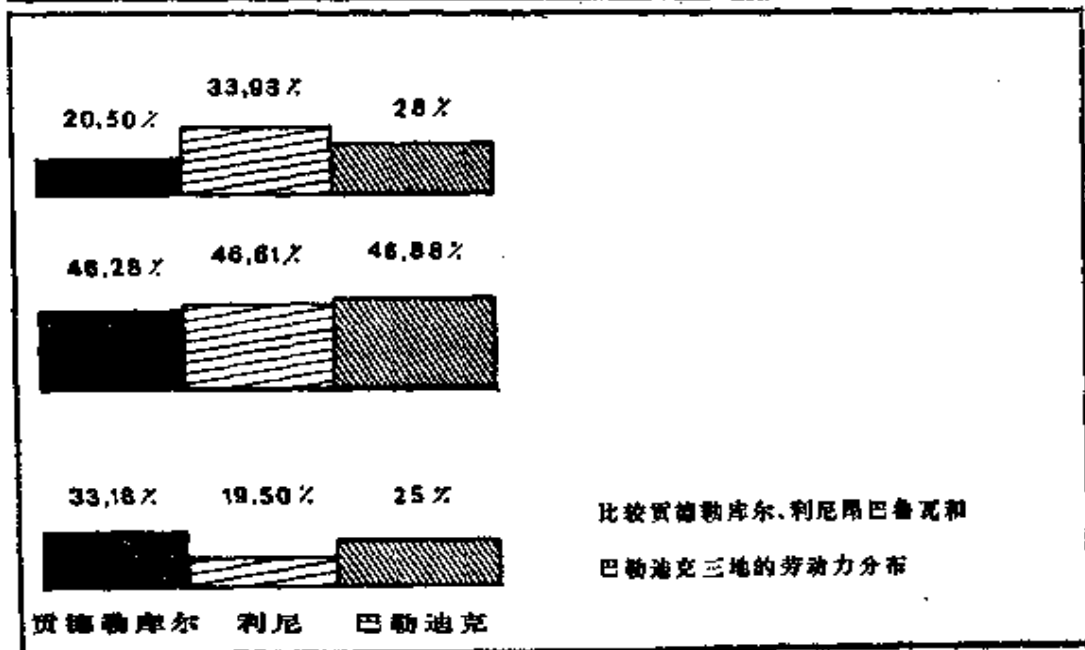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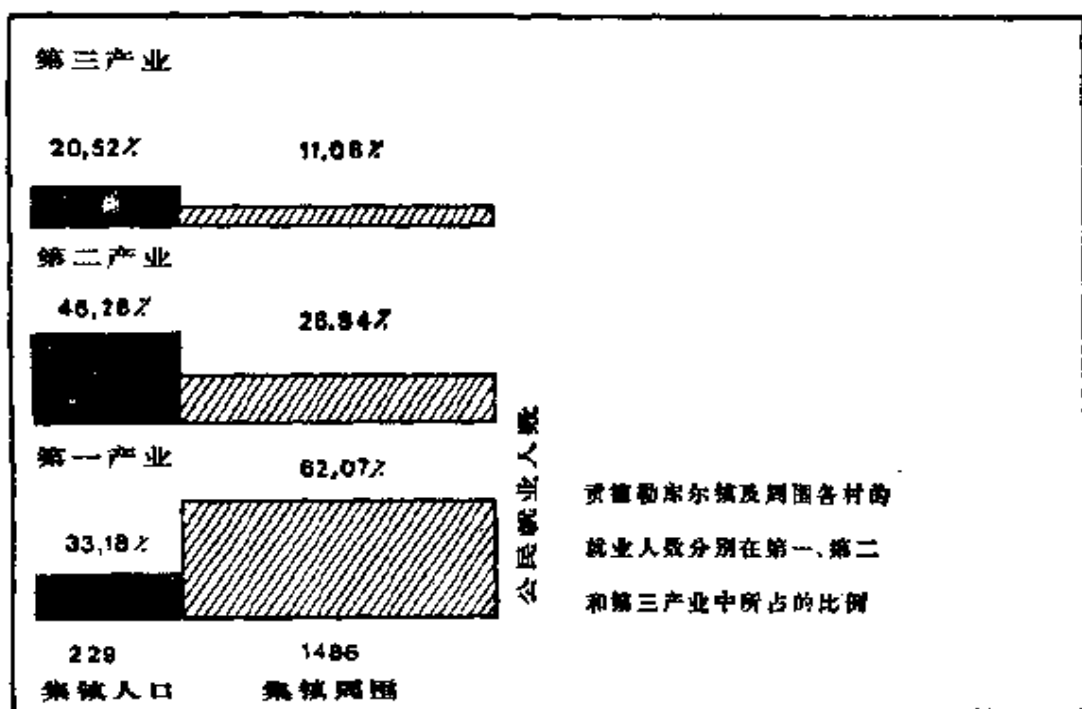
在贡德勒库尔区这一弹丸之地，历来使用地中海瓦铺盖屋顶。
资料来源：J. R. 皮特。

1803年前后，贡德勒库尔曾是默兹省境内面积最大的一个区（341平方公里），也是人口密度最低的一个区（每平方公里24人）。在邻近的沃伊区和蒙捷区，面积分别为274和199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则分别为37人和29人。由此证实了一条规律，即人口密度越低，集镇和村庄体系所占的地域越广。正因为贡德勒库尔区的地域广阔，博内、特雷沃赖和德芒日欧索等村庄也存在小型集市。如果我没有搞错，这些集市无疑弥补了贡德勒库尔每年

四次大型集市的不足。

作为乡村经济生活的发动机，集镇能力的大小首先自然要看集镇的人口多少以及集镇与周围各村人口保持怎样的比例。按集镇的人口为1计算，在1803年前后，巴勒迪克区的村镇比例系数最低，仅1.37，当维耶的系数最高，达11.47。按顺序排列，贡德勒库尔区的系数(6.95)低于当维耶，还落后于维尼厄勒—莱萨通沙泰勒(11)、默兹河畔代恩(9.44)、苏伊(8.34)、沃伊(8.32)和蒙福孔—昂阿戈讷(7.8)。尽管这些数字还有待解释(区是个简便的区划单位，但按区计算并不理想)，它们毕竟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如果比例数字很小，这就意味着中心和边缘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密的分工合作，同时也证明，集镇的影响超出了本区的范围，从而上升到城市的地位。巴勒迪克(1.3)、凡尔登(1.45)和圣米耶勒(2.75)的情形就是如此。如果比例数字很高，这就说明集镇深陷于乡村生活之中，本身只是个规模较大的村庄，其优势地位纯属错觉。当维耶或维尼厄勒—莱萨通沙泰勒都属后一种情形。

贡德勒库尔的比例系数(6.95)最终不算太低，集镇人口和村庄人口的社会职业配比也同样证明了这一事实。以上材料是由各市镇根据制宪议会的命令¹³⁶于1790年5月编制的积极公民名单向我们提供的。凡年龄在25岁以上的有职业的男子都被列入这些名单，虽然从原则上讲，只有以地产主或佃户的身份，纳税3里佛税款——等于3个劳动日的价值——的男子才被认为是积极公民，即初级选民。但是，不但3里佛这个数字很低，而且有的市镇竟完全忘记了这项指令，名单中包括了乞丐的姓名，甚至还提到几名寡妇。总的说来，这些数字显然还算和谐：在全区8263名居民中(1803年的数字)，列入1790年积极公民名单的有1715人，约占总人口的20.7%，这个数字同户数与人口数的惯常比例(1比4或1比5)十分接近。



贡德勒库尔区的人口状况：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分布

通过这些人口统计表，可以了解到很多事情。例如，贡德勒库尔全区只有一家面包铺，并且照例设在集镇上；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惊奇吗？村民们自己制作面包，1789年后，家家户户都有烤

炉,和面用的木箱是件普通的家具。另一件令人惊奇的事,甚至在贡德勒库尔镇上都没有肉铺。除了在莫瓦日这个过往频繁的村庄有家肉铺外,人们买肉都必须前往利尼昂巴鲁瓦或巴勒迪克(前者有5家肉铺,后者有14家)。小酒铺和小旅馆算在一起,也为数不多,总共才有18家,而且在24个村镇中,只是7个村镇有酒铺或旅馆。贡德勒库尔有2家旅馆,博内的旅馆和酒铺各有1家;当维尔—奥福日有3家酒铺,德芒日欧索有1家旅馆和3家酒铺,罗西耶尔—昂布卢瓦有3家酒铺……从133—134页间的地图可以看到,酒铺都设在边缘的村庄。由此可见,当地还没有喝酒的习惯,而且也不经常吃肉。全区没有一家食品杂货铺。

没有一名医生。看病必须前往利尼昂巴鲁瓦(内外科医生各2名)或巴勒迪克(内科3名,外科4名)。贡德勒库尔区仅有剃须匠兼治外伤,而且人数甚少,总共才7名:贡德勒库尔和莫瓦日各2名,沙赛、博内和上武东各1名。然而,接生婆则到处都有,这在统计表上并未说明,但在民事登记册上可以看到。

学校教师的人数说来还真不少,24个村镇共有11名。兼职授课的教士没有计算在内。扫除文盲的活动在当地开展甚早。在卢梅维尔这个小村庄,我们注意到一位教师于1689年举行婚礼¹³⁷。到了18世纪,当民事文书必须由证人具名(尤其是受洗儿童的教父和教母)时,男子几乎都会签字,女子能签字者则是凤毛麟角¹³⁷。

关于“资产者”,我们就不想去着重介绍了;统计表指出,全区共有11人以食利为生,其中5人住在贡德勒库尔。我们同样还注意到圣路易骑士团5名成员的姓名,其中4人住在贡德勒库尔。

绝大多数居民界于自耕农(富裕农民)和雇农之间,雇农又称“零工”,有时也拥有小片土地;在全区1715名积极公民中,491人为自耕农,478人为雇农。两个阶层的人数几乎相等;依我之见,这表明富农地位的相对低下(在梅斯四郊¹³⁸,雇农和自耕农的比例

为2比1)。然而,社会经济地位依然各有高低,尽管差异并不大。同城市一样,农村社会也存在不平等。每个村庄都有“首户”。

衡量农村社会的另一个办法是计算三大部类的比重:第一产业(以农业为主);第二产业(手工业);第三产业(包括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律师、商人、教师、神甫、食利者)。

在贡德勒库尔镇,第一产业占人口的33.18%(农业活动在集镇也占相当比重);第二产业占46.28%;第三产业占20.52%。就贡德勒库尔全区各村庄的情形来看,第一产业为62.07%,第二产业为26.84%,第三产业为11.08%;相比之下,这些数字十分说明问题。不过,最后一个数字有点牵强,因为我把少数身份不明的人统统列入第三产业。关键的问题显然是,同各村庄相比,集镇在农业活动方面只占相当小的比重;相反,集镇的手工业活动不断膨胀,第三产业的份量也比较重。我由此得出结论,地理布局本身造成了不平等和等级。马克思认为,城乡对立是阶级斗争最古老的表现形式,这的确是个天才的见解。

如果从集镇上升到大小城市的水平,这种对立只会显得更加突出。作为比较,我根据贡德勒库尔区的数字图解,对利尼昂巴鲁瓦和巴勒迪克的社会面貌作一概括;在利尼昂巴鲁瓦,三大产业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19.44%、46.61%和33.93%;在巴勒迪克,则分别为25.06%、46.88%和28.05%。乍看起来,人们不禁感到惊奇,巴勒迪克第一产业的份量竟然超过利尼昂巴鲁瓦。原因在于巴勒迪克有343名葡萄种植者,他们大概就在城市附近的坡地劳作,这些坡地今天已被撂荒。

我还特别注意到,总的说来,手工业实力雄厚,旨在满足当地需要的活动占很大比重。贡德勒库尔、利尼昂巴鲁瓦和巴勒迪克几乎都有一半居民以手工业为生。更令人惊讶的是,村庄中四分之一的村民从事手工业(但也耕种小片土地)。手工业门类之齐全

使我击节生叹：鞋匠、车匠、泥水匠、石匠、织布或织呢工匠、马具皮件匠¹³⁹、车夫以及骑马或步行的“驿差”……

至于贡德勒库尔自身的历史，我这里姑且割爱，不加铺陈，因为与我的论题关系不大。这个形同村庄的小城市利用了大路（巴塞尔至兰斯；肖蒙至凡尔登）交错的有利条件。该镇虽有堡垒可资守卫，但于14和15世纪两度失陷，而且每次都遭焚毁。贡德勒库尔不幸位于几条边境线的交界处，随时有遭入侵的危险；从1285年起，香巴尼的边界就是法兰西王国的边界；巴尔公国的边界（仅巴鲁瓦一侧自1302年后归属法兰西国王）；洛林公国的边界。因此，几个主子都想要贡德勒库尔纳贡称臣，都要在当地征收捐税。法国在朗格勒设置的税收机构尤其令人望而生畏。然而，这种混乱局面也有某些好处。例如，从贵族封爵的观点看，贡德勒库尔照例按香巴尼的规矩办事，“子随母贵”，因而如果父亲为平民而母亲为贵族，生下的儿子就有权要求巴尔公爵同意晋封贵族；假如证据确凿，甚至不要求你拥有非贵族父亲的遗产的三分之一（这是巴尔财政区的通例，贡德勒库尔的在这方面属于例外）¹⁴⁰。

作为一个破落的堡垒城市，贡德勒库尔由上城和下城所组成，前者被城墙和敌楼团团围住，后者比较热闹，取水便利，周五的小集市以及每年几次的大集市为在下城居住的商人提供赚钱的机会，他们赶着牛羊去草地放牧也比较方便，上城的农民和地主出城时要受城门的看守严密盘查。贡德勒库尔堡垒林立，但它还算不上是个要塞，至多可被认为是个瞭望哨所，在远处的森林地带，外敌可畅行无阻，不被发现。1635年¹⁴¹，黎塞留与奥地利王室交战，驻守巴鲁瓦的法军司令昂古莱姆公爵特意派一支小分队在贡德勒库尔布防，“因为这里是四通八达之地”。路易十四为简化边界防务，下令拆除了堡垒（今天，只剩下“尖顶塔楼”¹⁴²和徒具虚名的贡德勒库尔城堡外，已一无所有）；军事地位的下降将不妨碍该镇发

展其生产活动和服务活动，贡德勒库尔将不断扩大其影响。一份历史文献¹⁴³指出，这个初级司法区辖有29个村庄。此外，贡德勒库尔教区（下属于图勒主教区的利尼大教区）包括25个堂区¹⁴⁴。遥远的过去给贡德勒库尔城留下一座罗马式即哥特式的教堂，教堂内存放着几位名人的棺廓，特别是一位曾随弗朗索瓦一世远征帕维亚（1525年）和围攻那不勒斯（1528年）的战士；直到1790年，在设置市镇和县的行政体制时（贡德勒库尔一度成为县城），当地还有一所方济各修道院……但尽管存在以上迹象及其他迹象（有一所破落的麻疯病院和一所济贫院，还有在1700年仍在生产高档哗叽的织造业），这个小城市始终碌碌无为，只是与穷苦的乡村相比才显出其优越，它对乡村并不过分加以压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乡村经济的活跃。

三 解释体系中的城市

城市位于体系的最后一级。我们不要以为，到了城市一级，整个人口布局会变得豁然开朗，似乎登高可望全景。实际上，除了城市以外，还有许多居民点也起着城市的作用。而大量的小城市，它们同集镇又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直到工业革命乃至很久以后，许多小城市同集镇一样被乡村生活所淹没，人们的经济活动绝大多数仍与乡村生活有关。

为了正确地考察城市的类型，首先要把城市和非城市作出区分。对17世纪的法国人来说，事情十分简单。先看符尔蒂埃怎么说吧，在他编写的《辞典》（1690年）中指出：凡被城墙团团围住的地方，才称得上是城市。城市是个自成一统的小天地，不同于旷野。城市之独具一格，其标志和证据就在这里。可是，有些真正的城市并没有城墙，有些被墙围着的居民点却很难称之为城市。

1672年间,有人在旅行途中经过因洪水泛滥而闻名的勃艮第城市尼伊,觉得用以上的标准衡量城市未免牵强,他写道:“尼伊可被称作城市,因为城墙、壕沟、吊桥以及司法机构在这里一应俱全;其实,城内只有一条比较像样的大街,街道两旁住的都是制桶匠,因为市郊采摘的葡萄可酿制大量葡萄酒”¹⁴⁵。此外,这个小城市一直等到19世纪,居民才勉强超过2000人,《科多尔统计资料》指出,该城当时周长仅“400米”¹⁴⁶而已!

另一方面,任何人都不会把许多有墙篱围着的村庄称之为城市,例如纳博讷地区的卡内、圣纳泽尔、圣瓦利耶(设有两道围墙,外加一条宽窄壕)等村镇就是如此。还是在纳博讷地区,日内斯塔的情形也同样如此,原来的城壕最后成了供马饮水的小沟¹⁴⁷。以橡树林闻名的鲁夫赖,实际上是个小村庄,但在16世纪前,却被高墙深壕所包围,这一情形也是无可争议的事实¹⁴⁸。

统计学家根据聚居的人口数把各居民点分别纳入城市和非城市范围,居民在2000人以上者为城市,低于这个标准的就是集镇或村庄。这个办法说来真是简单,标准也很清晰明了,但未免过分直截了当,尤其因为人口限度势必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更。关于这个大问题,我在后面再谈¹⁴⁹。

什么是城市?

与其用城墙和人口数字作标准,不如说,城市最鲜明的特征表现于它在尽可能狭窄的地域内集中了最大量的经济活动,那里的人口因而十分密集。昂热·古达尔于18世纪已经说过:“在这么小的地块上集中那么多的人!”地面之小逼迫人们在往往不通车辆的街巷中行走,促使他们建造的房屋向高处(唯一自由的空间)发展,尤其是在城墙保护和遏制其扩展的时候。

城墙当然可以挪动,它们确实也像舞台布景一样可以搬迁。城

市因此而呼吸舒畅。在新并入城区的土地上，甚至有菜园、果园和耕地，后来还有射击场。街道和房屋逐渐布满所有的空地。即使在城墙完全拆除的情况下，例如像18世纪时的利摩日（此事应归功于杜尔哥）、卡昂、雷恩等地，城区仍然是密集的和拥挤的。为交通和办事方便起见，最好不要过分远离市中心。结果是，任何城市势必要受地域狭窄的束缚，这也是确保其效能的起码条件。城市必须使其店铺、市场、房屋、工匠、居民等等紧紧地聚集在一起。

但是，城市的任务首先是要进行统治。确定和衡量城市的重要因素，正是它实施其统治的能力以及它所控制的地域的大小。

例如，共和四年雨月，卡庞特拉力争要沃克吕兹省把民事和刑事法庭设在该地，而不设在阿维尼翁，从而一跃而上升到城市的地位；卡庞特拉提出的理由是该地道路众多，“从阿维尼翁、阿普特、奥朗日、瓦尔雷阿斯等地到卡庞特拉的各条大道全年畅通无阻（着重号系作者所加）”。其次，卡庞特拉位于沃克吕兹省的中央，而“阿维尼翁、阿普特和奥朗日却不能提供”这一有利条件。为此，卡庞特拉“因其位置优越，每七天有定期集市，影响播及远地，可成为本省其他市镇乃至邻近各省居民的集会地点”¹⁵¹。

卡庞特拉的威望或优势自然并不仅仅由其地理位置所决定。在巴黎东北部，靠近芒特拉若利的博尼耶尔是个仅有六、七百居民的村庄，1738年新建的巴黎至鲁昂的车道穿过该村，几年以后，于1753年建造的巴黎至卡昂的大路又经过这里。位居交通要冲的博尼耶尔从此成为商业中心。但它肯定不是城市¹⁵²。城市必定有纵横交错的道路，但除此以外，还必须增加许多其他条件，才能算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城市。

确实，真正属于城市范畴的任何地方，都有程度不同地受它控制的许多集镇在它四周围成一圈，每个集镇又使城市间接地与一些小村庄联系起来。由此形成一个简单的几何图形，这类图形可

惜并不始终一致，特别在涉及到高级城市的时候，情形更要复杂得多。

此外，每个城市不论大小，四周都有一个土地肥沃的区域，城市至少要靠它供应不宜保存的食品。每个城市都有其市场，就像土伦的市场”一样，“就近接受蔬菜和水果，果农和菜农牵着骡或驴，走上一、二个小时的路程，每天前来赶集”¹⁵³。在14世纪末，塔拉斯孔四周的食品产区位于一块完全由人力开发出来的土地上，显得尤其突出¹⁵⁴。这个小城市幸而位于罗讷河畔，但在河堤的保护下，北面依傍小山，南面贴近阿尔皮耶山，得以免受洪水泛滥的威胁。塔拉斯孔地区共分两个部分：位于河堤之间的低洼地紧靠城墙，是些小块的菜园和果园；河堤外面则是成片的草地和田野；最后是山冈的坡地，种着密密麻麻的葡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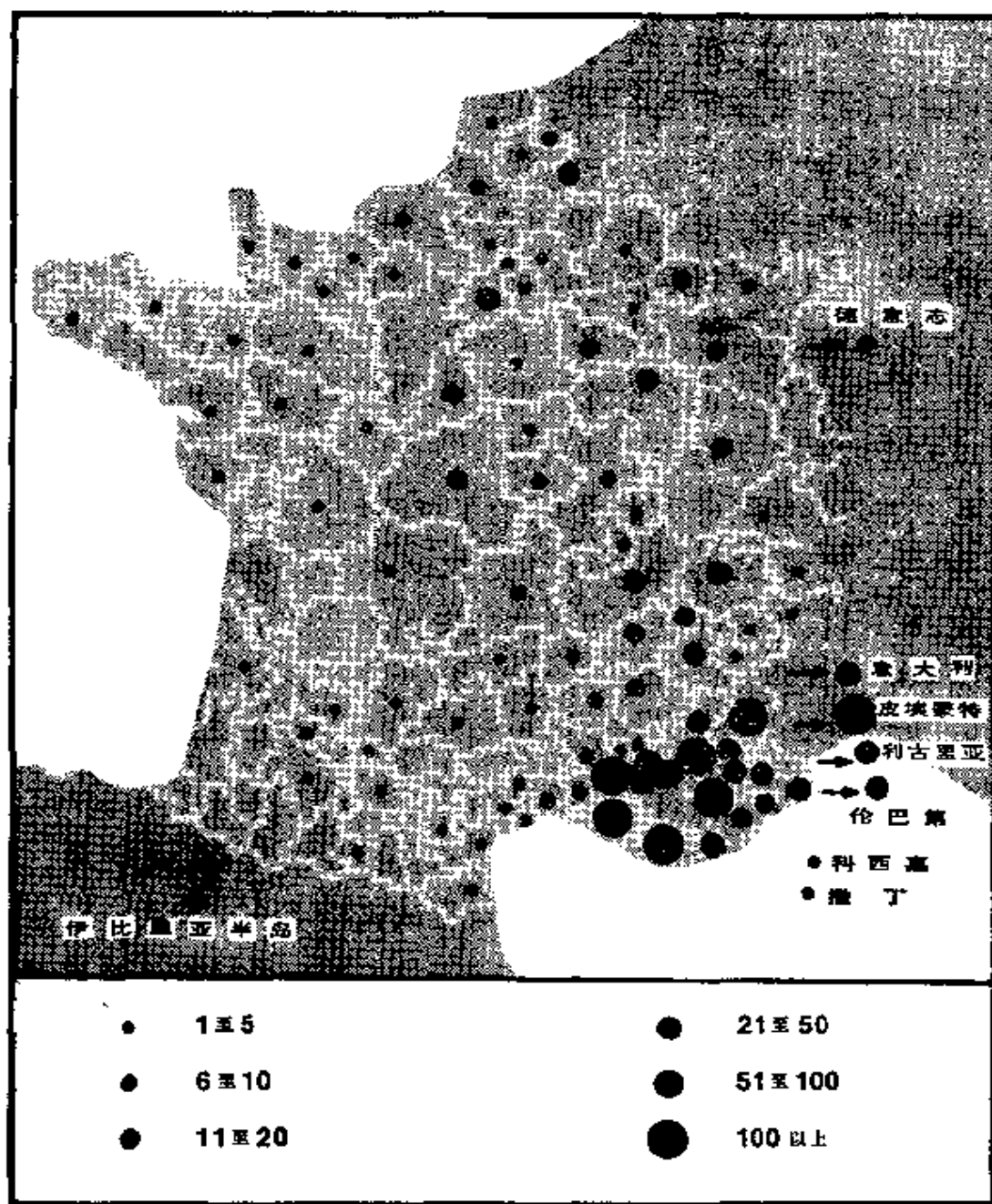
正是对这些近郊乡村，城市最容易甚至无意中施加其影响，城市决定着乡村经济活动的方向，乡村居民为生活所迫，往往要去城市谋生。流入城市的农民有时不再返回乡村，进而成为城市生活的一分子。在阿尔萨斯地区的科尔马、盖布维莱尔¹⁵⁵等城市的周围，于14世纪业已破败的一圈村庄逐渐被并入城市，同样的情形在别处也可遇到，例如在艾克斯昂普罗旺斯的四周¹⁵⁶，由此可见，一些村庄可无伤大雅地被城市所吞食。

但是，紧贴城墙、专门种植蔬菜或水果的农业区只构成城市外围的第一个圆圈，只是城市进行某种殖民扩张而跨出的第一步而已。城市的胃口极大，它的食物供应区和势力范围不是一个区域，而是一连串呈同心圆形状的区域：牛奶和蔬菜产区，谷物产区，葡萄产区，畜牧区，森林区，还有远程贸易区。一些起着中间站作用的集市和城市就分布在这一系列同心圆的不同地点。我们不由得想起厄卡尔·施莱姆的至理名言：“在城市的市场上，不仅进行城乡之间的交换，城市与城市也有交换。”¹⁵⁷关于这个问题，鲁道夫·

哈普克很久以前在谈到15世纪(布鲁日的鼎盛时代)尼德兰城市网的时候,曾使用了“城市列岛”的形象用语¹⁵⁸。

城市的扩张和统治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行政、宗教、文化等方面。在法兰西王国,城市曾同领主作斗争,反对(或拥戴)国王,以取得特惠和自由。城市逐步夺取了部分领主权或王权,接受了建立参政议政机构的恩赐;根据不同城市的机遇、实力或好斗程度,分别成立了初等法院、中等法院、高等法院等机构。请想一想城市在设置了主教府、教士会、修道院、大学等宗教机构后所享有的好处。我们顺便再用三言两语回顾有关罗芒(罗芒系多菲内地区的一个小城市,位于伊泽尔河畔,离瓦朗斯不过几公里)的一段历史:“瓦朗斯设有大学,格勒诺布尔是多菲内的高等法院、审计院、巡按使及省级官府的所在地,维埃纳是大主教和助税院的驻地,吸引着许多人来这里进行诉讼、求职和求学,而与此同时,罗芒则相形见绌,竭力发展其工商业。实际上……当地官员曾多次想要求把亨伯特二世设在圣马塞兰的下维埃纳中等法院迁到罗芒,但从未取得成功。”¹⁵⁹机构格局的变动只是个别现象。这对罗芒来说委实可惜!因为司法或行政机构不会出现失业,是能帮助城市生存的一个生财之道。丧失其中的一个机构,对城市几乎是场灾难。举南锡为例,在法国占领期间(1670至1697年),它被剥夺了中等法院。居民们说,南锡当时“陷入极大的苦难之中……资产者全都逃离该城,很少有人能免受这一不幸的打击”¹⁶⁰。

城市影响所及之处,不论远近,首先都向城市补充人力。确实,“人是世界上最无孔不入的生物”¹⁶¹,并且历来最喜见异思迁。城市就像是偷猎者设置的暗灯,在茫茫黑夜里吸引猎物自投罗网。它对四周的农民有着迷人的魅力。下面的几张草图极其说明问题,人们据此可以看出城市中的外乡人的原籍。不增加这些新鲜血液,城市将逐渐衰落,新出生的人口始终不足以弥补死亡留下的空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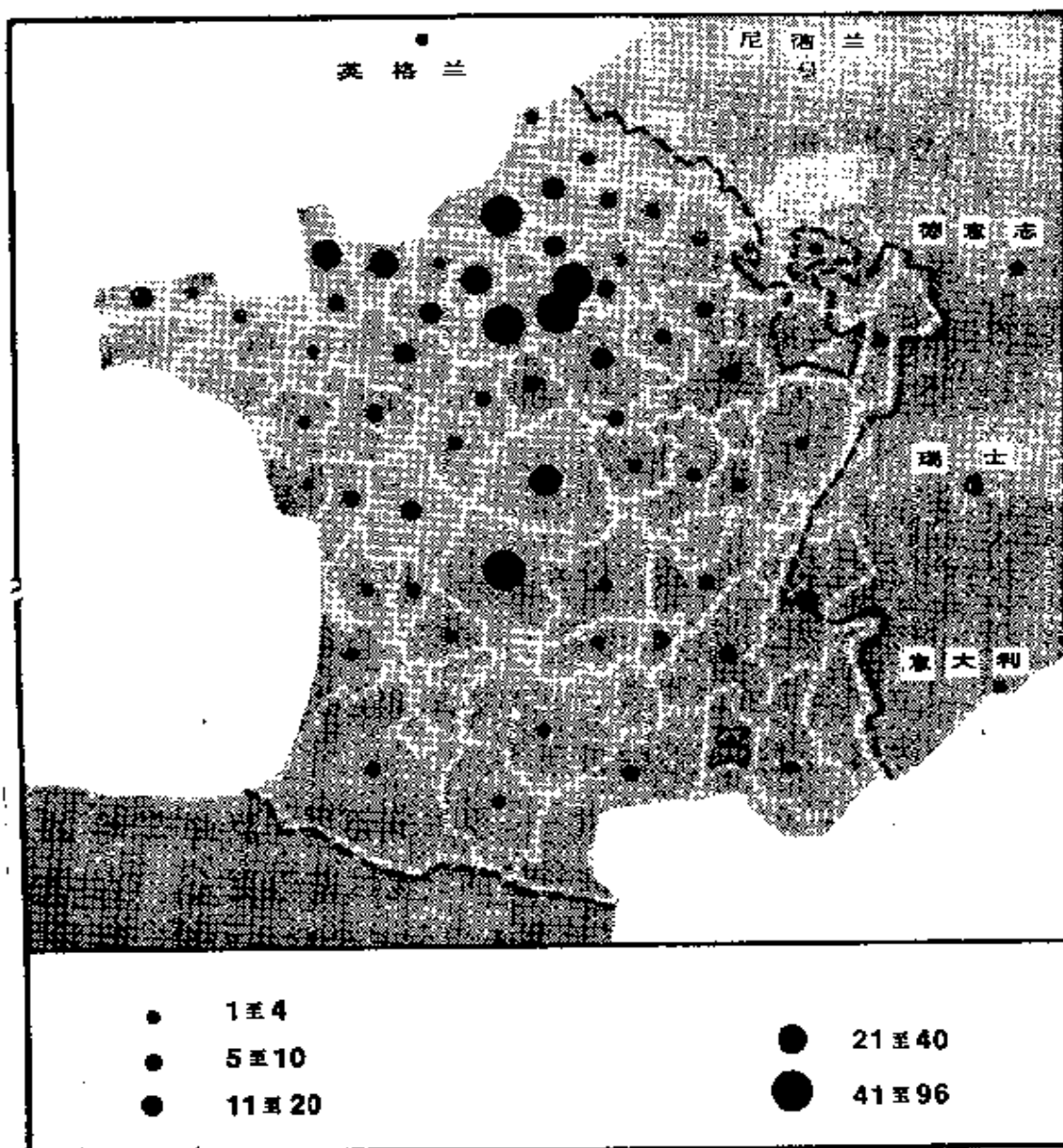


18世纪移居艾克斯昂普罗旺斯的外乡人

参见乔治·杜比主编的《法兰西乡村史》第3卷。

直到18世纪末为止，所有的城市，不论大小，统统都是“死亡营”。

从他们的原籍可以看出，进城的乡民来自城市周围十分广阔的区域。例如，18世纪移居艾克斯昂普罗旺斯城的外乡人（埃克斯当时只是一个中等城市）涉及到法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移民以工



凡尔赛已婚男子的籍贯(1682至1689年)

适应庞大建筑计划的要求，城市的工地从外地招收工人。参见乔治·杜比主编的《法兰西乡村史》第3卷。

匠居多，奇怪的是，他们的专长有时随各自的出生地为转移，以至“在劳动力市场上实施真正的垄断”：“图卢兹和佩里格的挖土工几乎全部来自布列塔尼……罗纳河沿岸城市的船夫多半出生于罗纳河上游地区，至于面包师傅和屠宰匠，多数分别是布雷斯人和奥

弗涅人。”¹⁶²在18世纪的巴黎，盖房的木匠来自诺曼底，泥水匠来自利穆赞，保姆来自勃艮第，刷扫烟囱的来自萨瓦，送水的来自奥弗涅，如此等等。每个居民点，即使不大的居民点，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个问题提供相同的答案：博讷维尔（原系福西尼省的首府，今属上萨瓦省）是个城市，也可算是集镇，18世纪时城里就有外来的移民；医生是第戎人；在两名警官中，一名是波旁地区的人，另一名是尼韦内人；面包商是诺曼底人；鞋匠是多菲内人；零工来自卡尔卡松、佩里戈尔以及萨瓦的乡村……难道还有什么能比这些事例更说明问题的吗？

然而，据我们所知，城市除招募工匠或零工外，还吸收高质量的移民，他们往往携带自己的财产，怀有一番抱负，前来城市经商，因而是城市中未来的资产者。在13世纪的梅斯城，人们就可以见到这种上等移民迁居城市的景象¹⁶⁴。

商业活动十分兴旺的城市——或用安德烈·皮亚蒂埃的话说，城市中的城市——向四周伸展的贸易区范围更大，这些贸易区在法国国土上分布甚广，并沿着大宗贸易的路线向远方延伸，直到东地中海地区、波罗的海、非洲和新大陆，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更开辟了通往远东的道路。本书和148—149页间的草图显示出，18世纪的鲁昂和马赛与法国许多地区有着贸易联系。读者顺便可注意到，这些商业扩张不论多广，但都没有包容法兰西的全部国土。民族市场迟迟未能形成，法兰西的国土尚缺少凝聚力和整体性。广阔的地域妨碍着商业一体化的实现，虽说运输在发展，集市在增多，为数众多的交易会几乎可取代城市或集镇的地位；城市定期举办的交易会显然促进了城市经济活动的成倍增长。尽管如此，甚至那些大型交易会——13世纪的香巴尼交易会，吉勃累交易会，博凯尔交易会——都只抓住部分国土。无论是法兰西国家，或是法国最先进城市的资本主义，都对法国过于庞大的国土，不能实

施完全的统治。更何况，这些先进城市又简直与法兰西王国格格不入，我在下文还有机会详加论述。

举几个尽可能简单的例子

与其对城市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各执一词地争论不休，最好还是先着重考察几个具体的例子。就从最简单的例子开始，即以规模和影响较小的城市为例。要说一眼就能让人明白的简单例子，我想恐怕是不存在的。任何城市生活势必都要力求达到收支平衡，始终要从收支的不平衡达到新的平衡。一个城市对外部的依赖以及为与外部相结合和控制外部而进行的内在变革，从不是简单的事，其中的奥秘通常还有待破译。

举例说明的好处正是可以验证我们的理论框架，后者则只是作出初步说明的一种模式。然而，仅仅有了模式还是不够的，必须让它经受现实的考验。如果它站得住脚，其意义当然十分重大；如果垮了下来，一切就要重新开始。

问题的关键无疑是要确定，一个城市在非城市（集镇、村庄）中占什么位置，与其他城市相比又处什么地位，进而揭示各城市在地方关系、地区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特有的“逻辑”。在国际关系中，世界历史进程不断对城市施加影响，改变它们的地位，甚至使某些城市一落千丈；此城市超过了彼城市，而在城市自身的命运中，却没有丝毫迹象让人看到这一变化的即将发生。

以上理论框架一经确定，我们再来进行验证（和使之复杂化），我们的侧重点将不从城墙内部去考察城市，而要展示城市统治的全貌，即根据市内和市外的不同关系，同时从内外两方面着手；确定这一关系的性质并不始终是件容易的事，进行定量分析更要困难得多。

贝桑松以及地区首府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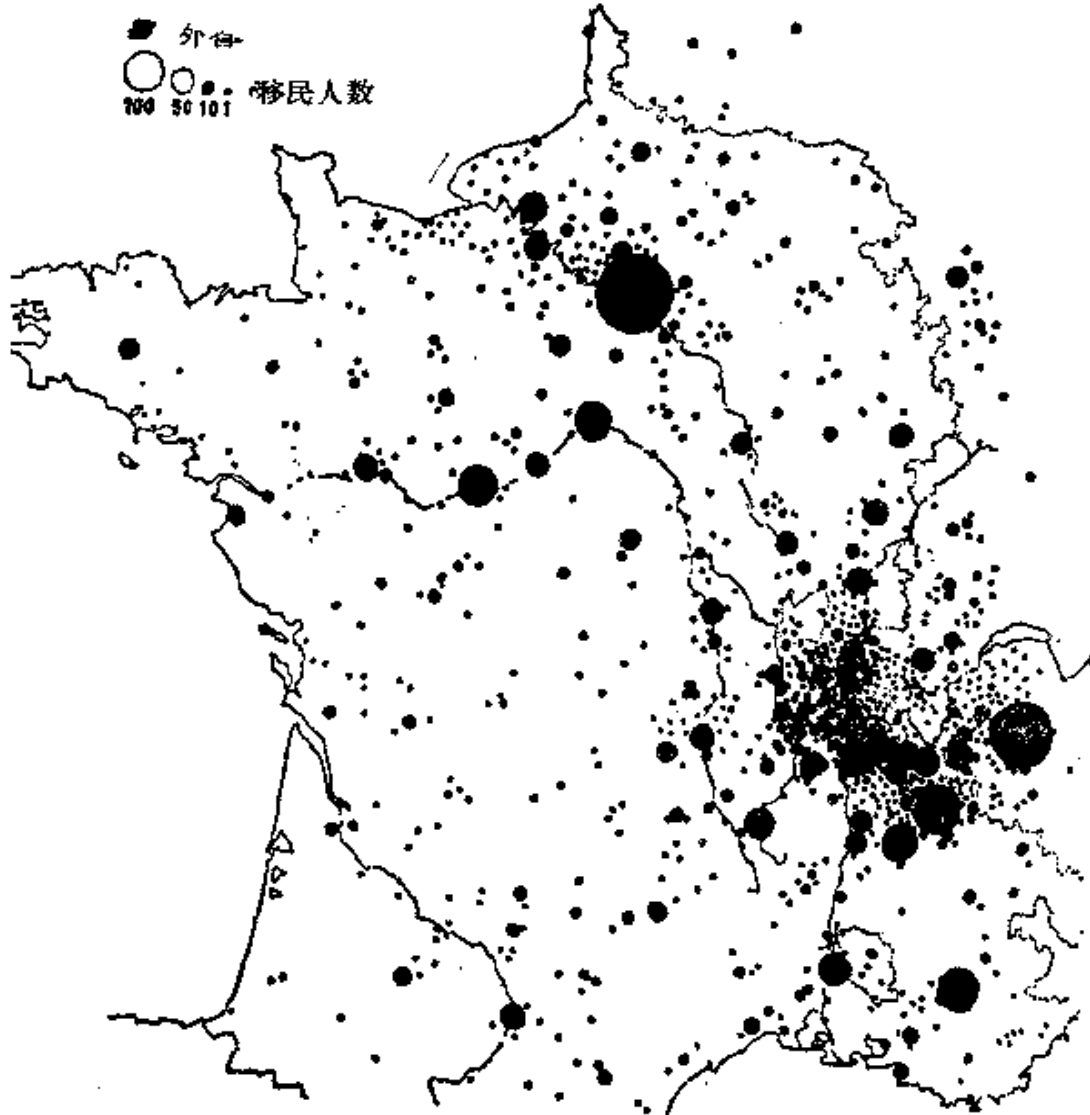
从第一眼看，很少有别的城市能比贝桑松这个例子更加鲜明，更加恰当。各种条件，无论好坏，这个城市全都具备；地理决定论在这里决不是泛泛的空谈。

杜河令人称奇的曲折河道包围着和保护着城市，但并没有完全围住，因为河曲留有一道缝隙，一个缺口，因而不能构成四面由河水防卫的岛屿。但从第152页的简图可以看到，这个缺口又被高出河曲100多米的一座山峦（海拔约360米）所封住。在这个制高点上，高卢时代曾留下一道围墙，另外还筑有堡垒（沃邦后来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加强天险的防御能力。在上新世时代，莱茵河一度流经今天的杜河河谷，直到孚日—黑森林高原沿中线出现塌陷，才使莱茵河放弃其在汝拉地区的河段，并改变了流向。莱茵河的水流比杜河强劲得多，它改变了贝桑松地区的地势，并像锯齿一样把汝拉山的边缘截成几段。贝桑松的城堡正是位于其中一个断面的顶部，夹在南北向的里沃特和塔拉格诺兹两个峡谷之间。

在这个巧得天险的地点很早建立城市，不会使人感到奇怪。贝桑松曾是独立高卢重要部落之一塞卡尼人的首府，塞卡尼人与据守汝拉山另一侧的海尔维第人以及与在杜河和索恩河隔岸对峙的敌人埃杜维人时有冲突。凯撒在其《高卢战记》中指出了贝桑松位置的险要。

到了古罗马时代，维松提奥（贝桑松旧称）曾是位于十字路口的一座重要都城，第一条路（通往洛桑和莱蒙湖）经卢河河谷和细长的蓬塔利耶峡谷穿越汝拉山；第二条从索恩河畔的沙隆出发，沿汝拉山边缘向贝桑松伸展，再经过蒙贝利亚尔、贝尔福、莱茵河及其支流，抵达美因兹。为罗马军团使用的这第二条路¹⁶⁵是仅次于里昂—沙隆—朗格勒—特雷沃干线的最重要的路线。维松提奥无

根据去官医院的病人入院登记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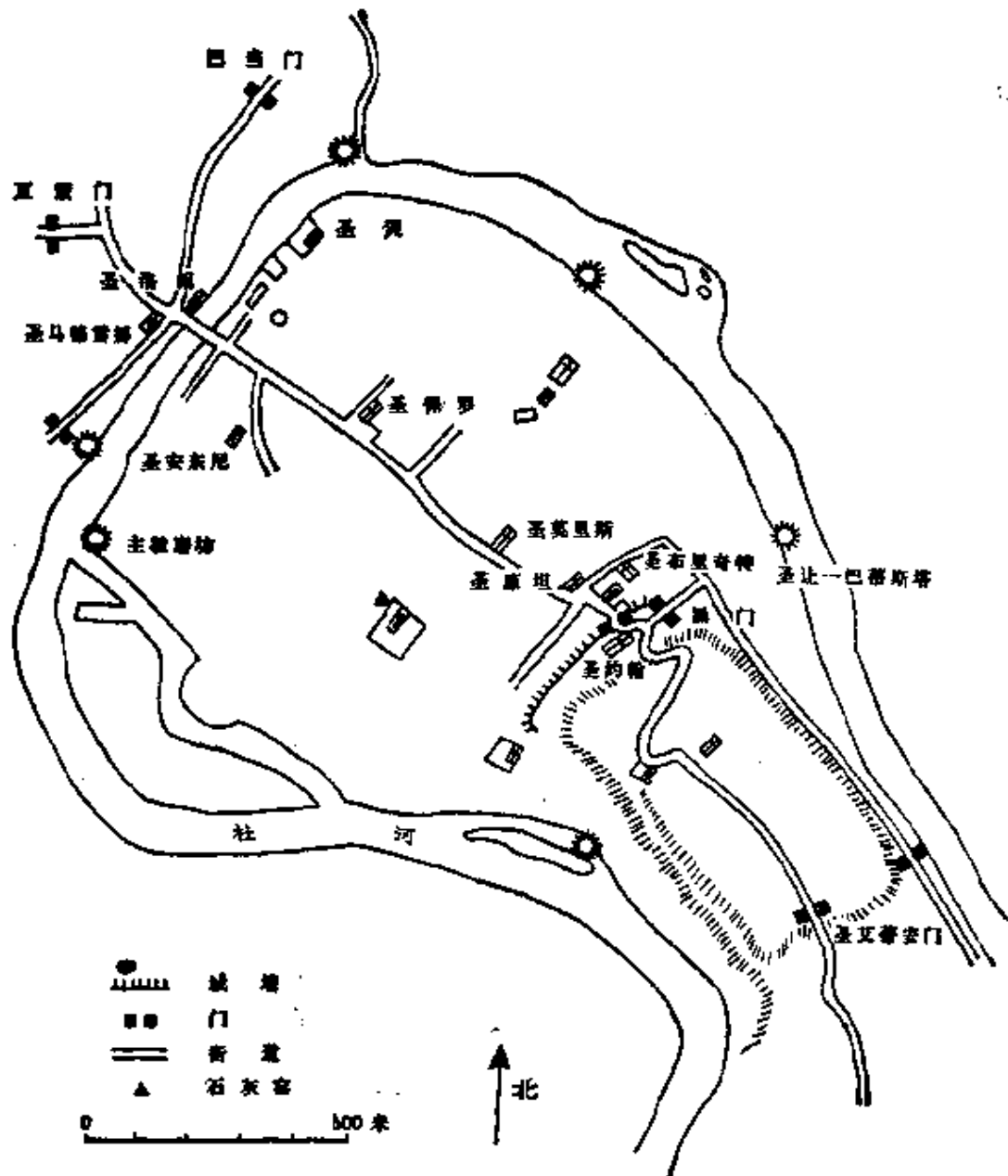


里昂的外来移民(1529至1563年)

本图引自皮埃尔·肖努和里夏尔·加斯贡，《法兰西经济和社会史》第1卷第1分册，1977年版。作为当时欧洲和金融都会，里昂的移民不仅来自整个法国，而且来自包括那不勒斯在内的意大利以及日内瓦、伯尔尼、科隆、慕尼黑乃至尼德兰和伊比利亚的某些城市。

疑是个重要的商业城市。那里的葡萄酒来自坎帕尼亚和拉丁姆地区¹⁶⁶；考古学家曾在杜河河曲发掘出双耳尖底瓮的许多碎片……

但是，除了若干竞技场、集市广场、黑门和贯通南北的大路（相当于今天贝桑松市的“大街”，街道两旁的店铺鳞此栉比，顾客盈门，热闹异常）以外，我们对古罗马时代的维松提奥了解甚少。我们甚至不知道基督教怎样自公元二世纪“由流动的奴隶、古罗马军团的士兵和行商”传到这里以及高卢的其他地方¹⁶⁷。



贝桑松市及其位置

引自克洛德·福伦：《贝桑松的历史》。

关于贝桑松市怎样经历蛮族入侵的黑暗岁月以及随后的墨洛温时代和加洛林时代,我们知道的東西也不多。城市相当富有,因而很早便出现集市;教堂遍布全城,有的建于七世纪(圣艾蒂安教堂、圣莫里斯教堂、圣保罗教堂、圣彼得教堂),其他的建于11世纪(圣安得烈教堂、汝萨穆蒂埃圣母院、圣文森特教堂)。大兴土木更巩固和提高了贝桑松的地位,使该市成为大主教的驻地,具体日期不详。这一事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贝桑松大主教作为全省的宗教领袖,于1041年获皇帝的许可,在市内行使民事权力。

贝桑松市在主教的统治下,天高皇帝远,参与了促进西方于11至13世纪朝着现代化方向迈出第一步的普遍运动。成千上万个新兴城市当时拔地而起,许多旧城市各展异采。也许正由于这种普遍繁荣,贝桑松市几经周折,终于在1290年摆脱了大主教的绝大部分控制,并成功地建立起市镇机构。鲁道夫一世同年发布的宪章实际上使贝桑松成为帝国的一个自由城市,几乎是一个共和制城邦,大主教对城市事务的干预日渐减少,城市有权征税、维持治安、依法判决乃至缔结联盟条约,并从1534年开始轧制印有市徽的货币。

然而,这些成就后来将出现反复;贝桑松虽然仍是孔泰地区的宗教首府,但在政治上和行政上与该省相脱离,因而在省内显得格格不入,用1574年弗鲁瓦萨尔·德·勃鲁瓦西亚院长的话来说,“像是掉进眼里的一根毫毛”¹⁶⁸。结果是让多勒成了法朗什—孔泰的首府,并享有由此带来的种种好处。多勒与贝桑松势均力敌,人口比贝桑松少些,交通条件较为有利,但位置偏离全省的中心。省高等法院于1422年迁往多勒,随后还有一所大学。多勒因此发展了起来。16世纪的一位名叫洛伊·戈吕的历史学家说得好,多勒“拥有最美的桥和最美的塔……最美的钟楼,最美的长矛,最杰出的知识青年,文人学士数量之多在全省高居榜首”¹⁶⁹。多勒人对勃艮第所怀有的乡土感情大概比孔泰其他地方的人更深¹⁷⁰。贝桑松正

是缺少以上有利条件，因而拚力守住既得的城市特权。

贝桑松却是孔泰地区人口最多的城市。1300至1350年间，该市连同“郊区”在内约有居民8 000至9 000人。这在当时已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但市民们又以什么为生呢？教会的产业无疑是依附主教府的教士和法官的经常性收入来源。资产者在城市附近拥有土地。他们全都过着某种早熟的并将持续下去的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

纺纱工、织布工、木匠、鞋匠、鞍具匠、马具匠、制瓦匠、锁匠等工匠人数众多。但是，除了生产的白布于15世纪向阿维尼翁和马赛出口外，工匠们主要为当地顾客服务。面包商、屠宰商和酒店主参与城市的交易活动，货源充足的零售店在通往巴当的大桥两侧排列成行，巴当是贝桑松在杜河右岸设立的附属街区。在13世纪，城市就近利用了香巴尼交易会的国际活动，并通过卢河河谷和茹涅税卡在香巴尼和意大利之间充当中转站。那时候，贝桑松拥有自己的批发商和钱币兑换商，甚至还有外国商人在市内定居。但是，随着香巴尼交易会从14世纪头十年起渐趋衰落，这种繁荣景象也未能维持下去。

贝桑松在丧失这种外力推动后，又于1349年8月和9月遭受黑死病的打击，从此黯然失色。城市的生计当时就靠城门外四周的土地所维持，这一区域确实很大，并且处在城市严格的控制之下，就像某个村庄服从其领主的权威一样。14世纪的一位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这些土地多属石灰质丘陵，“是一片多石的土地，连绵不断的岩石深埋地下，除有少量泥土覆盖外，岩石的顶部暴露在外”¹⁷¹。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只宜种植葡萄。当地生产几种优质葡萄酒，根据其葡萄产自“高坡、中坡或低坡”而分门别类。从葡萄园再往外，有几块麦地，例如在北部的圣费尔热和蒂耶鲁瓦；最后是一块不大的牧区以及一望无际的夏龙兹森林，森林由城市当局管辖，砍

伐的树木经杜河漂送城市。

贝桑松的唯一富源，“城市的真正养料”¹⁷²，就是葡萄酒。每年，在当局选定日期宣布葡萄收获季节开始后，盛装新酒的木桶在嘈杂声中运抵当地便成为众所注目的大事。即使在杜河河曲的环形部分，市内还有大片土地种植蔬菜、水果和葡萄，其中尤以葡萄居多。寺院的“庙产”¹⁷³至少占环形部分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由杜河推动的水力磨坊，除一座外，都归教会所有。

如同所有中世纪城市一样，贝桑松仍散发浓厚的乡村气息；饲养活动无空不入地进入城市；碰上赶集的日子，牲畜遍布街头，使街道更加拥挤；家家户户都喂养家禽、绵羊和猪（但在6月至9月的炎热夏季，禁止在城内养猪；猪在夏季可能被赶到夏龙兹森林放养）。另一个相当说明问题的现象是，性格好动和说话爽直的葡萄种植者至少占居民的一半，甚至四分之三。

结果，城市在其周围得不到足够的粮食和肉。贝桑松依靠上汝拉省源源不断地提供肉食。至于粮食，问题就比较复杂，有时还更费周折。每当格雷地区粮食紧缺——或因经索恩河运往里昂的粮食过多，或因瑞士各州在新粮上市前收购过多——贝桑松断了惯常的粮食来源，它就必须去阿尔萨斯甚至更远的地区购粮。1513年建立的谷仓对预防饥荒将是一个通常行之有效的保障¹⁷⁴。

总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300年左右，贝桑松的控制几乎仅限于自身的辖地范围之内。辖地内仅有几个村庄及零星的农舍，人们不会为此而大惊小怪。所有的城市，无论是巴黎，或是城墙四周由葡萄架守卫的图卢兹，都属于这种情形。城市的郊区就像是那些把村庄团团围住的菜园和果园，除开大小不成比例以外，又有什么不同？郊区近在咫尺，城市伸手可及，不需要集镇在其中撮合，郊区的土地往往直接就在身居城市的地主的眼皮底下。

相反，令人惊奇的是，在离贝桑松较远的外圈，却没有能把中

心城市的影响传往远处的中转集镇和卫星城。贝桑松与多勒、格雷、沃苏勒、萨兰、蓬塔利耶、隆勒索涅等地实际上只有松散的联系。周围的道路穿越汝拉境内的崇山峻岭，让人望而生畏，别处的道路也因维修不善，到处坑坑洼洼，路况甚差。朝南的方向，陆路交通在绍村大森林的“瓶颈”处阻塞。这是法国东部占地最广的林带；直到19世纪，每年还有五、六万头牲畜进入无边无际的橡树丛和榆树林中放养。这片森林就在过去莱茵河穿越布雷斯低地时留下的砂砾堆上生长。最后，杜河河浅水少，不宜通航，只供小木船、小帆船和漂送木柴使用。

贝桑松水路交通不便，又几乎没有良好的陆路，因而不利于它向外部世界广开大门。尤其，立足于本地，贝桑松的日子已经相当好过；对它来说，这就够了。

贝桑松后来将经历许多次波折起伏，但始终没有摆脱这些不利结构的束缚和制约。在15世纪，偏居一隅的贝桑松处境维艰。16世纪将给城市带来解放，带来出人意料的兴旺。城市张开双臂迎接进步时代的到来。勃艮第公国的遗产于1477年分为两块领地，公爵领地划归法兰西国王，伯爵领地最后由哈布斯堡家族所继承（1506年）。孔泰人为其新主子（于1519年称帝的查理五世，还有他的儿子即于1555年接任西班牙国王的菲利普二世）出力效劳，并争得了光荣和利益，因而用夸张一点的话来说，孔泰简直变成了“西班牙的一部分”。两位孔泰人——佩勒诺·德·格朗韦尔及其儿子格朗韦尔主教——曾以这些威望卓著的主人的名义，除统治孔泰外，在“日不落帝国”执掌政柄。

贝桑松在16世纪的崛起，更要归因于一个出人意外的条件，即热那亚的商人兼银行家于1535年在城里落脚¹⁷⁵。他们刚刚经受了一系列不幸遭遇：1528年被法兰西国王赶出里昂，在逃到萨瓦境内的尚贝里后，又遭萨瓦公爵的驱逐，被迫在隆勒索涅举行了主显节

交易会，他们终于取得皇帝和贝桑松市的准许，于1535年来到该市定居。热那亚人在贝桑松可以通过中间人继续暗中经商。我还认为，1560至1570年里昂的衰落使他们获得了更大的活动余地。总之，在他们与城市当局发生纠纷，于1568年离开贝桑松后，他们先后在波利尼和尚贝里暂住；从1579年起，他们的交易会一跃而成为欧洲的金融和信贷中心，其地点虽设在意大利的皮亚琴察，但仍以“贝桑松交易会”命名。

由于多项条件的凑合，贝桑松一度为16世纪最具实力的金融家充当掩蔽所。此事对贝桑松并非没有好处：城市的面貌顷刻间发生了变化。市内陆续建起了格朗韦尔宫、市政厅、蒙马兰府邸、蓬瓦洛府邸等建筑。一些富人从蒙彼利埃、丰特努瓦昂孚日、吕克瑟伊、隆勒索涅等地举家迁来这里¹⁷⁶。

可是，到了下个世纪，“灾难深重的”17世纪，不幸又再次降临。战争、瘟疫、饥荒在贝桑松周围游荡。气尽财穷的西班牙竟把孔泰省和贝桑松抛弃不顾，任其自生自灭。这为法兰西征服该省事先提供了方便：战事于1668年挑起，同年即以缔结亚琛和约而告停止；法军仓促撤退，抛弃了他们在当地的同党，留下了许多难解的怨怼和仇恨。但在六年以后，征服行动再次开始，虽然困难，但终究达到了目的。1674年5月，路易十四御驾亲征，调集恩吉安公爵的军队围攻贝桑松城，法军发射二万枚炮弹制伏了抵抗。5月10日，为避免横遭洗劫，城市终于宣布投降。

一个自由城市或几乎自由的城市在现代国家的面前屈膝投降，这种事件虽然屡见不鲜，但也动人心弦：在欧洲各地，有多少城邦就这样被吞噬！几年以后，施特拉斯堡同样被路易十四所占领（1681年9月29日），可说是另一个例子。在贝桑松，法国占领孔泰和建立政权只意味着真戏刚刚开场。法方审慎从事，一再让步，但收效甚微；农民开展了游击战；公众怀着希望和恐惧，等待西班牙

人卷土重来。特别在1675年，帝国军队暂时占领了阿尔萨斯以后，市民们更是群情振奋。法国当局有条不紊地在市内建立政权，甚至不惜使用暴力。路易十四的君主政体在当时是一台十分完善的统治机器¹⁷⁸。

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显然是贝桑松从此取得的新的平衡。这个城市的被兼并确实具有双重意义：它无疑被并入了法国的版图，但它从此也成为法郎什—孔泰的组成部分，而在这以前，它与后者总是有点格格不入。在1664年，经帝国政府的同意，西班牙虽然曾把贝桑松市划归孔泰省，并让该市在四周扩大其辖地（共100个村庄），但除扩大辖地外，以上措施仍是一纸空文。1678年奈梅亨和约正式宣布贝桑松并入法国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路易十四的政府首先确立了贝桑松的省城地位，把原来设在多勒的高等法院迁往该市，并创设了一个初等法院、一个中等法院和一系列非常法庭（货币，水面和森林，商事裁判）。城市还接纳了一所大学，迎来了巡按使和军事总督，最后还有一支强大的驻军。法国当局为恢复全省秩序而决定把省城设在贝桑松，原因在于贝桑松是全省人口最多和最富有的城市，特别是最强大和最利防守的城市。城市的地理位置又一次决定了城市的命运。

贝桑松因其地位的改变而有所得益，即使如此，我们切莫把这看作出自王国政府的恩赐。在完成征服以后，政府就要当地服从命令和缴纳捐税。贝桑松为高等法院的易地迁址付了一笔30万里佛的贡金，既出于自愿，又是一种勒索。路易十四政府不顾公众的强烈反对，于1692年在该省推行胥吏捐买制度。

法国占领后不久出现的真正的新变化，恰巧是各种官吏拥入贝桑松古城；官吏总数约在500人左右，连同家属可能达2 000人：“市内唯有葡萄种植者可自夸人数更多。”¹⁷⁹力求维护其特权的食利者阶级纷纷想在高等法院谋得一官半职，借此平步青云，既然孔

泰省三级会议不再举行，高等法院便被认为是全省的代表机构，他们也就把自己的特权与全省的特权和利益相混同。这一切势必助长了城市中那种悠闲懒散、浑噩寄生的风尚。

然而，这在贝桑松的历史上是首次成为本地区的都城。省城的地位意味着，贝桑松从此既要利用与其自身的生活紧密结合的周围一圈集镇和小城市，同时又要为它们服务。这一演变过程相当缓慢。几项见证可以显示过程的不同阶段。1735年，有人说：“贝桑松不是个殷实的商业城市……贸易很不发达，仅限于衣着食物和家庭日用消费品。居民向本省商人购买这些货物”，间或也光顾集市的流动摊贩。1747年听到的反应与上相同。萨瓦里的《贸易辞典》1765年指出，位于索恩河通航段起点的格雷是孔泰省最活跃的商埠。到了1785年，似乎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一份回忆录提到，贝桑松当时以经商为业者“人数甚多：有25家商号的名称可被举出”，另有二、三家商号专做批发生意，“从王国境内运来大宗货物，转买给各小城市的零售商”。贝桑松至此终于成了四周小城镇的货物集散中心。再补充一个证据：贝桑松也已变成了一个活跃的汇兑中心，“几乎全省所需的汇票，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与它有联系”¹⁸⁰。在全欧范围内，贝桑松的金融活动虽说微不足道，但它已与施特拉斯堡、巴塞尔、法兰克福、荷兰乃至英国建立了银行业务联系。最后，贝桑松在工业方面初试锋芒，特别是新建的针织业颇见成效。

对于这些进步，应该作何解释？这要归功于18世纪的经济增长和普遍富裕。尤其，全省陆路交通的改善，无疑是王国政府送给孔泰最好的礼物。1740年8月8日的一封官方信件使我们得知，“路况完好的道路长达75 000托瓦兹，因而如今在省内可疾步快行，四通八达，而在筑路以前，人们通过山区和沼泽，总是担惊受怕，而且一年仅有几个月时间可从事旅行”¹⁸¹。18世纪中期，定期

邮车每天在贝桑松和第戎之间往返，邮件经第戎可转发巴黎。每周各有一班邮车，分赴南锡、贝尔福、施特拉斯堡和巴塞尔。

另一个十分特殊的情形也必须注意到，就是说，法郎什—孔泰“向以外国著称”，领土的四周关卡林立，无论面对王国的其他地区或面对瑞士各州，都莫不如此。总之，离心倾向表现在各个方面。这给该省带来某种不便，甚至造成商业乏力，“但在另一方面，却在贝桑松周围产生趋极现象”¹⁸²，从而使贝桑松成为某种小型民族市场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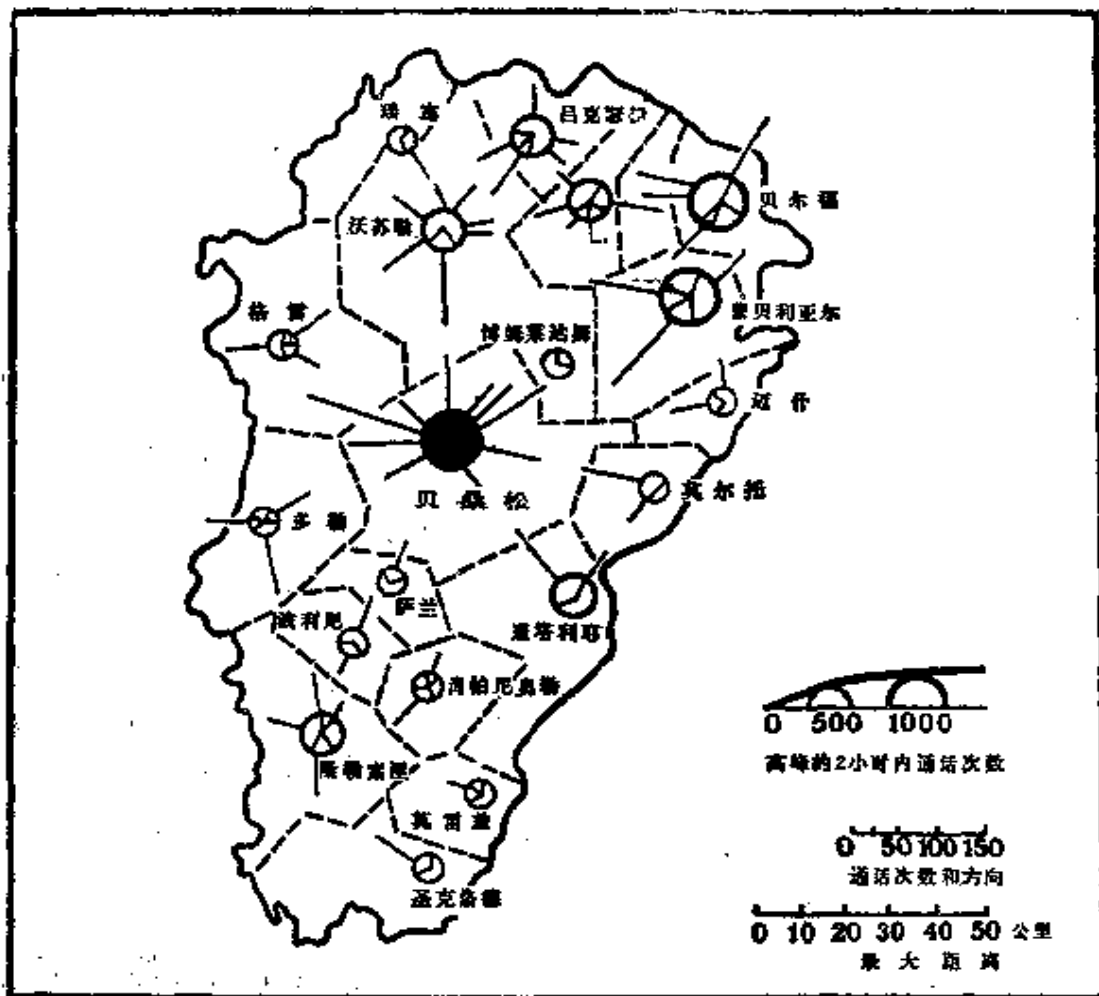
这的确是个相当狭小的市场：1710年左右，在15 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民仅有34 0720人，其中贝桑松11 520人；萨兰5 663人；多勒4 115人；格雷3 982人；阿尔布瓦3 340人；波利尼3 320人；蒙贝利亚尔2 540人；蓬塔利耶2 664人；沃苏勒2 225人；隆勒索涅1 922人；圣克洛德1 745人；奥尔南1 632人；博姆莱达姆990人；奥热莱532人；坎热470人¹⁸³。如果以2 000名居民为起点计算，城市人口在法郎什—孔泰总人口中的比例特别低，勉强占11.5%。总之，该省不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经济区。但在18世纪末，城市人口将达到450 000人，增长率为32%，贝桑松市的增长率则为75.6%（1788年共有居民20 228人）。孔泰地区其他城市的居民同年分别是，萨兰6 630人；多勒7 774人；格雷4 784人；阿尔布瓦5 902人；蓬塔利耶3 042人；隆勒索涅6 500人；圣克洛德3 640人；沃苏勒5 200人；博姆莱达姆2 080人；奥热莱1 274人；坎热1 846人¹⁸⁴。至于蒙贝利亚尔、波尔尼和奥尔南等地的人口数字，文献资料没有作出记载，但肯定也有所增长。尤其，贝桑松不论如何演变，它对其他城市的影响并不平衡。如同过去一样，它在汝拉省中部的影响比在汝拉省北部更加根深蒂固；高等法院的法官和贝桑松的商人在汝拉省中部拥有土地、锻铁工场、高炉、造纸工场等。位于萨兰至蓬塔利耶一线以南的汝拉省南部地区则几乎完全不受贝桑松的控制。

贝桑松晚至18世纪末才在本地区逐渐扩展影响，这里多少有一点人为的因素；人们可以认为，这一发展很少是自发的，而是由外力推动的，因为贝桑松的优势地位为期十分短暂。大革命对它是个致命的打击，贝桑松一下丧失了高等法院、巡按使以及各个宗教团体……

尽管瑞士工匠于1793年传来了钟表制造业（最初困难重重，很久以后才逐渐兴旺起来）；尽管经济活动在1810年后有所复苏，尽管在七月王朝期间修建了新的道路和开凿了罗讷河至莱茵河的运河，从而使贸易重现生机（但输入法国南方的葡萄酒将逐渐扼杀本省的葡萄种植），尽管重兵驻境带来了虚假的繁荣，贝桑松同法国其他城市相比却是显得无精打采，不断在走下坡路。在法国的城市排名中，贝桑松从1801年的第18位降到1851年的第25位。用圣贝夫的话来说，“城里挤满了公务员，显得死气沉沉”¹⁸⁵。巴尔扎克“用三言两语”对此作出了解释：“没有一个城市像贝桑松那样不声不响地在暗中抵制进步”¹⁸⁶。

其实，贝桑松真是打错了算盘。它的主要不利条件——陆路交通困难——本可以通过发展铁路而消除。从1840年起，贝桑松才想到抓住这张王牌。但经过多次努力，仍告失败。它被第戎和多勒所排挤，以瓦洛布和辛普朗的干线为轴心的铁路网把巴黎同瑞士、意大利和巴尔干连接了起来，而贝桑松却被排除在铁路交通之外，丧失了对外大批输送货物的可能。直到1960年，贝桑松和巴黎之间每天只有一班直达火车。

这一创巨痛深的失败是贝桑松市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尽管该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出现了急剧和空前的发展（人口于1960年达到10万），它始终未能变成一个重要的商业都会。除了铁路运输不便、公路曲折崎岖（车辆不能迅速通行，至今没有高速公路）等不利条件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南锡、米卢斯、第戎、里



贝桑松四周的电话联系(1956至1958年)

转引自《贝桑松史》。

昂等邻近城市早已向四周扩展影响。贝桑松下属的行政辖区甚至也受到这些邻近城市的争夺，1956至1958年间为该地区绘制的一张电话联系图足以为证¹⁸⁷。尽管距离不远，又有行政联系，而在实际上，“贝桑松同多勒或格雷的关系似乎不比第戎更加亲近，同圣克洛德的关系不比里昂更加亲近，同吕克瑟伊的关系不比南锡更加亲近，如此等等”。贝桑松原是军事隘口，一系列偶然机遇使它享有丰厚的息金，再加上当地的葡萄种植长期给它提供可靠的收益，它势必一贯以小康生活为满足，没有过高的雄心壮志。

贝桑松的历史究竟有没有意义？是否具有“举一反三”的价

值？它告诉我们一个普通的、基本的道理：一个城市就像某种大型集镇那样，能够依靠自身及其辖地而存在，不论是否受命运所迫。尤其，只是在外界条件的协助下，贝桑松才脱离了蜗居生活，这种脱离多少是人为的，决不是一劳永逸的。

位于十字路口的罗阿讷平原

从贝桑松出发，先穿过索恩地区，后经由里昂，只要再走上86公里，过了塔拉尔，即可到达罗阿讷，这里已是中央高原的中部，各方面的环境都与杜河流域和汝拉地区不同。这个小城市将为我们充当第二个例子，生动有趣的例子；它也相当复杂，足以提出好几个问题，但同前一个例子相比，毕竟比较简单。实际上，只是晚至15世纪末，罗阿讷才变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城市，它的福运主要与卢瓦尔河的航运有关。在这里，外在条件，外部因素，曾起了主导作用。

罗阿讷平原位于福雷地区的北部，这类自成气候的小天地在法国该有几百个之多。当地出生的人或从外地迁来的人对这块福地无不交口赞誉；奥诺雷·杜尔菲以罗阿讷平原为背景，写下了他的小说《阿斯特雷》（1610—1627年），把当地的环境描写为某种人间天堂。热情的赞美未免言过其实。这就像过去有人断言，沿卢瓦尔河和利尼翁河逆流而上的鲑鱼在遥远的上游沿岸每天都可钓到一样。

罗阿讷地区是块宽30公里、长50公里的小平原，过去是个瘴疠流行、“死水一潭”的沼泽地，奥诺雷·杜尔菲也曾承认，到处布满了“深不可测的大水坑”¹⁸⁸。天然的或人工的鱼塘¹⁸⁹占地面积达几千公顷，鱼塘主日夜警惕，常备不懈，而偷捕鱼者则寻找机会打开闸门，放干池水，借以捕捞大批鱼货，或只是对鱼塘主泄愤¹⁹⁰。此外还有大江、小溪以及水流湍急、动辄泛滥成灾的卢瓦尔河；在炎热的夏季，卢瓦尔河“几乎到处都可涉水而过”¹⁹¹，但洪水一到，就

迅速没过河岸，洪峰的水位比枯水期高出2至3米，有时达到5米，1790年11月12日甚至达到7米¹⁹²。河流的主航道、沙滩、岛屿以及有时移动位置的河汊在平原上形成一道开阔的缺口，其宽度从不少于1.5公里；建在河中一座岛屿上的德西兹市，宽达5米¹⁹³。除开这些自然条件以外，还要看到人的因素。人们在收割后总是挖掘排水沟，把挖出的泥土堆在田埂上；更何况，耕犁也把泥土带到地边，接着又被抛上田埂，各块田地全都成了积水的水盆¹⁹⁴。

罗阿讷长期是个“背靠教堂”和城堡的村庄，位于卢瓦尔河的左岸，民房座落在—块古老的河成阶地之上，高出危险的河水10至15米。卢瓦尔河的洪水极其危险，冲垮河上陆续架起的木桥，简直易如反掌；罗阿讷于1854年¹⁹⁵才有一座坚固的石桥，德西兹和讷韦尔却比它早走了一步¹⁹⁶。但在1687年，德西兹的两座桥，“法国最美的两座桥”，一座倒塌后被危险的渡船所替代，另一座不久前刚塌了一个桥拱¹⁹⁷。卢瓦尔河的河水真可谓反复无常，尤其因为河道经常可以涉水而过。罗阿讷中级法院的官员断断续续地、千篇一律地记录潮水死亡事故，尸体被冲上河岸，个别的被人认出——如赶着羊群过卢瓦尔河时突然遇到洪水袭击的这位羊倌——多数仍身份不明¹⁹⁸。

在水网交织的平原地区，陆路交通势必十分困难：数量甚少的车辆，而且如同在奥弗涅一样，用牛套车；驮重的牲畜；“肩扛背负”的人……

由于粮食生产（小麦、黑麦、大麦、燕麦）不够当地的消费，罗阿讷平原始终处于不平衡状态¹⁹⁹。大地主自动搬到小城市附近居住，依赖辛苦劳作的佃农为生²⁰⁰，但由于土地贫瘠，收效甚微²⁰¹。除少数近期冲积层外，平原由砂土地或粘土地所组成，二者除充当制砖原料外，往往别无用处。唯独草地生长茂盛，那也并不容易！一句古谚提醒人们注意：“如果地上生长的草已能使你养家糊口，

你千万不可辜负它的养育之恩而再去耕耘。”²⁰²。

此外,这块平原上瘴疠蔓延,死亡率很高。人口稀少是乡村的严重缺点,从4月到秋季,乡村里的热病流行,农民很少能得以幸免”²⁰³。18世纪末,人们把这归罪于“空气污浊”,而污浊又由定期抽干池塘,进行耕作,三年后重新灌水所造成;事情是否果真如此,我们姑且存疑。但可以肯定的是,疟疾在当地猖獗为害,到了炎热的夏季,富人纷纷去附近的山地避暑。

罗阿讷平原三面与海拔甚高的地区相接壤:东侧的博若莱山高1 012米;西侧的马德莱娜山高1 165米,南侧的讷利斯高地则在岸海拔500至600米之间。卢瓦尔河在穿过高地时,河身下陷,夹在两的峭壁之间,呈现一道深达200米的狭长峡谷(最近决定在这里建造水坝,以制服该河的突发性洪水)²⁰⁴。讷利斯高地在费尔和蒙布里松呈脊状隆起,成为罗阿讷平原和福雷平原的天然界线。当你坐车过了费尔后再往北行,路面出现陡坡,路标(用几国文字写成)赶紧告诉你注意踩住车刹。在北面,罗阿讷平原仅在伊格朗德和圣博内—德克雷与沙罗莱—布里奥莱丘陵“擦肩而过”²⁰⁵,顺畅地与波旁地区的平原连成一片。

罗阿讷平原东侧和西侧的两块山区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那里的人口长期过剩,可为平原经济补充劳动力的不足(每到冬季,他们前来平原打短工,协助分成制农庄的长工挖沟)。但在山上,这些壮汉却作为小自耕农,各行其是地独立生活。他们在大革命期间狂热地拥戴神甫,在帝国期间则坚决反对大举征兵。高山为顽固派神甫和逃避兵役的农民提供“可靠的藏身之地”²⁰⁶,有谁会去山里把他们捉拿归案呢?

这里还要在马德莱娜山和博若莱山之间作一区分。博若莱山在罗阿讷一侧不种葡萄。博若莱的葡萄树位于索恩河上方的相当陡峭的东侧坡地,而在逐级下降的罗阿讷一侧坡地,则以大片森林

为主，另有四周被枝叶茂盛的山楂树围住的草场。在这里向罗阿讷方向望去，几乎看不见制高点，特别在云雾缭绕的天气。在这一侧山坡，畜牧业的发展胜过种植业，历来展现树篱成行、草地成片的景色，总的说来，土地相当肥沃。也许正因为如此，纺织工业于19世纪在库尔至昂普勒皮和帕尼西耶尔一带取得了广泛的发展。当地与里昂联系比较方便，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马德莱娜山的情形十分不同，险峻的山峰屹立在西边的地平线上。山坡相当陡峭，朝平原方向倾注湍急的水流，奔腾澎湃、夹带泥沙的急流无疑把卢瓦尔河推向博若莱山；罗阿讷平原在河流两边因而显得有点不对称，城市后来将选择向卢瓦尔河西岸发展。这些短促的水流在马德莱娜山穿过狭窄的峡谷，给过路人造成不少困难。这里过去曾是“剪径贼”²⁰⁷拦路抢劫的天然场所。

然而，在海拔400米左右的斜坡上，阳光充足，土质适宜，密密麻麻地种着一排又一排葡萄树。一些大村庄由此应运而生，它们的产品信誉尚佳：例如勒奈松、圣罗曼·拉莫特、圣日耳曼—莱斯皮纳斯、圣福尔曼等地的葡萄酒；诺阿耶的葡萄酒又称“加朗波酒”，“色泽光亮如覆盆子”，普伊莱诺南的白葡萄酒“口味浓郁，兼有水果的醇香”……这些细节是我在17世纪的一位神甫那里借鉴得来的²⁰⁸。如果要从这些葡萄酒里选出最好的一种，他说，“那就要让在巴黎和里昂之间往返赶车的信使和驿差作出评断〔这条大路显然经过罗阿讷〕，他们嗜酒如命，是品酒的行家里手”，对品评各种葡萄酒的优劣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

到了18世纪，勒奈松的大集镇已成为罗阿讷葡萄酒的重要市场，货物大批运销巴黎，“在巴黎以阿尔梅松酒而著称”。据一份官方报告说，“阿尔梅松酒色泽红润，被用来为安茹等地的白葡萄酒上色。酒的品质不高，如果调配得当，也还可算是一种不错的普通葡萄酒”²⁰⁹。确实，在巴黎人眼里，同1720年开始大批上市的博若

莱酒相比，罗阿讷的葡萄酒低了一个档次²¹⁰。葡萄酒出口毕竟使罗阿讷的贸易收支恢复平衡，葡萄生产直到19世纪中叶仍有所发展：1809年的葡萄酒产量达到26万公升²¹¹。如同在贝桑松等地一样，“铁路的出现导致了衰落”，因为不可能抗拒南方葡萄酒的竞争²¹²。葡萄种植虽然从此减少，但至今也还没有完全消失。

“罗阿讷山坡”的葡萄不超过一定的海拔高度。在葡萄园上方，到处是成群的橡树、山毛榉和栗树，这些树种今天越来越受到“以高收益著称”的松属树种的竞争。在更高的山顶上，森林被“茅蒿丛生、死水淤积”的辽阔草地所取代，就像孚日地区的高山牧场一样，“湿生植被四处可见，牛不慎陷进泥坑，深可及膝”²¹³。

今天，用山毛榉木制成的木屐已被废弃，泥炭也逐渐不再使用，当地的葡萄种植多半已经衰落，农业人口普遍下降，这一切都是对山区的沉重打击，造成了山区居民不断外流。现代的农业和活跃的工业使平原价值倍增，平原的地位从此超过了山区。这块平原至今为过往行人展现一片“水草丰盛、牲畜肥壮”的美丽景色，沟渠纵横，绿树成荫，使环境变得更加整洁，高大的房屋，屋顶呈四个斜面下垂，一色的土墙，门窗都用当地的黄色石条为框架……

不用多说，无论过去和现在，对罗阿讷平原的评价不能着眼于它本身，还要看到法国各地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慢慢提高了罗阿讷平原的价值，并最终使罗阿讷交了好运。就在卢瓦尔河的两侧，并列着互为补充的两个世界：法国北方和法国南方。罗阿讷平原恰巧就位于这个接合部位，因而奥依方言和奥克方言竟各据该平原的北部（其中包括罗阿讷城）和南部！

法国的这两大部分在货物、人员、文化财富等方面互相交流。两条大路很早为这些交流提供了条件：第一条路取道罗讷河—索恩河沿线，经由阿尔、阿维尼翁、奥朗日到里昂，在建于1190年以前的拉吉约蒂埃桥越过罗讷河，再从索恩河谷朝莱茵地区、香巴尼和

巴黎方向前进；第二条路取道阿列河谷；商人们从艾格莫尔特或蒙彼利埃启程，到达尼姆、阿莱斯、勒皮、蒙费朗后，继续向北进发。

后来，在14世纪，开始出现第三条道路，该路也从勒皮出发，沿卢瓦尔河上游抵达福雷地区，经圣日耳曼—拉瓦勒（绕过罗阿讷），与讷韦尔相会合……

一系列横向支线与这些贯穿南北的大动脉相连接，支线往西伸向奥弗涅地区，往东抵达索恩河谷。

道路与城市是互为补充的一个整体。随着陆路运输于14世纪日趋活跃，罗阿讷平原陆续出现了一些新兴城市，而在这以前，当地只有一座贵族城堡，难得能见到一座修道院，条件相当不利。新兴城市顺利地取得了免税特权。不论有无城墙，它们陆续开办集市，分别聚集居民1 000至3 000人，这在当时为数已相当可观；它们是维勒雷、圣昂勒沙泰勒、圣日耳曼—拉瓦勒（交通枢纽）、塞尔维埃尔、圣瑞斯特—昂舍瓦莱、勒克罗泽、内龙德和沙尔略；在所有这些新兴城市中，位于卢瓦尔河右岸的沙尔略起步最早，经济也最活跃，是里昂通往巴黎的“法兰西大道”同与贝尔维尔并排的横向大路连接卢瓦尔河和索恩河的交叉点。紧贴布里奥内地区（境内有不少罗马式教堂）的这个大城市至今保存着往昔荣华的见证，例如建于12世纪的教堂前廊是早已被破坏的一座修道院留下的遗物。

罗阿讷或运输的胜利

直到14世纪，罗阿讷同周围的这些小城市相比，还只是一个人口不足400人的村庄。到了15世纪末，即百年战争的前夕，它才出现第一次突飞猛进。它是否掌握了什么重要的王牌？在罗阿讷境内，冲出维勒雷峡谷和穿越讷利斯高原的卢瓦尔河可通航运，开始“顺水行船”²¹⁴。查理七世的财政总监雅克·科尔（1395—1456年）一眼发现了这一有利条件；在他晋升为领主以后，雅克·科尔对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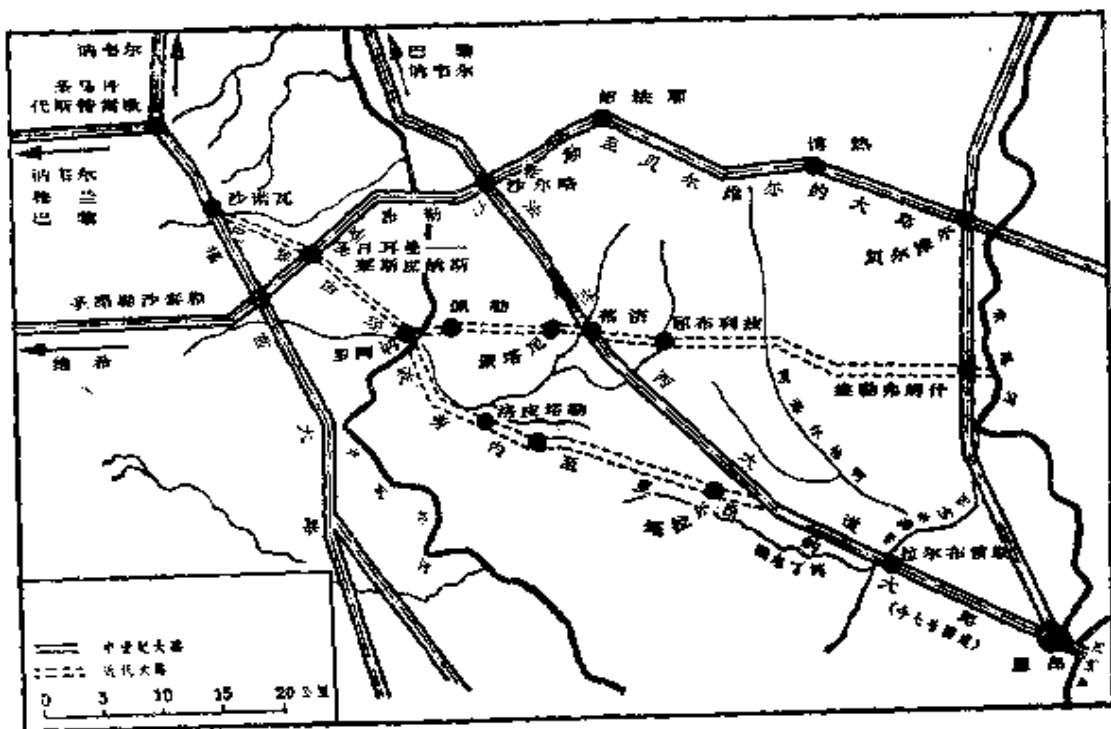
阿讷平原的铁矿、铜矿和铅银矿发生兴趣。由于矿砂需运往贝里、奥尔良、图尔等地区的冶炼工场，他怎么会不被位于卢瓦尔河畔的罗阿讷所吸引呢？他特意从贝里地区派遣造船工人去罗阿讷，此外还派去了船夫：有人认为，这些船夫是后来在罗阿讷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喜欢闹事、争吵乃至斗殴的那群水手的祖先²¹⁵。但是，雅克·科尔的干预为时甚短，不宜夸大他的作用。

罗阿讷的“起飞”实际上将在晚些时候方才出现，这里有两个很明显的理由。

第一条也是主要的理由，里昂与巴黎的远程联系，即罗讷河、卢瓦尔河和塞纳河的联系，发展十分缓慢。罗阿讷则随着这种联系的发展逐渐成长壮大。在法兰西经济生活中，巴黎几个世纪以来始终是个权力的磁极和富有号召力的中心；里昂从路易十一于1463年允许它开办交易会的那天起，一跃而上升到现代化大城市的地位。当然，两极之间的联系并非必须等200年以后布里亚尔运河开通时才达到相对的完善：这条运河将在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之间改变那种把货物卸下船只、改用车运的旧办法。

第二条理由是索恩河和卢瓦尔河在博若莱山区开辟了一条有利于罗阿讷的联系通道（其原因与罗阿讷的意愿没有丝毫关系）。直到15世纪为止，两河之间的联系以贝尔维尔为起点（贝尔维尔是博若在索恩河畔的港口），经山间栈道前往沙尔略（我们已讲过这个交叉路口的作用）。但在15世纪，维勒弗朗什正逐渐取代博若作为博若莱地区的中心地位，在变成了索恩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桥头堡以后，维勒弗朗什开始优先使用通往罗阿讷的另一条山间栈道。过后不久，里昂的货物将不再走直接通往奈韦尔和巴黎的“法兰西大道”，而是通过修筑新路，经塔拉尔运到罗阿讷的装卸码头。此事将于1449年完成²¹⁶。（见第170页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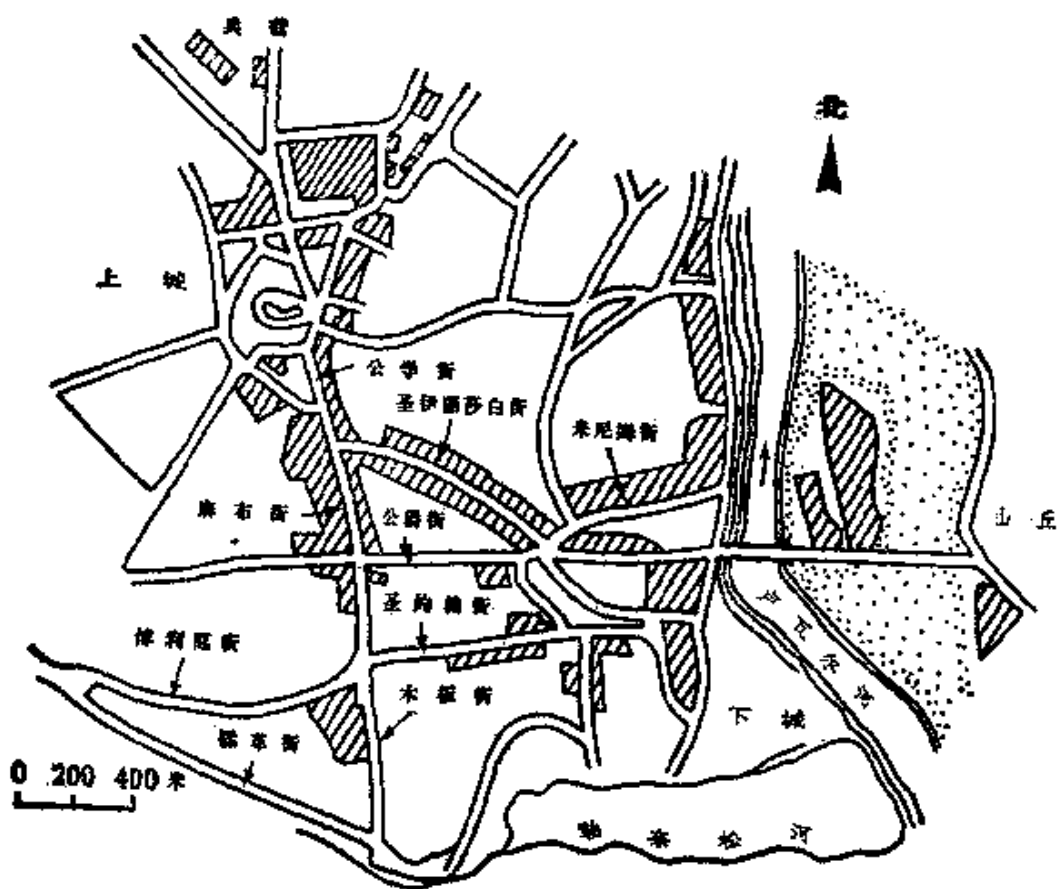
今天在七号国家高速公路驾车飞驰的人很难想象往昔陆路交



沙尔略的货运被罗阿讷所夺走

通的困难。在当时，几乎沿着同一条路线，人们沿着莱茵河谷和图尔丁河谷前进，穿过野人山口，后者屹立在卢瓦尔河和罗纳河之间的分水岭上²¹⁷。艾利·勃拉肯豪费讲述说：这条山路过去“十分难走，实际上并非因为山高，而是因为路途崎岖曲折，时而顺坡直下，时而向上攀登”；我们掌握着17世纪施特拉斯堡的这位旅行家的旅行日记。法国驻罗马大使丰泰恩侯爵与他一起乘坐“一辆装有玻璃窗的四轮马车”，拉车的6匹白马很快沾得满身都是黄泥，在过了塔拉尔以后，不得不“改用8头黄牛套车，以利行车的方便”。这是在1644年发生的事。但是，直到大革命前夕，尽管18世纪的道路有了许多进步，人们为翻越塔拉尔山，仍用黄牛拖拉驿车²¹⁸！当时在罗纳河和卢瓦尔河之间运输货物该有多少困难，由此也就可想而知。几乎应该说是一大壮举。

卢瓦尔河上的航运不是也同样困难的吗？从今天的情形看，



18世纪中叶的罗阿纳市

卢瓦尔河已被河堤所驯伏，两岸分布着沙滩、草木、浮动的残骸以及各种冲积物，人们怎会怀疑它往日竟是一条狂暴而又布满小船的河流！一位想象力很丰富的历史学家甚至说，卢瓦尔河“从未真正通航”²¹⁹。弗朗斯瓦·比亚库瓦则认为：“卢瓦尔河上船舶运输的生命力，原因主要不在于自然条件的配合，而在于人的意愿。”这话说得多么好啊！

此事关系重大：对卢瓦尔河上游来说，再没有比确保一大部分南北水陆贸易更重要的事了。五金用品、武器、纺织品（棉、毛、丝）、服饰用品以及杏仁、榛子、食油、无花果、橄榄、柠檬、葡萄、软木瓶塞、成桶的奶酪等成千种南方产品源源不断地从罗讷河谷运来。此外还要加上包括棉花在内的东地中海产品或意大利产品。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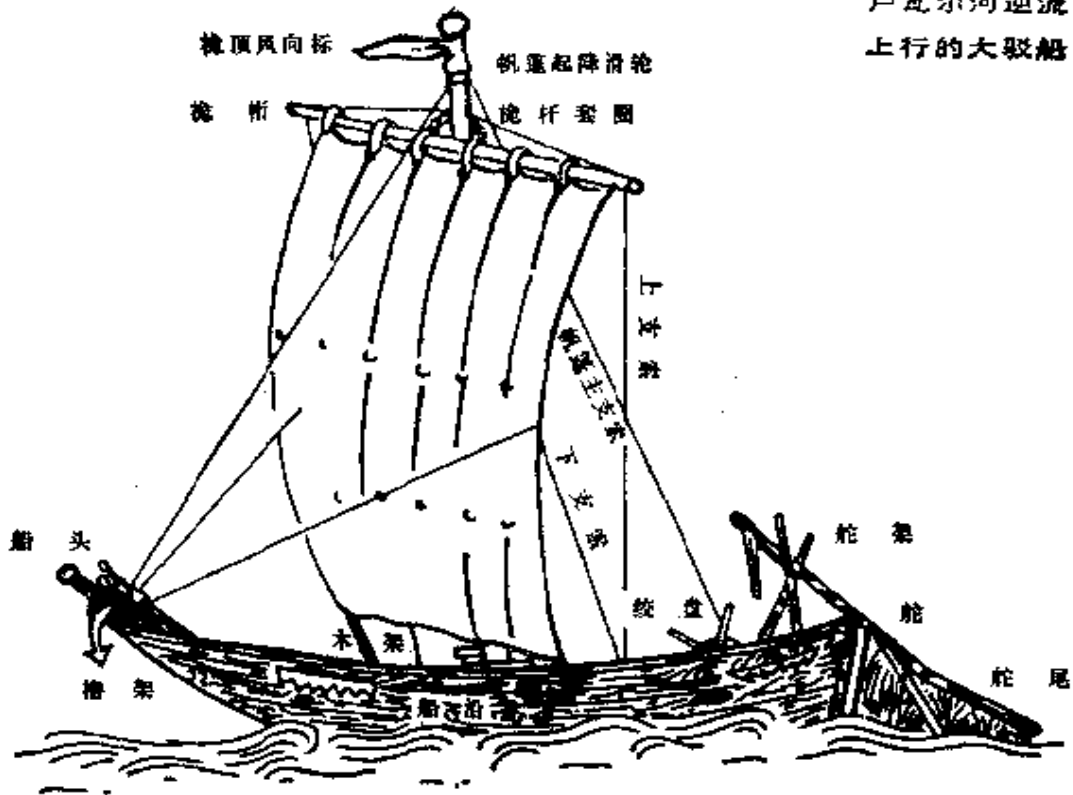
里昂为转运中心运出的货物更是多种多样。人们看到，亚眠的呢料有时就经索恩河运到罗阿讷，然后再同其他商品一起，运销卢瓦尔河沿岸各地²²⁰。还有奥弗涅地区的产品，经阿列河运往外地；阿普勒蒙或沃尔维克的石料；梯也尔和昂贝尔的磨石、砖瓦和纸张（于17世纪经由南特远销西班牙）；波旁地区的秸杆、葡萄酒、木梁、水果、木炭、泥炭；甚至还有17世纪以来深受巴黎人青睐的维希矿泉水²²¹。

朝另一个方向，逆流而上的货运量较少，而且货物往往较轻：茜草、木炭、桶装鲱鱼、织物、美洲的糖和咖啡……但大西洋的盐也逆水运往上游地区，有时甚至利用阿列河的部分河段。作为重货的小麦，每当谷物歉收，也必定用船运输。由于谷物在罗阿讷平原每年供不应求，有时就靠卢瓦尔河流域通往普瓦图、博斯、奥弗涅的陆路供应，甚至通过大西洋的港口。例如，1562年的收成很糟，但“因卢瓦尔河1653年1月已经化冻，满载小麦、黑麦、豌豆、蚕豆、梨、果酱等货物的许多船只，开到卢瓦尔河从奥尔良到罗阿讷的所有港口，向居民提供食品；有的〔指的是谷物，当然不是船〕据说来自波兰王国”²²²。1529、1531和1543年，里昂出现饥馑，博斯地区的小麦用船运到罗阿讷，再用两轮货车转运里昂²²³。1709年，各地普遍缺粮；人们在同一些道路上看到成队的运粮船从奥尔良启航，供应多菲内部队的军需²²⁴。

在另一个方面，在马赛卸船的东地中海谷物有时先运到罗阿讷，然后再转送巴黎。1710年的情形正是这样。我们正好可乘机估算里昂和罗阿讷之间的陆路运输量²²⁵。最好的办法是列举历史文献向我们提供的具体数据，但这就要我们像小学生一样，把很久前学过的那些容易让人上当的基本算术题仔细地重新叙述一遍。与此同时，我将用方括号和着重号穿插作必要的说明。

“里昂四郊的堂区〔指的是村庄〕，在靠山的一侧〔即西侧〕，通

卢瓦尔河逆流
上行的大驳船



卢瓦尔河上的大驳船

驳船装有帆、舵、桅架(齿状木块,固定在船身前方和后方的两侧,可插入一根木棍,加快船只的航速)和绞盘(可起降桅杆的船篷)。参见G.比东:《卢瓦尔河的船只》1972至1976年版。

常可提供600名牛车夫,每人每星期只能去塔拉尔〔即占全程的三分之一〕跑一趟运输,因为他们无论在里昂装车和前往塔拉尔,或在塔拉尔卸车〔这里可以看到,货物需要转运〕和返回里昂,都用6天时间,第7天为星期天,牛车夫不工作。因此,里昂每天有100名牛车夫装车〔装100辆车〕,每车各载重8公担²²⁶。100名牛车夫就运800公担,按每塞蒂埃重230斤计算,折合374塞蒂埃小麦。从塔拉尔到圣西福里安以及从圣西福里安到罗阿讷,每天也都有600名牛车夫从事运输〔原文如此〕。每星期因此都有2 244塞蒂埃小麦从里昂运到罗阿讷,折合187姆伊。在贝尔维尔到卢瓦尔河畔普伊

的路上〔原文如此〕,每天的车运量为150塞蒂埃小麦。每星期就运900塞蒂埃,折合75姆伊。总计〔187 + 75〕262姆伊。由于节庆日同星期天一样,牛车夫都不赶车,估计可把总数减低到250姆伊。”

读者如果有耐心逐字逐句地读完以上材料,就会发现这是农民利用剩余劳动力从事的定期运输活动:1 800辆牛车慢吞吞地排队前进(每天行程约14公里),每隔7公里为一站,也就是说,在每公里路上,都有20辆车在上坡或下坡,车与车的平均间隔仅50米!我们今天开汽车外出,往往为路上有太多的卡车需要超车或交车而抱怨。当时坐四轮马车旅行的人或驾驿车赶路的人又该作何感想呢?

至于运输的小麦数量,如按巴黎的度量单位计算,里昂和罗阿讷之间每星期为187姆伊。根据文献申述的理由,再减少一点,就算180姆伊,我们可得出每年9 360姆伊的数字;按每姆伊折合1 800公升计算,就是16 848 000公升,约等于140 400公担或14 000吨,这是充分利用陆路所能达到的最大运输量。文献在一开头就指出,有3 200姆伊的谷物储存在法国南方,需要用几个月时间才能运到那年急等粮食解救饥荒的首都。可惜的是,里昂沿卢瓦尔河的陆路运输“极其困难,限制着每星期运到巴黎的谷物数量”²²⁷,尽管在平行的两条路上兼程行进,运量仅250姆伊而已。

每年14 000吨的运量显然只是一个数量级,因为运输的货物,体积相同,重量却未必与小麦相等;此外,道路也并不始终能得到充分使用。还有可能出现所谓瓶颈堵塞。我们切莫对运输量小有所不满,这已相当于6至7艘中等吨位的海船。尤其要考虑到道路的崎岖不平,铺路技术的进步在18世纪前尚未问世。技术进步是否使扩大运输量成为可能?人们可以这样认为,在18世纪的战争期间,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宁愿使用罗阿讷至巴黎的陆路²²⁸,避免在海上被英国人劫夺所冒的风险。早在采用蒸汽机车以前,工

业家已利用私人资本主动开办几条铁路(1823至1828年),连接圣艾蒂安至里昂及圣艾蒂安至罗阿讷(经由昂德雷济约)的交通。这难道是偶然的吗?1826年,人们对这第一条铁路的股东们说,这是“终于实现期待已久的连接卢瓦尔河和罗讷河交通这件善事的可靠手段”²²⁹。

用今天的眼光看过去,我们对卢瓦尔河的运输,就会看得清楚得多。几千条木船在河上航行,一律都是平底,以免“搁浅”,这一危险时刻困扰着所有的船夫,搁浅的原因如果不是撞着埋在河床上的礁石或树木,便是陷进浅水沙滩。即使设置航标也保证不了安全:每次涨水都使河床改变模样,航标的位置也要不断改变。在河面开阔的某些地段,河网交叉,岛屿密布,卢瓦尔河“既无处不在,又难寻踪迹”²³⁰。一条平底小船在前面领航,沿途插上细长的榛树枝或忍冬树枝,必要时高声警告。

卢瓦尔河的船只用松木制造(通称松木船,在卢瓦尔河上游的造船中心圣朗贝尔,又称“拚板船”,如来自阿列河,又称奥弗涅船),多数仅供顺流下航之用;船员下船后步行返回罗阿讷,船只往往就地“拆散”,当作木柴出售。《1809年卢瓦尔地区统计年鉴》说,船只“出售后或被劈成木柴,或改充梁架”。若要逆水上行,每条船的成本约在300至500里佛之间,在启航地花300至500里佛买下,再在巴黎以100里佛卖出。这些船并不牢固,制造仓促,“往往论打出售”。它们经不起几次航行。相反,兼备顺流和逆流航行能力的船只,则用橡木精心制造,寿命长达10年之久。这些古老的货船,又称趸船、拖船或颞船,至18世纪末才定名为驳船。驳船船身细狭,约有9至15米长,张挂一篷大帆,往往三五成群地连成一队逆卢瓦尔河上行。领头的第一艘船使用船舵,帆篷挂得很高,其他的船陆续放低篷帆,以利风力推动。一串约5至6米长的平底拖船跟在后面。整个队伍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前进²³²。1709年9月14日,突然

狂风刮起，船队最后的两条船“撞在前一条船的尾部，致使船沉水底”²³³。

这种航运充满着不测事故，冬季河水骤涨，行船危险，夏季水位过低，使船不能通行。即使顺水下航也要花几星期时间。无论在卢瓦尔河或在阿列河，船员必须不断划桨，过着苦役犯一般的生活，且不说挤在船上睡觉²³⁴。身下就铺一点草秸。只是当天黑前靠岸时，才有登陆休整的机会。旅程结束后，在步行返回的途中，他们倍觉轻松愉快，发疯般花钱。

卢瓦尔河的船只以顺水下航为主，但逆水上航也达几百次之多。每年约有50来条船从卢瓦尔河下游来到罗阿讷，而从该河上游和阿列河开出的船却有几千条。勤奋的地理学家 J.-A. 杜洛尔 1789 年在罗阿讷看到，扬着巨帆的船只“满载货物从南特或卢瓦尔河其他沿岸城市开来，货物随后经陆路转运里昂”。除帆篷外，这些航船还用人力拉纤；但航行仍极其缓慢，甚至往往停船等待顺风，以致这些敞篷船“逆行百里所费的时间经常比殖民地产品从美洲飘洋过海来到法国的时间更长”。奥尔良有一位名叫桑松的人断言，运送的货物很可能在途中腐烂变质，他主张用兽力代替在卢瓦尔河和罗阿讷河岸边的人力拉纤。一份长篇报告在答复中说：桑松的意见完全不可能实现。马匹沿卢瓦尔河岸行走将困难重重：高耸直立的堤坝几乎遍布河边，有时达五、六米之高。护堤坡既少，又不够宽：人可在坡上冒险前进，而马匹则不行²³⁵。

正是卢瓦尔河两岸的农民，一到冬季，受雇充当纤夫。其中一些人也充当替补船员，但真正的船员结成一个抱得很紧的封闭性团体，就像旧制度下的小帮会那样。他们对这些乡巴佬、“牛粪团”、“稻草人”、“泥腿子”动辄破口大骂。受辱者则以“蠢种”、“屎包”、“臭水鬼”反唇相讥²³⁷。这是一场阶级斗争，还是一场粗鲁的对骂？

总之，船上的人脾气都很火爆，在罗阿讷中级法院投诉控告的数量之多²³⁸足以为证。涉及到的固然都是些小事（骂人、打人或伤人），但船民在其中占了太多的比例。他们也可能起而反抗官府，正如较晚的一份文书²³⁹所说：“用武力对付武力”。据说他们还“弄虚作假，不守信用，谎言骗人和敷衍塞责”，这也有此可能。有人特意提醒施特拉斯堡的旅行家艾利·勃拉肯豪费：对那些争先恐后地上前坑骗旅客的船民，最好还是把饭食、饮酒、沿河的停靠地点以及船主留在船上等一切事宜预先讲明，抱定宗旨要等到旅程结束方才付款……结果，艾利·勃拉肯豪费根据罗阿讷一家商行的推荐，租用了路易十三从前坐过的那条船；他最后承认：“我们没有察觉船夫有何过错，他们肯守规矩，态度也还诚恳。”²⁴⁰

此外，旅客纷纷前来罗阿讷，显然不是为了早日到达巴黎（这种希望恐怕会落空，从里昂到巴黎乘坐驿车只费5天时间，而乘“舱船”，单是罗阿讷到奥尔良这段水路，赶上晴天也要花3天时间）²⁴¹，而更多地是要少受车马劳累之苦。他们觉得舱船比较舒适，这种专门为客运而建造的轻型船只因在甲板上设有“舱房”，故名“舱船”。当时的权贵们对这种运输方式倒也并不轻视。1447年，勒内一世²⁴²从昂热上溯卢瓦尔河至罗阿讷，前往普罗旺斯公爵领地，“随行的船队舱内张挂帷幔，舱外饰以旗帜，船上或乘坐王公宠臣，或载运壁毯、碗盏及其他器皿”。1481年，“国王的尸体又秘密地从原路返回，经罗阿讷到蓬德赛，最后抵达昂热城”²⁴³。其他名人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路易十一于1476年从勒皮来到罗阿讷；弗朗斯瓦·德·保尔、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分别于1482年、1490年和1498年到此一游²⁴⁴，萨卢斯侯爵于1539年启程时随带“一群小提琴手”，为旅途生活增添情趣²⁴⁵；亨利三世和卡特琳娜·德·梅第奇于1584年夏亲临该地；萨瓦的夏尔-埃玛尼努尔于1599年来到这里²⁴⁶；亨利四世于1601年1月放弃对萨瓦的战争行动后返回巴

黎。此外还有路易十三、黎塞留以及塞维尼夫人……

客运和货运在18世纪全都有所进展。一方面，巴黎为满足其需求，要从罗阿讷“山坡”和博若莱取得葡萄酒，两地每年的输出量分别为300万和500万公升。这些酒桶并不全都经由罗阿讷运出：博若莱和勃艮第的葡萄酒在普伊苏沙略、德西兹、迪关以及卢瓦尔河沿岸的各村镇装船，这些村镇都有“港口”，其实是些普通的码头。但罗阿讷在葡萄酒运输中所占的比重最大，遥居领先地位。

第二股推动力，具有决定作用的推动力，是罗阿讷的航运自1728年起一直伸展到上游的圣朗贝尔，使穿越讷利斯平原的卢瓦尔河峡谷终于通航。这项酝酿已久的计划最早始于1572年。整个工程由皮埃尔·德·拉加台特主持进行，旨在修正河道的流向，所需的巨额资金由一家公司提供：买下卡住河流咽喉的一座磨坊；通过协商使十二、三座其他磨坊让开通道；清除埋在水底的危险礁石和树木……总的说来，工程相当困难，而且旷日持久，要冒风险。大臣会议于1702年5月2日决定批准正式开工，“直到1725年才真正完工”²⁴⁷。在原则上，中标人本应把圣朗贝尔上游的疏浚工程延伸到莫尼斯特罗尔。但皮埃尔·德·拉加台特提出种种理由，声称此事不可能实现，最后始终没有履行这部分承诺。由此引起了商人们的抗议乃至攻击，也有的商人表示愿意出力帮助。圣朗贝尔的一些木材商人愤怒之余，决定在莫尼斯特罗尔建造两条船，其中一条被洪水冲走，另一条于1756年顺利到达圣朗贝尔，借以表明在河上航行完全是可能的；尽管他们的行动纯属徒劳，但我对此十分欣赏。

回过头来再谈正题。把罗阿讷上游的航行延长到圣朗贝尔至少要达到两个目的。首先是开发圣朗贝尔周围尚未砍伐的森林，这就可能使不久将几乎垄断整个卢瓦尔河流域造船业的木材商人在这个小港口集中。当时，每年建造的木船至少有100条，后来更多：

如果我的计算不错，大革命前夕达1 500条；据一位名叫德尼·卢伊亚的青年历史学家说，1822年可能达2 800条²⁴⁸。这些船开到罗阿讷，有时空载，有时装着木材或泥炭。载运泥炭的船逐渐增多，泥炭产自圣艾蒂安盆地，先用车辆或驮畜运到圣朗贝尔桥下方的小港圣茹斯特，再从这里装船启运。无论空载或实载，这些船只进入罗阿讷时都必须缴纳40里佛通行税，河道疏浚公司在河道中央插着一排木桩，再加一条铁链，拦住船只的过往通道。

至多可装运15吨煤的“松木船”在抵达罗阿讷后又额外装货，达到20吨之多。这项转运更巩固了罗阿讷的有利地位。用当时的尺度来衡量，2 000多条船约运货4万吨，其中酒和煤各占一半，为数相当可观²⁴⁹；煤主要供应塞夫尔手工工场，经布里亚尔运河运到巴黎。

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

我们不要就此以为罗阿讷在18世纪或19世纪初经历惊人的繁荣。它依旧是个小城市（1800年仅有居民6 992人，另外再加上其直属镇帕里尼的居民810人）²⁵⁰。J.-A. 杜洛尔²⁵¹于1789年指出，由于没有城墙（这是一个迹象，即使不应认为是一个决定性的迹象），罗阿讷“不具城市的名号，人们至今称它是集镇，虽说是法国最了不起的集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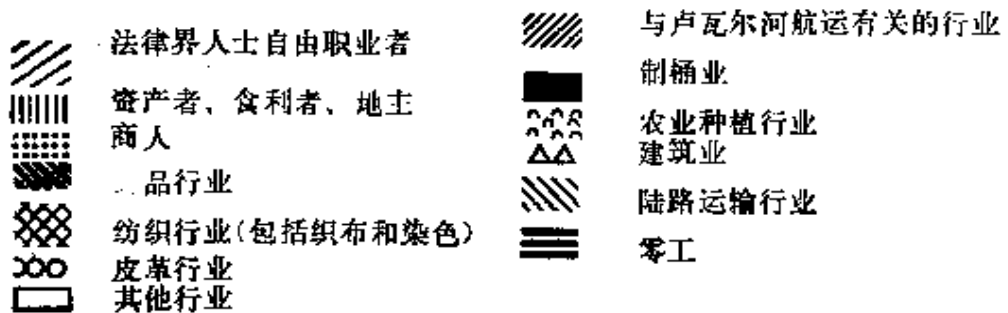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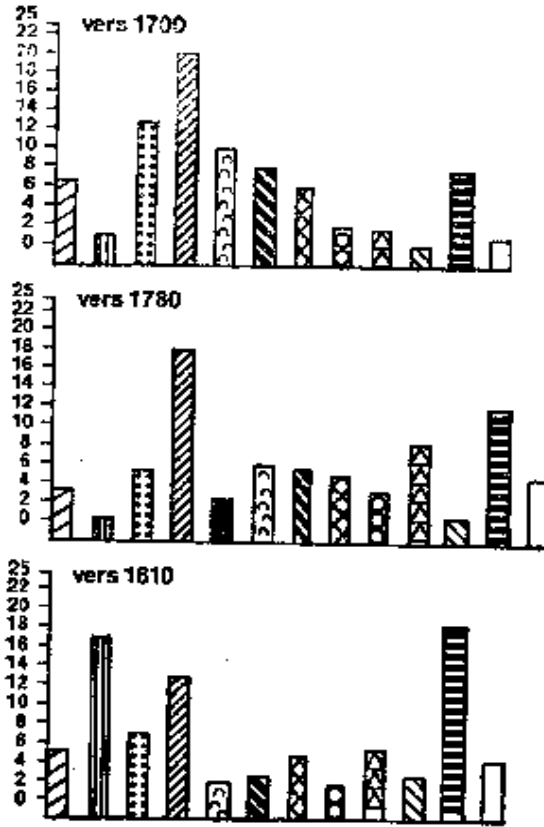
可以肯定，位居水陆要冲的罗阿讷不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如同任何其他城市一样，罗阿讷市区的行业门类十分齐全，有律师、医生、各式各样的商人。甚至还有批发商（在他们死后进行的财产清点足以显示其数额之大）以及十来名经销商（1700年前后，接受里昂各家公司发送的货物，通常再转运巴黎）²⁵²。最后，罗阿讷还有一些出任荣誉职务的大人物，但他们与当地的生活有点格格不入。对国王于1657年在地方行政长官之外设置的“长官助理”的职位

(职位实行捐买),富人毫不动心。城市治理不善,或毫无秩序可言,泥泞遍地,铺路的石块残缺不全,这也许与上述情形有关。但更大的可能是,在这方面,当时的城市大多与罗阿讷十分相似。

历史学家在回顾往事时,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放在运输方面。从道理上讲,罗阿讷的财富以及资本主义的新生事物难道不该集中在运输部门吗?可是,就在城市活动的这个中心,并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运输的高涨给木材业和造船业带来了生机。资本主义迈出了蹒跚学步阶段的最初几步。运输商同船主逐渐分家,后者率领几名帮手在船上工作,前者拥有好几艘船,委托代理人和船工驾驶。随着18世纪的加速发展,一些小资本家纷纷成立运输公司,借以赚钱谋利:贝里—拉巴尔因事业成功而发家,就是个相当典型的事例。这个家族同时拥有船只和造船工场。1765年,皮埃尔·贝里—拉巴尔以及几名批发商“几乎垄断了”圣朗贝尔和罗阿讷之间的贸易²⁵³。这里所说的贸易究竟是指煤炭的买卖,或是仅仅指主要在这一河段上从事的运输呢?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垄断都事关重大。在官方文书中提到的一张汇票恰好来自这家富商,恐怕不是事出偶然。1752年9月25日,几名船工截住公司的几艘运煤船,居然自作主张就把船开到巴黎。事情虽小,却很说明问题²⁵⁴。贝里—拉巴尔家族行动并不自由,遇到的对手相当厉害。再说,尽管没有数字作依据,在人们的印象里,总觉得由船运发家的财主都是小资本家。旧制度下的运输业实际上从不是个能赚大钱的部门²⁵⁵。发横财的人虽说也有,那就要到另一个社会阶层中去寻找了。

与以上的造船主相比,皮埃尔·德·拉加台特更称得上是真正的资本家。对他的情况,我们不很熟悉。他的企业成立之初就以巨额资本为后盾,一笔50万里佛的巨款由许多放款人(1792年清帐时了解到,共40人)共同提供。此外,河流的维护(设置必要的航



罗阿讷社会职业状况的演变

请注意,在经济增长的一般环境下,第三产业和资产阶级大幅度上升;农业人口急剧下降;船员人数相对减少(即略有减少);陆路运输逐渐增加;工匠人数(包括建筑业在内)明显增多;最后,零工大量增加,零工于1810年已成为最大的社会集团,这表明平民阶层面对财富增长而趋向两极分化。

标)费用每年都在4 000里佛以上,还必须使用相当多的人手收纳通行税。税额每年为5万里佛左右;人们认为,这笔收入同几年工程期间的非生产性投资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如果作一粗略计算,收入不会超过支出的8%。此事看来涉及许多具体细节,我们对其中的“奥秘”并不全都清楚。在查阅历史文献时,我们偶然得知,1765年11月出任“里昂巡按使代表”的维尔农先生是开辟“新航线”的出资人之一,或者说是其中的一名股东。另有一个更宝贵的细节,皮埃尔·德·拉加台特不单从通行税收益中提取息金,并且还在圣艾蒂安城外购买煤炭,装船运往罗阿讷——他因此违背了关于该市四周方圆二里范围内生产的煤炭只准供圣艾蒂安使用的规定²⁵⁶。

总之,开辟所谓“新航线”所涉及的方面要比人们一眼所能看到的更广,不但保证有利可图,而且赚钱的花样也多,拉加台特及其合伙者之所以对开通莫尼斯特罗尔至圣朗贝尔一段河道的工程不计代价,敢冒风险,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了。他们财大势大,最好的证据也许莫过于他们在同皮埃尔·德·里瓦²⁵⁷对簿公堂时取得了胜诉,此人也非等闲之辈,恰恰在航运问题上同他们有了矛盾。里瓦原是布列塔尼煤矿(产量已大大降低)的股东,自从在菲尔米尼定居后,想把在莫尼斯特罗尔开采的煤炭装船运往外地。于是同新航线公司发生了冲突。里瓦对大臣会议提出申诉,控告该公司借故爽约。为此进行了一系列专家调查,提出的报告显然偏袒拉加台特一方。里瓦的理由是,扩大开发莫尼斯特罗尔四郊的煤矿和重要森林资源不但能使造船主取得替代的木材(圣朗贝尔森林经过50年的大量砍伐,资源已经枯竭),而且还能向国王的海军提供大树(将沿河漂送至南特),但他的意见没有被人采纳。尽管他一再坚持,尽管他怀有强烈的事业心,最终还是失败。他在菲尔米尼被淹的矿井中装设了一种机器,并以此为自豪,这种机器其

实就是根据英国纽科门的样式²⁵⁸加以简化的蒸汽抽水机。这在1759年是项了不起的成就！

至于罗阿讷至南特和巴黎的马拉驳船，能否算是大企业呢？这项运输活动由拉菲亚德公爵于1679年²⁵⁹创办，并几乎立即由他承包经营。马拉驳船不享有任何垄断，但强者往往欺压弱者，当它每星期两次从罗阿讷开船时，总是广事招揽，力求装满旅客和货物，其手段之恶劣使一般运输者不可能与之抗衡。然而，受害者的恼怒和对立终于迫使马拉驳船在1697年停止营运。但在1736年，亚历山大·伊冯再次接受承包，利用他拥有布里亚尔运河的产权，同蒙塔日和内穆尔的马拉驳船相竞争。布里亚尔运河、奥尔良运河和卢万运河之间的这场争夺战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关系较远，但它可以表明亚历山大·伊冯的经营范围之广，顺便指出，伊冯不是罗阿讷人。

总的来讲，在18世纪，罗阿讷及其附近地区远没有经受近代资本主义的侵扰，近代资本主义当时才刚起步。罗阿讷人仍深受旧时代的束缚，这从拉菲亚德公爵的行为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拉菲亚德公爵于1666年被封为罗阿讷公爵，并因此获得一系列新的产业、税收和特权；雄心勃勃的公爵立即动手，彻底加以开发利用。他不仅成功地维护了既得利益，而且还有所开拓，恢复了某些早已废弃的特权，严格按老规矩办事，这一事实的确值得人们回味无穷。就在罗阿讷当地，他在卢瓦尔河征收港口税和通行税（包税额可达5350里佛），对在城市货栈出售的小麦征收“谷物税”，甚至还征收拘押税，在堂区的什一税中提成四分之一；他有权比别人早一个月在市内出售葡萄酒，有权强制居民去他的磨坊磨面……他在离罗阿讷一里远的地方拥有布瓦齐城堡，还有土地，分成制庄园以及七、八个鱼塘。再加上几处收费的榨坊，村庄中的葡萄农必须去那里压榨葡萄。这类封建权的数量之多不胜枚举，以上仅罗

列主要几项；公爵及其下人乘机要挟、找岔、勒索的情形更比比皆是。1705至1706年间，他们同城市的经销商打了一场官司，又建造和买下几座磨坊，企图恢复征收磨面费的特权。这些仗势欺人之事可鲜明地显示罗阿讷当时的真实情景。封建主义在罗阿讷难道能与资本主义和睦相处吗²⁶⁰？

市内状况

这里恰好有一份调查材料提供了有关旧制度末年罗阿讷的社会职业状况(见第181页的图表)，其中的许多问题有待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如把这个小城市的人口按三大产业(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划分，大体上可分别得出以下数字：13.5%；54%；20.5%；总数达不到百分之百，由此说明调查还不可能十分完整。但这些数字暴露出一种奇怪的结构：

一、在“第三产业”中存在一个地位显赫的官吏和法律界人士的阶级；商人和旅馆老板仅占总数的7%。

二、工匠人数众多，占54%(其中19%是船工)。

三、第一产业的人数因我们把零工计算在内而有所扩大，农民和葡萄种植者实际上只占7%。这就证明，罗阿讷似乎同周围的农业活动有点脱节，甚至保持相当距离。重要的问题是，这究竟由于城市起步较晚，或者因为水陆运输部门不断在招收劳动力？拥有地产的特权阶级控制着城市四周的一大部分土地。罗阿讷与米卢斯等其他城市不同，并未停止在邻近的乡村进行投资。

四、最后一点，在大革命前夕，罗阿讷的居民区有明显的专门化趋向：工匠和零工主要住在北部的“兵营区”、下城的南部和西部边沿，以及港口附近；特权者分布在上城和下城的交界地带；商人、经销人和船工集中于罗阿讷的岛上。城市布局尽量适应分工的要求²⁶²。

在19世纪和20世纪

以上的简短考察对罗阿讷及整个罗阿讷地区过去的经济活动还有许多方面没有谈到，特别是关于城乡间的平衡问题。大量的学术著作，尚待发掘的历史资料，当能允许我们作更深入的研究。但就我们这里解释的范围而言，难道还有此必要吗？

为了最终确定罗阿讷的独特地位，最好还是看一看在原有的船运业消失后²⁶³，也就是说自从1838年后（在卢瓦尔河一侧建造的运河于1838年完工，该运河将长期为罗阿讷服务，其活动今天正不断地急剧下降），或者自从1858年后（一座铁路桥使罗阿讷与全国铁路网相连接²⁶⁴），这个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变成了什么样子。

从整体上看，这些事件没有葬送罗阿讷的繁荣。城市仍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正如在开凿了连接圣艾蒂安盆地至罗讷河的日沃尔运河（1761年）和从迪关到索恩河的中央运河（1784—1790年）以后的情形一样。今天，就在已有了很大扩展的市区范围内，罗阿讷共有居民十几万人，等于1800年人口的10倍以上。更何况，城市对周围地区的控制也有所加强。它的辖地面积十分有限，在四周方圆60公里的范围内，就有下列城市同它接壤，同它竞争：圣艾蒂安、里昂、马孔、穆兰、维希、克莱蒙费朗；即便要挪动一块界石，也殊非易事。罗阿讷地区面积既小，土地又贫瘠；但在19世纪，乡村作坊却成倍增加。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足以满足发展棉织和丝织工业的里昂资本家以及罗阿讷的小企业家的需要。此外，这是些手艺高超的劳动力：如同法国的许多村庄一样，乡村中的大麻加工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每当夏季来临，平原上“臭气熏蒸”，正是“浸沤和翻晒大麻的时候”²⁶⁵。麻织向棉织的过渡从18世纪开始，到19世纪更趋加剧，这还不是一次真正的突变，熟练的纺织技艺早已存在。

罗阿讷的纺织业是一种陈旧的工业形式，同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13世纪的毛织业相去不远²⁶⁶。但这种原始工业或“前工业”寿命很长。食品市场和乡村作坊近在咫尺，便于这种工业的均衡和健康发展。老板们因城市工人的骚动而惶惶不可终日，对工业的集中和机械化并不起劲。电力的出现给他们帮了大忙，使动力和工场的分散布局成为可能。工业的现代化因此姗姗来迟。经济形势又为罗阿讷的兴旺发达助了一臂之力。随着米卢斯于1871年被德国吞并，罗阿讷成了色彩艳丽的“维希棉布”的首要制造中心。因此，1870至1890年间，罗阿讷的纺织工业将处于鼎盛时期。它后来还抗拒了1929年的经济衰退。“缕空挑绣”的针织业出现后，罗阿讷在法国迅速取得了第二位，紧随特鲁瓦之后。

相当出人意外的是，罗阿讷仅在1955年才出现了结构性危机。旧经济的土崩瓦解顿时使人们惊惶失措。然而，罗阿讷利用其行政职能，依靠正在发展的第三产业以及在市内或附近地区新建的冶金工业，仍然成功地顶住了这场危机。到了今天，席卷法国和世界的普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心态危机——在罗阿讷也同样表现出来。至于前途如何，现在谁也预见不了。但有几个问题可以看出。

其中之一关系到通道的职能，这个永恒的问题在14世纪已发挥作用，如今又一次被重新提了出来：三条南北通道正互争高低：经由克莱蒙费朗的阿列河通道，经由罗阿讷和塔拉尔前往里昂的波旁地区通道（即卢瓦尔河通道），最后还有索恩河和罗讷河通道（该通道于20世纪已超过另两条通道，并不断扩大其领先地位）。此外还有南特至里昂、波尔多经克莱蒙费朗至里昂的横向通道之间胜败未卜的较量以及高级城市之间的竞争。我们对今后的事态发展尚不清楚，很难进行预测，但对罗阿讷市和罗阿讷地区的活力，我们是否要再次寄予信任？

拉瓦勒兼得工业和远程贸易之利

罗阿讷的情况说过不谈；我曾经打算在位于中央高原另一侧的布里夫拉盖亚尔德稍作逗留，顺便再谈到蒂勒和于塞勒；布里夫像是楼房的底层，林木丛生的蒂勒可比作一般的楼层，靠近米勒瓦什高原的于塞勒则是顶层。我终于放弃了这个打算，无疑是为了缩短路程，但也因为布里夫拉盖亚尔德（意即“逍遥自在的布里夫”）是个坚实的、几乎安闲自得的城市，我想说的是物阜民康、安居乐业的城市；两道城墙可保安全；道路四通八达，交易会远近闻名（在18世纪，一次可聚集5 000头牲畜），城市可坐享其成；由于土地肥沃，贵族和资产者享有可靠的地租收入；最后，当地的百姓循规蹈矩，各守其业。

因此，我比预期更早地到达拉瓦勒。拉瓦勒市地处崎岖不平的下曼恩地区，位于马耶纳河高耸的右岸，在横跨该河的“老桥”下，与旧城堡和新城堡遥遥相对。在这个古老的城市中，有着许多名胜古迹，其来历的复杂似乎存心要捉弄历史学家，硬逼他们在参观时回想起有关中世纪艺术和近代艺术的全部概念，却不管他们是否真正懂得这些概念。总之，拉瓦勒是个不折不扣的法国城市。意大利的城市往往景色更美，甚至更加令人心醉神迷。但我国的城市全都拼命地扎根在各具特色的乡村之中，乡村包围城市，抬高城市的地位，并部分地说明城市的成长。尤其在昔日的法国，城市首先以乡村的面目而出现。

拉瓦勒在17世纪将近有一万名居民，屹立在一个狭窄的盆地的中央，比四周地区略为富裕，些或者说，不像四周地区那么穷，有几块灰质土可资利用，很早就在那里建起了几座石灰窑。

拉瓦勒位于布列塔尼的边沿，原是免纳盐税的地区，因而贩运私盐几百年来在这一带相当兴旺，“野地里草木丛生，树林和池塘

参杂其间”，“冬青和染料木等矮生树丛长得密密层层，一人在其中藏身，离几步远就无从寻觅，地上铺满草苔……压低脚步的声响”。在旺岱战争期间，这个以往的“私盐贩”的天下也就成了朱安党人的天然活动场所。朗迪维小村的本堂神甫²⁶⁹指出，这个地区“夹在诺曼底和号称外邦的布列塔尼之间”，几乎构成一个“半岛”，怎么可能没有走私活动呢？拉瓦勒与私盐贩等不法之徒²⁷⁰确实并无通同作弊之嫌，但作为边境城市，当地往往有部队驻防，而驻防部队则几乎毫无例外地为走私活动提供后备补充。部队的士兵，甚至颇有体面的军官，往往被私盐贩的利益所引诱。尽管国王一再颁发禁令，对违禁者处以重刑（如在1682年判罚苦役）²⁷¹，他们依旧几乎明目张胆地进行走私。1693年有12份判决书表明，一些私盐团伙，分别以20至70人结队活动，全副武装地骑在马上，犹如“王家卫队的骑兵”，携掠农民的马匹去布列塔尼贩运私盐，肆意袭击盐税局的火枪手……甚至冒充盐税吏，欺凌过往行人”²⁷²。

即便他们不事骚扰，驻军的存在也因营房和物资供应等问题而增添无穷的麻烦。1693年5月，6连骑兵的到达给拉瓦勒及附近各乡带来一片惊恐。这支人马大量消耗面包、草料和燕麦，怎么可能让人供养得起？巡按使米罗梅尼尔担心激起民变，要求国王出资供应马匹的一部分食料，减免向各堂区的摊派，如果仍有困难，则考虑“从卢瓦尔河下游”运来燕麦。至于小麦，居民尚嫌不足，更让人“胆战心惊”的是，在附近已有9营驻军，每月都要吃掉1000袋面粉。巡按使最后说，看来必须“打开城市和乡村的谷仓，通过合理的可能途径，设法防止出现任何事故”。但几天过后，事故仍然发生，巡按使不得不下令实行粮食征购²⁷³。

因粮食供应问题激起群众愤慨，本是自然的事：在这个辽阔的地区，江河纵横，水流湍急，岗坡遍布，崎岖不平，土质多属寒性，不利植物生长。“许多土地12年内勉强仅获四、五次收成；在

长达7年之久的休耕期间，只长据说可供提高土地肥力的染料木。小麦产量很低：整理土地十分费劲，而产量仅是种子的3至5倍。人们因此宁愿种植荞麦，收成可达种子的30倍、60倍乃至100倍。小麦和黑麦〔种植后者多于前者〕的价格总是过高，荞麦供缺粮的平民食用”²⁷⁴。向救国委员会呈送的一份报告还提到：“在平常年份，我们只在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土地上播麦，现今劳力短缺，往往就到不了四分之一。”²⁷⁵当然还有栗子可供食用，但这种资源难道是取之不尽的吗？另外的办法就是经由卢瓦尔河、曼恩河和马耶讷河从南特运来小麦。葡萄种植不值一提，这在拉瓦勒地区十分少见。自15世纪后，当地生产的苹果被用于酿造苹果酒，并不仅仅供穷人饮用。1741年苹果歉收²⁷⁶，使苹果酒的价格几乎赶上葡萄酒，因而主宫医院宁愿向穷人普遍供应葡萄酒（应该承认，是渗加了水的酒），不再提供苹果酒。当然，真正的葡萄酒从附近的安茹以及奥尔良地区运到拉瓦勒来，数量每年达2000皮普（容量单位，每皮普约在四、五百升左右），总消费量竟达80万至100万公升，这对以饮用苹果酒和水为主的整个城市来说，就是个不小的平均数，10000居民消费100万公升，为数相当可观。

至于畜牧业，当地几乎没有绵羊，但有大量的牛和矮种马：平均每套犁可分摊4头牛或4匹马。野兔、红山鹑、野鸽、秧鸡、鹌鹑、山鹑等猎物极其丰富。

这种乡村景象直到18世纪仍无明显改观。共和三年前后，据一份报告说，土豆“仍处在摇篮阶段，因为它仅在菜园、好地上试种成功，或者必须施肥，开支很大。土豆还很稀少，不足以供人食用”。人工草场也刚刚起步，虽在最后的20年内，面积增加了两倍，但又因缺少肥料，只建立在当时“用铁锄翻耕的”好地上。唯独亚麻和树木的资源极其丰富。报告最后说“苹果〔用于酿酒〕和梨是我们的两大副业收入。”²⁷⁷

总的说来，农业状况尚属低下。农民只可能是分成制佃户：“我们的土地大部分采用租佃制，也就是说，农民辛勤劳作，可得产品的一半，另一半则交给地主”²⁷⁸，地主几乎总是住在城里。

由此可见，拉瓦勒不能靠土地求得繁荣。当地的道路纵横交错，通往雷恩、昂热、勒芒（向前延伸，可达巴黎或奥尔良）、马耶讷、卡昂以及阿朗松（经由险峻的佩尔什丘陵），难道这能确保拉瓦勒的繁荣吗？不能，因为其中没有任何一条道路路况良好。勒芒—拉瓦勒—雷恩的大路于1772年开始通车。而地方性道路，即使从一庄园至另一庄园的道路，全都糟糕透顶：“过去，在法国西部，再没有别的地方能像下曼恩地区那样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²⁷⁹1772年前，旅行者宁愿经昂热和南特绕行，塞维尼夫人就曾这么做过。“运输全靠马驮，有时还用人背。”²⁸⁰马耶讷河可通航运，直到拉瓦勒为止或更远的地点。但在拉瓦勒下游的河段，分布着22座船闸和许多磨坊，磨坊顽固地制造障碍，船闸则陆续被损坏²⁸¹。

还要补充的是，这里同罗阿讷一样，如果从城市出发，画一个约70公里长的圆圈，就会遇到一些城市的竞争和排挤：昂热（相距73公里，据最近的人口统计，居民达143 000人）；勒芒（相距75公里，居民达155 000人）；雷恩（相距72公里，居民达205 000人），而拉瓦勒至今仅有居民54 500人。

总的说来，人们对拉瓦勒当今的重要性并不会大惊小怪（它作为一个省城，拥有多种工业，经过改良的土地使当地成为相当好的畜牧区，这些都是它可使用的王牌）；但是，对于该城早在19世纪取得的成就，有谁会不感到吃惊呢？

这些较早取得的成就，原因究竟是什么？首先因为拉瓦勒四周是个贫苦、顺从的乡村，从17世纪起，拉瓦勒每周3次吸引乡民前来赶集：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再加上5次交易会。此外，在与拉瓦勒相关的财政区范围内，还有21次交易会²⁸²（4次在布莱镇举

行，2次在格雷昂布瓦尔，3次在苏热，8次在蒙泰素尔，4次在科塞）。19世纪初的拉瓦勒地区同原来的财政区大小相同，但那里举行的交易会也有67次之多²⁸³。显然，拉瓦勒正是通过这些“牲口交易会”出售当地畜养的牛马。这项商业活动推动着当地贸易的健康发展；拉瓦勒市在同一时期还扩展了交易会的场地，经取得中央政府的批准²⁸⁴，把“原属本笃会修道院”的土地和房屋收归城市所有。总之，拉瓦勒不能不侵占周围的地区。以下数字足以为证：拉瓦勒市1831年共有居民15 830人，其郊区共有24 669人，整个拉瓦勒地区共有114 577人（城市人口占地区人口的13.8%）。

然而，拉瓦勒的繁荣，首先还在于当地的工业与远程贸易相联系，并且与周围乡村的贫穷相得益彰。据一位历史学家说：“正是乡村的贫困支撑着拉瓦勒的手工工场，穷人迫于生计，为城市提供它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在我国的一些地区，乡村的家庭工业可补充农民收入的不足。

织布工场的建立可能由来已久（根据传说，建于1298年，这一确定的日期并不十分可信），最初由跟随居伊·德·拉瓦勒九代传孙的妻子贝阿特里克斯·德·格拉夫前来城市定居的佛兰德工匠所创办²⁸⁶。这与当地的条件恰相适应：下曼恩地区历来盛产亚麻和大麻，而羊毛则量少质次，只能制造粗呢。

拉瓦勒的织布工业其实要等到17世纪才真正繁荣起来。起飞过程十分迅猛，几千名织匠投入生产，商人很快发财致富。西属美洲和安的列斯群岛的市场为欧洲工业打开了销路，从而加速了这一工业的发展。甚至拉瓦勒向特鲁瓦、博韦、卡昂、里昂、鲁昂出售的坯布，在以上城市漂白后，也大多转销新大陆。拉瓦勒的批发商还利用小商贩向美洲运销麻布，布匹由小商贩送达圣马洛或南特，再发往美洲船队的启航港加的斯。小商贩返程时随车带回铁、厚薄木板和其他木材；下曼恩地区当时设有一些铁匠炉和高炉。布

匹贸易又推动了拉瓦勒炼铁业的发展。

到了18世纪中叶，“拉瓦勒各商场每年出售约2万至2.5万匹麻布，全系现金交易。每匹麻布的长度不少于100尺，无论是可供漂白的坯布，或是用以缝制上衣或作衬里的灰布。坯布售价每尺为26苏至100苏……灰布为20苏至50苏。拉瓦勒约有25家商店从事这项贸易。近来还生产麻纱和棉纱手绢，比绍莱制造的质量更佳”²⁸⁷。按今天的度量单位折算，拉瓦勒的产量约在200万至250万米上下，按每米3里佛计算，价值600万至700万里佛。同勒芒的平纹呢等法国其他纺织工业相反，拉瓦勒的织布业直到法国革命为止仍不断在增长²⁸⁸。

织布业促进了拉瓦勒市及其邻近村镇的兴旺发达，1732年在加斯特河畔新建的商场正是这种兴旺发达的表现。织匠们每星期六肩扛着布匹前来商场；顾客站在板凳上展开布匹，仔细察看，成交后把货物请人“漂白”。在市郊的马耶讷河左岸或茹阿讷河沿岸，草场附近设有许多洗漂作坊，经这里加工的布均“洁白美观”²⁸⁹。洗漂作坊的主人往往兼营商业；他们自己也收购布匹，经漂白后，转手出售。他们还为法国其他城市的商人充当经纪人，提取6%或8%的佣金²⁹⁰。

承接产品的精加工是商人控制市场的一个手段，通过这最后一道工序，商品不但因产品增值而获得最大利益，而且还享有转手出售的优厚利润。拉瓦勒的批发商同法国各大城市的批发商均有业务往来；他们敢冒各种风险，谋取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他们甚至派遣兄弟子侄去巴约讷、加的斯、圣玛丽港、里斯本（该城于1755年毁于地震，拉瓦勒商人因此损失30万里佛）²⁹¹等地联系业务，更远的还去加拿大、马提尼克、圣多明各和几内亚²⁹²。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几家批发商曾合伙冒险派船从圣马洛出发，运送货物和现金去美洲各岛或南海进行贸易；1711年，他们又派船随同杜

盖-特罗安远征里约热内卢²⁹³。他们还购买法属印度公司的股票，随后又参与密西西比公司的疯狂投机。其间虽曾导致几次破产，但损失不算太大，他们尽管敢冒风险，处事却又相当审慎。

我们这里也许不必再长篇大论地去介绍这些批发商了。他们同法国和欧洲的许多其他批发商一样，高居资本主义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顶峰。他们必定声势显赫，生活起居无不令人侧目而视；或高车骏马，娇妻相随，前往乡间别墅，或在赶集的日子，等着佃农来城里侍候和提供食物。他们的仓库和贮藏室装满了小麦、黑麦、荞麦、咸肉、果品和木柴……他们很早就捐买官职，购置领地，而且不计代价²⁹⁴。金钱既可打开所有的大门，他们的子女遂逐渐挤进了贵族的行列。

但拉瓦勒与其他城市也有截然相反的地方，那就是所有的特权者，不论是否业已晋升贵族，几乎都继续经商。勒克莱尔、马莱斯特、吉泰、贝尔赛、德拉波尔特、皮松、杜什曼、勒努松、皮旭等家族均以其领地而闻名于世（格拉夫里的皮旭，乌勒里的吉泰，库佩利埃尔的贝尔赛），但他们过着相当简朴的生活。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依旧带着宗法制的色彩（不仅在发生破产时，互相提供保障，以挽救家族的荣誉）。他们建在旧城中心的房屋于18世纪按“现代方式”进行了美化和改造，变得更加舒适，但他们的衣著仍然朴素，家中的仆人也很少。²⁹⁵18世纪末来到拉瓦勒定居的一名医生指出，富人和穷人的饮食均十分省俭，他们往往喝汤，而且喝得很多，喝的是白菜大葱汤，少许有一点肉；工人饮用白水，“难得有苹果酒”，富人通常以苹果酒佐餐。葡萄酒和佳肴仅供“盛宴”之用²⁹⁶。

批发商人数不多，却无不身居要位。通过组织城乡劳动，他们已成为社会大厦的顶梁柱，自然也就身价百倍。据17世纪末的一位观察家说²⁹⁷，拉瓦勒的贸易“依靠三种人的推动”：30名从事大宗贸

易的批发商；500名收购纱线和交人加工的织匠师傅；还有5000多名织工，“即使最富的帮工，全部家产也不超过100里佛”。这种分类实际上还适用于许多其他行业。在拉瓦勒，织匠师傅和织工的人数原则上不受任何行会法规的限制；任何人都可把他加工的产品送到商场自由出售，但也确实存在一种依附体系。富有的织匠师傅拥有几台织机，甚至还有一所漂洗作坊，他们用现金购进原料，然后出售雇工生产的产品；但也有一些织匠师傅除雇佣一、二名帮工外，亲自在作坊劳动，他们因需要购买原料，急于出售产品，往往受纱线商人的摆布。一些织工条件较好，自己拥有工具，同妻儿一起参加劳动，几乎同小作坊主相仿佛，但另一些织工完全靠出卖劳动为生，或在更多情况下，半天务农，半天在家织布。曼恩地区所有的村庄和农户全都以织布作为家庭副业。由于对批发商的这种依附，织匠师傅和织工的抗议行动也就事先注定不能成功：1732年，当新商场建成时，他们曾试图改变传统的销售条件，但终究落空。拉瓦勒的以上情形在别处也普遍存在；面对少数城市商人，前工业时期的工匠四散分布在广大的乡村或郊区（就拉瓦勒而言，则在科考尼埃区）。这在兰斯和鲁昂是如此，在亚眠和勒芒也是如此；勒芒离拉瓦勒很近，17世纪末，那里建立了平纹呢工业。

位于贫困乡村包围之中的拉瓦勒，其经济的兴衰完全随远程贸易而转移，这种结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谁向织工提供必要的资金，让他们在克朗市场上购买亚麻（克朗出售的麻纱质量最佳）²⁹⁸？是谁提供必要的贷款，以应付远程贸易造成的资金回收期限过长？是谁为建造漂洗作坊进行投资？假如产品出现滞销——这类情形时有发生——整个体系便告卡壳，但蒙受打击最重的还是陷于失业之中的织工。

拉瓦勒的工业繁荣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年为止。从那时开始，来自远方的竞争使它处境维艰；西里西亚用波兰的优质亚麻织成

的麻布很有竞争力，那里的劳动者地位低下，备受剥削，报酬甚至比下曼恩地区更差。随着法国革命的到来，新大陆的市场几乎完全关闭，且不说旺岱战争的灾难……织布工业的状况更一落千丈。拉瓦勒交上的第一次好运至此告一段落：幸运随远程贸易而兴，也随远程贸易而亡。

卡昂是城市的典型，更是可供参照的实例

卡昂诚然地位重要，但只是个二等城市。巴黎、鲁昂、南特、波尔多、马赛、里昂、里尔、施特拉斯堡、图卢兹和几个其他城市早已把它甩在后面。卡昂于1695年共有居民26 500人（数目已相当可观）；1753年有32 000人（三年前不得不拆毁城墙，让城市变得宽敞些）；1775年有40 858人；但在大革命最初几年，人口有所下降，1793年仅34 996人²⁹⁹。

总的说来，卡昂地处肥沃田野的中心，养育着众多的工匠，地方工业也远近闻名；城市在奥恩河畔拥有一个港口，离这条沿海小河的出海处约15公里，这里恰好又是奥恩河同另一条小河奥登河的汇合点，并且还受到潮汐的影响。由于奥恩河在17世纪的泥沙淤积，卡昂的航海活动一度几乎陷于停顿，载重为200吨的海船仅在每年春分和秋分的涨潮期间光顾城市。港口平时只接纳30至50吨的平底驳船，这些小驳船有时前往塞纳河下游³⁰⁰。直到1857年在奥恩河一侧开凿了运河以后，卡昂城才恢复了航海活动³⁰¹。

卡昂尽管规模不大，或者正因为如此，它可充当城市的典型。让-克洛德·佩罗的鸿篇巨著³⁰²就此问题作了详尽的介绍，为一般城市史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前景。他所选定的时期——18世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沿着一条分界线进行观察，因为在当时，卡昂城既没有完全摆脱以往几个世纪的陈迹，却又已经置于新选择的束缚之下。另一个好处是城市发展缓慢，这就同时便于当时的人和

我们进行观察。根据以上理由，我把本段的标题定为：卡昂是城市的典型，更是可供参照的实例。

大家都会毫不惊奇地看到，卡昂照例在其周围画出几个层能式的同心圆，或一系列光圈般的经济区。城市外围之所以被划成许多圈，原因是一系列经济区应满足城市的消费需求，而在当时运输缓慢的困难条件下，它们必须靠近城市。当然，卡昂的胃口不像巴黎那样大得出奇。但它的食量基本上也足以说明，为什么有几个圆圈紧贴在下诺曼底的首府的四周³⁰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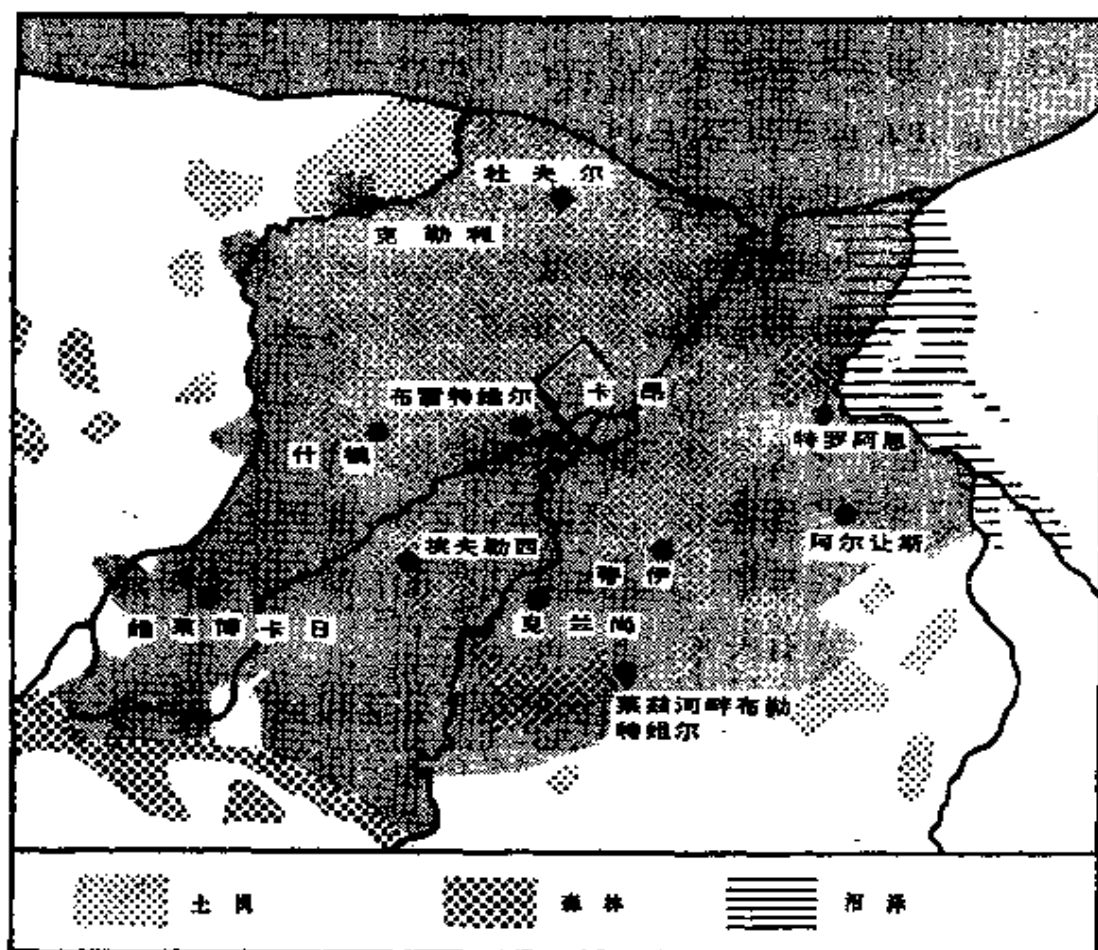
第一道圈，“蔬菜种植区”，以园地为主，也包括市内的草场。蔬菜种植在市区的宅地间见缝插针，又在距城市不到一里半远的十几个村镇全面铺开，占地达5000公顷以上。这个区域因紧靠城市的市场而价值倍增，土地被分成小块种植，经营者生活尚好。第一道圈内自然还有相当多的土地种麦。每天的蔬菜消费实际上很少，仅5000公斤；牛奶消费也不过2000公升，通常充当副食或供药用。作为主食出现的小麦因而挤进这个区域，虽说根据层能的理论，第一道圈仅仅提供蔬菜和牛奶。

相比之下，第二道圈显得庞大得多(66700公顷)，这里是卡昂辽阔田野上肥沃的冲积层土地，几乎完全种植小麦，西接瑟勒河，东靠迪沃河，北临英吉利海峡，南近桑格莱森林。这块小麦种植区实行三年轮作制，用马匹套犁耕地；仅在西南方向，例如敦弗隆泰一带的树围地，大麦、黑麦和荞麦的种植超过小麦。

更远和更广的一圈是饲养牲畜和生长小树林的区域。

综上所述，卡昂的小麦供应充足有余。即使赶上坏年景，小麦也几乎不虞匮乏，因而卡昂城从不考虑建造积谷义仓，而在当时的欧洲，各城市当局总是让谷仓装满粮食。1771年，每人每天平均消费约535克，可说是一份不错的口粮，城市每年的消费量总共达81000公担。11个乡村集市每星期在财政区(共包括131个村镇)的

各个集镇轮流举行，每天都有手推车和四轮马车源源不断地把粮食运往城市。粮食供应很少出现故障，但在1725年、1752年、1789年和1790年却曾发生过³⁰⁵。每当粮食供应不足，当局就向外地采购，这也毫无困难：只要向勒阿弗尔提出要求，荷兰或英国的小麦随时都可经英吉利海峡来这里卸船。可见，粮食供求平衡，居民生计确有保障，而且情况只能越变越好，因为到了18世纪，谷物的质量普遍提高。就以卡昂为例，1740至1775年间，小麦籽粒重增加了10%。与此同时，随着市内的7座磨坊（提供城市消费量的一半）



卡昂的辖区

卡昂地处英吉利海峡、瑟勒河和迪沃河之间。大部分土地种植小麦；西南部为树围地；奥恩河以南和以东为森林。让-克洛德·佩罗，《一个近代城市的诞生——18世纪的卡昂》。

使用经济磨具，磨面的质量也大有改善。既然面包总有供应（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吃白面包），每个人的生活基本上也就有了着落。

甚至其余的食品，即所谓“可有可无”的食品，供应也同样充裕。卡昂的乡村几乎仅仅生产粮食（迪沃河潮湿的沿岸一带除外），由它直接提供的鱼和肉不能满足城市的需求（每人每年吃30公斤肉），但在离城不远的林木区，向有外销牛、羊、猪的传统，尽管数量有限，却也不无小补。此外，大海近在咫尺，可以供应海鱼，奥恩河又盛产鲑鱼、鲱鱼和鳗鱼。

还有，本地不产葡萄（阿尔让斯丘陵上“大胆试种的小片葡萄树长得病病萎萎”，也许不值一提）³⁰⁶，但盛产苹果酒。后者可替代葡萄酒，而且在18世纪前，也曾使啤酒、梨酒在当地绝迹。1733年城市各酒铺共订购普通葡萄酒1 005坛，苹果酒42 916坛，后者达前者的40多倍³⁰⁷。如此巨大的消费量势必造成以下的结果：满载苹果酒桶的四轮或两轮马车在城市的街道上排成长队；车载沉重，往来频繁，使崎岖不平的道路变得更加难走。运费又是如此昂贵，因而欧日地区竟将苹果酒提炼成酒提精运出。大概于1703年出现的卡尔瓦多斯酒因其价格昂贵，足以承担运费，虽然苹果酒使用牲畜驮运，运费比使用车辆更高。酗酒现象在卡昂迅速发展到惊人的地步，无疑与此大有关系。

正如葡萄酒产量和小麦的价格在别处呈相反方向摇摆一样，苹果酒产量和小麦的价格在卡昂也是此涨彼落。据卡昂巡按使说，1772年的苹果歉收“势必将影响谷物消费，因为平民喝酒少了，也就多吃粮食”。同样，在1778年，“酒类短缺将促使粮价坚挺”³⁰⁹。1779年和1781年，价格运动呈相反的趋势。

有关食物和饮料之间的消长关系，我们这里不必再多噜嗦。同罗阿讷、拉瓦勒等许多其他城市相比，卡昂享有的安定生活令人羡慕。

如同任何城市一样，卡昂当然也维持许多工匠和店铺主的存在，以满足城市的日常需要。其中，一些工匠参加行会，另一些实行自由经营；一些工匠承接普通的活计；另一些则猎奇弄巧，为富人制造“豪华和奢侈”；一旦时尚发生变化，他们便濒于破产的边缘。

但最值得重视的是，工业（也可以说，前工业或原始工业）已在城市中立足生根。优质和中等呢绒业、针织业、织布业和花边业在18世纪曾经接连出现了四次工业浪潮。我用了“浪潮”一词，是想说这些接连出现的工业并不是互相补充的，而是按先后顺序取代的。每种工业轮流上升，萎缩，然后终告垮台，这可能属于工业发展的一般趋势。但在卡昂，是否有什么特殊原因在起作用，阻碍着手工工场的广泛发展呢？

当年创建任何一项工业都必须适应两个可能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工业必定朝食物过剩的地区发展，粮食过剩的地区对工人具有几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让-克洛德·佩罗³¹⁰写道：“在某种程度上，往昔的工业必须设在食物丰富的地区，其原因同工业化时代的工厂必须集中在矿产丰富的地区一样。”第二个条件几乎倒了过来：工业必定在食物资源相对不足的地区发展，过剩的人口在当地提供廉价劳动力；罗阿讷、拉瓦勒或诺曼底林带地区的工业，特别是维勒迪约—莱波埃勒的铜器加工中心³¹¹，都足以为例。

卡昂应列入第一类。但这对工业发展是否最有利呢？总的看来，卡昂的工业根基还很差，而这与国家无关，原因并不是税收负担过重（别处时有这种情形）。也不是因为行会控制太死，或因当地资金不足。如果说有障碍，毛病可能出在邻近乡村的富庶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后果。让-克洛德·佩罗正确指出，“卡昂乡村的富庶的确在许多方面导致了诺曼底的农业不愿为工业服务”³¹²。

首先，农业拒绝供应城市充足和廉价的原料。亚麻和大麻种得很少，而且质量欠佳（用于制作花边的麻线将从荷兰或庇卡底输入）。羊毛也质次价昂，因而向英国求助。整个下诺曼底都原料不足，而与此相反，上诺曼底土地不甚肥沃的乡村却甘愿适应鲁昂及邻近的其他工业中心的要求。

另一方面，虽然卡昂周围的地区人口众多（每平方公里约70至80人，甚至达100人），虽然乡村总有些人迁居城市，但乡村的人吃得饱肚皮，又有不少事干，往往宁可留在家里。因此，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仍然狭窄，很少有扩展的余地，至少从路易十四统治末期起是如此。手工工场的一名督察于1764年惊呼：“假如能得到期待已久的充足的劳动力”³¹³，我们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到！至于家庭副业，农民的日子相当好过，对此不太起劲，必须付出高价才肯接受。1715至1724年间，王家手工工场的织机有四分之三停工待料。1766年，村妇们对加工纱线再三推辞，“除非肯付比以往高得多的工钱”³¹⁴。

农村富裕造成的另一项后果是占用了城市的投资。资金的投放对象主要是土地（约占40%）、房产和息金（尤其是土地息金）；很少捐买官职，几乎不办两合公司或实行商业借贷（占0.5%）。工商业主平均只把其祖产的40%投入流通渠道，其余的则购置不动产或坐收息金。每当出现困难，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总是首先牺牲息金收入，而不放弃地产³¹⁵。

以上的原因只是部分地与经济有关。在这些百物丰登的乡村，土地和地租当然是生财之道，而在创业之初，工业却从不是获取高利润的部门。工业家必须兼营批发才能致富，如在拉瓦勒那样，他们把产品投入到有利可图、但也冒点风险的远程贸易中去。然而，仰仗土地安居乐业使人养成一种反对任何冒险的心理，对尚无把握和带有风险的投资充满疑虑。

卡昂正属于这种情形。地主纷纷拥入城市，支配城市的一切，并使城市昏昏入睡。让-克洛德·佩罗甚至说，“整个地区陷于冬眠”³¹⁶，这个说法未免过分尖锐，但相当形象。卡昂难以接受新事物或新诱惑。当地有个别投机者出资开发矿产。少数律师和高级官吏曾对经济学的新观念发生兴趣。但都没有激起多大的反响。即使直接影响其生产的纺织部门也是如此。卡昂对技术革新表现冷淡，而在1750年后，技术革新在法国各地普遍得到鼓励。鲁昂始终密切注视着英国的技术革命，甚至不惜窃取工业情报，相比之下，卡昂总要落后50年左右。卡昂的商人只是通过卡昂和吉布雷的大型交易会才与外界有所往来。他们在法国的活动范围间或超过布列塔尼、诺曼底和巴黎地区，对法国东部和南部则置之度外。只有极少数人偶然投资创办海运两合公司：席卷法国的远程贸易热潮仅在18世纪末才波及卡昂。早年曾从事黑奴贩运的船长、卡昂的市民勒瓦尼埃于1781年发表了关于“海上贸易之利益”的一篇短文，他就卡昂唯一的商业银行“戈蒂埃银行”1775年的破产发表评论说：为什么这家银行对利率为4%的借款和存款竟没有很好利用？“如此无所作为，真正使我弄不明白”，他愤然作色地指出，难道这笔款子还不够装备10至12艘船吗？³¹⁷

确实，对于一个因循守旧、“坐收息金”、安享太平的城市，怎么可能推动得了³¹⁸？卡昂满足于本地的乡土生活，眼界之狭窄只看得到老圣艾蒂安城堡的塔尖或男女修道院华丽的屋顶，并且以重农学派的贤明通达而自鸣得意。对其势力范围达不到迪沃河彼岸，它也毫不在乎。在这条小河的另一侧，鲁昂的影响起着决定性作用。鲁昂名胜众多，财富殷实，又面对大海和外部世界，才是真正的大都会。

总之，家庭条件过分优裕，很少受到困难的追逐，见不到面前的挑战，不幸也就随之降临。

大城市的地位

根据巡按使的调查³¹⁹, 1787至1789年间, 法国城市人口可得出以下的统计数字。按高居榜首的12个城市的顺序排列: 1. 巴黎, 524 186人(数字大概估计过低); 2. 里昂, 138 684人; 3. 波尔多, 82 602人; 4. 马赛, 76 222人; 5. 南特, 64 994人; 6. 鲁昂, 64 922人; 7. 里尔, 62 818人; 8. 图卢兹, 55 068人; 9. 尼姆, 48 360人; 10. 梅斯, 46 332人; 11. 凡尔赛, 44 200人; 12. 施特拉斯堡, 41 502人。居民超过3万人的城市还有: 奥尔良, 35 594人; 布雷斯特, 33 852人; 蒙彼利埃, 33 202人; 图尔, 31 772人; 特鲁瓦, 30 706人; 兰斯, 30 602人……读者顺便已注意到, 波尔多当时正值鼎盛时期, 其位置排在马赛的前面。但这仅是一个细节。

如果把以上数字同法国的总人口(可能为2900万)作一对照, 人们可以看出, 与英国或荷兰相比, 法国的城市人口显得太少。巴黎约占总数的五十分之一到六十分之一。12个大城市的人口加在一起, 共1 249 890人, 占法国人口的二十三分之一。今天, 巴黎及其市郊将近占我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因此, 这些大城市过去曾给数以百计的次等城市和集镇留有滋生繁衍的广阔余地, 这显然证明昔日法国的城市结构尚未完善。

这12个非同寻常的城市, 或用安德烈·皮亚蒂埃的说法, 这些“出类拔萃的城市”, 或不如说, 这些超级城市, 它们在我国狭窄的地域上又怎样分布的呢? 其中有4个城市是港口: 鲁昂、南特、波尔多、马赛。另外4个位于陆地边境: 里昂、施特拉斯堡、梅斯和里尔。尼姆姑且撇开不谈, 这个城市靠近大海, 但又并不经常参与海上活动。剩下3个内陆城市: 巴黎、图卢兹和凡尔赛。凡尔赛也可不算, 我们有权把它同巴黎并在一起。凡尔赛像是城市的附庸, 那里发生的一切事情, 甚至出租马车不停的奔驰, 凡尔赛路上玩命地

策马飞奔的“狂人”，都与首都有关。

总的算起来，在12个大城市中，以地处边沿（海边和陆地边境）的城市居多，9个城市占着12个城市总人口的半数（626 436人）。这些边沿城市一脚留在法国境内，一脚跨出法国境外：鲁昂、南特和波尔多与波罗的海、北海、英吉利海、大西洋、美洲（加拿大、安的列斯群岛、葡属和西属美洲）、远东相联系；尼姆位于朗格多克的边缘，而朗格多克本身也越出自身的界线；马赛被称作柏柏尔和勒旺的城市，更正确地说，它是个地中海城市；里昂把德意志和瑞士各州的交易吸引了过来，它的鸿运高照主要因为它长期是个意大利城市，是个“不在意大利国内的米兰”；里尔与佛兰德、荷兰和英国相联系。也就是说，与从17世纪开始成为欧洲最进步的地区相联系。施特拉斯堡之所以相形见绌，排在末位，这是因为，在路易十四于1681年对这个国际城市实行武力兼并后，施特拉斯堡便变成了在它以前已被并入法国的阿尔萨斯地区的首府。另外的原因还在于，德意志转过身去，开始朝阿姆斯特丹、里昂和意大利的方向发展贸易，而不再同施特拉斯堡打交道。德意志经济因而使施特拉斯堡的期望落空，正如也让巴塞尔的期望落空一样。最后再看梅斯的情形（关于梅斯，我后面还会谈到），这个与德意志和尼德兰交往频繁的城市首先是个“军事重镇”，法国通过梅斯窥测莱茵河地区的动向；莱茵河地区战云密布，不断使法国担惊受怕。

除巴黎以外，图卢兹是内地唯一的大城市。尽管两个城市的分量相差悬殊（过去或现在），仔细想来，把它们相提并论似乎也还合乎情理：它们难道不正是法国两大冲积盆地（巴黎盆地和阿基坦盆地）的引力中心吗？图卢兹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中央高原、地中海、比利牛斯山、西班牙和大西洋均有道路可通。附近地区盛产粮食，资源丰富，生活稳定。加隆河可与塞纳河相比，尽管到头来总还不如塞纳河。在几个世纪内，图卢兹城也曾在人物荟萃、文

化渊源深远的朗格多克地区占有统治地位。假如历史给予厚待，图卢兹的语言本可以像法兰西岛的语言那样，征服辽阔的地域，向东越过莱茵河，向西直抵大西洋。图卢兹如果成功，不就是另一个巴黎吗？今天，拥有60万人口和众多工业的图卢兹会不会重整旗鼓呢？

以上见解未免显得唐突。但是，它们同两个法兰西并存（奥依语的法兰西和奥克语的法兰西）的基本认识再次不谋而合。难道不正是巴黎降服了并逐渐扼杀了蝴蝶花的城市，正如它把奥尔良或兰斯收拾得服服帖帖一样？奥尔良和兰斯曾是巴黎的北方劲敌，假若没有历史从中作梗，它们很可能成为法国的引力中心。

但是，除了北方和南方以外，其他两个法兰西——内地和边境，二者不断发生冲突，至少互相敌对——难道就不存在吗？内陆城市和边远城市的反复较量并不是法国特有的现象：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马德里和塞维利亚或加的斯，柏林和汉堡，维也纳和的里雅斯特都可以作为例子。这类边远城市较少受到干扰，往往听由自身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的摆布。

法国沿海地带一度曾有严重的离异倾向。马赛的表现尤其突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马赛是个历史十分悠久的城市，依靠自身的活力繁荣了城市，争得了各种自由，并固守其既得利益，因而很晚才在法国这台机器上运转合拍。马赛甚至长期拒绝承认是法国的城市。鲁昂和南特是比较顺从的城市，甚至波尔多也是如此（投石党时期及吉伦特党当政期间除外）。但它们毕竟是些各据一方的城市，它们的利益、兴趣、爱好和生存空间与首都和法国内地几乎完全不同。

巴黎在边远地带的唯一对手是里昂，而里昂却很少意识到这一点。里昂的市政长官（1706年2月10日）³²¹曾说过，里昂是“王国的第二大城市……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城市”，交易会、现金和信贷

吸引着阿尔卑斯山彼侧、莱茵河彼岸和瑞士的客商。这里商贾云集，长期是王国的金融中心和资本集散地，而且距巴黎较远，可不受太多的刁难和挑剔。但在18世纪末，巴黎随着交易所的创办而日趋繁荣，“营业额”的增长不像约翰·劳时期那么疯狂，却更加扎实，从而已恢复或即将恢复对法国资金的控制。但归根到底，里昂同巴黎的较量，还只是陆地与陆地的竞争。在巴黎和鲁昂、巴黎和南特之间，却没有发生陆地与大海的抗争，这对法国来说(或对历史学家来说，他们事后观察历史，不免提出一些离奇的苛求)真是多么不幸！奇怪的是历史没有给法国提供这个机遇。

巴黎与其他城市相同吗？

不管经济学家、地理学家、一般评论家作何定论或作何预测，我相信“超级城市”即使在今天也永不脱离其立足点，永不背离中等城市的常规和命运。超级城市仅在表面上走出“城市、集镇、村庄”的习惯格局，尽管它比其他城市更多地，而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大城市对大城市的协商一致。今天，每个超级城市都直接面向世界，倾听世界的呼声，追随世界的潮流，但它们至今还不能脱离自己扎根的基地，不能放任自流地生活。只要看到过去的巴黎(巴黎在以往的不同时代始终是个硕大无朋的城市)怎样遵守城市建设的一般规律，人们也许会更加容易懂得以上的道理。陆路交错，江河纵横，赋予了巴黎优越的地理位置；这在最普通的地图上一眼就可以看到；罗纳河上满载木桶的船只和木排鱼贯而行；马恩河水流湍急，变幻莫测(船只在过桥时不免会撞上桥墩)；瓦兹河水流平稳；塞纳河逶迤曲折，缓缓而行，终究流入大海……不管人们怎么说，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罗纳河和索恩河给里昂提供的有利条件堪与巴黎相比。

如同所有的城市一样，巴黎是从一个交叉路口逐渐建设起来

的；一条南北通道（过去是圣雅克街，再加上圣马赛尔街）、一条东西通道（圣奥诺雷街，位于塞纳河右岸）。后来，又开辟了两条新干线，与原来的通道相平行；一方面是圣米歇尔林荫道和塞瓦斯托波尔林荫道，另一方面是于1800年开始铺设的里沃利街，与以上林荫道垂直相交。巴黎的古建筑今天仍然位于这些新旧通道的交汇点附近。它们是昔日巴黎宏伟壮丽的见证。

国家犹如精益求精的工匠，乐善好施的仙女，创造一切，推动一切，顺应着巴黎的命运。因其地位的特殊，条件的优越，金钱在巴黎汇聚和积累起来，被重新使用，或被挥霍浪费。正是法兰西王国的全部资金，特别是政治资金，同时培育了巴黎的进取心和寄生性。欧洲的汇兑商全都知道，向巴黎发出的汇票容易得到兑现，正如启蒙时代向威尼斯签发的汇票一样³²²。

资金的充裕，寄生的繁衍，自然以巴黎在整个法国首屈一指。当然，所有的城市都必定财大气粗，城市生活总是比别处更加昂贵。1800年前后，即使像沙托鲁这样的小城市，其生活水准在邻近地区中也高居榜首³²³。

巴黎也是成批移民的汇集地，同其他城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乞丐、流浪汉和穷人有时向城市猛扑，简直势不可挡，甚至以粗野闻名的巴黎警察也无可奈何；乞丐的渗透无孔不入，犯罪行为也随之剧增，警察人数太少，警报纷传，却穷于应付。这是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的罪恶渊藪³²⁴。

同所有的城市一样，巴黎为其自身的问题所困扰，最明显的结果就是街区的专门化。巴黎的空间存在等级化的倾向，手工业以及贫民的棚屋拥挤在圣马赛尔和圣安东尼关厢（直到第二帝国末年，圣安东尼关厢仍保留着受老式商业资本家控制的陈旧过时的手工业）³²⁵。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必定要跟上国家的步调而畸形扩张，由于18世纪的“大兴土木”，巴黎的街区布局出现了巨大的变

动。重力中心逐渐向西移动，同时又在塞纳河右岸和塞纳河以南为富人建立“空旷宽阔”的新街区。“1737至1740年后，大下水道（污水使塞纳河臭气熏天）加盖工程的完成使城区朝西北部的鲁勒河和蒙索方向发展。金融家纷纷在林荫道的外侧进行投资，接连开通了普罗旺斯街、阿图瓦街、肖沙街、泰布街、拉博特街。在塞纳河左岸，河滨路、荣军院和军事学校的兴建为向大石区和格勒内尔一带扩展提供了据点”³²⁶。

随着贵族向巴黎西部推进，东部的贫民区也日渐扩大，以容纳不断涌来的外乡人。这些移民初来乍到，便根据各自的原籍，分省分区集中，形成一个又一个小社会。以圣马赛尔关厢为例：“勃艮第人住在圣维克多街、奥尔良街和河滨路。那里也还有些洛林人、香巴尼人和诺曼底人。利穆赞人往往选择圣雅克街和莫贝尔广场一带，奥弗涅人在穆夫塔尔街和卢兴街安顿，这两条街上还住着皮卡底人、佛兰德人和多菲内人”³²⁷。由此可见，街区像是城市中的村庄；“老乡”就在那里碰头。在1960至1970年的大规模建设以前，巴黎的某些街道也还是布列塔尼人、奥弗涅人、萨瓦人的聚居地。这些陈迹即使至今也并未完全消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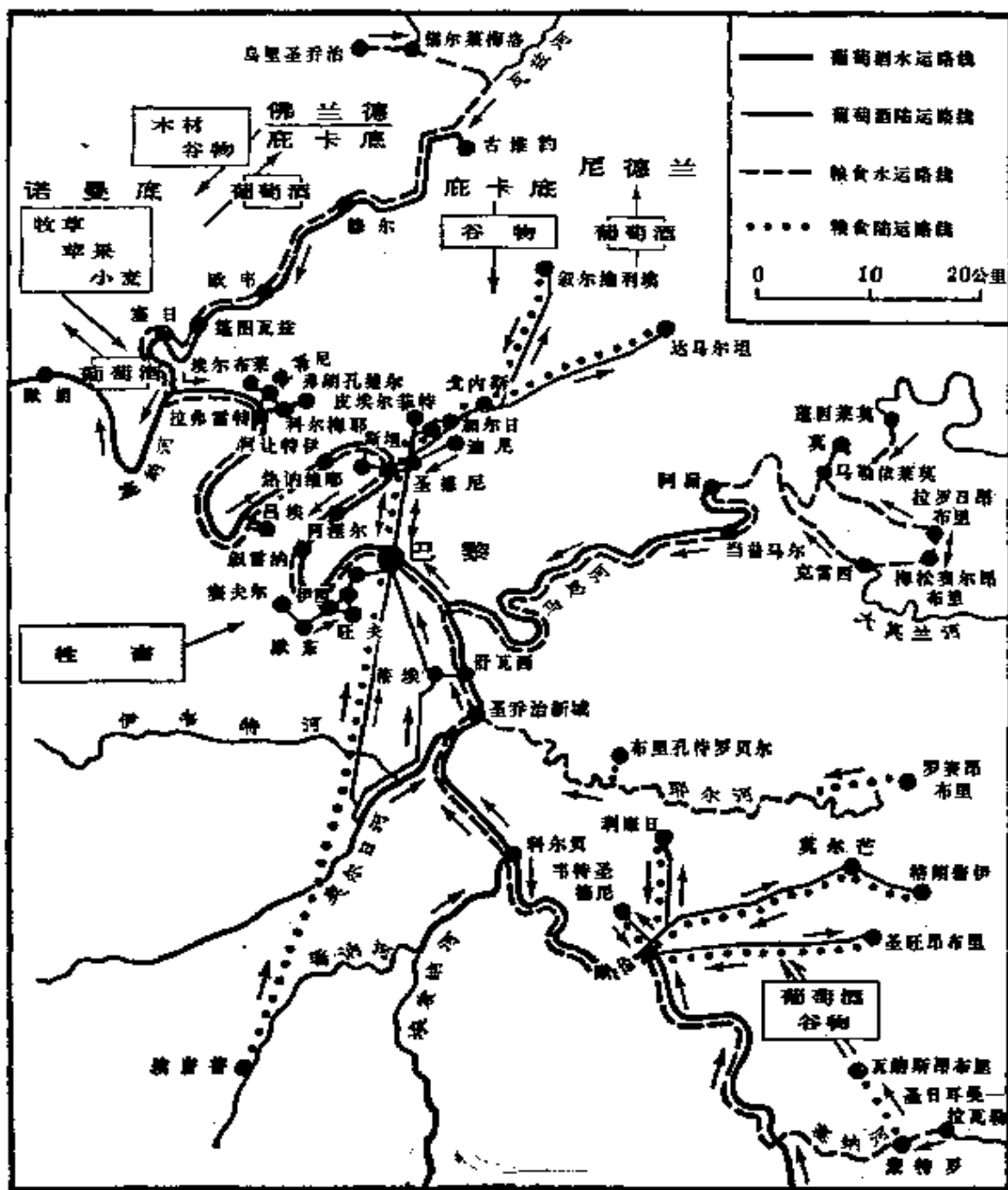
近郊和远郊的乡村也逃不出大城市的手掌，邻近土地的大幅度增值与巴黎有关。蒙特勒伊的土地和果园身价百倍，罗曼维尔、苏雷纳和伊弗里坡地上的葡萄树茂盛兴隆，都是这个原因。1704年2月的一个夜晚，20来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硬闯圣马赛尔区的税卡，每人背着一“背筐”葡萄酒（每个背筐装一只小酒桶）。据违警文书记载，“圣马赛尔和圣雅克关厢的酒铺主晚上把维勒瑞夫生产的葡萄酒大量私运进城，恰恰也走这一条路”³²⁸。只要土壤和地势适宜，哪怕只是一半适宜，巴黎围周还有什么地方不种葡萄？市郊的葡萄种植大概居法国的首位，至少每公顷提供的收益肯定最高，据1817年的一项统计，超过勃艮第、香巴尼或波尔多的优质葡萄酒

产区。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下一章里再谈。正是巴黎造成了市郊的畸形发展，任何劣质葡萄酒在市郊的小酒铺都能畅销不衰，由于不过城门，不付入市税，葡萄酒的售价低廉。

凡去巴黎旅行的人都必定注意到周围的景色在逐渐变化。例如，1656年12月，两名荷兰人刚从瓦兹河畔的博蒙启程。他们说：“走出这个小城市后，我们猛然发觉离巴黎已经不远，我们看到许多漂亮的房屋分布在田野，路旁经过的村庄也比以往所见规模更大，建筑也更加讲究。人们称这些郊区村庄是巴黎的乳房，说得确有道理，因为巴黎正是在这里吸取最好的营养。”³²⁹这番话为屠能的公式作了绝妙的衬托。同样，1790至1792年间，一名妇女在革命巴黎的四郊行走，不免有点心慌意乱，却在拉维耶特前面看出了神，“靠近城门的栅栏路口，名义上只算是个村庄……这个地方却比外省的大多数三流城市更加热闹，居民人数也更多”³³⁰。

所有这一切，都要归结为巴黎的胃口太大。为了吃饭，为了生存，首都不得不牢牢控制乡村。居伊·符尔干³³¹写道：“在方圆40至50公里的范围内，相当于骑马一天的路程，巴黎在百年战争前一个世纪已实现了对这个地区的经济统治”；不但很早就扩展了各教会的地产，而且分散建造了一些城堡和乡间别墅。此外还要加上资产者的投资，而土地又是他们名利双收的源泉。在17世纪，这些土地投资为在巴黎周围建立大农庄起了促进作用。毫无疑问，所有的城市都莫不如此。

巴黎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宫廷的奢侈令人眩目，市民纷起效仿，造成社会需求的畸形膨胀。1700年间，巴黎已不再满足于唾手可得的大量葡萄酒和蔬菜，而且还要生产“无花果、石榴、柑桔和柠檬……药草及各种花卉……郊区的菜农自有办法把别处只在夏天才能买到的芦笋、朝鲜蓟、莴苣等等保存过冬”³³²。暖房已经推广。采用防冻设施的菜地生产时鲜蔬菜。例如，马雷在17世纪被改造



中世纪末巴黎的食物供应路线

这张地图突出地反映出，河流及其港口在巴黎的葡萄酒和粮食(重货)供应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陆路均就近与水路会合。地图引自R. 福西埃：《中世纪》，第8卷，1981年版。

为贵族居住区以前，就是一片这样的菜地。

只要走出巴黎的各个“栅栏路口”，田野、耕地、果园、村庄、农民便展现在人们的眼前。1830年7月29日，起义者攻占杜伊勒里宫的消息一经传出，奥尔良公爵、未来的国王路易·菲利普也许为了躲避，“同经人介绍认识不久的耶迈斯一起，从讷伊落荒出逃³³³”于当晚到达雷希”。第二天早晨，前来请他接掌政权的议员们在讷伊没有找到他，于是只能去雷希请他回来³³⁴。让-巴蒂斯特·萨伊或米希莱常越过栅栏路口外出游览，几乎到达野外，途中遇到的都是真正的农民。1815年5月，联军逼近巴黎，关厢的居民纷纷逃往城里，难民全都是真正的农民。布瓦涅伯爵夫人及其母亲坐车出城，但见围城林荫道上“挤满了巴黎市郊的人”。“拥挤的人群赶着牛羊，带着包裹行李，杂乱无章地前进……随时准备对比他们更走运的人发泄怒火。人们只能一步一步地紧挨着走；我们的四轮马车不免招人辱骂”³³⁵。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同样的情形于1870年再次发生。阿歇尔教授（是位医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德军逼近时，城里的许多家庭离开巴黎，而市郊的居民却携带车辆和牲畜涌进城来。这些乡下佬就在新筑大道两侧的空楼房里住下。”³³⁶霍斯曼男爵肯定没有预见到竟会发生这样的事！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屠能所画的第一道圆圈，这里的集市向城市提供日常食品。圆圈的范围相当宽广，与城市的大小恰成比例。

这是个硕大无朋的城市，谷物、肉食、森林等其他圆圈又怎么画呢？依我说，就同其他城市一样，只是构成圆圈的集镇在这里是一系列城市。

一份未曾发表的文献资料³⁷⁷表明，在18世纪，巴黎的周边线之一经由蓬图瓦兹、芒特、蒙福尔、德勒、默伦、内穆尔、莫城、罗赛昂布里、库洛米耶、普罗万、诺让、蒙特罗、桑斯、茹瓦尼、圣弗洛朗坦

等地。在这条线上，每个城市程度不同地各司其职，向巴黎输送木柴、草料、活牲畜、木炭、燕麦或劳动力，其中尤其以小麦居多。为了达到巴黎地区的极限范围，还必须更往远去，触及一系列大中城市：奥尔良、特鲁瓦、马恩河畔的沙隆（或不如说维特里—勒弗朗索瓦，来自巴鲁瓦和洛林的小麦在这里集中装船，经马恩河运往巴黎）、兰斯、贡比涅、亚眠、鲁昂、沙特尔。巴黎的影响在或近或远的不同地点有时逐渐减弱，甚至完全消灭（极限范围也随之变化）。但是，力畜和肉用牲畜属于例外，因为这种商品不必使用运输工具，可以自己转移地点。

巴黎与这些周边城市之间存在着此长彼消的相互关系，我们这里有现成的证据：宗教战争末年巴黎被围期间（1562至1598年），首都苦难深重，经济陷于瘫痪，这些“次等”城市乘机收容了外逃的失业工匠、商人和资产者。在另一方面，巴黎不也正是从这一系列周边城市吸引大部分移民，特别是招募其大部分仆役吗？在通往首都的途中，有两个城市充当中转站，西面是凡尔赛，东面是特鲁瓦（从勃艮第、香巴尼远道而来的移民都在特鲁瓦中转）。

但请注意，巴黎对物质供应的主宰大体上仅限于夹在英吉利海峡和卢瓦尔河之间的巴黎盆地，包括庇卡底、洛林和诺曼底，勉强还可算上阿尔摩里克的边沿地带。巴黎把这块辽阔的地域完全控制起来，使这里的城市不能自由发展，始终停留在一定的水平之下……

当然，这不等于说巴黎的影响仅限于完全受其控制的地域之内。这里是巴黎物质生活的基地。但首都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许多影响，其范围之广，不断超出这些地域的界限。几百年来，巴黎也对整个法兰西的兴亡盛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村庄、集镇、城市的结构模式的现状

通过对昔日的法国进行以上的初步观察,我觉得已足以说明,在村庄、集镇和城市之间,存在着某些基本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否则法兰西的躯体——或欧洲任何其他民族国家的躯体——就不会有严密而牢固的结构。请看,这一构造体系经历了罗马帝国的垮台,特别是渡过了百年战争的难关,并且安然无恙。依我之见,它还经受了我国历史上最奇特的考验:1939年后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以及让·符拉斯蒂埃所说的“光荣的30年”(1945至1975年)的突飞猛进。

我想借用安德烈·皮亚蒂埃主持完成的研究成果为例证。安德烈·皮亚蒂埃在考察当今法国的“领土结构”时,把一省的地域——以卢瓦雷省为例——切割成几个城市引力区,具体地说,划分为奥尔良、蒙塔日、皮蒂维耶、吉安等城市的势力范围,每个城市分别把各自的产品、服务、中间环节、商人、商店、公证人、律师、医生等强加于它的势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势力范围互有局部的重合,城市与城市在边缘地带经常发生冲突,因而“根据城市与当地关系的紧密程度,可以排列先后顺序”,同时还根据不同的“交换体系”(奥尔良以城市为主,皮蒂维耶以乡村为主),区分各城市的“功能等级”³³⁸。

城市与城市的这些冲突并不同我所描绘的模式相矛盾:冲突能移动模式的位置,调整模式的布局,输送新的活力,但模式体系却颠簸不破。今日巴黎的逐渐扩大,难道不正是说明这一切的极好例子吗?对距离甚远的周边城市,巴黎有所偏袒,为扶持图尔和勒芒,不惜遏制奥尔良和昂热³³⁹。势力范围因此可能发生改变,而城市的网络依旧不变。

体系的结构原封不动,但在每个层次却有变化,不仅在城市一

级，而且在基层的乡村：近几年来，法国乡村蒙受了严重的摧残。1945至1975年间法国农民经历的演变比路易十四至普恩加来期间更大。我那故乡的村庄（成千个其他村庄同它一样）转眼间已变得面目全非；不再有马匹，但有拖拉机；几乎不再种麦，到处都是牧场；听任富裕农场主摆布的小农已再也见不到了。最后，人口猛然减少了一半。尽管如此，城乡的联系依然存在，只是网眼有所扩大而已。一个范围更广但又结构相似的联系网正在形成。

在这个问题上，昂利·芒德拉恰好为我提供了一个不容置辩的依据。在1980年出版的《智慧与混乱》这部集体著作中，他试图展示“法兰西的乐观形象”，国家的和谐、稳定和公平，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完美，对自身地位、存在问题和必要变革的认识也更加清楚；英国人彼得·威尔斯的名言值得牢记：“法国其实比它自己所想的更公平些”³⁴⁰。但是，我借鉴这部重要的著作，却并非由于以上的判断（尽管我也赞同以上判断）。这是因为我在一位惯于研究现实问题的社会学家的笔下，为我自己的立场找到了佐证。的确，在我看来，不论法国发生什么变革（在各个方面的实际变革），法国的乡村依然存在，它有力地保卫自己，并成功地适应现时的需要。自1945至1980年，法国人口由4 200万上升到5 300万，新增的人口首先有利于城市，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要用上个世纪的老眼光去看待当今的社会。”³⁴¹说得明白些，我们不能再把过去的标准当作铁定的界线：人口在2 000以上的居民点为城市，低于这个水平的则是集镇和村庄。更何况，早在18世纪和19世纪，这条界线已经过时。

今天，人口界线需要大大提高，应该定在1万至1.5万人左右，甚至更高的水平。在法国总人口中，居民在1.5万人以上的城市1946年占56%；1975年占58%；而乡村人口（低于1.5万人的水平）则分别占44%和42%（但人口的绝对数字仍有所增加）。昂利·芒

德拉由此得出结论说：“所谓‘法兰西的沙漠’³⁴²只是徒具虚名，其实从不存在。在20世纪末的今天，乡村人口仍停留在2200万左右，与18世纪末期相差无几，尽管19世纪的人口有了急剧增长。以小城市为中心的‘地区’网状布局基本保持不变……而且几乎到处都是如此……村庄中的农业人口有所减少，但小城市〔新型集镇〕的人口则相应增多”³⁴³。剩下的村庄继续种地，拖拉机代替了农业工人或牵犁的马匹，种地也往往比过去种得更好了。

可见，法兰西有着稳定的地域结构，正如米歇尔·罗什福尔所说，“地区作为一个特定的单位，并不始终取决于城市，而要由城市所属的整体组织所决定”³⁴⁴。中间层次的膨胀，集镇份量的加重，“这是因为工业〔必须说明，这里应包括大工业和现代农业〕反过来又孕育了崭新的第三产业”³⁴⁵，也就是说，比以往更加充实有力的第三产业。无论过去或现在，村庄都与城镇结成某种合作关系，集镇在其中“承担每个村庄单独行使不了的职能”³⁴⁶，“而第三产业，不论是商业或服务业（住房、医疗卫生、金融、交通、行政等），都为这种结合起着凝聚作用”³⁴⁷。

安德烈·皮亚蒂埃走得更远。他写道：“第三产业早在第二产业（工业）很久以前业已存在，正是它缔造了城市。无论在多么久远的过去，城市始终是商贾云集、交易兴旺的中心。它的出现为附近地区的居民提供了联络和合作的据点……”³⁴⁸我们且记住，第三产业由来已久，远在现代以前早已诞生。这个观点同我以上所说的正是不谋而合。说到第三产业，人们怎能不联想到等级？第三产业既是城市的工具，又是城市居高临下的根本原因。很早以前，集镇已拥有活跃的第三产业。现实是对历史的充实和丰富。一切都十分符合逻辑：除非在自给自足的阶段，生活不能没有第三产业，即使在那时，也总有一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人服从命令。

第三章 地理是否创造了法兰西？

这个问题提得突然，但它毕竟是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提出过的老问题。拉布拉什问道：“法兰西难道是个地理存在吗？”¹ 更加可以肯定的是，它还牵涉到地理决定论的模糊命题。不管人们怎么说，我以为由这个问题引起的论争还有待澄清。

地理学家诚然早已宣布地理决定论不能成立。在他们看来，决定的因素不是土地、自然界或环境，而是历史，是人；人类始终不能超脱自身，它接过祖先从事的事业，继承以往的传统和技术，并在一系列历史条件的决定下开创未来，虽然人类对这些决定性因素很少意识到。

就我个人而言，我始终对历史渊源的沉重负担深信不疑，并且为之惊恐不安。历史把我们压得简直透不过气来。但这不等于说，在法兰西复杂的成长过程中，应把一切归诸于过去。否则，那就会使法兰西悬在空中，头不着天，脚不沾地。那当然是愚蠢的。法兰西确实是奇迹般的历史积累的产物，但这是历史在特定地点的积累。法国在欧洲接合部占有特殊的地位，法国处在欧洲的范围之中，这一切全都起了作用。维达尔·德·拉布拉什针对法国的一句话说得有理：“一国的历史不可同国人居住的地域相脱离”。他接着又说：“因此必须认为，地域像是一个储能库，自然界在这里蓄积了能源，但如何使用则取决于人”²。

这番话可被列入“可能论”的范畴；“可能论”是吕西安·费费尔为概括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思想而创造的一个词³。一个

“可能的”法兰西，几个“可能的”法兰西，我对这些提法到也并不觉得讨厌。但我们能否抓住它们的含意呢？不得已求其次，我终究只能赞同今天的地理学家的见解，认为唯有历史才能说明法兰西作为一个地理整体的成长过程。有鉴于此，我选择了三个命题，以便深入进行探索。也许不必说，这是从几十个论题中筛选出来的三个命题。

一 不要夸大法兰西地峡的作用

这里必须先就法兰西地峡的问题作一番交代。如果我没有弄错，“地峡”是法国地理学家创造的一个术语，至少是他们常用的术语，特别是在过去。欧洲陆地之狭窄，简直称不上是一块大陆，也许应被视为庞大亚洲的海角或顶端；越往西伸展，夹在北方诸海和一系列海洋盆地之间的欧洲越加狭窄；地中海位于海洋盆地的正南方。几个与经线平行的地峡把无论是历史或者是气候全都互相排斥的、恰成鲜明对照的两个世界连接在一起：从北海到波罗的海的俄罗斯地峡；从亚得里亚海或热那亚海湾到汉堡或尼德兰的德意志地峡；最后是法兰西地峡，这个地峡实际上有两条通道，除了地中海顺着南方运河（于1666至1681年开凿）的走向，经由诺鲁兹山口与大西洋取得的联系外，还可加上从罗纳河到索恩河，然后再到塞纳河或莱茵河的一条路线。法兰西地峡的跨度最短：俄罗斯地峡长1200公里；德意志地峡长1000公里，并且必须翻越阿尔卑斯山；至于法兰西地峡，“从塞纳河口到罗纳河三角洲长约700公里，从加斯科尼湾到利翁湾仅长400公里，而且两条通道沿线都没有山”⁴。恩斯特·库尔提乌斯的一句话说得巧妙：“北方人可在法国满足其情怀地中海的宿愿”，因为法国“与德意志不同，前往地中海沿岸不必翻越阿尔卑斯山”⁵。

地峡的收缩(或用莫里斯·勒拉诺不无风趣的说法:“地峡夹紧钳口”⁶)使北方和南方、大西洋和地中海在法国境内互相靠拢,这对法国十分有利。这大概也是法兰西地域的基本特征之一。

在法兰西地峡的两条通道中,只有一条堪当欧洲地峡的称号。经由诺鲁兹山口的陆路在古罗马时代已往来十分频繁,加上加隆河水道,连接起地中海至大西洋的交通,但这条路线仅在16世纪的短时间内才是重要的国际交通线;在16世纪,英国的羊毛抄这条近路(还有拉罗歇尔经由卡奥尔到尼姆的罗马古道)⁷运往地中海和佛罗伦萨;此外也许还有图卢兹生产的菘蓝(但我不能十分肯定),这种风行一时的染料后来将被海外的靛蓝所取代。

罗讷河的通道之所以占了上风,原因并不在于它更加方便(罗讷河的通道更长),而是因为它从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北欧各国,地中海在这里遇到自己的对立面,反方向也是同样的情形:北方与南方在这里狭路相逢。这种状况从史前时期早已开始,并且延续至今。随着欧洲经济区在中世纪首次建立,北意大利与尼德兰这两极接通了,两极之间的联系更趋扩大。两极之间通电进一步提高了这条经线通道的价值,这就再次显示了它的许多有利条件:罗讷河与索恩河、卢瓦尔河、塞纳河(及其支流约讷河、奥布河、马恩河、瓦兹河)、摩泽尔河和莱茵河等航道全都连接在一起。

在没有水路可通的地方,车辆和驮畜进行必要的补充:从里昂出发,经由中央高原的边缘,抵达卢瓦尔河;在第戎以远,经科多尔省,在索恩河和塞纳河之间建立联系;由索恩河经勃艮第出境前往莱茵河。水陆道路共同汇成一个庞大的交通网,进而征服和利用法兰西的全部地域。罗马帝国为对高卢进行“殖民”开发而兴建的大道促使整个水陆交通更趋活跃。罗马军团把交通网的东段置于首位,一方面朝莱茵边界的方向,抵达与日耳曼地区隔界相望的特里尔或科隆,另一方面则经由布洛涅地区朝英格兰方向伸展,该岛自

公元85年后逐渐被罗马所征服。

保尔·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率先强调了贯穿法国全境的这条河道的重大意义。他写道：“地中海与北海的靠拢很早就对我国国土的形成产生了影响。这一影响在地理方面表现为远距离联系的建立，而远距离联系的建立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影响。以普罗旺斯为起点并以英格兰和佛兰德为终点的法兰西贸易干线，其稳定性的确令人刮目相看。中世纪时代的主要交易会——博凯尔、里昂、沙隆⁸、特鲁瓦、巴黎、阿拉斯、图鲁⁹和布鲁日——正是沿着这个方向陆续向前延伸的。这条流通渠道对政治统一的确立可能产生的影响几乎是不可捉摸的，但我们有不少实例可加以说明：只是在阿庇亚大道和弗拉米尼亚大道连通了南北两端以后，意大利才以政治区域的面目而出现。在大不列颠的交通网络中，伦敦通往塞文峡的路线——华特灵大道——曾是英格兰的要道。”¹⁰

从以上的寥寥数语可以看出，罗纳河、索恩河和塞纳河（或莱茵河）的联系干线是法兰西实现统一的原因之一，甚至是主要的或根本的原因。有鉴于此，应该传讯到庭作证的第一位证人就是罗纳河。我将从罗纳河着手，开始寻找“可能的法兰西”。

1850年以前的罗纳河

证人显然是昨日的罗纳河，这条河水流湍急，恣意妄为，“变幻无常”¹¹，沃邦称它“无可救药”。但这一切都已成为往事，技术的进步、经济的需要以及才刚完成的一项大型工程已使河流改变了面貌，一下变得驯服和顺从起来。

昨天，由于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和雪水的下泻，河水奔腾澎湃，夹带大量泥沙和石块，这些滚动的石子如今在乡间的小路上，在罗纳河流域城市的街道上比比皆是，使过路的牲畜和行人磕磕绊绊。

道路和桥梁工程师夏尔·朗代里克于1892年告诉我们说：“泛舟河上的人，只要注意观察，不难看到或至少听到水下石子的滚动，并且分辨出河面的汨汨流水声和水中成千上万块石子前推后拥的撞击声。”¹²

罗纳河的水土冲刷极其严重，任何人都不会对此感到惊讶：河身曲曲弯弯，在凹进的岸旁冲出深水区¹³，又在凸出的岸边留下浅滩。因此，在浅水区和深水区之间，就有几道沙洲和石礁呈脊状隆起，横置河中；这些障碍物还会流动，船只过河随时有搁浅的危险。每逢河流的枯水期，沙洲和石礁便暴露在水面上，每年约有70天不通航运。相反，赶上河水上涨，船只随着水流急速直下。例如，从图尔农至圣灵桥这段长90公里的狭窄河道上，船只犹如射出的飞箭，圣灵桥的桥洞过于狭窄，通行尤其危险，总要让人胆战心惊。流速过急还阻碍逆水航行。后来出现的蒸气机船并未完全解决问题：由于以上困难，罗纳河上不能使用一般的拖船，必须配备专门的拖曳装置¹⁴。另一个困难是狭窄的河谷中风力强劲，其中包括可怕的密史特拉风。每当狂风刮起，又该如何办呢？幸而河中岛屿众多，可供船只避风，不然就得把船牢牢地系在岸边，等待暴风停息……

可是，几百年来，这条充满危险的河流却是往来舟楫如织。早在罗马时代（可能还要更早），满载货物的船只在罗纳河上往来不绝。从一些铭文可以看出，罗纳河有着无数的船运组织，尤其该河支流甚多，除索恩河外，还有阿尔代什河、迪朗斯河和伊泽尔河；几百年来，每条支流各有其内河航运业。

木船运输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叶，几乎直到今天，没有发生多少根本性变化。木船甚至成功地抗御了蒸气机船的竞争，后者于1829年崭露头角。因此，直到1850年为止，罗纳河上始终展现着木船往返繁忙的生动景象，这些传统木船平底，体大，名称各异：平板

船(供运马用),塞塞勒船(因在塞塞勒制造而得名),松木船或萨瓦船(船身长达70米),橡木船(在索恩河沿岸制造,通常用于谷物运输)。同卢瓦尔河的船只相比,这些船只堪称庞然大物……此外再加上专门从事客运的马拉驳船,即长约15米的“水上马车”,驳船舱内设有长条板凳,供旅客就坐,就像马车车厢一样。有的驳船较小,又名“快船”,必要时划桨前进,而大型驳船则“随波逐流”……小驳船也称“小木船”,载重可达250公担;它们逆水航行,从阿尔勒到里昂“约需7至8天,从阿维尼翁到里昂需6天”,而通常在罗讷河运货的大木船在阿尔勒装船和逆行到里昂分别“历时一月之久”。船只顺水航行,速度大大加快,自里昂至阿维尼翁仅需2天时间,顺水下航的时间随冬季和夏季的不同还有很大差别¹⁵。

顺水航行比逆水航行更迅速,但也更危险。旅行者无不视为畏途。1320年,佩特拉克坐船前往里昂,因罗讷河被赶赴博凯尔交易会的商船所堵塞,便先去富菲埃尔教堂恳求圣母的保佑。

船行迅速自然是件好事。一名旅客于1704年5月坐船从里昂前往阿维尼翁,他后来说:“船只沿罗讷河顺水下行,速度极快,这对坐船去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的人来说十分方便”¹⁶,去意大利当然也很方便。但航行事故也真不少:塞维尼夫人1673年因船只失事遇险;英国人克劳杜克夫人1784年在冬季枯水期旅行,船只在沙滩搁浅;她“好不容易”方才脱身,并花了不止一天的时间,从里昂前往维埃纳;硬是使用32匹马总算把船从沙滩拖出¹⁷。1799年秋季,马尔博将军坐船去意大利大军赴任,尽管罗讷河当时水位较低,途中躲过了不少浅滩,但在接近圣灵桥时,突然刮起密史特拉风。随父同行的将军的儿子写道:“船夫们没法让船靠岸。他们六神无主,索性不再工作,祈求上帝保佑;就在那时,狂风急浪把船推向桥去!眼看就要撞上桥墩,父亲和大家一道举起带钩的船篙,及时向前猛扑,抵住桥墩,避免发生直接撞击。船篙的反作用力之大,一下把我

们撞倒在长凳上,但这一撞却使船改变了方向,奇迹般地从桥拱下顺利通过……”¹⁸

“逆流而上”的航行不会产生以上危险。但又要费多大的劲呀!“船工行业的辛苦说来真是一言难尽”¹⁹!船只行进时排成一列长队,通常为四、五艘,有时更多;第一艘船像是海军中的旗舰,船身光滑细巧,船尾设置一舱,船员集中在舱内睡觉、做饭、吃饭……然而,往往沿着河流的左岸,约有50来匹马聚在纤道上拉纤,其中28匹拉前边的纤杆,另外20多匹拉后边的纤杆。一位作家热情地赞扬说:“多么出色的马匹!如此高大有力的马恐怕今天是再也见不到了。”²⁰19世纪初,罗讷河两岸共有马6 000匹之多。到达里昂后,马匹便交给莫拉蒂埃尔的马厩喂养,然后经这个转运站,用平板船(名符其实的水上马厩)运回南方,再次在纤道上劳作。

留在纤道上的所谓“陆上水手”十分辛苦。他们要照顾牲畜(动身前进行检查,必要时重钉马掌,每4匹马为一组,分别用“套索”把它们同纤绳连接起来,再根据第一条船传达的船主命令,牵马前进),绷紧系在大船桅杆上的长麻绳,当纤绳与岸边“茂密的柳树”缠绕在一起时,设法解开缠住的结口……在某些纤道上,纤绳及“套索”的伸展距离可长达一公里。例如,在栋泽尔(即船工们所说的“猴山”),纤队在高出河面60米的岸边爬坡,船队则缓慢地鱼贯而行。还有另一个困难:当一岸的纤道中断时,必须把拉纤的马匹运往另一岸。马匹挤在专用的船只上,渡河前往彼岸继续拉纤。在这种情况下,船队显然要自己过河。1764年5月2日,一艘满载谷物的“橡木船”顺流而下,与正在易岸拉纤的船队不慎相撞,造成船身破裂,沉落河底²²。有时候,船队遇到急流巨浪的冲击,必须赶紧砍断绳缆,否则马匹会有落水的危险。

罗讷河上的船工几乎从不离开船只:他们不像卢瓦尔河或阿列河上的船工那样徒步返回原地,虽然船只在到达罗讷河下游的

港口后有时被拆毁和卖掉。他们的人数总的说来并不很多，1811年约在3 000至3 500人上下²³，全都来自沿河的几个地方（沿河有几个专门的船民村庄，正如沿海地区有传统的渔村一样）。日沃尔、孔德里约悬岩、塞里耶尔、昂当斯和圣昂代奥勒镇一带是“历来以河为家、子承父业的粗犷汉们的一统天下”²⁴。这些横眉竖目、敢作敢为的人抱成严密的团体，往往在亲戚之间凑齐足够的资金，买下一艘或几艘船。他们的打扮与众不同：佩戴金耳环，长发编成“几个小辫”；他们使用特殊的行话，与沿河居民的语言毫无共同之处；他们还有自己的节日，即12月6日的圣尼古拉节。甚至菜肴也有其独到之处：例如，把各种河鱼——种类既多，味道又好——切块放置锅内，浇上当地生产的红葡萄酒，再像制作潘趣酒一样点火引燃，这就是所谓“水手煮鱼”的烹饪法。最后，船工在沿河地带还有他们经常光顾的旅店，这些旅店的顾客几乎全都是船工²⁵。

此外，围绕着这些船工，还有我前面谈到过的“陆上水手”（人数同真正的水手不相上下），还有装卸工、搬运工等苦力，最后还有塞塞勒、里昂、韦内松、日沃尔、维埃纳、孔德里约、昂当斯等地的造船工人。这里且不算索恩河畔“橡木船”的造船工人。从阿尔沃河、伊泽尔河或迪朗斯河驾着大型木排（约60至80米长，14至15米宽）而来的“护排工”还不算在内，他们的情形十分独特。在水流过急的这些河道上，放送的木排并不完全是随波逐流、随流漂移的²⁶。

由以上这一切形成的宽广的河运体系能够承担起巨大的任务，虽说运输途中不免要遇到各种困难。

然而，与塞纳河或卢瓦尔河的情形不同，罗纳河的交通很少朝其支流的方向伸展。这些支流或者不宜航行，或者不能使用与罗纳河相同类型的船只。

唯独索恩河勉强是个例外。可是，索恩河每年都发生洪水泛滥，淹没沿岸的辽阔草地；漂流的浮冰有时使索恩河变得极其凶

暴，毁坏桥梁，撞沉或撞破船只，甚至冲走岸边的房屋²⁷。尽管如此，在索恩港以下的河段，河水充裕而平缓，可得舟楫之利。在罗纳河和索恩河之间建立联系却并不容易。为此往往必须更换船只。不仅如此，由于里昂的房屋一直建到岸边的河面上，没有纤道，牵引船只也就成了问题。里昂有一批船工，专门从桥上拉拽紧缚的缆绳，帮助船只逆流航行（纤夫此时站在船上观望）。这些船工横凶霸道，胡搅蛮缠，因为在法兰西地峡的这个最敏感的地点，他们拥有极大的权势。人们迫于无奈，只得委曲求全，听凭船工们敲诈勒索。

用以往的尺度来衡量，索恩河和罗纳河的运输量十分可观（罗纳河的运量可能达卢瓦尔河的4倍；可与莱茵河比拟，简直像是“双胞胎兄弟”）²⁸。但是，这两条河流（罗纳河和索恩河）位于南北向的同一条直线上，因而不能构成完整的航运系统。在里昂上方笔直向东、朝日内瓦方面伸展的罗纳河上游，通航河段只到塞塞勒为止。当然，通过某些陆路转运，罗纳河仍可与迪朗斯河和伊泽尔河的船运业保持一定的联系。我们应该想到还有其他的运输手段：一些陆路运输队，一些驮畜，一些货车从罗纳河沿岸出发，分赴中央高原、朗格多克、普罗旺斯、多菲内、萨瓦和里昂地区，甚至深入汝拉山区。车把式们“一手牵缰绳，另一手举鞭子，上身穿蓝大褂，下身是天鹅绒短裤，头戴五颜六色的帽子，另外还有羊皮披风和羊皮绑腿”²⁹，他们补充了罗纳河流域运输手段的不足，并使船运业与内地取得了联系。

整个运输体系于19世纪上半叶达到了最高的水平。顺水和逆水加在一起，货运量可能达40万³⁰至50万³¹吨，逆水运输量大体上约小于顺水的4倍。就按每艘船平均运输40吨计算，每年的航运船次将达1万次或者更多。据瓦朗斯水运局的计算，“从1809年4月1日起到1810年3月30日止，顺水驶往下游的货船为2250艘，

空载为150艘；逆水航行的货船共1468艘，也有少量空船”³²。任何计算都带有随机性。至于陆路运输，大概只相当于水上运输的一小部分，但这也不过是估测而已³³。

罗纳河上的往返运输活动蓬勃兴旺。北方各省在博凯尔交易会上购买的各种商品都经由罗纳河运输。满载地中海产品的海船在阿尔勒被罗纳河的内河运输所取代。这些船只陆续在沿途装载罗纳河流域各城市的许多份量轻、价格高的货物。其实，罗纳河的船几乎什么东西都装，包括最出人意外的东西，例如准备立在贝尔库尔广场上的路易十四的雕像（为了顺利抵达里昂，雕像先从巴黎经由勒阿弗尔和直布罗陀海峡运到地中海³⁴，结果在米拉蒂埃尔出了沉船事故，雕像事后从河中被重新打捞出来），又如双西西里国王的女儿玛丽亚—卡洛琳娜1816年嫁给贝里公爵时陪送的嫁妆。

内河航运自然以运输重货为主：铁、石料、砖瓦以及自中世纪以来成为重要商品的小麦、葡萄酒和盐。小麦船沿着罗纳河有时驶往上游，有时驶往下游，这要看各地收成和消费的反复变化而定。罗纳河流域同其他各地一样，小麦消费主要依赖当地的收成，但邻近地区之间也常互相调剂，只是在出现普遍的危机时，才从远处运来外地小麦。大家都知道，这类危机时有发生。至于葡萄酒，各城市长期满足于邻近乡村的产品。但到18世纪，随着消费的增加，葡萄酒交易（首先是优质葡萄酒）开始变得重要起来。食盐作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同时受到国家和资本家（各大运输公司和销售公司）的关注。成群结队的木船前往宽广的贝盖盐场或圣玛丽盐场，把盐运往沿河的各个盐仓。一些盐船可上溯到罗纳河通航河段的终点塞塞勒。罗纳河把塞塞勒一分为二：属于法国的一侧是个使用松木板制造“塞塞勒船”的村庄，关于这种壮观的船只，我在上文已经说到过；属于萨瓦的另一侧设有关卡和一座大仓库，成车的盐从这里运往日内瓦在莱芒湖的港口勒贡弗尔。

食盐贸易不断促进运输业的发展。1701年7月，一些实业家考虑在里昂和塞塞勒之间开办客运业务，每星期开三班，但他们力求要避免让船只“空着驶往上游，付出大笔开支，却得不到任何收益”³⁵。他们究竟想得到什么？那就是准许他们“把七、八千米诺^①的平价盐从贝该运往塞塞勒”。³⁶

运输、交换、中转、仓储等活动促使了罗讷河两岸的一系列城市应运而生，这些城市尽可能避开洪水的威胁，每当赶上有利的机遇，往往展示令人眩目的光彩。阿尔勒长期保存着罗马统治高卢时代的灿烂光辉；阿维尼翁长期作为基督世界的中心，闪耀着夺目的光芒。即使作为二等城市，它们风采不凡，蜚声远近。但在大革命前夕，有两个城市后来居上。南面是博凯尔；博凯尔举办交易会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1315年，每逢这样的盛会，城市聚集的商人、顾客和参观者达10万人之多，其嘈杂、喧哗也就可以想见。北面是里昂；城市每年举行几次大型交易会；作为信贷和贸易中心，里昂试图驾取整个法兰西王国（但未成功），甚至想在欧洲经济中充任乐队指挥。

地峡及法兰西的统一

我们且回过头来重谈正题。索恩河—罗讷河流域对法兰西的生活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城市、活跃的经济区和名胜古迹沿河排列成行。亨利·范司盖³⁷写道：“人们常问：为什么在勃艮第有那么多的修道院、隐修院和其他寺院，而且都久享盛名？历史和地理显然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或许还应加上优美的自然环境”。此外，正如在法朗什—孔泰、里昂地区、多菲内、朗格多克、普罗旺斯等地区一样，交通方便显然也是一个有利条件。历史从来就是

^① 米诺系重量单位，约等于250公斤。——译者

在道路的两旁生根发芽的。

然而,难道我们赞同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见解,认为索恩河—罗纳河的这些集散运动,不论是急速的顺流而下还是缓慢的逆流而上,不论是从北往南还是从南往北,都对法兰西的文化统一和政治统一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人们往往先验地等待着得出以上的结论。但在这个问题上,历史是最好的法官,我们且看它作何判决吧!

在古罗马时代,地峡无疑曾是一条得天独厚的轴线,是生死攸关的脐带,但它却只为罗马帝国及其在摩泽尔河—莱茵河地区开辟的大道和繁荣的城乡服务。地峡似乎甘愿置身于高卢的范围之外。作为罗马帝国的交通枢纽,里昂分别与山南高卢、地中海、西部和北部高卢相连接,是罗马军团开赴莱茵河边界的必经之地。当时的里昂难道不就像是殖民地的首府或是从事戍边屯垦的边境城市吗³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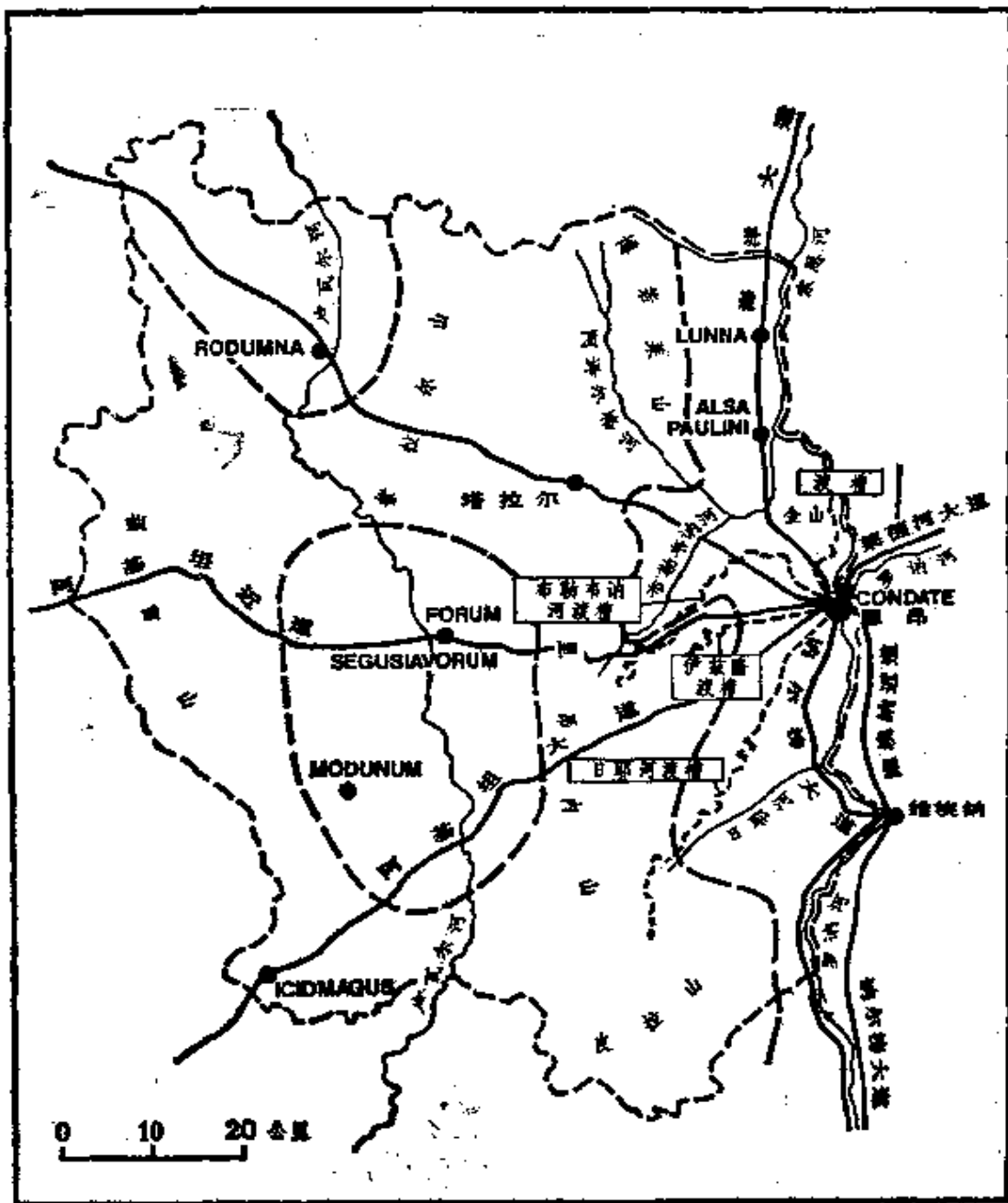
到了12至13世纪的香巴尼和布里交易会期间,以上情形显得更加突出。罗纳河航线既可通大海(例如在艾格莫尔特乘坐威尼斯的“帆桨商船”),也可与阿斯蒂运输者使用的阿尔卑斯山路相连接,但还只具备有利条件的一半,因为它位于王国的边境。在当时,埃斯科河、默兹河、索恩河和罗纳河这“四条河流”从法国边界向东流去。在船工们看来,罗纳河的右岸是法兰西王国的河岸,左岸则是帝国的河岸,德意志帝国的势力在很久以前已经抵达河边³⁹。对法兰西来说,它在罗纳河的左岸却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这真正是个奇迹。

实际上,只是在我国的边界慢慢地、困难地向南和向东移动以后,随着朗格多克(1271年)、里昂(美男子菲利普于1311年3月13日进占该城)⁴⁰、多菲内(1349年)、普罗旺斯和马赛(1481至1483年)、布雷斯中部地区(1601年)、阿尔萨斯(1648年)、法朗什—孔泰

(1678年)、洛林(1766年)、阿维尼翁(1790年)、蒙贝利亚尔(1793年)、萨瓦和尼斯(1860年)陆继被并入法国的版图后,罗讷河才参与了法兰西的生活。

1481至1483年间,法兰西国王兼并了普罗旺斯和马赛,在地中海边取得了安稳的立足之地;这一扩张行动具有决定的意义。在这以前,圣路易曾想在艾格莫尔特建立据点,甚至在该市打开面对地中海的一个窗口(他于1248年在艾格莫尔特登船前往埃及,后于1270年向现名突尼斯的地方进发);从长时间看,这个窗口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彼得大帝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圣彼得堡。更何况,艾格莫尔特不是良港。早在1248年,即在远征埃及(第六次十字军东征)的前夕,当圣路易率领船队浩浩荡荡出发时,小城市与大海之间被几道沙丘所隔开,紧靠城市的辽阔海面几乎像是几个内海,船只必须沿着航道行驶,才能驶出内海。至于雄伟的城墙,那是圣路易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大胆菲利普建造的,当时大胆菲利普正与阿拉贡人相抗争。艾格莫尔特的港口出入既不方便,当地的商业活动又不发达,因而尽管国王作了努力,城市的地位也不能与蒙彼利埃、尼姆和马赛相比。1248年,茹安维尔可能出于谨慎或迫于无奈,从马赛坐船去塞浦路斯与国王会师。

由此可见,索恩河和罗讷河绝妙的通道很晚才彻底确定了它在法兰西国土范围中的地位。地理学家皮埃尔·古鲁认为,“索恩河和罗讷河的干线尽管历史悠久,具有优美而坚实的文明(勃艮第、里昂、瓦朗斯),却被洛泰尔王国和德意志帝国吸尽了脂血”。他又补充说:“在这里,没有地理方面的原因;一切仅仅取决于历史”⁴²。请顺便注意这个毫不含糊的限定词,它是对一千多年以前确曾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的指责:根据公元843年签订的凡尔登条约,虔诚者路易把部分国土分给他的长子洛泰尔,单独建立“帝国”;后来,奥托王朝又把帝国的边界扩展到莱茵河。



里昂附近的罗马道路系统

里昂是罗马大路的枢纽，这些大路为罗马帝国的贸易和政治服务，分别通往莱茵河、南部高卢、地中海以及西部和北部高卢。

地图摘自安德烈·拉特雷伊主编的《里昂和里昂地区的历史》，1975年版。

说到底，关键的事实是，在中世纪的欧洲，罗纳河早已成为一条边界。既然罗纳河在几个世纪期间几乎位于法兰西的国境之外，所谓法兰西地峡能不能负起民族的使命呢？请看，在14世纪，作为教皇的驻地，阿维尼翁是何等的荣华。作为新兴的人文主义的中心，城市的光芒如果不是普照全球，至少也是遍及欧洲，而决不仅仅限于法国。同样，在其交易会于十六世纪达到鼎盛的时期，里昂首先是意大利商人的附庸，是个全欧性的城市。

因此，人们可以说，罗纳河没有承担起统一法兰西的使命，或者不如说，法兰西没有及早抓住和充分利用罗纳河的通道。

另一个因素也起了作用。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法兰西地峡并不是欧洲唯一可以利用的地峡，甚至并不始终是往来最频繁的地峡，古罗马时代也许属于例外，香巴尼交易会期间也属例外。从13世纪末开始，欧洲贸易无疑已取道德意志地峡。沿途经过的城市：南部是热那亚、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中部是奥格斯堡、巴塞尔、施特拉斯堡、纽伦堡、法兰克福、科隆以及在德意志采矿业（铜矿和银矿）推动下兴旺的其他城市；此外，在北海沿岸，还有布鲁日、安特卫普、汉堡，甚至还有伦敦。在阿尔卑斯山区，村民冬季驾着雪橇积极参加运输；高山不但不是障碍，却往往加速交换的发展⁴³。

所以，面对历史悠久、古迹众多、初生的资本主义茁壮生长的热那亚，面对勒旺贸易的中心并与德意志有阿尔卑斯山路可通的威尼斯，即使像马赛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城市显然也不可能同它们相匹敌。

我们不妨想一想意大利、德意志、尼德兰和英格兰的那些强大的城市，它们携手合作，共同组成所谓“欧洲的经济脊梁”，在前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这一欧洲核心区域，道路纵横密布，交织如网。意大利和德意志之所以迟迟不能在政治上实现民族统一，正是因为一些早熟的、富有的城市在国内各据一方，各行其是。法兰

西之所以没有跟上欧洲的经济高涨，原因是法兰西地峡单靠马赛、朗格多克诸城市或普罗旺斯各港口还是不能大显身手，它不能不迁就意大利城市的意愿和利害，意大利城市当时是有效地展开一切经济活动的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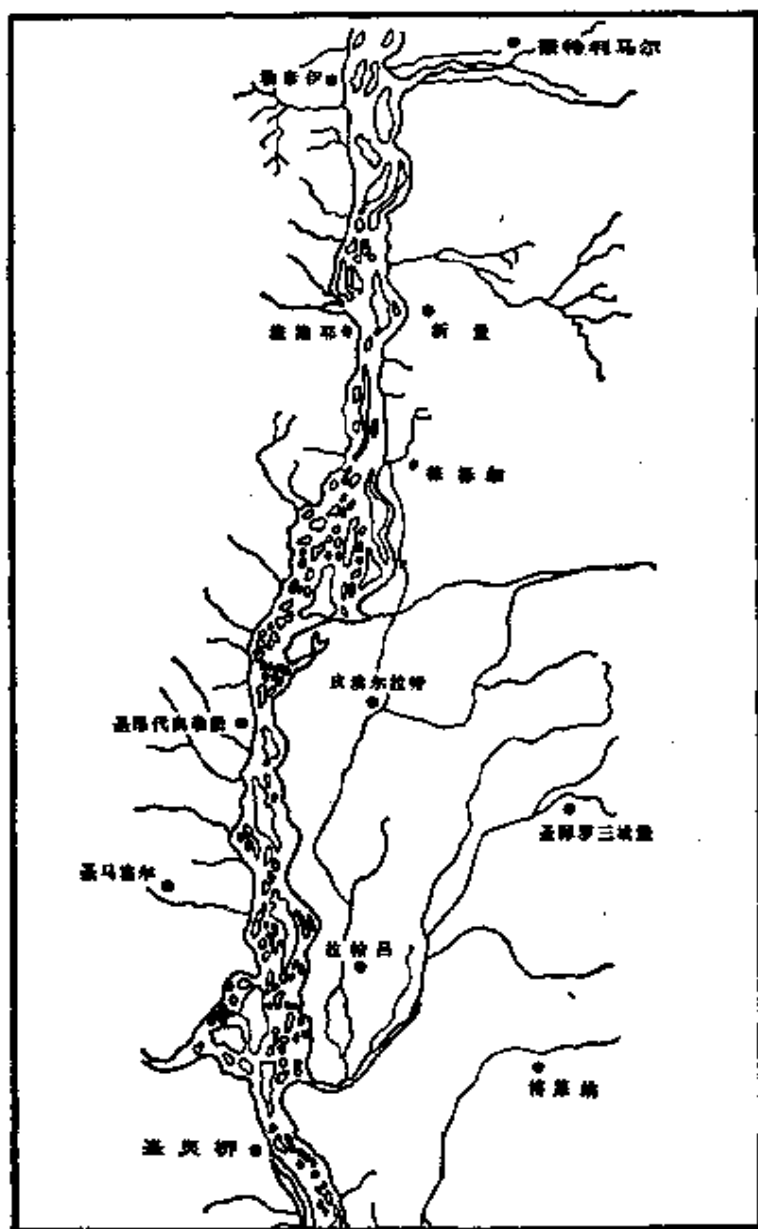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一方面是德意志地峡上升为主要贸易通道，另一方面是13世纪末(1298年)和14世纪初在地中海和北海之间开辟的经由直布罗陀海峡的定期海路联系⁴⁴，终于把法兰西排斥在兴旺的商业活动之外，使法兰西得不到正在蹒跚学步的近代资本主义所可能带来的各种好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重新谈到，尤其因为历史学家通常很少说明其中的道理。然而，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吗？尽管法国生性好动，从不安于现状(也许这正是由于它的失败)，它未能挤进欧洲资本主义的有利地理区域之内。难道这是它的过错？难道是它“生来”就不适合？或者是欧洲资本主义(且不说国际资本主义)出于疏忽，竟在无意中把我国排斥在外？

罗纳河边界

罗纳河一度成为边界，成为分离、切割和阻隔的界线，达尼埃尔·富歇⁴⁵甚至说它是“祸害”。这不但因为罗纳河水流湍急，行船危险，经常泛滥成灾，而且还有人为了的原因以及历史的偶然性。在一般情况下，河流与其说是阻隔，不如说是联系的纽带；河流使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随心所欲地从此岸前往彼岸。罗纳河的情形并非如此。

罗纳河当然可被渡过，甚至每天都有渡船往来。但在隔岸相望的姐妹城市之间，必须采取协商一致的行动，共同维修桥梁、渡船和溜索⁴⁶。在18世纪卡西尼的地图上，日内瓦和地中海之间共有15座桥。分别位于大桥两端的姐妹城市为数甚多，它们是：日沃尔

和沙斯；维埃纳和圣科隆布；昂当斯和昂当赛特；图尔农和坦莱尔米塔日；瓦朗斯和圣帕雷；阿维尼翁和阿维尼翁新城；塔拉斯孔和博凯尔；阿尔勒和特兰克塔伊⁴⁷。有时是右岸的(王国的)城市压倒左岸的(帝国的)城市；有时则是相反。这些姐妹城市的出现取决于经济的要求，它们的数量之多使人不由得想到，对两岸的居民和



罗纳河的岛屿

在18世纪末卡西尼的地图上看出，从蒙特利马尔到圣灵桥的罗纳河段有无数岛屿，成为船舶航行的众多障碍之一。

商人来说，前往对岸比前往上游或下游更加要紧。

但国家的政策并无以上的偏爱。显然，国家的政策或普通的行政管理可以横跨某些河流的两岸。如果说塞纳河和卢瓦尔河都把两岸联成一片（就以卢瓦尔河为例，尼韦奈、奥尔良、图尔、安茹、布列塔尼等省区都地跨该河的两岸）⁴⁸，但有些河流，如莱茵河、罗纳河和索恩河，却是天然的屏障。无论是普罗旺斯、孔塔-佛奈桑或小小的奥伦治公国，无论是朗格多克、维瓦雷或里昂地区，实际上都并不地跨罗纳河两岸。萨瓦——至少当萨瓦公国拥有的热克斯、比热和布雷斯等地区尚未根据里昂条约（1601年）划归法国时——也并不横跨索恩河两岸。道路四通八达的勃艮第勉强可以说是越过了水流缓慢的索恩河。

1707年，德·台赛元帅于都灵一战失利后（请见下文），在多菲内集结残部，曾担心敌人会从萨瓦方面发起进攻。但他安慰自己说，朗格多克无论如何不会遭到入侵，因为“敌人不可能偷渡罗纳河”⁴⁹。实际上，尽管两岸贸易兴旺，罗纳河却像一条“天然的”边界，一道裂缝，一个要塞的堑沟，排除了国家或准国家的国土横跨两岸的可能。普罗旺斯王国虽然一度夺取了右岸的维瓦雷地区，但这种联系只是为期甚短。更何况，河流的两岸地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我甚至敢说，直到今天，从阿尔卑斯山经圣灵桥至中央高原，我在多次往返途中几乎始终摆脱不了以上的印象。尽管河流两岸都种着葡萄，但一路过来，那确实是经历了两个世界。

甚至当法兰西国王成了两岸的主人，把所谓“伤口的两侧”⁵⁰缝合起来以后，差异和对立仍经久不衰。分处两岸的居民和省份互相结冤成仇，不能和平共处。即使隔岸相望的村庄或城市之间的争斗时有“间歇”⁵¹，即使也有个别几对城市相处融洽，但总的说来，纠纷、仇恨和诉讼却是常例。

至于河流本身的归属，不可能也不应该存有争议。法兰西国王很久以前就已宣布自己是罗纳河及其一切资源的主人。早在兼任普罗旺斯伯爵前，法兰西国王于1380年声称，“鉴于国王的权力至高无上，罗纳河及朗格多克其他河流的全部岛屿均归国王所有”⁵²。路易十一于1474年（即继承普罗旺斯领地前几年）所说的话也同样斩钉截铁。他在诏书中声称：“罗纳河所经之处，包括其港湾岛屿在内，全部归国王所有。”⁵³

既然河流的归属在法律上业已确定，王国政府坚定地行使权力。据说，在1734年，“当阿维尼翁城〔教皇的领地〕的罪犯逃到罗纳河的船上去了以后，教皇的官员就不再有权捉拿他们”。甚至，“每当罗纳河涨水进入阿维尼翁市区直入甫斯特里街时，港口总监便接到命令，要他去那里插设国王的徽饰，以表示河流是国王的产业”⁵⁴。

尽管如此，河流两岸却有80个路卡，分别由在岸边拥有土地的私人所设立；同安德烈·阿利克斯所说的相反⁵⁵，罗纳河即使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也不是中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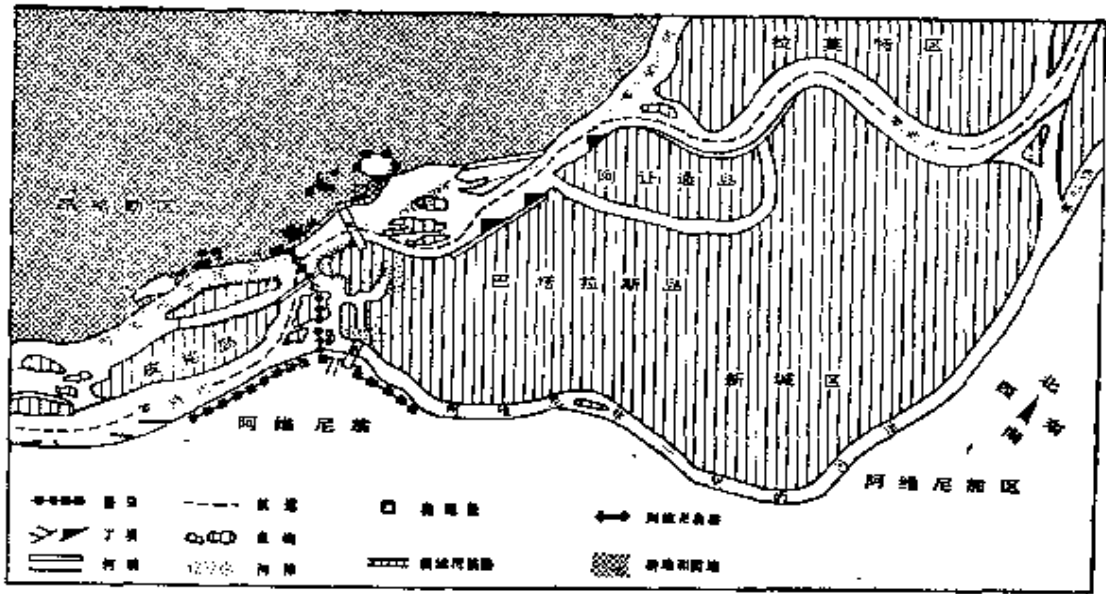
罗纳河甚至还造成省与省之间的纠纷。请看，直到1760年前后，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仍然各执一辞，互不相让；对于这一争执的历史缘由和法律缘由，甚至历史学家也茫无头绪⁵⁶。这场官司最后交大臣会议作出裁决，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两省派出代表所争夺的东西其实都是国王的财产。具体地说，是罗纳河不断冲积而成的大小岛屿以及“各种滩、涂、淤、淀”，是“像木排一样随水移动的浮岛……或是无主的木船”⁵⁷。争执的要害究竟是什么？双方争夺的这些土地，有的固然十分贫瘠，但有的也极其肥沃，小麦产量可达种子的10至15倍⁵⁸。尤其，在这些照例有人居住的土地上，究竟该由普罗旺斯或是朗格多克的包税人征收税金；我发现这份冗长的诉状只在一处提到“渡河”，就是说，唯独阿维尼翁

新城的船工有权在阿维尼翁的渡口从一岸前往另一岸。

大臣会议判决朗格多克胜诉，准许它将其辖区扩展到罗讷河左岸，至少到帝国境内淤泥地的边缘。此事本身并不重要。国王大概考虑到这个事实，朗格多克被并入法国比普罗旺斯约早两个多世纪，先来后到嘛。因此，在有关罗讷河及其沿岸地区和岛屿的历次诉讼中，图卢兹高等法院总是受到某些照顾和享有某些特权。

另一次争端——几乎是国家与国家的争端——更加重要，有关的文件连篇累牍，我们这里就来看其中的《德·沃邦先生之奏折》（1686年3月22日，国立档案馆藏）⁵⁹。作者通过以下的图例说明了他的计划。确切地说，他建议让罗讷河航线改道，使船只紧贴阿维尼翁新城一侧峭壁林立的河曲行进，不再经过对面的阿维尼翁港（阿维尼翁当时归教皇管辖，是与法国对立的外国港口）。然而，改变河流的航道殊非易事，这一企图最终归于失败。沃邦对此似乎早有先见之明。他写道：“圣安德烈山冈应是纤夫的必经之地，而在山冈的脚下，却还没有真正动工”，这里显然是指紧靠新城的方面。人们已经建造了一系列丁坝，促使尽可能多的河水流向新城一侧和进入运河。奏折又说：“既然罗讷河及其岛屿都归国王所有，既然丁坝与孔塔的河岸不相接触，教皇的人对此将无话可说，罗讷河也就完全可以把航道移到阿维尼翁新城一侧”⁶⁰。这句引人注目的话重申：河流和岛屿属于国王，只剩孔塔一侧的河岸留给教皇。

沃邦在奏折中顺便介绍了有关阿维尼翁桥的某些情况：“12尺宽，500丈长，不适宜通行车辆和负载重物，此乃这类工程的最大缺陷之一”。更往北去，圣灵桥“长400丈，宽14尺……桥面一石拱中央已有裂缝，虽然尚未断塌”，因而存在同样的毛病：货车过桥时只能卸下货物，交搬运工装上渡船，送往河的对岸⁶¹。也就是说，罗讷河上尽管有桥，过河还是很不方便。



罗纳河航道疏浚工程计划(沃邦奏折1686年的附本)

船只遵循的航线用虚线表示。工程的目的是要让航道走向从教皇管辖的左岸(阿维尼翁)转移到法国管辖的右岸(新城)。为此必须做到:

1. 改变水流方向。具体办法是修建a/b、c/d和e/f三条河堤;建造丁坝,使河水向右岸流去;加宽圣皮埃尔运河和图依埃尔运河。工程才刚开始,便出现重重的困难和产生意外的结果:河岸遭到冲刷,在河中形成沙滩。

2. 在新城一侧的河岸修筑一条纤道。阿维尼翁桥和奥德堡(城堡过去直接建在河上)之间的纤道业已修成。留下一个大难题:在支撑圣安德烈要塞的山冈下开凿至少五米宽的纤道。这项工程本身十分困难,此外还必须拆毁“要塞的一角”,使围墙退后20来米。

至于王国当局对“岛屿”一词究竟赋予什么含义,人们或许会提出疑问,巴塔拉斯岛显然紧贴阿维尼翁的领土。

里昂的命运

里昂的命运并不比罗纳河的命运简单。一切城市无疑都是复杂的存在。特别是里昂,它的财富,它的剧变,它的新奇乃至古怪,更使历史学家为之惊叹。过了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昂已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它不断追新猎奇,被迫多于自愿。里昂本身就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难题,也许是个关键的问题,肯定是关键的指针。

里昂是个顽强的、生气勃勃的但又令人捉摸不透的城市。它

在环境的包围下似乎施展不开；它间接地受到历史的打击；它经历的骚动和遵循的节奏均十分独特⁶²。里昂自从被法兰西夺得以后，便真心实意地同这个辽阔的国家休戚与共。作为罗讷河沿岸的城市，里昂受到远近相邻地区的拉扯，来自四边八方的各种势力恰好汇聚在这里。因此，里昂有时倒向一方，有时又倒向另一方。今天有一位地理学家认为，里昂在中央高原的影响反而“比在罗讷河流域要大得多”⁶³。确实，由于历史的和现时的许多原因，皮埃尔·埃斯蒂安低估了索恩河和罗讷河轴线对里昂的重要性。关于这个问题，我过一会儿再谈。

里昂的古怪确实使观察者感到惊讶、犹豫和无奈，不论他怎样进行认真观察，均无法摸清里昂的真相，甚至很难画出它的轮廓，因而不得不随时改变观察的视野和色彩。当然，人们可以根据习惯的程式，根据当地的、地区的或民族的“逻辑”，对里昂的古怪情形作出解释。但每一次，刚说开了头，便再也说不下去，否则就是越解释越复杂。

里昂市的日常生活仰仗四周的里昂地区就近供应，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城市资产者在里昂地区拥有土地、葡萄园和住房。但里昂地区之小与城市之大不成比例；乡村背离城市，阻碍城市的发展。在里昂地区和图卢兹乡村之间，在里昂地区和法兰西岛之间，差异之大不可能作任何比较！

地区的“逻辑”也让人感到困惑；它肯定提供不了谜底。毫无疑问，里昂自16世纪的经济复兴以后，始终是个坚实有力、健康发展的地区性首府。随着其势力的扩展，里昂市的影响今天已远达罗阿讷、第戎、索恩河畔沙隆、贝桑松、日内瓦（里昂的宿敌）、格勒诺布尔、圣艾蒂安以及昨天的维埃纳和今日的瓦朗斯等一大批城市。但是，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还必须像我们在上一章谈到的安德烈·皮亚蒂埃那样，就有关问题进行确切的考证，必须对里昂与这

些城市(同时是里昂的助手和对手)的商业往来和金融往来的规模展开调查。

至于民族的逻辑,我认为这方面以消极的、敌对的因素居多;即使有例外,例外也正好证实规律。法国在扩展其政治和经济影响的同时,始终未能或不愿支持里昂成为强大的中心。

总之,法国经济促使索恩河和罗纳河地峡的轴线偏向巴黎,通过波旁古道(今天的七号国道)扩大巴黎与里昂的直接联系。尤其,从巴黎来到里昂的货物不再取道罗纳河,而是直接朝意大利(都灵、米兰)方向运输;在经过尚贝里以后,来到莫里纳河谷;由于海拔为2100米的塞尼山便于通行。这是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唯一通道。总之,这条对角线虽然经过里昂,但与罗纳河轴线只是交叉而过。此外,在全国范围内,无疑也不能容许两个指挥所的并存,不能容许两大城市同时高居榜首。巴黎之所以压倒里昂,原因十分简单,因为巴黎过去和现在都是首都,势必是全国资源的天然汇集场所;国家的财政收益也在巴黎汇聚,不断使巴黎有充裕的货币可供支配。

然而,在经济方面,里昂曾长期压倒首都。由于各种交易会的繁荣,这座罗纳河畔的城市曾大大超过其自身的力量。在16世纪,巴黎及其零售商业同里昂的批发商业和银行活动相比显得暗淡无光。但一到17世纪,法国经济放慢了脚步,交易会的光芒渐趋消失。而当18世纪的复兴到来时,交易会已如昨日黄花,经济起飞促使巴黎走在前面;首都逐渐取代里昂的金融职能。在启蒙时代末期,这一取代过程业已完成。巴黎用正当或不正当手段攫取的钱财堪与里昂相匹敌。在19世纪,两大城市的争斗继续进行,并日趋加剧。今天,里昂的资本已被贪得无厌的首都抢夺一空。里昂交易所自1983年在本省和在巴黎开辟“第二市场”以来开始反击,若干新企业的股票在里昂上市,这些反扑行动最终能不能改变力

量对比呢？现在回答问题尚为时过早。里昂工业家似乎还心存疑虑。至于在金融领域，全部问题还要看非集中化是否行之有效⁶⁴。

据我认为，只是到了这里，人们才开始懂得和看清里昂的命运。它的悲剧在于，城市的经济地位和兴旺发达取决于国际的条件，取决于广大地域范围内的“逻辑”，必须得到外力的协助。给里昂降恩赐福的仙女身在外国。

当罗马征服高卢和兴建里昂城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形。周围的部落极其弱小，无力与征服者相抗衡，建立在中立地带的新兴城市便代表阿尔卑斯山两侧的统治者的利益，成为对高卢的国土进行“殖民”开发的中心⁶⁵。

历史决不会原封不动地、分毫不差地重演。但15世纪末至16世纪期间里昂交易会异乎寻常的繁荣却显然是同一过程的产物。虽说里昂交易会自1420年起业已存在，但它真正发挥其国际影响却就在那个时期，这是因为路易十一偏爱里昂，推行了破坏日内瓦交易会（1462—1464年）的政策⁶⁶。梅第奇家族于1467年在里昂开设商行，到16世纪更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里昂交易会因此成了欧洲经济的主要中心，正如几个世纪以前著名的香巴尼交易会一样。但是，推动这种兴旺繁荣并从中获取利益的人却是佛罗伦萨、卢卡、热那亚等地的意大利银行家。他们从里昂向法国扩大经营活动，进而不断攫取贸易盈余。这种经营活动同几个世纪前罗马对高卢的开发，竟是何等地相似！里夏尔·加斯贡写道：“外国人居高临下，以势压人。他们包办一切，只让法国人充任经纪人的低级职务……随着银行机构的发展，经纪人的职能又不断缩小”⁶⁷。路易·布尔茹瓦就16世纪上半叶（1491至1551年）的里昂写了一部文笔生动的著作，他为其中的一章所定的标题是：“国中之国：佛罗伦萨人”⁶⁸。当时，欧洲的富商巨贾云集里昂，其中的瓜达尼家族是佛罗伦萨人，这个姓氏已经法国化，变成了加达尼。意大利人组成

一个高高在上的小团体，总共不过80个家族单独生活在一起，子女间相互通婚，避免与本地人联姻。历代资本主义的这种常规通例在这里表现得十分典型。

里昂引人瞩目的财富——不论属于里昂人或外来客商——使法兰西及其国王心醉神迷。我们不禁会认为，在16世纪，这座罗纳河畔城市真是前程无量，甚至可能变成王国的首都。法国的政策当时正热衷于翻越阿尔卑斯山，却在意大利战争中损兵丧师，里昂照例是人员、物资、大炮、信贷……的集合地。里昂全力支持进行这场给它带来众多利益的持久战。既然一切都有联系，里昂也经历了文艺复兴的辉煌岁月，它完全可能成为与巴黎一样光彩耀目的文化都城。的确，一切都是可能的。即使在弗朗索瓦一世当政时，也是如此。弗朗索瓦一世是我国最重视意大利事务和最偏爱里昂的一位国王。1538年，当他顺罗纳河下航，抵达艾格莫尔特，与查理五世皇帝举行著名的会谈时，他是否想到建都里昂呢？可以肯定的是，他在经过里昂时，这个城市又一次使他动心。可惜，太子在一场网球赛后因着凉突然病倒。去南方的旅行继续进行，但不得不让这位王子在图尔农上岸治疗，王子于8月10日在图尔农去世。勃朗托姆说：“年轻的王子就此一命归天。”⁶⁹

里昂没有取得非它莫属的桂冠，难道是由于以上的不幸事件吗？我看很难说。建都里昂不可能出自随心所欲的决定，而要取决于城市是否在事实上占有领先地位。里昂命运不济，终告失败，明显地由另一个原因所造成：欧洲于16世纪中叶开始把重心转向北方和大西洋，从而使地中海和意大利被抛在一边。随着意大利战争以卡托-康布雷齐条约（1559年）而告终，里昂的地位便一落千丈。这项条约使法国在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优势丧失殆尽，法国贵族为此大动肝火。亨利二世放弃了皮埃蒙特和萨瓦（法国于1536年占领了这两个地区，并在那里开始站稳脚跟）。法国的边界因此

退回到里昂附近，东边被割掉了一大块地域。假定法国在意大利战争中取胜，从而占领都灵甚至米兰，里昂作为整个欧洲财富中心的地位将会进一步巩固。只要瓦卢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在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战事中胜败未定，里昂的荣华就会长久地持续下去。

里昂的衰退早有迹象可见，1557年的信用破产已是一起突然的大暴露。然而，该城参与金融和信贷活动历时已久，不可能在朝夕之间被排斥在外。在全欧的地位固然逐渐在丧失，但法国国内的业务却依然保存。在17世纪各国经济普遍萧条期间，里昂仍控制着我国一部分尚未确定投资方向的游资。这部分资金转来里昂，用以取得交易会延期交割的贴息——每期3个月，息率为2%——，并有黄金承兑的保证；任何汇票必须用“金埃居”兑付。我们记得，单纯的有息借贷在当时是遭到禁止的，里昂的批发商正是利用这一系列延期交割维持资金周转，并通过简单的帐面往来结清他们的交易活动。这是交易会的一种常规，一种变相的有息借贷。

但里昂也是一个商品集散地，是个在工业方面十分活跃并有所创造而引人注目的中心，这也许是对城市金融作用下降的补偿。总之，里昂的工业活动使它在整个欧洲市场上依旧占有一席之地。里昂很早致力于发展丝织工业，而作为奢侈品的丝绸照例销往外地。随着丝织工业的壮大，里昂不得不招募新工人，而不断招收织机所需的劳动力，包括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在内，实际上便成为决定里昂命运的一个根本保证。因此，为了进一步说明里昂的命运，就必须进一步弄清这一工业活动的实质⁷⁰。里昂附近的贫困地区，即阿尔卑斯山区和中央高原，是否源源不断地向里昂提供足够的人力？

里昂丝织业的惊人发展旨在迎合法国和外国贵族阶层的需

求。丝织业挖空心思地向顾客提供华丽和新颖的绸料，推出欧洲的时新款式，并且一年一变。为了保证丝绸出口，一些外国商人常年住在里昂；他们此外还有别的事情可做：参加交易会，向城市供应日用必需品，进口生丝，经营汇兑业务或从事贵金属和货币投机。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同国外的勾结在从里昂寄出的信件中有所反映。里昂的工业家始终都在窥测动向；眼看都灵开始织绸，苏黎世制造绉纹绸，意大利人利用样品对里昂的丝绸模仿得尽善尽美，里昂的工业家感到十分担忧。唯一可行的对策便是迅速更新式样，以使模仿的产品在抵达市场时已经过时。为此，里昂丝织业常年保持专门的图案设计班子⁷¹。1705年5月，勃艮第公爵的儿子去世后，宫廷发布了6个月的国丧期，这在里昂造成了一片恐慌：绸布存货将因此卖不出去。“这批货物留在那里，将使他们大蚀其本，因为6个月的丧期过后，他们的绸布也就不再时兴”。若在平时，他们完全可以把货物销往国外。但又恰好赶上战争，也就别想再打这个主意！与外国人联系既不方便，“更何况外国人又在新教徒的帮助下模仿我国的部分产品”⁷²。1706年，当法国军队准备攻打都灵时（攻城战并未成功），市内的商人要求关闭雇有里昂工人的丝织工场。

综上所述，里昂多半还要到法国境外去谋生存，还要仰赖外国。经济、形势和机遇都迫使它不得不这样做。后来，曾经出现过极其有利的机遇。第一帝国和大陆封锁期间，里昂将恢复其欧洲陆路交通中心的地位，大大扩展其势力范围，重新成为欧洲各条道路的汇合点。通往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的各条道路，与莱茵河、瑞士各州、德意志乃至荷兰的各种联系，统统置于里昂的控制之下。但随着帝国的垮台（1814至1815年），这个局面便立即结束，里昂又重新沦为仰人鼻息的附庸。到了19世纪的30年代，由于蒸气轮船率先在莱茵河得到推广，德意志的陆路运输又夺走了里昂

的部分职能。

关于里昂极其重要的历史，我势必还会重新谈到，这里暂搁下，以便先回到本章的正题上来：法兰西的成长过程。

但我认为，以上的阐述即使没有完全说明里昂的历史，至少也指出了里昂同时开展的几个不同活动方面。里昂的命运，必然的和由它选择的命运，正是要在这些不同的活动之间下赌注。如果我没有搞错，若要使里昂充分发挥作用，它就必须登上更高一级的台阶，而法国又不可能给它提供这样的方便，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和交通便利的罗纳河流域也不准备让它达到这样的地位。幸而，规模巨大、充满生机的工业使里昂能够维持现状和继续等待。里昂在过去曾经等待。难道它今天不也正是处在等待之中吗？这是让·拉巴斯于1982年提出的见解⁷³。在他看来，里昂要重新成为国际城市——它目前不是——，取决于以下的条件：走出罗纳河至阿尔卑斯山的一隅之地；摆脱巴黎强加给它的二等城市或接力城市的地位。不过，这难道是可能的吗？

罗纳河至莱茵河地区的现状

我们今天正处在彻底改造罗纳河通道的前夕，这次改造将同上个世纪使用蒸气一样，成为一场革命。1980年3月19日沃格里大坝开闸放水标志着里昂至地中海之间的罗纳河整修工程的完成；从那时起，各种报刊纷纷以显著地位庆贺罗纳河的被驯服。

这项工程从热尼西亚大坝交付使用算起(1948年)已经历了32年时间。总共建造了18条拦水坝，13个电站，13座船闸，64个涡轮发电机组。这些卓越的成就，同丧失昔日真正的罗纳河相比，当然尚不能使我们有所慰藉。但我们要诚实地承认，就工程本身而言，它们毕竟完成得十分出色。

在长达300公里的水路上，极其现代化的航运业开始建立起

来：动力达3 000匹马力的拖船，长80米、载重2 000吨、吃水深度达3米以上的平底大驳船，且不算直接来自外海的小船。以上还只是罗纳河改造工程的第一个阶段。预计将在里昂至日内瓦之间的罗纳河上游建立水电站。此外还计划把水流平稳的索恩河利用起来（这一任务相当简单，只需拆除几个障碍，如马孔的圣洛朗桥，船只在涨水期间不能通过桥洞，但马孔市对该桥依依难舍），然后再彻底重修罗纳河至莱茵河的运河（从圣桑福里安开始的河段由于河道狭窄，船闸过多，至今几乎不能使用），从而打通马赛与德国莱茵地区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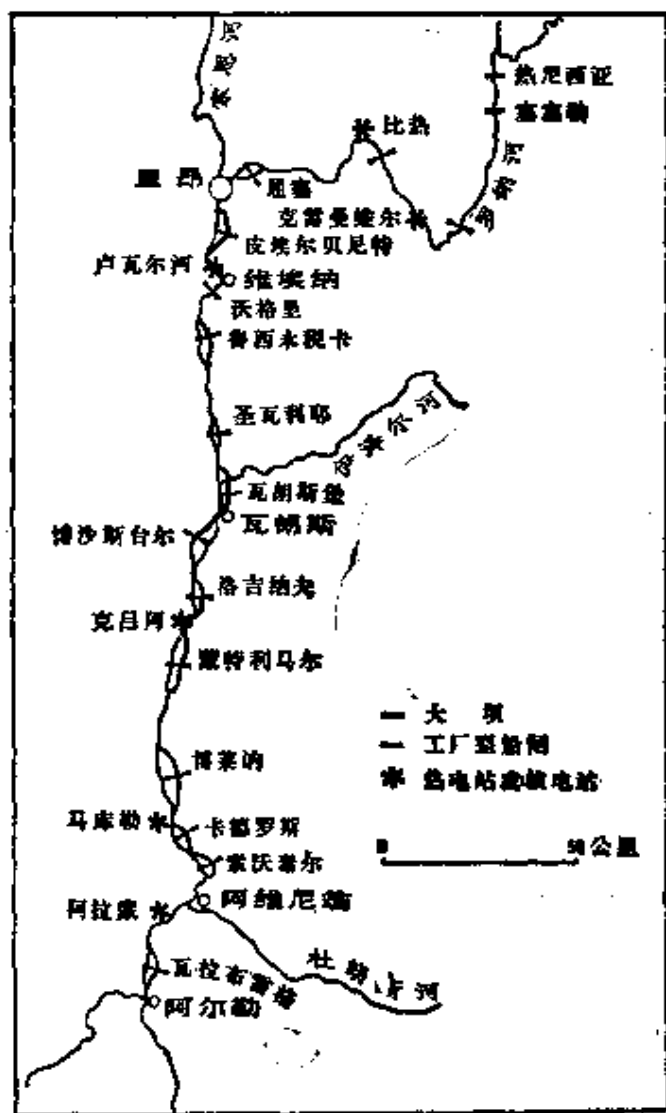
总的来说，这是一项宏伟的计划：如果付诸实施，马赛将成为瑞士和南德意志地区的出海口之一，即使不能与汉堡、鹿特丹、安特卫普、鲁昂、勒阿弗尔等北方大港完全平起平坐，至少也能列入同一个档次。此外，还可合乎逻辑地对罗纳河腹地的工业发展寄予期望。说到底，这在当地将产生连锁反应。罗纳河上兴建水电站，发电量可达1 300亿千瓦之多。

然而，还有不少细节必须作出保留：

1. 罗纳河在里昂和富尔克（距阿尔勒4公里）之间有280公里的河道今天可通航运。在往来频繁的这段河道上，过往船只1979年为7 356艘，乍眼看来，数字相当可观，但平均载重量仅463吨（逆水行船载重较多，为589吨，顺水行船载重较少，为243吨，总运输量达3 402 014吨，其中1 879 174吨为石油产品）。1980年的总吨位略有增加，达到3 554 527吨。1981年（根据前三个季度的结果计算第四季度），总数可望超过400万吨；有所增长，但增长不大。我们再看鹿特丹的情形，大家知道，这是世界第一大港；1979年的运输量为3亿吨，1981年为2.5亿吨；每年到港的内河船只25万艘。“在这2.5亿中，1.227亿吨由平底或尖底的驳船装卸”⁷⁴。

为什么罗纳河的货运量相比之下显得这样微不足道？难道是

由于输油管（从福斯至巴塞尔，输送5 000万吨石油）、公路和铁路等其他运输手段的竞争吗？巴黎—里昂—地中海的铁路达到创记录的速度，高速火车从巴黎到蒙彼利埃只需5小时。地中海同首都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而罗纳河水路却不能把这一成功算在自己的帐上。罗纳河之所以相形见绌，这是因为货物在这里运输有诸多不便，马赛（运输量将达1亿吨）几乎从不使用罗纳河，里昂惯于通过公路和铁路输出货物，尤其因为德国的工业品输出被鹿特丹一口独吞，罗纳河谷甚至分不到一点余羹。



罗纳河20世纪的整治工程

实际上，罗纳河目前400万吨的运输量并不全都属于大规模的直线航运，相当一部分属于零星的短程航运，虽然后者对沿河两岸也很有用。但是，使用这样的技术手段，而又不从事大规模的远程运输，这就谈不上有什么效益。难道应该认为，效益将在全部工程结束后方才出现？难道罗纳河运输到那时将突然脱离童年时期？我们还不如说，这只会要求追加投资，而并无实效。

2. 无论是在罗纳河上游兴建水电站，或者是在罗纳河和莱茵河之间扩大联系，这些宏伟计划至

今还远没有完成。假定所有这些计划都已完成,在我看来,如能整治罗纳河系的几条支流(这一设想目前尚未作出任何安排),如能通过勃艮第运河或古老的中央运河和布里亚尔运河把索恩河和塞纳河联成一个水网(这一计划似乎业已搁浅),这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看来,把我国最现代化的内河航运网扩大到巴黎,将是合乎逻辑的。否则,罗纳河水道就有再次“偏离法国领土”的危险;它将成为一条欧洲的通道,却不优先促进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我国的某些高速公路也为英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前往西班牙或意大利提供过境方便,但它们毕竟主要是为本国的需要服务。我主张让罗纳河水道也充当法兰西心脏的主动脉,这难道是错的吗?我并非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挽救法国的中央集权,也并非讨厌看到法国对欧洲的全面开放。但由我国领土提供的欧洲交通干线不能仅仅满足于在我国过境,它还应该派生许多支线。我国制定计划的人却并不持这样的观点。根本的原因在于成本,这将耗费极其巨大的投资。当然也还因为,处于严重危机之中的内河航运业在法国正日趋萎缩。

罗纳河业已经过整治,但目前的运输量却令人失望。难道这不正是因为运输的覆盖面还不够广吗?水运协会主席雅克·弗莱歇1982年9月访问鹿特丹时断然声称:“必须使法国的内河同欧洲的水网相衔接。莱茵河上和摩泽尔河上的法国港口泊位不敷使用。塞纳河和罗纳河应与欧洲联成一片;马赛、勒阿弗尔、鲁昂、巴黎和敦刻尔克在内河航运方面不应停留在本地区的范围之内,它们应该成为欧洲的港口,拥有与北欧竞争者同样优越的条件,也就是说,深入内陆几千公里,并适应20世纪规模的整齐划一的河道。”⁷⁶由此可见,在谈到罗纳河、里昂、马赛的运输问题时,不能把塞纳河、巴黎、鲁昂、勒阿弗尔等等置之度外,持以上想法的人肯定不只是我一个。

3. 我提出以上的见解,正是期待着罗纳河能取得成功,希望它能出现奇迹。鉴于目前危机四伏,成功和奇迹更将姗姗来迟。地理学家以悲观论者居多,对改造罗纳河工程颇多微词。皮埃尔·埃斯蒂安对“法兰西地峡”只字不提,却说罗纳河和莱茵河之间的轴线、通道、过道和走廊“是一条时断时续的大裂缝”。我们在这里远不是要像维达尔·德·拉布拉什那样,心存疑虑,而处之泰然。这种悲观论可为我的论断充当佐证:以边界出现的罗纳河轴线,在法兰西形成过程中,几乎置身局外。皮埃尔·埃斯蒂安走得更远,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是否应该认为,把罗纳河和莱茵河连成一片的主张纯属妄想,要在罗纳河和莱茵河之间用运河接通也是强人所难?”⁷⁷他的结论是否正确呢?我希望是他错了,但愿未来将证明事实恰恰相反。

二 确定巴黎、法兰西岛和巴黎盆地的地位

我并不否认法兰西地峡具有多种重要性,特别是从史前期起,这条通道在文化传播中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它至今仍是法国最大的交通干线。我只是想指出,在法兰西的统一过程中,它并不如人们过去所说的那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简单地说,最好的证据莫过于法兰西统一的诞生地不在法兰西地峡,而在别处,位于索姆河和卢瓦尔河之间以巴黎为圆心的一个圆圈内;这个以巴黎至奥尔良或以巴黎至鲁昂为半径的圆圈,除了法兰西岛和奥尔良地区以外,还包括香巴尼、皮卡底、诺曼底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特殊的法兰西。毫无疑问,这个中心或核心正是一切的出发点,实现法兰西统一要“从一个中心出发,不断向四周辐射”。米希莱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因此,法兰西的中心,即最不起眼的一部分国土,陆续侵占了其他部分国土。中心部分在最大

程度上代表着法兰西的本性。当地的种族比别处更加混杂，土地比较平坦，自然景色更令人烦闷，这三项条件最终促成了社会精神。法兰西岛占有法国；法国则将占有世界”⁷⁸。在1789年前，“只是巴黎周围的几个古老省区才具有法兰西的特性”⁷⁹，国王在由科尔倍尔于1664年统一的五大包税区比在别处享有更多的行动自由。虽说如此，但我却并不认为，对国王的顺从竟是所谓“社会精神”的产物。我也不认为，瓦兹河沿岸地区或卢瓦尔地区的景色竟是令人烦闷。这远不符合事实。

无论如何，巴黎、法兰西岛和巴黎盆地毕竟创建了法国，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弗朗西·于雷形象地指出：“如果把法兰西岛当作一个硕大无朋的细胞，巴黎则是其雄性细胞核；它们拥有旺盛的食欲，不顾一切地去完成一项遗传工程，终于导致了‘国土呈六边形’的法国”⁸⁰。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强烈的结构不对称。

我们不要把这样一项工程完全当真；整个发展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偶然因素、潜在力量都曾起了作用。但结果却摆在这里：11世纪初，当巴黎圣母院奠基时（1072年），促使巴黎大踏步前进的各种因素已经或即将完全具备，城市的规模已经极其庞大，并且不久将成为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

有一个问题拦在我们的路上，必须首先加以解决。我们要知道的是：在这宏大的向心运动中，究竟是从中心城市或是从中心地区开始起动，或是从两处同时起动？我们姑且先认定从中心地区，即从巴黎盆地开始起动。

巴黎盆地的优胜地位

巴黎盆地占有今天法国四分之一以上的领土，是法国最广阔、最富庶，也许还是最多多样化的平原地区。尽管米希莱在谈到巴黎

盆地时说过，“香巴尼和法兰西岛千篇一律的乡村……遍布着石灰石建筑和木结构建筑的城市，令人望而生厌”⁸¹，但他当时所想到的只是自然景色，并不是确指经济。

巴黎盆地的大部分土地属于巴黎财政区管辖；在17世纪，人们众口一词地认为，“境内的土地都有一定的用处：不长小麦或其他谷物的地区生产葡萄酒；小麦和葡萄酒全不生产的地区提供水果、牧场、薪柴、树林和核桃”⁸²。达维蒂于1625年说：“巴黎周围的乡村既不缺谷物，又不缺葡萄酒、奶制品、干草、水果和蔬菜，河流遍布，水源充足，因而巴黎生活的舒适简直叫人拍案叫绝。”⁸³ 诸如此类的例子简直举不胜举。

地理学家将会乐意继续唱这类赞歌；他们对卢瓦尔河以南至中央高原这个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还有重大的保留意见，但他们特别强调巴黎四周的石灰质台地具有非同寻常的有利条件：在这些土地上，雨水自然渗进土层，作物不至受到积水的危害，当干旱出现时，渗入土层的水又通过毛细管作用重新上升到地表，并使作物免于死亡。此外，这些台地（博斯、布里、苏瓦松地区等）在地表保留着一层松软易耕的冲积土，因而早在史前时期，就从欧洲各地吸引了最早的一批农民⁸⁴。

以上的论据说来似乎都有道理。但是，它们并不能为我们的问题作出最后的解答。巴黎盆地聚集的居民，在整个法兰西的范围内，确实显得异常稠密。人口过剩固然可以作为解释问题的一个重要理由，但这个理由本身却还有待说明。我们看到的是事情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当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分崩离析时，巴黎已经存在着人口过剩，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罗马在法兰西岛的统治比在其他地区持续更久，直到西亚格利乌斯被克洛维击败为止（公元487年）。以上因素大概确曾起了作用；罗马在这里的统治比别处长一个多世纪，此事

未可等闲视之⁸⁵。

由于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法兰西岛及其邻近地区后来成为加洛林王朝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据点。在很长时间内，加洛林王朝始终注意维护位于其领地中心的这个地区的统一，并把该地区的统一视为其力量的源泉。雅克·栋特则进一步认为，该地区于公元837年的分裂竟使加洛林王朝的生命力陷于枯竭。这一认识显然言过其实了。

相比之下，爱德华·福克斯的眼界更加开阔，他的论点也更加引人注目和值得推敲。他赞同某些历史学家的见解，认为阿拉伯入侵虽然随着普瓦蒂埃之战失利而一蹶不振（公元732年），但入侵行动毕竟是被法兰克人在查理·马特时代创建的重骑兵所挡住的。正是在这个时期，有轮子而无犁壁的重型犁车终于问世并开始普及，随后又出现了三季轮作制（小麦、荞麦、休耕），从而使土质板结的北方地区的土地得以充分耕种；正是在这个时期，为重骑兵所不可缺少的马镫也逐渐推广。因此，“加洛林王朝突然获得了互为补充的两项有利条件：马镫和荞麦，荞麦种植可使战马的数量空前增多”⁸⁶。“由于兵强马壮，法兰克国王的骑兵纵横驰驱，从而在战略上使罗马军队不可望其项背”⁸⁷。

考虑到以上这些理由，加洛林王朝只会朝着盛产荞麦和马匹的北方地区发展。因此，昂利·皮兰纳过去作出的片面解释应予推翻！并不是伊斯兰把西方势力一度逐出了地中海，而是西方势力自动朝北方转移，以寻求“西欧土层最深，土质最肥沃的土地，直到今天，这里每公顷土地的产量几乎为世界任何地区所不及”。所有这一切，最终都由“新型犁铧开垦的塞纳河盆地和泰晤士河盆地的土地”所决定⁸⁸。

上述论据全都不容忽视。谁又会否认重骑兵的重要性呢？重骑兵为欧洲军事史开辟了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新时期。手持长

矛、纵马飞驰的骑兵冲锋陷阵，势如破竹，威廉·麦克尼尔曾把他们比作“1940年的重型坦克”，“一队骑兵，即使人数有限，也能决定战役的胜负”⁸⁹。

但是，如果回过头来再考察位于卢瓦尔河、塞纳河和索姆河之间的这个区域，势必就要查看以上演变的大概日期，特别是要注意到，北方地区的农业实践肯定早在查理·马特时代以前已经开始。

解释又一次回到了原来的老问题上来了。人们认定这里具有先进的农业组织，而农民人口众多则是农业组织先进的必然后果，至于这一切如何形成，仍然没有作出说明。

然而，在法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家里，如果不从历史的长时段去考察，人口问题就不可能被弄清楚，这里的长时段仍然停留在传统历史的范围之内。实际上，所有的变化是在几千年内完成的，史前史不久前取得的进步已使我们对这几千年历史开始有了初步的了解。

法国今天所处的地域，远在史前时期，曾被两群人所穿越，一群来自地中海，另一群来自中欧腹地。我们暂且只考察第二群，即从中欧向巴黎盆地——未来的法兰西奥依语地区——的决定性人口迁移。史前时期中欧的辽阔大地曾是典型的“农民大陆”，农民所经之处，“从叶尼塞河到费尼斯泰尔”⁹⁰，都留下了语言的痕迹。在这宽广的地区，各个不同的部落波浪般地向西涌来，移民浪潮或与被征服的居民相结合，或在途中带动后者一起迁移。他们带来了养牛和种植谷物等生产活动。公元前4000年，他们在巴黎盆地各集居村落的周围卓有成效地建立起农业基地（在这以前，巴黎盆地因当地居民滥施砍伐而陷于部分荒芜）。这些平原土地开阔，自然条件优越，便于人口的迅速繁殖。随着东部移民的源源而来，人口数量更不断增多，终于在公元前1000年间促成了凯尔特人的扩张。一

望无边的开阔地在那时随之出现，并预示着“中世纪开田制”⁹¹的即将到来。以上简要介绍了高卢的形成过程，也可以说，介绍了法兰西最初的形成过程。

我们因此可以从史前史得知第一次统一，而这第一次统一的基地将为实现第二次统一作好准备。读者或许会认为以上的解释未免过分简单了。

巴黎为什么成为中心？

可是，法兰西统一的中心为什么最终建在位于塞纳河特定河段的巴黎“城岛”？为什么不选在位于塞纳河另一河段的默伦？默伦也有自己的岛屿，而且处在一个同样肥沃的地区的中心。为什么又不选在桑利、兰斯或奥尔良？正在孕育中的法兰西似乎曾经想把其政治中心设在奥尔良。卢瓦尔河对实现法兰西统一所起的作用与塞纳河相同。卢瓦尔河顺水可通航运（原因不言自明），逆水依靠西风相助也可行船。但奥尔良北有森林，南有索洛涅地区的积水，夹在二者的中间。

为什么鲁昂不能成为中心？米希莱认为，“巴黎、鲁昂、勒阿弗尔（众所周知，该城由弗朗斯瓦一世于1517年建立）三者合一，构成同一城市，塞纳河则是该城市的一条大街”⁹²。假如我们凭借想象来重写历史，我们完全可能设想法兰西的中心朝英吉利海峡方向移动，并在鲁昂固定下来，从而使城市的规模大大扩展；鲁昂很早就是个十分繁荣的城市，只是后来才因在河边发展余地不大而遇到了障碍。位于泰晤士河出海口的伦敦成为英国的首都，可算是同一类型的胜利。总之“巴黎之成为巴黎”并不是“必然的”⁹³。

如果说巴黎成为法兰西的中心，“并非出自有意识的选择，而是凑巧赶上了机遇”⁹⁴，人们岂不可以心安理得地认为，在这场结果未可预知的竞赛中，任何其他城市均可有幸成为法兰西的中心？

巴黎确实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塞纳河及其支流约讷河、马恩河和瓦兹河近在咫尺；小麦，木材，成桶的葡萄酒，满载草料的船只，随水漂送的木排，都可顺利地从上游直达这个大城市的码头。

然而，法国首都也有其不利条件。城市地处内陆，不能不产生严重的后果：首都拖着法国向内陆发展；要不然就是法国在几经犹豫终于作出这一选择的同时，甘心情愿成为一个内陆国家。

面对决定近代世界命运的海洋，法国自有其决胜的手段，它拥有港口、水手以及无所不为的穷苦人。皮埃尔·博诺正确地指出：“法国为进行大规模殖民征服所能拥有的机动条件之多远远超过英国。人们切莫以为法国人对外出移民不感兴趣：自愿外出移民的人很多，王国政府又不惜采用拉夫、流放等强制手段，‘输送’国人前往海外。”⁹⁵ 不过，王国政府的注意力仍在陆地。

为法兰西设想另一种命运，正是试图搞清楚历史赋予它的命运。米希莱差不多正是这样做的，但他没有完全披露自己的想法。他于1831年8月在《日记》中写道：“勒阿弗尔……地处北方前沿。大洋〔原文如此〕一平如镜，海岸不算险峻，放眼望去，下诺曼底清晰可见。每当潮水下落，大洋属于英国。这块壮丽的自由天地竟归别的国家所有，转念及此，我感到心忧神伤……不管我国的港口是多么缺少活力，但从诺曼底多不胜数的教堂来看，法国的活动中心当时显然偏向西方。英格兰在11至13世纪曾多次遭到入侵，法国当时似乎拥有海上优势。”⁹⁶ 对于以上的见解，我个人表示怀疑。我很难相信大洋竟是自由的天地；大洋是富源，因而也是不平衡。但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如果希望出现另一个法兰西，那就必须设想，作为法兰西的样板地区，巴黎盆地把注意力转向北方和西方，并把其雄心勃勃的中心设在鲁昂，而不在巴黎或奥尔良。法兰西的这一初见端倪即被葬送的海上使命，已成为我国历史上的千古之谜。沃邦曾经提问：巴黎这个“无底洞”是否应对此负责？回答既

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因为巴黎既是结果，又是原因。

可以肯定的是，奥依语地区的优势给我国打上了扭曲的、不对称的烙印，这种不对称对法国几乎可以说是一场灾难。但是，假定法国竟以鲁昂、里昂或图卢兹为中心，情况是否会有所变化呢？民族统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上层建筑，是向情形各异的几个地区撒开的一张网。网终究要向一个得天独厚的中心集中，即撒网人的手。不平衡于是就自动产生。依我之见，恐怕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国家是真正对称的。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知道：各个地区是否可能撇开统一的国家而自行其是？我以为是不可能的。独立的地区确实曾经存在，甚至一度居统治地位，后来又合乎逻辑地停止存在。我相信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某种必然性。

三 边界：至关重要的验证

栖息是生存的开端。法兰西早在正式存在前已有了边界，已有其栖息地。这些世代相传、几经争夺的边界所划定的一块地域，用过去交通缓慢的尺度来衡量，大得简直骇人。从这个观点看，法兰西长期是个“庞然大物”，一块独立的“大陆”，一个超等国家，其政治覆盖之广堪与帝国相比拟⁹⁷；为把几个地区粘在一起实在很不容易，它既要应付内部的威胁，又要防范外来的危险。这一切迫使它保持警惕和耐心，所要调动的军队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昂热·古达尔在谈到路易十四的战争时说，“攻城掠地已使法国境内要塞遍布，为此必须保持大批驻防部队；王国的边界延长了，需要扼守的要冲也增多了。从此，和平与战争已不再有任何区别；新征服的区域越大，守土的责任越重，保留同等数量的士兵也就成为势在必行。”⁹⁸

边界问题贯穿于法国的全部历史，为此消耗着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⁹⁹。就在1756年，眼看七年战争业已开始，昂热·古达尔正确地指出：“我国正规部队的数量之多为欧洲任何国家所不及。军费开支已成为国家难以承受的负担。荷兰和英国的陆军加在一起，不过4万人而已。我国的陆军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在15万人以上，比以上两个国家多11万名士兵。”¹⁰⁰这个数字看来并未夸大，当路易十四于1661年即位时，法国单是步兵就达“21.8万人，其中留守部队共2.6万人”¹⁰¹。当然，士兵的人数随时有所波动。除正规军以外，还应加上临时征集的农民以及民伕和民兵，且不说负责采购和运送粮食马匹的军需商，往往粗暴地强征新兵入伍的募兵官（新兵几乎总是伺机脱逃，因而征集新兵十分困难）。我们还不要忘记把必要时召募雇佣军的费用以及购买武器、军马、大炮等装备的费用列入军事开支。

荷兰（即尼德兰）和英国军费开支较小，这是因为英国受到大海的保护，荷兰则因国土较小，边境上又是炮台密布¹⁰²。法国不仅辽阔无边，而且其领土贪欲简直像是农民的肚皮，永远也填不满。

边界由来已久

“边界”(frontière)一词原系形容词（而且从不以阳性形式出现)(frontier, frontière)，意即“面对面”。该词很早即开始使用，“在弗雷德里克·戈德弗鲁瓦（1881至1901年）的《古法语辞典》中，可读到居亚尔（14世纪初）的一段话：Li navré vuident les frontières，意思是说，受伤者撤离前线，来到后方。”¹⁰³在变成名词后，“边界”表示在一条分界线的两侧面对面地相持不下的敌对双方¹⁰⁴。在这一含义上，该词长期与bornes(界)、termes(沿)、limitations(边)等一系列其他用语相竞争。它最终取代了这些用语，

从此主要确指每个领土国家的外部界线。

实际上，国家的行事方式与个人相同。每个人都竭力要划定自己的生活场所，正如任何自由的动物都坚守自己的地盘一样。沃邦于1673年¹⁰⁵致信卢瓦侯爵，要他劝告国王专心致意地沿着北方边界开拓疆土，法国在北方刚夺得的几个城市当时还是处在西班牙领土包围之中的“飞地”。“如果您相信我，大人，请您务必坚持扩展疆土，而放弃不切实际的计划；真正能拿到手的东西才是有用的好东西。”划定边界，确定地盘，保护边界安全，各国对此无不孜孜以求。各种国家，无论是崭露头角的新国家，或是阅历丰富的旧国家，全都羡慕、向往着中国的长城。我国的长城——马奇诺防线——命乖运蹇，每当我们抚今忆昔，心里莫不感到十分沉重。这条防线搅乱了解释的思路。

修建防御工事不单是恐惧、忧虑和明智的反应，而且也是国家富强的证明。有些堡垒甚至威名远扬。在实现统一的进程中，这些工事是法兰西国势增强的见证。早在沃邦以前，卡佩王朝建造了罗浮宫的主塔，埃普特河谷或塞纳河谷的城堡，还有与加亚尔城堡遥遥相对的拉罗什-古伊永城堡。

一切行政区划的界线，尤其是政治边界，一旦正式划定以后，便趋向长期固定下来，甚至永久不变，似乎就像一道永不消失的伤疤。例如在法国，许多教区界线沿用了罗马统治下高卢各邦的区划；它们从加洛林王朝以前开始，直到1789年革命为止，几乎原封不动地予以保留。

至于国家之间的边界，其寿命之长更为众目所见。马德里或里斯本对美洲殖民地领土划分所作出的决定，事先为20世纪的独立国家确定了各自的版图；总之，这些独立国家在诞生以前已有了边界，一些对它们并不始终合适的并且往往不合常理的边界。同样，就在眼下，独立了的非洲也在过去殖民地的边界内安置新国

家,不管这些边界对它们是否合适。边界对一些国家不利,对另一些国家有利,引发了种种冲突。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因边界而获益匪浅,它保留了殖民地时期建立的与非洲各地的联系,还获得了撒哈拉及其石油……

可见,历史趋向于边界的固定化,似乎边界的起因纯属偶然,但一旦与地域结合后,便扎下根子,很难移动。

然而,这些边界事先必须有足够的时间与土地相结合。我在萨瓦的住所四周曾栽插了一些加拿大杨树枝条。30年过后,树木生长茂盛,几乎围成一道篱墙。但30年时间对一条边界的形成和确立还远远不够。雅尔塔协定在欧洲躯体上所划下的界线至今已有30多年时间。恐怕要过100年以后,才能确定这条边界能否得到巩固。

凡尔登条约(843年)

神圣不可侵犯的凡尔登条约(843年8月)的主要特点,无疑是这个条约的各项规定持续了几个世纪,并且在时间的盲目帮助下得到巩固。

就在1000多年以前,宽厚者路易把他的大而无当的帝国交给三个儿子平分:路易分得东法兰克,即日耳曼地区;秃头查理分得西法兰克(最初的法兰西由此产生);界于二者之间的洛泰尔地区归其长子洛泰尔(罗退尔)所有,后者在承继帝位的同时,取得两个首都——北方的艾克斯拉沙佩勒和南方的罗马——以及连接两地的一块200公里宽、1500公里长的带状领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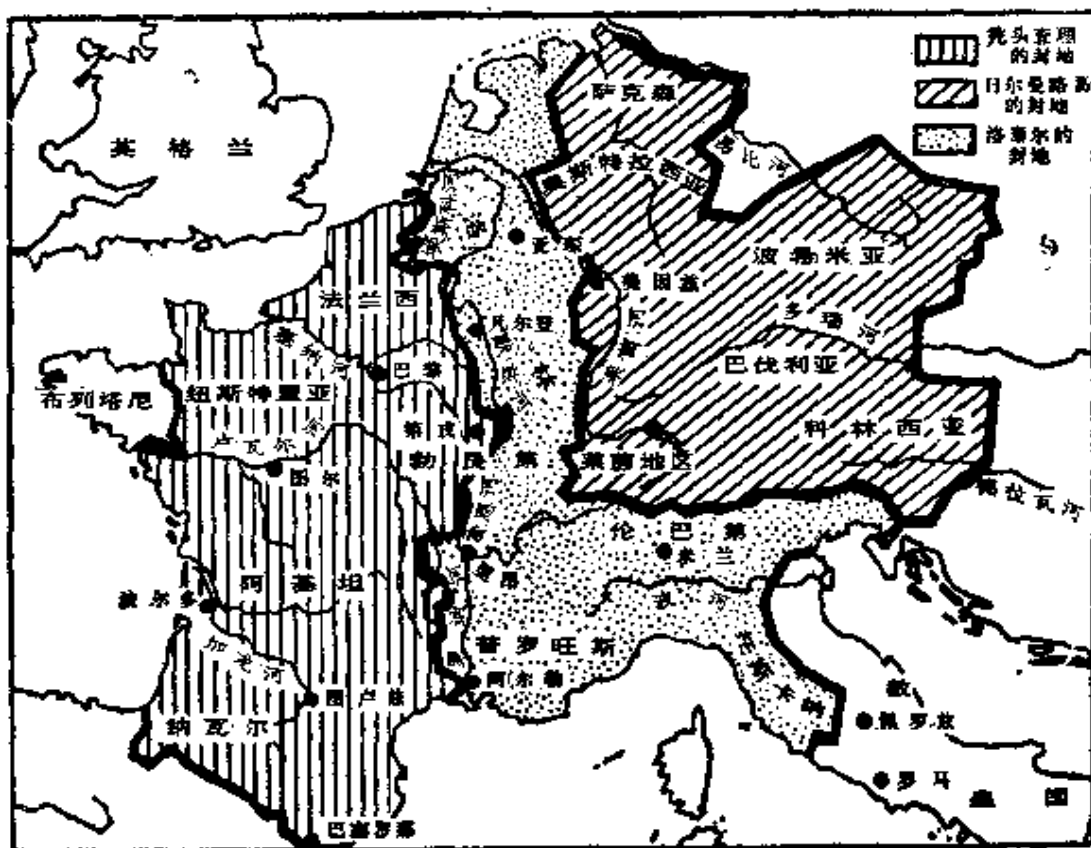
这条“地峡般”的带子穿越阿尔卑斯山,一直延伸到贝内文托以南的意大利。凡尔登条约的谈判人,或如罗歇·迪永所说的“专家”¹⁰⁶,为了维持帝国的门面,作了以上荒唐的划分。他们之所以把美因兹和莱茵河左岸的一块土地划归日耳曼路易,竟是为他就

近享用葡萄酒。真是一份绝妙的礼物！

不用说，以上这些随机性理由（根本不可靠的理由）说明不了凡尔登条约令人难以置信地长寿的原因。法国将在几个世纪期间始终以罗讷河、索恩河、默兹河和埃斯科河为东部边界，尽管它与这四条河流（埃斯科河除外）事实上只有部分接触或根本没有接触。摇摆欲坠的洛泰尔帝国其实仅维持了不到一个世纪；这个地区于936年被日耳曼人吞并，不久建立了日耳曼人的神圣罗马帝国，当时其气势之盛胜过加洛林王朝晚期和卡佩王朝的法国。因此，法国正是在四条河流的沿线遇到了“日耳曼的”边界。

当然，只要法国君主在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方面尚未腾出手来（对付英国的入侵），日耳曼边界还相对平静。特别是在这条边界沿线两侧，封地的七零八碎滋生了小封建主的割据。但这并不等于说东部边界就此便不存在。尽管封建主之间的冲突、战争、袭击、争端和诉讼接连不断，或正因为有这些事端，逆来顺受的当地居民对边界的走向竟是一清二楚。例如，流经阿戈讷地区的比耶姆河是条微不足道的小河，除了沿岸建立的玻璃工场外，人们很少说起它。可是，在缔结凡尔登条约时，它有幸被选中充当法兰克国王和洛泰尔帝国之间的一小段边界，从而也就成了凡尔登教区和马恩河畔沙隆教区的界线。当地居民于1288年被问到时，对“哪里是帝国，哪里是王国”¹⁰⁷，都能分辨清楚。这就证明，对经常越界的附近居民来说，王国的边界是确实存在的。直到今天，比耶姆河仍是马恩省和默兹省的省界，由于每个省相当于一个主教区，它也是凡尔登教区和沙隆教区的界河。

以上叙述确认了边界长寿的事实，却并未说明其原因。有人说，凡尔登条约“是虔诚者路易的三个儿子互相争夺而达成的一项妥协。他们最关心的是平均分配，每人一份。他们利用河流，即单纯的地理分界线，充当国界”，这样比较方便¹⁰⁸。对于加斯东·泽



公元843年凡尔登条约对查理大帝帝国的划分

引自贝蒂埃·德·苏维尼的《法国史》

勒的上述见解,或对于罗歇·迪永的见解(也属地理范围),我都赞成。但说到底,划分的边界之所以能够存在和长期保持,难道不正是因为语言的界线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时已经确定?这些界线的走向与过了10多个世纪后的今天几乎相同。由此可见,这里发生的政治演变已被既存的文化现实所确认。对在凡尔登条约前18个月举行的施特拉斯堡宣誓(842年2月14日),我们必须承认传统历史赋予它的重要性。洛泰尔的两兄弟面对双方的部队宣誓结盟,秃头查理用条顿语宣誓,日耳曼路易用罗曼语宣誓,部众也分别以各自的语言宣誓。就在洛泰尔带状领土的两侧,我们看到正在形成的两个民族社会分别以自己的语言显示自己的存在,宣布

自己即将诞生和展露头角。当然，这里还谈不上确切的语言界线和民族。但塞纳河在其发源地圣日耳曼·拉弗伊难道就已是塞纳河了吗？无论如何，直到1914年，法国人和德国人还在打仗，争夺原来洛泰尔的那块地盘。

四个关键的年代：1212、1213、1214和1216年

边界的走向要由缓慢流逝的历史所决定；伊夫·勒努阿尔¹⁰⁹在论述随后时期的文章中指出了这一点。在他看来，西欧的政治地图是在1212、1213、1214和1216这四个关键年代一劳永逸地确定的。四年将最终确定缓慢发展的局势和力量对比。

就在13世纪初，四个超级国家企图扩展各自的边界：阿尔摩哈德王朝的西班牙在北非和西班牙大部实现了伊斯兰的统一后，逐渐向北方推进；金雀花的安茹王朝把爱尔兰的一部分以及法国的很长一段海岸线（从布雷勒河的出海口到比达索阿河的出海口）并入英国；图卢兹、萨拉戈萨和巴塞罗那正酝酿成立强大的奥克西坦帝国，并怀有侵吞罗纳河彼岸的普罗旺斯的野心；菲利普·奥古斯特在攻陷加亚尔城堡后，于1204年6月24日兵不血刃地进入了鲁昂，这一胜利促使法国成为潜在的超级强国。但胜利者是否将向海上发展呢？

然而，这些野心勃勃的超级国家陆续遭到了失败，它们被古老的国界线缠住了脚，就像赛跑运动员被横在路中间的绳索绊倒一样。跟斗摔得很猛。西班牙的阿尔摩哈德王朝在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被基督教联军击溃（1212年）。1213年，西蒙·德·蒙福尔在米雷一举战胜图卢兹伯爵和阿拉贡的彼尔二世。1214年，菲利普·奥古斯特在布汶决战中击败了失地者约翰组建的反法同盟。这在法国历史上是个辉煌的时刻；失地者约翰陷入困境之中；英国的反叛贵族迫使他作出让步，签署了《自由大宪章》（1215年）；贵族们于

翌年更召请菲利普·奥古斯特的儿子、未来的狮王路易八世前来英国。但是，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再次受挫：失地者约翰死后，英国贵族拥戴其儿子亨利三世接位，狮王路易被迫返回法国。

以上插曲都以相同的方式而告终。古老的边界经受了考验，而且将保持下去。这无疑因为，在13世纪初或更早一些时间，欧洲已是一个结构严密的整体，一个由许多政治个体组成的整体。政治个体之间互相遏制，这种相互制约使它们全都动弹不得。瓦尔特·肯纳斯特¹¹⁰说得对，很早以前就有某种“欧洲均势”的存在，而且早于该词出现以前，均势打破一切旨在建立“世界王朝”的称霸企图，尽管“世界王朝”的说法是在后来，即在16世纪方才提出。

这种动弹不得实际上揭示了某种内在的力量对比。

先看1212年的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在半岛上坚守阵地的基督教文明（即使在穆斯林统治下，西班牙仍有基督徒的存在）击退了已是强弩之末的伊斯兰文明的冲击。

至于英国和法国的情形，也不容任何犹豫。在黑斯廷斯战役（1066年）和占领诺曼底以后，英国已不再是个岛国。只是到1558年，当弗朗斯瓦·德·吉斯收复加来后，英国才有幸——虽然还不太情愿——恢复其岛国的地位（英国人如果出于明智，理应为强盛的英国的这位缔造者建立丰碑）。法国和英国（至少两国的统治阶层）在中世纪有着相同的经历：金雀花家族原系法国的王公，这从他们的名称可以看出。虽然如此，但透过王公间的明争暗斗以及阿基坦公爵之女埃莱阿诺尔的再婚，透过狮心王理查的愤怒和孤注一掷，透过失地者约翰的错误和软弱，透过菲利普·奥古斯特的审慎、狡诈和机遇，我们可以看到英法两国的形成过程。菲利普·奥古斯特夺取了鲁昂，从而把依傍大海的金雀花王朝的领地拦腰切成两块。英国抛弃路易（未来的法国国王路易八世），也就成功地

把法国的势力赶回英吉利海峡的彼岸。海峡两侧从此一刀两断，预示着具有民族特性的实体即将诞生；民族实体既是文化的产物，需要经过一个缓慢的成熟过程，但也肯定具有远大的前程。

阿尔比派的十字军东征与以往几次十字军东征不同，它的目的并非针对国外的异端，而是在基督教世界内部扔了一颗炸弹。由此便出现了类似的、更加复杂的问题。事情的经过相当清楚。在表面上，一切都恢复秩序：异端遭到了镇压，朗格多克于1271年由法王继承，并入法国的版图。但在这场文明与文明的战争结束后，奥克语地区虽然有所扩展，但原来的边界依然存在；这道长长的伤口将不会愈合。我国历史留下的这个重大问题没有找到，并且也不可能找到完美的答案。

“天然的”边界

以上叙述有助于我们提出所谓“天然边界”这个棘手的、也许是虚假的问题。古代高卢的边界，法兰西的最早框架和雏形，由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地中海、比利牛斯山、大西洋、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所构成。随着高卢被罗马征服，这些边界进一步得到巩固。到了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统治期间，高卢继续在这块辽阔的领土上生活，维护了国土的完整；朝南和朝比利牛斯山的方向，远征西班牙使边界更加巩固；朝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方向，查理大帝征服了意大利的伦巴第；朝莱茵河沿岸的方向和沿着漫长的海岸线，诺曼底海盗从公元9世纪起肆意抢掠，但终于逐渐消失，并不始终如历史学家所说，成为莫大的灾难。总之，高卢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期内，几乎完整地保存着它赖以生存的地域，时间之长足以使地域同命运合而为一，使种族和文明各不相同的居民学会共同生活。

昂利·马丹在其《法国史》一书中毫不迟疑地写道：“崭新的法

兰西，古老的法兰西，都奉高卢为唯一的法人代表。”¹¹² 虽然我决不会使用“法人”一词，但我们不必对此过分挑剔，有一点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系列现实自始至终地贯穿于整个发展过程，互相替代，又互相制约。

但我们不要以为，古代高卢的征城掠地，直达我国的所谓“天然边界”，竟是法兰西扩张的指导原则，竟是一项遗传工程，而我国的领导人根据这项工程的指令，清醒地认识到有一块领土尚待收复。法国历代国王推行的政策，或因势利导，或随机应变，或碰碰运气。他们取得的一切成功都有一定的原因，但原因与原因从不相同，每次成功又产生了新的欲望。

第一条理由，这是因为古代高卢长期被我国历史学家置之度外，几乎被彻底遗忘。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和编年史家把王公们的一大堆传闻轶事当作法国历史来介绍，而且谬误百出。就以尼古拉·吉伊于1492年发表的直到1621年仍多次再版的《高卢历国纷争中基督徒和调停者建功立业之详尽年表》一书为例，虽然该书的标题提到了“高卢历国”，但其内容却并不涉及高卢和高卢人，而只谈法兰西国王及其起源，把法兰克人的祖先同神话故事中的普里阿摩斯、赫克托尔、弗朗西翁等特洛伊英雄硬扯在一起！

在当时的法国，“高卢人是我们的祖先”这个口号尚不存在。费迪南·洛特说：“我国的历史随着法兰克人的到来而开始”，而弗朗西翁则是法兰克人的首领。“中世纪的法国人甚至不问，在法兰克人到来前，是谁在高卢居住……或者他们回答，那里住的是罗马人。”¹¹³ 埃斯蒂安·帕斯基埃首先想到（1560年），通过对恺撒的研究，或许能对高卢及其居民有真实的认识。我们可以不太夸张地说，高卢人从此才进入了法兰西的“历史”。我们应归功于埃斯蒂安·帕斯基埃及其同时代的人，特别是令人瞩目的拉伯普利尼埃尔，他们首创了文献考证，不再把武功歌谣和神话传说当作历

史¹¹⁴。不幸的是，由法兰西人文主义产生的这种新型历史诞生不久即告夭折；17世纪的反动与新型历史开创的模式“背道而驰”¹¹⁵，重新制造了重重烟幕。“直到1714年，博学的尼古拉·弗列莱因想证明法兰克人原系日耳曼人，竟被送进巴士底狱关押！”尤其，他还是在法兰西铭文和文学学士院发表意见时获罪的¹¹⁶……

既然人们无视高卢的存在，怎么还会注意到高卢的边界恰好正是天然边界？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几乎从未明确提到过天然边界，人们所能收集到的暗示不足以充当见证。数量之少可谓凤毛麟角。

就在1444年，对英战争尚未结束，查理七世及其儿子未来的路易九世率军出征阿尔萨斯和洛林，经过精心策划和几次交战，进占巴塞尔城；他们暗中期望乘机扫除法国境内的游兵散勇，同时也遏制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的扩张野心，后者当时企图根据凡尔登条约的划界，重建洛泰尔王国。查理七世当时声称，法兰西王国被剥夺其直达莱茵河沿线的天然边界迭经多年时间，现在时机已到，应该收复国土和恢复主权，莱茵河西侧的领土“从来就属于法兰西历代国王所有”¹¹⁷。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所谓“历代国王”指的是克洛维等法兰克君主，特别是查理大帝，中世纪传说和武功歌中的这位英雄被我国国王称作“先祖”。路易十一在其晚年更崇奉查理大帝为圣人，规定1月28日为法国各城市举行祭庆活动的节日。就在15世纪，开始出现一项奇怪的仪式：“法国新任国王举行加冕典礼时，应将前任国王葬礼上使用的棺罩送往艾克斯拉沙佩勒，加盖在查理大帝的墓上”¹¹⁸。这项仪式直到路易十五1774年去世时依然使用。加斯帕尔·德·苏尔在其《回忆录》¹¹⁹中对亨利二世1552年出兵莱茵河结果只夺得三块主教领地而感到遗憾。他的意思不言自明：为什么不夺取阿尔萨斯和洛林？他说，“这本是恢复奥斯特拉西亚的一个机会”，奥斯特拉西亚王国曾是克洛维的一个儿

子留下的遗产,后来曾多次并入法兰西王国。因此,当法兰西国王为争夺继承权而寻找根据时,他们引证的理由与其说是古高卢的天然边界,不如说是法兰克国王和查理大帝的伟勋业。

有关天然边界的历史素材确实很少,我们这里要补充1558年的一个暗示和1642年的一个明确提示。

暗示来自一位默默无闻的洛林王公,人称“好人约翰”,他写道:“巴黎畅饮莱茵河水之日,将是高卢〔即法兰西〕功业圆满之时”¹²⁰,所谓功业圆满,也就是说,收复全部国土。

明确提示出自黎塞留的遗嘱。人们借这位大主教之口声称:“本人执掌政柄期间,致力于恢复自然赋予法兰西之界限……务必使法兰西与高卢恰相一致,并在旧高卢的基础上,振兴新高卢。”以上的话不可能再有任何含混。但大家知道,这份遗嘱是伪托的,而且又是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考虑到文章毕竟是由黎塞留的亲信所撰写,人们至少可以部分地相信,天然边界的提法是在法兰西的政治中枢诞生的。这种推测也许有理。不过,在1642年以前,从未有过类似的说法,而在1642年以后,则一直要等到大革命开始,才在革命文告中重新见到伪托黎塞留说过的话。

既然君主时代的法兰西实际上并未使用天然边界这一方便的论据,并且又曾吞并了一些地盘,它又怎样为吞并行为进行辩解的呢?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满足于攻城掠地,进行兼并,而听由别人去说三道四。即使出现例外,也恰恰正是证实规律。

法国于1601年从萨瓦公国夺得比热、热克斯和布雷斯等地区。亨利四世对他的新臣民们说:“既然你们历来都讲法语,你们理应是法兰西国王的臣民。使用西班牙语或德语的地方,我赞成分别留给西班牙和德国,但使用法语的地方应归我所有。”¹²¹

这番话虽然说来也还顺理成章(我不认为此话说得正确或者真有理),但法国国王事到临头,却并不说话算话;就以法朗什一

孔泰为例,该地区于1674年首次被法国国王占领(派驻一支瑞士雇佣军),于1678年再次被征服,并根据奈梅亨和约并入法兰西王国。又如,1766年斯坦尼斯拉·莱津斯基去世后,洛林也遭兼并。对于法国1648年占领使用日耳曼方言的阿尔萨斯,又该作何解释?对这项武力行动,法国并未提出任何理由,舆论界当时也几乎不感兴趣。1659年缔结的比利牛斯和约使法国除兼并鲁西永和塞尔达尼亚两地区外,还从加泰罗尼亚取得了一块割地。当时居然还曾简要地回顾了古老的边界:“比利牛斯山早年曾是高卢与西班牙的分界线,今后也将成为两个王国的分界线”¹²²。但这里提到高卢纯属偶然。在为确定边界走向而随后举行的谈判中(前一次于1660年4月至5月间在塞雷举行,后一次于1660年11月在柳维亚举行,并达成协议),双方只是陈述法律论据而已。既不涉及地形,又不谈到高卢¹²³。一个世纪后,既在1752年,当博米侯爵巡视鲁西永的边界时,他在报告中回顾说:那时候(即在1659年),“曾经决定以比利牛斯山的顶峰和朝向划界,面对鲁西永内地一侧的山坡属于法国,面对西班牙各省一侧的山坡属于西班牙王国,并根据阿尔卑斯山的划界方式,遵守分水线的规则”¹²⁴。这样做显然对今后比较省事。

天然边界的理论根据只是在大革命时期才终于取得胜利。“天然”二字难道不是在启蒙时代十分风行吗?论据是不容置辩的。格雷古瓦教士于1792年声称:“法兰西是个自给自足的整体,既然自然界到处给它设置的障碍使它不必进行扩张,我们的利益与我们的原则恰相吻合。”1793年1月31日,在吞并比利时后不久,丹东也说:“法国的边界由自然界所划定。我们将朝四个方向抵达边界:大西洋、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¹²⁵

对于莱茵河边界,德国人只是在较晚的时候才向我们提出异议。弗里德里希二世曾讲过一句奇怪的话(至少听来不太顺耳):“只要手里拿上一张地图,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兰西王国的天然

界限似乎一直伸展到莱茵河，这条河流好像生来就是为了把法国与德国隔开。”¹²⁶直到1813年，德国的反应才在恩斯特·摩里茨·阿伦特的《颂歌》中得到表现：“莱茵河是德国的大河，而不是德意志的边界。”¹²⁷

我因此认为，寻求天然边界并不是法国政策的指导路线。我们暂且把官方的宣言、论据和说法撇开不谈：法国的扩张继续在进行，不断引起欧洲的忧虑，这毕竟是事实。奥古斯丹·梯叶里、昂利·马丹和阿尔贝·索布尔十分重视这一政策的连续性；我并不认为他们错了；法国革命与其说败坏了，不如说继承了旧制度的政策。自从亨利二世远征莱茵河以后（1552年），法国处心积虑地要把开向东欧的门户关闭起来和上闩落锁。

从未征服的大海

研究边界问题的专著很少谈及大海。陆地的名声之盛杳无边际，对陆地的迷信远胜一切！然而，边界毕竟是地域的断裂，当人们离开加来或到达杜夫尔时，有谁会不相信，这是离开或到达边界？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断言：“人是陆地的动物。”¹²⁸英国杰出的旅行家查尔斯·达尔文于1831年乘坐“贝格尔”号船作了环球旅行后说：“人们进行航海，原是迫不得已的事。”¹²⁹虽说如此，大海、海岸、海员和船队毕竟都是客观的存在，海洋无疑是天然的边界。根本的问题是要知道，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法国历史的范围内，人或历史究竟对漫长的海岸有何作为。

法国在海上曾屡建奇勋，可是，除了这些插曲以外，其扩张成果与在陆上从事的冒险却不可同日而语。二者甚至很不相称。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夹在大海和大陆之间的法兰西偏向陆地的一边。菲利普·奥古斯特于1204年夺取富饶的诺曼底沿海地区，从而打开了被金雀花王朝封闭了的通向大海的门户。他伤心地声称：“法

国人不懂得向海外发展。”就在同一年，“似乎为了印证国王所说不虚”，法国人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打君士坦丁堡时，“承认自己在海上作战不如在陆上那样得心应手”。此话出自若弗鲁瓦·德·维尔哈杜安之口¹³⁰。

确实，必须等到1264年，法国才在地中海拥有艾格莫尔特这个港口或“窗口”。当时，除诺曼底地区外，法国的水手人数不多。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法国在斯勒伊斯海战（1340年6月24日）中一触即败，从而丧失了宝贵的制海权；这次失利导致了英国军队于百年战争初期顺利在法国登陆。此外，海上战局于1369年出现转机，这也不是查理五世或杜盖斯克兰的功劳，而是因为卡斯蒂利亚国王亨利·德·特拉斯塔马尔派遣了帆桨战船前来援救杜盖斯克兰；帆桨战船使用射石炮（一种新发明）进行轰击，在拉罗歇尔的港湾中消灭了英国舰队。这次胜利便于法国“夺回普瓦图、圣通日和昂古穆瓦等三地区”¹³¹。同年12月，查理五世任命让·德·维埃纳为法国海军司令。在让·德·维埃纳的努力下，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海军部队，并在布列塔尼和英国沿海一带多次作战获胜，致使伦敦惊恐万状。当时，法国海军在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的船只协助下，攻击有力，屡战屡胜。但这一局面不久又迅速恶化；让·德·维埃纳离职后被派往遥远的尼科波利斯战场，在1396年与土耳其军队作战阵亡。

法国在收复失地后，又于1481至1482年夺得了普罗旺斯和马赛，从而在地中海站稳了脚跟（朗格多克于1271年被并入王国的版图）。但它随即遇到了困难，因为它的海岸线从此分布在两大海域：一方面是大西洋、英吉利海峡和北海，这个战场今后将是圆头壳船的天下；另一方面是商业活跃的地中海地区，这里使用的细长形帆桨战船自16世纪末年后（除个别例外），不再在大西洋起重要作用。

法国因此需要拥有两支船队。或者是将船只数量增加一倍，或者是将一支船队分作两支使用，舍此没有别的选择。西班牙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但它可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把地中海和大西洋连接在一起；除了这项有利条件外，西班牙不久（1617年）又采纳了那不勒斯总督奥苏纳公爵的计划，同时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使用大型帆桨船¹³²。后来，作为长条船和圆头船的妥协，战列舰在各地得到了普遍推广。但法国的困难却依然存在，海军当局又总是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很难集中使用兵力。因此，法国于1692年拉乌格海战中惨遭失利，“假如土伦舰队能与布列斯特舰队会师，托尔维尔将可支配80多艘战舰，鉴于法国战舰船坚炮利，足以击溃英国和荷兰的99艘战船”¹³³。1805年袭击布洛兵营期间，悲剧再次重演。海军兵力不足因而是法国的痼疾。国家必须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方能克服这一顽固的弱点，而执政者却偏偏缺少坚强的毅力。黎塞留和科尔倍尔曾卓有成效地致力于重建海军，但路易十四、摄政王和路易十五并没有意识到海军的重要（摄政王竟取消了战舰和商船）。确实，从乌得勒支条约（1713年）到巴黎和约（1763年）这长达50年的期间，“法国的海船只出现在韦尔内的图画上”¹³⁴。路易十六想要更弦易辙，可惜已为时太晚（据阿兰·吉约姆说，路易十六的真正爱好不是制锁，而是造船）。

法国地处欧洲的中心，利于进行大陆战争；至于它的海上活动，却因其地理位置而受累不浅。法国未能充分发挥自然和历史赋予它的有利条件。关于有利的自然条件，皮埃尔·古鲁写道：“欧洲没有任何别的国家能有如此壮丽漫长、曲折多变和条件优越的海岸。源远流长的大江在入海口显得格外宽阔，四周更有良港环列！”¹³⁵历史对法国的青睐非同一般：法国在夺得诺曼底、布列塔尼、阿基坦、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等地区的同时，便拥有大批航海世家。让·德·维埃纳的海船与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的舰队并肩

作战,而且与巴斯克海盗相勾结……布列塔尼并入法国版图(1532年)使法国一跃而成为欧洲水手人数最多的国家。然而,这些天赐的便利至少有一半未被利用。

原因当然不仅仅在于法国地跨两大海域,为了设计和推行面向大海的伟大政策,法国必须具备一项先决条件,即要从持续不断的陆地战争中脱身,并如同英国一样,专心致意地从事海战,把全部军费用于建造船只。而要作出这个选择,不仅要求头脑清醒、机遇凑集和坚持不懈,而且还要可能抗拒贵族在欧洲各地挑起战事的企图。艾米尔·布尔茹瓦¹³⁶在《对外政策历史教科书》中讲述的历史始终引人入胜:法国在海洋和陆地之间举棋不定,几经曲折,终究作出错误的选择。年高德昭的弗勒里大主教在其晚年(1740年)仍坚持己见,竭力反对参加即将爆发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但对法国来说,不在陆上打仗,也就不再有其存在的意义。更何况,欧洲恐怕也不容它置身事外。

因此,法国海上扩张的潜力往往未被充分使用,甚至往往被遏制。我国的海员在国内难以谋生,纷纷到缺少水手的外国船上去就业。一旦法国航海业有所复兴,他们便脱离西班牙、马耳他、英国或荷兰,返回本国效力,“长期四海漂泊实非所愿,十分希望以有生之年为国王出力”。他们感谢上帝让法国在长期的无所作为以后,终于获得了航运的复兴¹³⁷。科尔倍尔发展造船业据说曾使8万名法国水手回国服务。法国驻海牙大使提供的这一数字大概有所夸大,但无论如何,确有大批水手回到了法国。

以上情形不能完全归罪于陆地战争的需要。皮埃尔·维克多·马鲁埃在出任三级会议和制宪议会议员前,曾长期在海军部门工作(他于1781年11月1日就任土伦海军巡按使,任期7年)。他揭示了法国政策所未克服的基本障碍:“科尔倍尔诚然才智过人,但他在建立强大的海军时未免过于匆忙,基础未稳便想立见成

效；他比别人更加明白，只有通过大规模的出口贸易，才能组建一支海军。他不遗余力地鼓励和发展制造厂，即足以为证。但是，商船队才刚建立不久，就被他改作军用；一度迅猛发展的造船业终因缺乏后劲而渐趋衰落。至于我们的对手，他们为建立海军所作的准备比我们要早两个世纪，因而后劲充足，可以不断扩大。”可见，法国的落后应归罪于经济的不发达，甚至归罪于“资本主义”的不发达。马鲁埃还补充说：“在专制政体下，几乎永不间断的战争和日益增长的奢侈使税收负担渐趋加重，使海外贸易不可能繁荣起来。必须设法开放商业投机，才能形成富有的资本家阶级；否则，就不可能通过贸易活动扩展国内产品的对外输出。可是，无论在政府机构中或民间习俗中，我们至今还没有见到过为创建和保持强大的商船队所必不可缺少的创业精神和节俭精神，而强大的商船队是强大海军的唯一坚实的基础。”¹³⁹

以上的话确有道理，虽然略为显得牵强。我们尤其应该进一步看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法国始终未能成为欧洲的第一经济大国，未能成为欧洲的“经济中心”。欧洲财富的中心从未在法国立足，香巴尼交易会的“大陆”时代或许可算是个例外，那也未必尽然。法国财运不佳，虽说并非一切都差，但它缺少的却是最基本的条件：充足的经济实力，高度发达的信贷，活跃的商业往来，积累的资金，大量的海运，总之，支持长期繁荣的手段和实力。昂热·古达尔在谈到黎塞留的海上业绩时正确地写道：“为使法国成为一个海上强国，应该作出整整一个世纪的努力。”¹⁴⁰

土伦的一位见证人于1761年10月26日清醒地写道：“法国如果不掌握制海权，就决不能成为受到邻国敬畏的强大国家……一支2万人的海军比一支2万人的陆军将给法国带来更多的光荣和利益。总之，谁控制着海洋，谁就拥有一切。”¹⁴¹法国从未能够充分扮演海上强国的角色。

四 搞些抽样调查是否有益？

在从事艰难的历史研究时，开展抽样调查可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一条出路。这使我们减少无穷无尽的考证。我们研究的边界问题也许就属于这种情形：边界问题包含法国的全部历史，涉及的重大事实的数量之多，是任何一名历史学家单独所不靠完全掌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进行有限的、不尽可靠的抽样调查，恐怕也会受到欢迎。正如大家事先可以猜到的，抽样调查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这样做至少将使我们可以详尽地看到我国边界的历史。我们将从中得到教益。

为了避免过分冗长的认证和叙述，我将仅限于作两次旅行。第一次去陆上的梅斯；第二次去滨海的土伦。我们肯定会学到任何人都不能完全弄懂的事情。治理法国和防卫边界是项繁重、复杂和棘手的任务，更何况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两眼漆黑。意外和失望不断在未来出现。

东北部和东部边界

为什么选择了梅斯？

法国的大部分边界——海洋，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汝拉山——几乎都可顺理成章地被称之为“天然边界”，这些天然屏障减轻了部队的防御任务。1940年，在法国的空前溃退中，阿尔卑斯山边界竟得以守住¹⁴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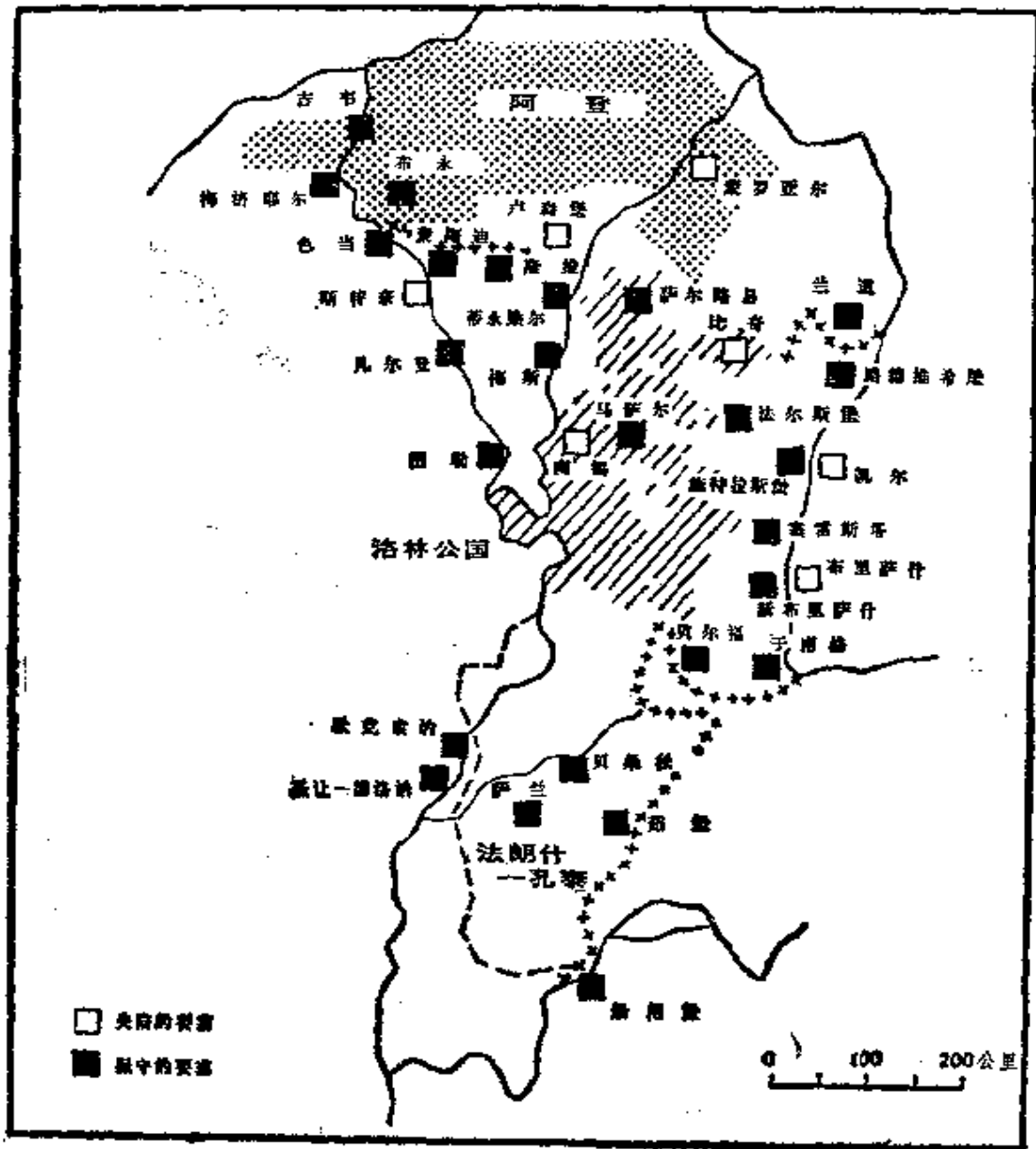
从北海到莱茵河的一段法国边界是人为的和不安定的边界，是由政客、军人、工程师凭空制造的，是由众多的历史偶然促成的。面向东北方的莱茵河给人留下十分完美的印象，却与英吉利海峡毫无任何共同之处。其保护作用徒具虚名而已。更何况，法

国政治只是从1648年起才进抵阿尔萨斯地区；在整个莱茵河沿线（从巴塞尔近郊到海边），法军及其盟军占领左岸地区也时断时续：1795至1814年，1919至1930年¹⁴³。

东北部和东部的这条边界是脆弱的和动荡不定的边界：强邻咄咄逼人，危险丛生，警报频传。邻国早已得知，必须从这里进攻，才有打开法国大门的希望。查理五世皇帝于1544年进行了第一次演习：他从卢森堡出兵，攻克圣迪齐埃后，沿马恩河向莫城推进，直逼巴黎城下。接着，在1557年、1596年、1636年、1708年、1814年、1870年、1914年和1940年，旧戏一再重演。人们常说，由其本质所决定，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进程，历史事件永远不会重复发生。我谨奉劝先生们，此话最好少说为妙。历史缺乏想象力，往往按老习惯办事。

这条边界与19世纪以前的所有边界相似。切莫把它当作一条现代的界线。正如厄内斯特·拉维斯¹⁴⁴所说，设置两排海关检查口的“笔直”的边界线只是在不久前才有的事。“直到路易十五……的条约里，‘直线边界’的概念尚未真正出现，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看到有大量的‘飞地穿’插在一起”¹⁴⁵。1771年，我国的两名地理工程师沙萨尔和若利受命在格朗普累将军的指导下，负责绘制阿尔萨斯北部从敦刻尔克到兰道的边界地图。他们测量的边界地带竟达三、四里宽¹⁴⁶。

边界可见总是一道粗线，往往并未划定。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相互穿插的“飞地”可以是几个村庄，也可以是几群村庄和集镇，甚至包括几个小城市；在敌国领土上建立的要塞是始终打开的、通向敌国的一个门户。显然，飞地只是在敌对双方实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才能维持日常生活；奈梅亨和约（1678年）第16条就对法国和西属尼德兰的边界作出了以上的明确规定。由此也势必产生冲突、纠纷以至小规模战争。国王在佛兰德的包税人本想禁止



东部的要塞

在阿登、阿尔萨斯、洛林和法朗什-孔泰的“敏感的”边界上，由于17和18世纪连续不断的战争，要塞有的已失陷（白方块），有的仍坚守（黑方块）。参见罗科尔上校：《法国防御工事的2000年》，1973年版。

法国边境村民“光顾邻近的西班牙村庄〔原文如此〕的小酒馆，据说那里出售的酒比国王辖地一侧的小酒馆便宜，村民常去西班牙村庄的小酒馆，使国王的税收损失颇大”¹⁴⁷。巡按使德马特里据理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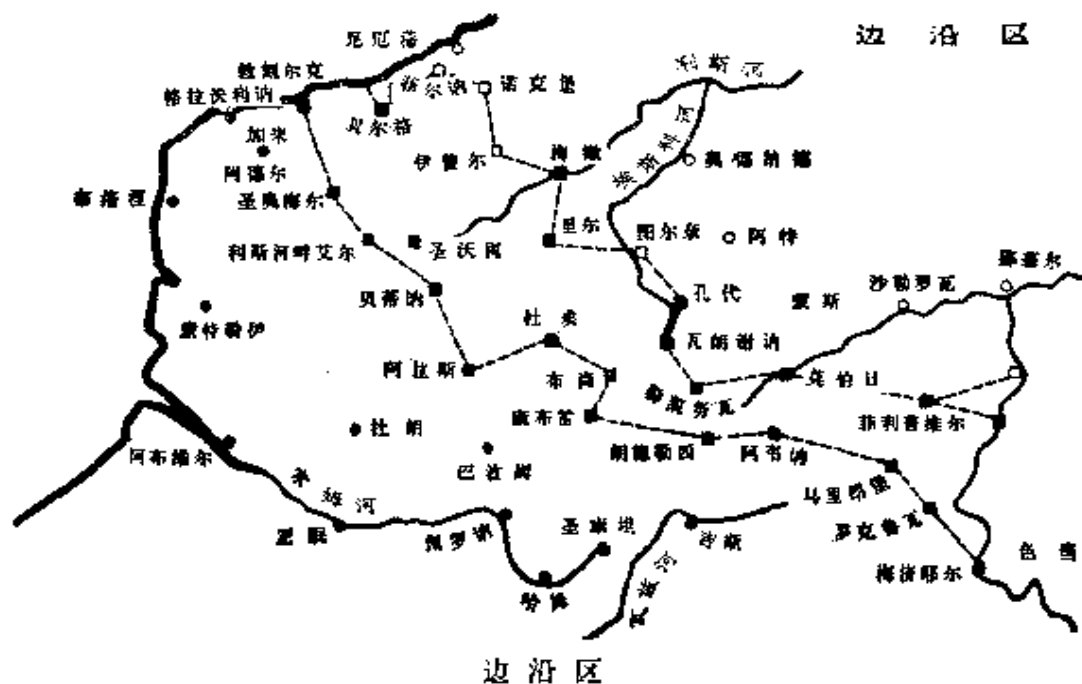
驳，声称这符合奈梅亨和约的规定。在这同时，战争又重新开始，西班牙于1689年决定禁止边境村民的自由通行。巡按使于是说：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国王下达命令，我们这边同样可以禁止通行¹⁴⁸。

人们或许会想，如果按照后来所做的那样，硬是把边界拉成一条笔直的直线，岂不就能改变以上的局面？不，这里有习惯势力在起作用。东北部和东部边界的动荡不定，各国之间的明争暗斗也是一个原因，法国君主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他们在边界沿线利用各种借口，制造和挑动纠纷；或因边界走向不清，或因监护权与臣服权相混淆，或因措辞不当而产生的模棱两可；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我国的司法家们特别爱打官司。他们怎么可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于是，他们打着司法公正的招牌，使用各种狡诈和奸计，花样不断翻新，硬是要把无理说成有理。一位名叫奈利·吉拉尔·达尔比森的女历史学家说，法国当局“不愿签订任何边界条约，因为条约用白纸黑字写成，很难进行抵赖，他们宁可采用在领主会议时代盛行的所谓调解政策，这使他们在法律上有无穷的伸缩余地”¹⁴⁹。奈梅亨和约（1678年）签字后不久召开的历次领主会议，特别是施特拉斯堡会议（1681年），恰恰反映出法国国力的蒸蒸日上。神圣罗马帝国在1675年和1676年两次没有取得自由通过施特拉斯堡桥的许可，因而两次从背后包抄杜兰纳的部队。

不论边界是否业已妥善划定，如何组织防御始终是个问题，这项任务不但耗资巨大，而且总还留下隐患。意大利工程师在16世纪初期提倡的近代防御工事逐渐在欧洲各地推广，要塞的基本设施开始朝地下发展；方型堡、半月型堡、骑兵、交叉射击已屡见不鲜。沃邦（1633至1707年）的时代早在这位元帅诞生以前已经开始。

北海至莱茵河的边界可分为两大区段。

首先，从敦刻尔克到默兹河（吉韦、梅济耶尔），是人们常说的



参见罗科尔上校：《法国防御工事的2000年》。

“铁的境界”，这里的防御工事大部分由沃邦设计建造，罗科尔上校为纪念这位元帅，称之为“边沿区”¹⁵⁰。其实，这项大型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正是国王本人。从上面的地图可以看到，那里的要塞呈两行排列¹⁵¹。更往南去，第三行要塞由索姆河沿岸原有的工事所组成，就是法兰西王国早先的边界。这些工事已经过时，本身不足以胜任防御任务。但在德南战役前夕（1712年），路易十四在把法国剩下的最后一支部队交给维拉尔时，特地交待后者，万一战争失败，便把部队撤往索姆河后面。国王说：“据我所知，这条河流很难强渡；河边设有要塞，我打算亲临佩罗纳或圣康坦收集残部同你一起作最后的努力，拚死拯救国家；我决不容许敌人逼近首都。”¹⁵²

可见，这些防御工事构成一个宽广的整体，并不像罗马防线、中国长城或马奇诺防线那样连成一条长线；密密层层的据点步步为营，旨在把入侵的敌人拖住，使他们不得安宁，进而分化瓦解。

另一方面，从默兹河到莱茵河一线，即从梅济耶尔到兰道，就没

有这样密集的防御体系。这里的情形同法国在1940年的经历恰好相反：我国在蒙梅迪和莱茵河之间建立了“第二防区”，而在沃邦的“边沿区”不设巩固防线。法国将为此受累不浅。

在沃邦时期，还有一项重大的有利条件，足以保护默兹河和莱茵河之间的边界（南段除外，这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历来是法国的薄弱环节）。阿登高原在吉韦和比奇之间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高原的岩石经长期的风化冲刷，土壤贫瘠，沼泽众多，到处布满了低矮、密集的树丛，难得有几块林中空地，城市（卢森堡、阿尔隆）中生活贫苦，更不用说乡村。从梅济耶尔和吉韦到卢森堡，森林曾是通过这一高原地带的重要障碍；19和20世纪的大量砍伐树木仍未真正损害当地广大的森林覆盖。我们这里顺便指出，茹尔丹于1794年5月从阿尔隆出发，穿过了阿登高原南部，与北方军团会师，从而于6月26日取得了弗勒吕斯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可见，虽然存在障碍，却并非不能克服。

默兹河和摩泽尔河在高原形成两个狭窄的空隙，从这里越过障碍更要容易得多（与横贯岩页高原的莱茵河相似，阿登高原位于岩页高原的西部）。凡尔登、斯特奈（于1689年被夷为平地）、梅济耶尔、布永、默兹河畔吉韦、梅斯、蒂永维尔¹⁵⁴、摩泽尔河畔蒙罗亚尔等要塞城市全都建在两个缺口的沿线。此外，在摩泽尔河的支流希耶河和萨尔河沿岸，还分布着一系列据点；因而从萨尔路易或比奇到莱茵河（实际上直到兰道），只剩一个极小的区域可以通行。法国在1792年和1814年遇到的两次外敌入侵，都从这个缺口突破。

法国东部边界的这些据点，不论强弱，都始终处于严密的戒备状态，这是因为在偏南方向，洛林地区不断受外部势力所操纵，标榜独立，与法国作对，造成法国后方不稳。在这辽阔的政治地域中——该地域界于香巴尼、勃艮第、法朗什—孔泰、阿尔萨斯、特雷

沃主教领地和卢森堡之间——梅斯、图勒和凡尔登这三个主教区（或者说梅斯财政区）的领土像是大海中的几个岛屿。梅斯市地方官员于1707年5月3日再次向国王诉说：“我们四面被洛林所包围……当地的产品不够供居民三月之需。建筑所用的全部木材、小麦以及日用必需品，都靠洛林供给。”¹⁵⁵因此，对洛林这位邻居，必须曲意迁就。洛林既是取用不绝的谷仓，也是潜在的危险：一不当心，敌人可直扑南锡和夺取这个城市。面对入侵威胁，最好的办法还是法国抢先占领洛林地区：部队在占领区就食，夺取各要塞，取代公爵征收捐税并开征新税，出卖官职，每年收取一次胥吏捐纳金，如此等等。洛林在91年中曾有57年被占领：1633至1661年，1670至1697年，1702至1714年。偏南方向存在的危险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至少不再制造麻烦。

梅斯的地位为什么重要？

梅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为它处在边界的一个相对薄弱的部位，也是一个要害的部位。人们以为路易十四总是呆在卢浮宫和凡尔赛宫，其实不然，他曾六次在梅斯逗留。沃邦对他说：“王国的其他要塞城市分别掩护各省，唯独梅斯掩护全国”¹⁵⁶，也就是说，梅斯是整个法兰西的屏障。沃邦又说：“为加速完成要塞的工事建筑，每个有良心的法国人都应送来一筐石子和泥土。”杜兰纳也直截了当地说：“只要保住梅斯，法国就有活路，即使连打几个败仗，它还能收集残部援救邻近地区和保护后方的运输。根据以上情况，唯独梅斯要塞才能挡住帝国部队的联合进攻”¹⁵⁷。这里显然是指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它在一天之间就能派出大批军队取道帕拉丁和卢森堡向阿尔萨斯和洛林进攻。

据我看来，从荷兰战争开始（1672年）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1714年）这个阶段适宜于进行抽象调查；梅斯在此期间没有

发生直接的敌对行动。这种相对稳定既是审慎措施的产物，也是偶发事件的产物：例如1684年法国占领了卢森堡等战略要地。又如在1688年和1689年法军对帕拉丁地区的城市和乡村推行焦土政策，虽然犯下了残酷的罪行，但并未取得预期的军事成果。随后爆发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4年）是路易十四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战争，梅斯战线当时仍处于次要地位。作战的主战场位于尼德兰境内和沃邦的“边沿区”一带，在巴伐利亚的莱茵河右岸和多瑙河沿岸，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梅斯置于重大的军事行动之外。经常在平原地区活动的帝国轻骑兵间或进行突然袭击，抵达梅斯附近的村庄，甚至经洛林密探的指引，逼近离城二、三公里处；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梅斯才进入警戒状态。

那么，与其介绍梅斯，我们为什么不选择伊普尔或里尔作为调查的实例？梅斯城警报频传，到头来却像《鞑靼沙漠》中的主角那样，总是站在远处观战；里尔城于1668年并入法国版图后，根据沃邦的计划修筑了防御工事，却于1708年10月23日被欧仁王子所攻克，并被荷兰军队所占领¹⁵⁸。但在后来，联军又被“边沿区”的据点所缠住，因而在马尔普拉盖战役后（1709年9月11日），联军后方还留有一支强大的部队，不能放心大胆地向巴黎推进；更何况，1712年7月12日，法军在德南一举将联军击溃。总之，里尔经历了复杂多变的局面，并且亲眼见到法军的顽强抵抗和最后胜利。正因为如此，里尔当时处在战争所强加的特殊条件下（与第二次抽样调查中谈到的土伦的情形相似）。调查梅斯的好处在于，它显示出边界为不断保持戒备而作出的日常的、单调的和普通的努力：修筑工事，补充给养，调动作战部队和留守部队，侦察活动。至少，在我看来，梅斯会比里尔让我们懂得更多的东西。

慢吞吞的战争

梅斯“是个始发点和仓储站”¹⁵⁹，用我们的行话来说，是个兼有起点、终点和仓库三项职能的铁路枢纽。物资、食品、马匹、车辆、经费和人员不断向这里汇集……其中又以人员往来和部队调动占首要地位。过去的梅斯地区眼看着城里城外不断有部队往来或驻扎，这批人肯定都很不安分。当地一位律师¹⁶⁰在《日记》里说：“当时〔1683年11月，还在开战以前〕，每逢有部队开到，梅斯便开始发出警报；为使大家知道部队从哪个城门进入，在警报发出后敲钟一响表示部队进圣蒂埃博门，二响表示进马泽尔门，三响进德意志门，四响进蓬蒂弗鲁瓦门，五响进死亡门，大教堂的钟楼上悬挂一面小旗，白旗表示进城的部队是步兵，红旗则是骑兵”。据我所知，用于发警报的大钟名叫“拉穆特”¹⁶¹，从1605年起就被装在梅斯城的钟塔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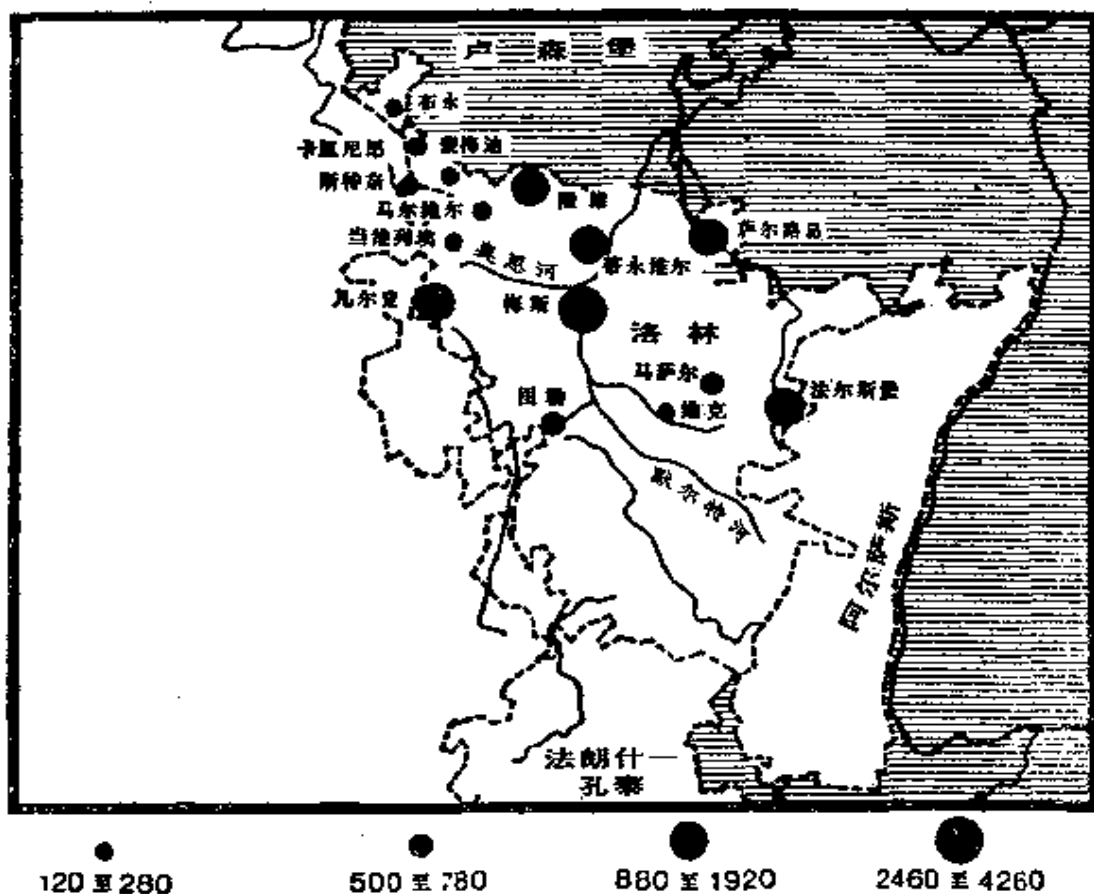
在这些部队中，有的只是“过路”，准备朝佛兰德或阿尔萨斯方向开拔，根据情况的紧急程度，有时被派往很远的地方。对当地来讲，自然宁愿部队“过路”，而不要“驻扎”；每年的“冬季整训”时期一到，梅斯地区就逃不过一番大折腾。无论在战争或和平期间，城里总是挤满了步兵、骑兵和马匹，每人都在寻找住房。

由于特权者可免于接纳军人，他们的住所撇开不算，市内可供征用的房屋不过2400所，而且多系狭窄低矮，仅40所属于一层楼房。梅斯的景况之糟显然与其他驻军城市相同，“部队蜂涌而来，……住所却十分有限”¹⁶²。除了硬塞硬挤，又有什么别的办法？

1693年5月的一份报告说：“今年整个冬天，梅斯和凡尔登几乎所有居民的家里都住有6名骑兵或步兵，最穷的人家也至少住有3名士兵。”¹⁶³

请设想让3名士兵住进一家狭窄的工匠铺子里，该有多么拥挤！1691年，梅斯圣克鲁瓦教区的掘墓人（最穷的穷人）绝望地说：“我们每人只住一间小屋，赶上有军队路过，还得让给士兵使用。”¹⁶⁴

显然，住在居民家里的士兵不免表现放肆无礼和横行霸道。由于饷金微薄，他们往往铤而走险，小偷小摸更是见多不怪。他们有时倒卖房票¹⁶⁵，私卖烟草，参与贩运私盐¹⁶⁶，以致流弊全国而不可遏制。部队力图约束军纪，必要时进行惩罚，却并不十分理直气壮，因为士兵有其表示不满的理由：首先是饷金不得预支，伙食量



梅斯省驻军状况

根据每天就餐人数计算，圆圈的大小与每个城市驻军人教成正比。（参见乔治·杜比的《历史地图集》）

少质次。1710年，向梅斯要塞驻军供应的面包“售价极高”，其成份却是“一半大麦，一半燕麦”¹⁶⁷。

不满情绪引发骚动也屡见不鲜：1712年1月14日，梅斯巡按使圣孔台斯特正就晚餐，突然有“300名驻军士兵”在街上出现，并且冲进他的院子。巡按使当即予以训斥，却获悉他们因欠饷不发，“已在那天上午抢劫了集市和几家店铺”。他们居然对巡按使出言不逊，“手执刀剑……乱扔石子和冰块，阻止我的仆人出门”。事件最终得到妥善处理：“驻军的几名军官听到吵闹声后急忙赶来，大打出手，把抗命士兵驱散”¹⁶⁸。

在一般情况下，城市秩序相对稳定，市政当局和警务部门维护治安，实施宵禁。但乡村的情形便大相径庭，在与敌人交战的战场附近则尤其严重。士兵几乎为所欲为。梅斯的同一位巡按使对士兵在平原地区的胡作非为深感担忧。他指出：“边境村庄常遭焚烧和抢掠，并且屡禁不止。”受害者别无出路，只得支付一笔额外的贡奉。圣孔台斯特又说：“对于征收额外的贡奉，我曾明令予以禁止，但我相信，在本财政区内，贡奉不但过去已在私下缴纳，今后还会照此办理。甚至一些有地位的人向我坦然承认：我们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与其让人抢劫烧杀，还不如缴纳额外的贡奉。”¹⁶⁹。

当然，无论在本国或别国的领土上，国王部队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同。士兵与农民的对立简直是一场永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士兵一般稳操胜券，但农民有时也施加报复。在洛林地区，孚日山区农民的残暴性格究竟是出诸先天，或者是由后天养成？一份明显地带有偏见的历史文献告诉我们说，这群无赖“想尽办法袭击国王的部队以及在冬季往来于途中的军官，当局已经对其中的几名坏蛋处于车轮刑，但在后来，由于他们人数很多，不得不赦免其他罪犯”¹⁷⁰。这份报告没有说明，这些农民为什么离家出走去干袭击士兵的勾当。他们的境况与1688至1689年间备受法军蹂躏的帕拉

丁地区又有什么不同？在帕拉丁地区，“一些破产农民……在唐纳山一带¹⁷¹出没，伺机袭击行人，这座高山位于埃伯斯堡¹⁷²和凯泽贝尔¹⁷³之间，长约七、八里，宽约三、四里，山上树木密布，只有小路可通，农民在这里拦路抢劫，竟收获颇丰；平原居民闻讯后纷纷带着牛羊外逃。一无所有之人，总共约四、五百人上下，往往七、八成群，前往邻近村庄谋生”¹⁷⁴。

常备不懈的梅斯城显然不会像普通村庄那样，直接受暴乱的威胁，但也不能放松警惕。必须定期检查驻军状况，每当发现士兵缺衣少鞋，武器不足，或军官过于年轻，或某个营队调动不灵，便及时采取补救措施¹⁷⁵。1702年8月25日，人们正准备把梅斯的驻军鲁埃格营派往洛林地区的马尔萨勒要塞，却发现“只有200名士兵带着武器，该营被迫仍留原地”。第二天又发现驻守梅斯的福雷营也有问题：“许多士兵身材过矮，该营可被抽调的士兵不足150人”¹⁷⁶。

防御工事是另一件让人操心的事；它们随时都需要进行修补。人们急匆匆地树起栅栏，扫清炮台外围，以使射界开阔，因此，菜地、果园以及好端端的果树全遭破坏。大批农民应征充当劳工，工钱简直少得可怜，每天仅得5苏¹⁷⁷（一匹马每天的租金也要25苏）¹⁷⁸，他们或者在城里城外用锹锄挖土，或者抢割青苗¹⁷⁹，不让敌人在收获季节获得粮食，或者在穿越森林的大路两旁砍伐树木，以免敌人就近设置埋伏。

此外还要征集新兵，制作军装，训练民兵，关心伤兵和管理俘虏。且不说还有军需物资的调运、仓储以及种种有关的组织和管理工作，付款更是让人伤透脑筋的事。总之，每天都有一大堆繁杂而又紧急的具体事务需要处理。必须不断计算和充实各项库存物资：火枪的引信，造桥使用的大量绳索，炮弹，火药（硝土来自卢森堡），还有必要的包装用品（运输铅弹所需的木桶）。单靠当地的财

力物力,怎么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当地生产的绳索数量有限,怎么可能满足需求?鞋子的供应没有太多困难。至于钢铁,梅斯于1706年建造了一座高炉和一个锻造工场。办法虽好,但打铁的噪音之大引起了居民的抗议。因此,必须立即考虑迁往别处¹⁸⁰。

梅斯地区具备一项有利条件:军队大量使用的马匹,不论是坐骑或驮马,就近即可取得;洛林和阿尔萨斯是王国产马最多的省份。人们根据军事的需要从梅斯向意大利输送马匹。剩下一个大难题:粮草供应;对于留守部队和过境部队的军马,必须提供足够的草料。梅斯巡按使于1702年5月18日写道:“我现在赶紧就去征购燕麦,此事不宜声张,而且尽可能要做到收购的燕麦数量多和价格低。”¹⁸¹可是,他接着又问,粮食究竟应该运往默兹河(即佛兰德军团驻地)或是摩泽尔河(即德意志军团驻地)呢?驻守梅斯的骑兵也要求得到大量草料,必须给牲畜留下过冬的草料,正如要为士兵准备过冬的食粮一样。

保证士兵不饿肚皮显然是最大的问题,虽然减少马匹的食料并不比减少人员的粮食配给更容易。一切供应都有困难。由于四郊集市较少,肉要从法朗什—孔泰、洛林和瑞士运来¹⁸²。赶上丰收年景(例如1699年¹⁸³),粮食采购可保顺利,但同其他地区一样,梅斯地区丰年很少,即使在肥沃的默兹河谷也是如此。1698年小麦歉收,从秋天起,库存已捉襟见肘。梅斯的犹太商人,以赛尔·莱维和亚伯拉罕·斯旭为首¹⁸⁴,在法兰克福买下了17 000袋小麦,建议梅斯巡按使杜尔哥(著名经济学家、法国财务总监杜尔哥的祖父)拍板成交。购粮合同规定,运抵梅斯的小麦价格每袋为22里佛,交易额共达37 400里佛。巡按使为此犹豫再三:情况是那么紧迫,他是否应该便宜行事,不等凡尔赛的命令?他终于下决心签订了这项合同。1698年10月9日¹⁸⁵,他恳请财务总监“向国王申述,为臣如此大胆行事,实在迫不得已,目的是要使百姓和部队免受饥

谨之苦”。大家记得，巡按使历来小心谨慎，处处推卸责任，这样的例子可数以百计；我们这里就能看出杜尔哥的敢作敢为，以及当时梅斯省的粮食紧缺。当然，如同别处一样，梅斯省也有粮商囤积居奇，他们往往是国王手下的官吏，而且备受保护，因为蒙受损害的主要还是消费者，而不是地方当局¹⁸⁶。

为组织粮食供应，必须随时准备大批运输工具：在摩泽尔河和默兹河，从伏瓦、科梅尔西或凡尔登开出的船只络绎不绝。默兹河的使用率比摩泽尔河更高，可惜沿途设有太多的磨坊；船只在通过这些障碍时不免把载运的货物弄湿，因而在那慕尔¹⁸⁷或列日，用船运输的小麦磨成的面粉往往口味不正¹⁸⁸。在凡尔登或梅斯地区征集的洛林四轮货车是运输的主力军，其运输量超过船舶。只要一声令下，村庄就能征集几百辆车。1675年7月，梅斯地区派出1 500辆车，把750塞提埃小麦送往萨韦尔讷。20年后，800辆满载香巴尼小麦的四轮货车从凡尔登前往梅斯¹⁸⁹。下一年，又有1 500辆车向萨韦尔讷驶去，每车装载12袋燕麦¹⁹⁰。波恩一度被法军占领，军需品由70艘船运输（梅斯和波恩往返一次付运费500里佛），这些船于1702年1月6日从梅斯启程，于11日向驻军送交火药、铅、工具、4 000条麻袋以及用于制造“法国口径”的火枪弹的模具。第二批船几天后在特雷沃附近的梅尔吞停靠，“所载的货物转交350辆车运输”¹⁹¹。

这一切当然都要花钱，而且开支颇大。成车的现金落入“发战争财”的人的腰包。从我们掌握的一份历史文献看出，其中有一车装着“40口袋一埃居和半埃居的全新银币，价值1 000里佛，8口袋面值4苏的改铸钱币，每口袋价值500里佛”¹⁹²，另外10至20口袋的情形不详。梅斯铸币所自1663年起原已不再铸造仅限本地使用的货币，而只造全国通行的铸币，如今却把许多供士兵使用的小面值货币投放市场。因此，不断有西班牙银币（作为原料）送抵施特拉

斯堡或梅斯的铸币所。决定铸造小面值硬币的目的是要阻止小面值的外国硬币充斥市场，尤其是荷兰或西属佛兰德的一先令和半先令硬币。由于边境地区的渗透，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王国的金币纷纷向德意志和联合省流失。圣孔台斯特为此于1706年主张在梅斯铸造500万荷兰先令¹⁹³。当然，除了这些硬币以外，还有大量纸币流通，即国家向军需商或放款人支付的“指券”。军需商或放款人则要自行设法将指券换成真正的货币，此事总是颇费周折……军费开支是个永远也填不满的窟窿。

在军费开支刻不容缓的情况下，梅斯的犹太商人（1712年有800多户¹⁹⁴，1697年约有四、五千人¹⁹⁵）给巡按使帮了大忙。他们的代表人物毫无例外地都十分精明能干，对采购小麦或牲畜、提供贷款和情报更起着无以伦比的作用。他们在梅斯发了大财，巅峰时期堪与德国的宫廷犹太人相媲美¹⁹⁶。他们向巡按使提出的条件之一是要取得通常拒绝发给他们的护照，以便能够前往巴黎或凡尔赛；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以上两地找到经办汇票业务的代理商，取得信贷，以及设法拉拢财务总监。他们关系广，路道粗，同时可向里昂、阿姆斯特丹或法兰克福签发汇票。但是，犹太商人越来越多也使城市当局感到不安；一些修女院声称已被犹太人的房屋所包围¹⁹⁷。于是，1702年1月，有人要求圣孔台斯特巡按使及时采取措施，“今后不准犹太人再在该省的乡村定居”¹⁹⁸。巡按使回答说：“依我之见，目前不宜驱逐任何犹太人……当地银根已经很紧，采取驱逐措施将使局势变得益发不可收拾。但小心提防当不失为明智之举，我以为今后可阻止犹太人迁来这里，因为他们的人数已经太多。”¹⁹⁹

战争时期又该如何？

我早已告诉大家，战争不在梅斯进行，这里地处后方。间或也

曾发生过轻骑兵的突袭，邻近的村庄遭到烧杀抢掠。当地有时也实行警戒，调动部队，甚至举行军事演习。某种紧张气氛始终存在，事实上，不虞之祸也随时可能出现。德·克雷基元帅率部援救被敌军包围在特雷沃城内的法国军队。由于驻防部队的出卖，城市于1675年8月11日向德国和洛林联军投降。五天过后，8月16日，仓忙溃逃的士兵已在梅斯出现：“衣不蔽体的士兵陆续逃回城来，农民已在士兵躲藏的树林里解除了他们的武装。”²⁰⁰随后，城市已投降，撤回梅斯的人群也全是这么一副可怜相。得胜的德国和洛林联军没有信守投降协议；按照规定，投降的士兵在交出武器和马匹后可自由离城。“然而，他们于9月9日星期一回到这里时，全都是可怜至极的样子，大多数衣着不整，鞋帽不齐，有的身上只用草秸、纸袋或破布围着，还有的在内衣外面用干草披盖，以便防寒避雨。他们到达后就住在城墙或其他接待站搭起的马厩里²⁰¹。既然敌方破坏了特雷沃投降协议，该城的驻军当然也不必遵守这项协议，他们便留在梅斯，不再前往维特里²⁰²，待补充衣帽鞋等物后，重新组成作战部队。”

整个事件并不以上述的可笑结果而告终。幸被收容的残部在装备一新后于9月18日接受检阅，其中就有曾在特雷沃开城迎敌的士兵。“40名龙骑兵经甄别后被责令抽签，抽得黑签的五名龙骑兵当场被处以绞刑。”²⁰³

以上细节今天看来似乎残忍，但在当时却很平常，特别是在梅斯。城市居然还专门接受由军事法庭送来的死刑未决犯。据圣克鲁瓦教区掘墓人的回忆，“该市的王家监狱总是挤满了逃兵、苦役犯和其他军人，阿尔萨斯、莱茵地区以及桑布尔河、默兹河和摩泽尔河等地的犯人全都送到这里关押”²⁰⁴。掘墓人抱怨说，这些犯人因监狱环境恶劣，“多数死于传染病”，掘墓人埋葬他们的尸体，还得不到报酬。监狱阴暗寒冷，囚犯双脚受冻，提取井水十分不便

(直到1691年设置“水池”后才有所改善)²⁰⁵。1695年3月的一天，装满麦秸的顶楼突然起火，究竟事出不慎或有意报复，也就无从查考²⁰⁶。这些犯人出狱的唯一希望便是被送往国王的帆桨船服役。1691年2月2日²⁰⁷，一条“链索”把60名犯人带往帆桨船服苦役，他们都很年轻，体格壮实，“身材魁梧”，据说大多因临阵脱逃而被判终身苦役。他们来自法国各地，为首的五名罪犯被割掉耳朵，砍了鼻梁，身上还刺着百合花图形……

是否应对梅斯城寄予同情？

梅斯城的居民生活很不正常，日子确实相当难过；士兵不时滋事骚扰，委实可恶可恨，让人防不胜防；边界近在咫尺，责任既重，麻烦又多。城市总是入不敷出，开支按粗略计算，高达10万里佛²⁰⁸，为此负债累累。但在当时，又有哪个法国城市能不负债？大笔的开支毕竟能养活大批的劳动力，即使为维修工事和确保城市治安，开都所费不贲。

此外，王国政府的巨额行政开支在当地也都成为商人、工匠、企业家和放款人的天赐财源。各行各业全都繁荣兴旺，肉铺生意兴隆，鞋匠也无苦可叹。市内已有8家书店，居然尚嫌不够；当地的书商和地方当局自然并不这么认为，当局深怕书店数量增多；禁书的销售会有扩大的危险，尤其因为“梅斯城地处边境，居民信奉新教²¹⁰，比别的城市更便于禁书私下流传”。交易活跃的另一个不容置疑的迹象是：8名王国公证人和28名地方公证人在梅斯开业任职²¹¹。城市相当富有，吸引来大批瑞士移民²¹²。确实，梅斯的日子还能过得下去，而且过得不错。

梅斯也有特权阶层，特别是一批高级军官以及于1632年创建的高等法院的成员。资产者及滑吏讼棍从附近乡村的葡萄园获利颇丰。城里设立的葡萄酒市场专门出售近郊的产品，甚至对某些

远郊村庄也予以排斥²¹³。为此居然还振振有词地讲出一番道理：“梅斯市郊是个沙土质的丘陵地区，除收获葡萄外，不生产别的东西。大部分居民的唯一财产就是几块种植葡萄的分成制租地。担任公职的大富翁拥有的地产最多……当地生产的葡萄酒口味不佳，只是受到生产者的称赞。除色泽和质量低下外，这种葡萄酒口感辛辣，带有当地的土味，因而不易对外推销。”这番道理正好用来反驳勃艮第酒业公会的抗议，后者对梅斯公共市场不接受勃艮第葡萄酒表示愤慨。可是，若是对物美价廉的勃艮第葡萄酒开放市场，梅斯地区的葡萄种植者就会破产。难道梅斯就没有权利像波尔多、博讷、马孔、维特里—勒弗朗索瓦、圣迪济耶那样²¹⁴，保护自己的葡萄酒市场吗？更何况，士兵和骑兵对酒的品味要求并不高。全靠他们，梅斯附近及洛林地区的葡萄酒酿造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²¹⁵。在路易十四统治末年，又有哪个军事要塞能够少得了酒？

梅斯理所当然也有穷人：每逢小麦短缺，价格上涨，梅斯的小民百姓同别处一样困苦不堪。据统计，城市在1699年“共有4225名穷人，其中不少人竟衣食无着”²¹⁶。但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哪个城市又没有生活贫苦乃至衣食无着的穷人？这还不算从外地涌来的大批乞丐。从1676年起，梅斯对乞丐采取了防范措施，决定从此“不准穷人以乞食为生”。“本城和当地出生的乞丐”将由圣尼古拉济贫院收容，“集中在一起吃饭”²¹⁷。至于“外来的穷人”，他们在接受布施后，将被“赶出城外，不得再回来乞讨，市民若予包庇或怂恿者将处以徒刑和500里佛的罚款”。这些措施几乎已是司空见惯，是否有效，也还值得怀疑。乞丐在17世纪泛滥成灾，城市无论采用多么周密或严厉的措施，都不能保证完全没有乞丐。

战争对梅斯来说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不免会产生麻烦，但也带来某些好处，特别是真正的战争一般离城很远，野外的危险比城里更大。在旧制度下的欧洲，贸易不因战争而中断，甚至包括同敌人

的贸易。因此，梅斯不论在和平或战争时期，生活总是千篇一律的老样子。到了路易十五执政期间，情况也还没有变化，梅斯城在贝利勒元帅的“开明”统治下，经济繁荣发达，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增加了许多新建筑，建造了一些通风的要塞。城市得到了美化，付出的代价当然更高。不过，就在路易十四的晚年，城市开支已经十分高昂！

第二次旅行：前往土伦

有三个滨海城市可供选择：布列斯特是法国在布列塔尼和面对大西洋的据点；由沃邦“苦心经营”的敦刻尔克是朝北海打开的窗户；土伦是法国海军在地中海的唯一集结地。我终于选择了土伦，就在土伦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紧要关头，确切地说，是在1707年的夏季²¹⁹。那时候，土伦被以耶尔群岛为基地的英荷舰队所封锁，而萨瓦大公的军队则正向无险可守的要塞猛扑过来，确信能不费一枪一弹进占城市。土伦因而受到海陆两面的威胁。这一次，我将不排除是场戏剧，甚至就像在古典主义剧本中那样，谈到地点整一性（被包围的土伦要塞）和时间整一性（1707年夏季的几天时间，从7月26日到8月24日）。实际情形当然更要复杂得多：土伦正是一项大规模进攻计划的突破口，这项在伦敦、海牙、维也纳、都灵等地设计的计划，其攻击目标不仅指向普罗旺斯，而且指向整个法国。

自然条件对土伦起着重大作用，该市拥有两个港湾，大的一个位于塞佩角和勃伦角之间，通向外海，水面开阔，像是房屋的前厅或舞台的前台；小的一个紧挨城市及其船厂，拥有两个港口，两个用墙围着的船槽，另外在城东的莫里永海沟边上还有一个小港，船只历来都去那里油漆。

由于王国的海军经常使用这个港口，土伦的人口有所膨胀，城

市本身却依然故我，局促于一隅之地，被城墙卡住了脖子。1543年，弗朗索瓦一世事先撤走了居民，把一座空城拱手交给了红胡子海盗（约有一百多艘帆桨战船，无数的辅助船只，几千名士兵，自1543年9月29日至1544年3月末占领土伦²²⁰），城内当时不过几百所房屋和5000名居民²²¹；旧城墙已把城市闷得透不过气来，并且已不再保护它了。

1589年后，这一枷锁终于被拆除了。城市从此将能自由呼吸了吗？只是不长的时间而已。最初几年，在新城墙脚下，还有一些树木和几块空地，但房屋迅速从市中心向五、六个关厢区发展，填补了空白，使关厢区变得同样拥挤。根据沃邦的建议，后来曾对城墙的走向稍加修改，但这丝毫改变不了土伦的先天性缺陷。到18世纪初，土伦市依旧是一系列弯弯曲曲的狭窄小巷，有的还是暗藏杀机的死胡同，街巷里到处垃圾成堆，臭气熏天……房屋之小令人难以置信（每屋楼只有一间屋），挤得像蜡烛一样向高处伸展，屋身由外支撑，柱顶则由架在街巷和行人上方的横梁连接。除了人称“战场”的一个广场外，城里没有任何可供部队集中的地点。7月15日，正当敌人抵达土伦时，“海岸驻军统领德·沃斯侯爵与帆桨战船副将德·格里马迪骑士在广场决斗身亡，一人被刺中心脏，另一人躯干被剑穿透。他们原是姑表兄弟。”²²²他们在别处恐怕很难能找得到决斗的场所。

城市居民1589年有1万人，1688年为2万人，大革命前夕竟达3万人，这真是一个奇迹。1707年夏季，城市的三营驻军因没有兵营，住在居民家里；据一封信件说，城市人口可能达6万人，该信并不完全可信²²³。居民中有许多妇女（喜欢争吵，但很容易惊慌失措）、儿童、士兵、卖身女郎以及遭到城市“明令驱逐”但又始终赶不走的穷光蛋。此外还有海员和在陆上的水兵，他们动辄斗殴，拔出腰边佩带的匕首就拚个你死我活；他们不听命令，滋事寻衅，宿娼聚

赌，无所不为，有时拚起命来，其勇气倒也让人称赞。

在城市四周，乡村之美令旅行者眼花撩乱：田园、花朵一望无际，橄榄树、柑桔树、棕榈树、葡萄架、村庄、麦地琳琅满目……一句话，真是人世间的“天堂”。当然也还有山，在灼热的阳光下，一些“光秃秃的”山头，沃邦写道，“紧紧地把城市围住”²²⁴。1707年7月和8月，天气炎热无比，从拉加泉引来城里的饮水远不能满足人畜的需要。参加土伦保卫战的一名战士写道：“我以为只要战胜敌人和保证粮食供应²²⁵，就能万事大吉，却没有想到还有缺水这第三个仗要打。”城内虽有若干水井，但因海水渗透，井水带有盐分，具催泻作用。井边必须“设置岗哨，阻止人畜饮用”²²⁶。总的说来，野外景色优美，但物产并不十分丰富，难以养活众多的军人，更何况一声不吭的农民心里对法兰西国王毫无热情。每逢他们前来为守城效力，“两天过后即行逃亡，应召充当民兵的人亦然如此，民兵向来不携带武器”²²⁷。

确实，在土伦，一般从北方前来任职的军官并不都有让属下服从命令的本事。有一名军官显然就是如此，他于7月20日写道：“当地百姓的刁顽，我在别处从未见过。指挥官对他们下达命令，简直白费口舌，服从的还不到四分之一。”²²⁸可是，普罗旺斯副军事长官格里尼昂伯爵因系当地人，与土伦百姓相处便毫无困难。

这是因为同其他边境地区一样，普罗旺斯是个地位独特的省份。法国在这里根基还浅。国王于1481至1483年间以遗产形式承袭了这块领地，但在过了两个世纪以后，尚且立足未稳。各个城市，特别是马赛，还有阿尔勒和艾克斯，都有自己的特权和保留。1707年7月，当萨瓦公爵率军攻入普罗旺斯时，当地并没有出现通敌情形，更没有像敌人预期的那样，爆发新教徒叛乱²²⁹。全省百姓保持中立和观望，显得无动于衷；大贵族安然不动；教士也不动；农民则静以等待……但是，早在开战以前，当法军司令德·台赛元帅还

留在多菲内时，已经警告国王不要对普罗旺斯的居民“寄于希望”，即使他们忠于国王，他们也没有枪枝和火药²²⁹。

1706年期间，对土伦的进攻尚未开始，普罗旺斯已给人一种局势不稳的印象。马赛牢骚满腹地诉说，勒旺贸易所需的皮阿斯特银币不再从海上直接运到本地，“从巴约讷和奥莱龙经由波尔多和图卢兹运出的银币，到了利翁，就全被截下”²³⁰。这难道意味着，自从在西班牙沿海发生海战后，地中海的航路已变得危险了呢？对普罗旺斯地区来说，真正的灾难还是冬季大雨引起的洪水泛滥。罗纳河堤大片决口，塔拉斯孔和阿尔勒被淹，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阿尔勒大诉其苦，但应给予救济的城市并不就它一个，尤其它还享有种种特权，“免纳人头税和盐税，不接纳军人住宿”²³¹。实际上，这个地区普遍受灾：“该省没有一个教区不受损失”。洪水冲走了“播下的种子，甚至耕地的表土，在表土未被冲走的地方，又有泥沙淤积”²³²。

1706年对路易十四的军队也是灾难深重的一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使法国在欧洲各地兵力分散，在接连吃了几个败仗以后，法军退守本国的边界；1704年赫希施泰特一战失败，巴伐利亚随即陷落，法军退回到莱茵河左岸；1705年，英国护送菲利普五世的对头查理大公在巴塞罗那登陆，加泰罗尼亚地区群起响应；马尔伯勒在拉米伊取胜后（1706年5月23日），夺得了比利时——西属尼德兰，并进逼铁的边界，准备攻打里尔和敦刻尔克；德·拉费亚德元帅不久在都灵城下战败（1706年9月7日），法军驻守的米兰地区已摇摇欲坠，皮埃蒙特不久也予放弃。在西班牙，收复马德里（1706年8月3日）和贝里克元帅的军事胜利挽救了战局，但形势仍十分困难。

路易十四已不再所向无敌，部队“吃败仗和匆忙溃退已司空见惯”。1707年初，就在战局出现转机的前夕，米歇尔·德·沙米亚尔

(1699年任财务总监,1701年任国防大臣)“承认自己无力组织正在展开的战役”²³³。

然而,从意大利撤出的部队踞守着从萨瓦(仍被法军占领)到尼斯(法军于1703年4月夺得该城,于1704年1月攻陷中心堡垒)、维尔弗朗什和昂蒂布的阿尔卑斯山沿线;面对唐德山口的整个尼斯伯爵领地仍在法军控制之下。

1707年1月31日²³⁴,国王下令德·台赛元帅出任阿尔卑斯军团司令,尽管后者刚打了两次败仗——直布罗陀攻防战(1705年)和巴塞罗那攻防战(1706年)——,声名狼藉。元帅自格勒诺布尔启程,于2月28日抵达布里扬松,在当地设立了指挥所。

德·台赛元帅将在下面讲述的故事中扮演主角。据圣西门的描绘,此人性格怪诞,狂妄自大,其信件常使国王哑然失笑。情形究竟怎样呢?怎么了解元帅的为人?圣西门从不知道宽厚待人?皮埃尔·杜布瓦曾阅读过元帅的大量信件,他把元帅描绘成另一个样子,当然说不上是名伟大的军人,却是位幽默、稳健、精明的外交家;元帅抵达土伦不久,就设法缓和了因城防司令圣帕坦脾气暴躁和乱下命令造成的冲突。

确实,在他到达布里扬松时,阿尔卑斯山沿线防务缺少一个明确的、系统的军事方略:法军的“营队”或骑兵随着敌军的进退而转移,双方在玩捉迷藏的游戏。德·台赛元帅不能对此负责。

德·台赛元帅推卸责任还有另一项理由:由他率领的部队,加上从米兰地区撤回的士兵(1707年3月23日,在与皇帝签订了都灵协议后,敌人同意法国从米兰地区撤军),总共不过三、四万人。尤其,士兵潜逃接连不断,有的团队竟有一半缺额。德·台赛的副手之一德·布罗伊主张严加惩处,以儆效尤。他于1707年7月2日写道:“30多名逃兵已被砍了脑袋²³⁵。这一及时而无情的措施完全取得成功:据我所知,半月以来再也没有发现士兵潜逃。”办法虽

好，但又怎能持久？在所有的部队里，开小差是个常见的现象，甚至还存在一套惯行程序：先逃往瑞士，再返回家乡，在当地领取津贴，报名加入民兵，然后重新潜逃。总之，军队待遇低，伙食差，又缺衣少鞋。

在战线的另一侧，萨瓦公爵维克多—阿梅代二世在欧仁亲王率领的帝国军队的支援下，拥有众多的兵力，其中包括在都灵战败后被强征入伍的4 000名法国士兵。他组建了三个兵营：第一个设在伊夫雷亚，位于奥斯塔河谷、小圣伯纳德山口和上塔朗泰斯的中间；第二个与法军在皮埃蒙特的阿尔卑斯山脚下占有的皮涅罗尔和苏瑟两个要塞遥遥相望；第三个位于科尼附近，负责监视通往巴斯洛内塔的各条道路以及通往尼斯和普罗旺斯的唐德山口。

德·台赛元帅需要同时关注萨瓦、多菲内、普罗旺斯等几个战区。敌军的积极备战表明进攻即将开始。但攻击点将在哪里？就在4月底，据意大利情报人员的报告，攻击点可能选在普罗旺斯。元帅不太相信，便把消息通报宫廷。宫廷在答复中斥责元帅愚蠢，要他对萨瓦方面严加防范。在南部战线已经打响后，当土伦催促他带领阿尔卑斯军团前往援救时，元帅直犯嘀咕：“在普罗旺斯、朗格多克、多菲内和萨瓦，并不只是土伦一地必须守住！”他又说：“我敢向你们保证……你们与国王的想法完全不同。”²³⁶此话也许不假。凡尔赛当时可能还在为萨瓦担心。

就在这1707年的夏季，法国又有谁不为萨瓦担心？敌方认为法军的抵抗即将结束。路易十四接连不断地进行卓有成效的秘密谈判，更使人们相信以上的判断非假。实际上，法国仍在坚持抵抗。例如，在北海和英吉利海峡，敦刻尔克的海盗不畏强敌，给予英国和荷兰船只以重创。马尔伯勒对是否进攻里尔或敦刻尔克尚在犹豫之中。因此，敌人为图便利，才计划在远处的普罗旺斯实行快速包抄，对着法国防御的软肚皮狠加打击；法军在这里的防御肯定组

织不善，难以守住土伦、马赛、艾克斯以及整个朗格多克地区；敌人还想在朗格多克的塞文山区再次挑起一场卡米扎尔起义，新教徒的这一武装反抗于1704年和1705年才刚被维拉尔和贝里克镇压了下去。向起义者输送的武器在博凯尔被扣押，起义农民的首领克瓦利埃随萨瓦军队行动，并且是萨瓦公爵餐桌上的宾客。

经过长期的策划，整整一套计划终于制订完毕；今天，在伦敦、海牙、维也纳和都灵的档案馆里²³⁷，人们还可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萨瓦公爵将在欧仁亲王的部队的掩护下，负责陆地作战。野心勃勃的维克多—阿梅代过细和秘密地完成了一切准备。但欧仁亲王和公爵的部队调动却不能逃过他人的眼睛；台赛在阿尔卑斯山上登高望远，虽说不能始终观察清楚，而各种消息不脛而走，经由圣雷莫²³⁸和热那亚传往法国。有关进攻普罗旺斯和土伦的计划不久到处流传，由于从马赛或土伦到凡尔赛，消息传得很快，不过4至8天时间，宫廷于6月15日终于获悉，敌人正准备入侵普罗旺斯²³⁹。于是，赶紧派遣当时正在凡尔赛的德·沃弗累和朗日龙侯爵（土伦的两名海军指挥官）返任就职。他们于6月23日方才抵达普罗旺斯。

萨瓦的前锋部队——每大队4 000人，随后跟着大批骡车，每批达5 000头牲畜——于7月初终于通过唐德山口，普罗旺斯全省告警。与此同时，尼斯卫戍司令德·萨伊侯爵于7月2日撤离城市，率领5营部队和一些民兵在刚刚决口的瓦尔河沿岸布防。但敌军仍于11日渡过这条小河（许多士兵被洪水冲走，损失不小），并于12日架起浮桥，供炮兵通过。

然而，维克多—阿梅代在进入尼斯后，却迟至13日方才动身。为什么耽搁这么长的时间？因为英荷联合舰队已开进了尼斯港。圣西门在其《回忆录》²⁴⁰中说：“萨瓦公爵去舰队进行拜访，并索取已向他许诺的军费。英国人害怕自己不够开支，花了一整天时间讨

价还价，结果使舰队误了行期。最后，看到公爵已打定主意，不付款便不动身，英国人交付了100万²⁴¹，由公爵亲手收下。这一天拖延正好救了土伦乃至整个法国的命：在此期间，21营援军及时赶到土伦。”

以上解释说来似乎颇有道理，但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入侵的敌军于7月11日后继续向前推进，不论有无军官率队。前进途中几乎很少遇到法军阻挡。然而，行军十分艰苦——夏季炎热，饮水和食物全都短缺——，部队又必须小心行事，深怕骚扰普罗旺斯居民。公爵竭力要以解民于水火的解放者形象出现。他与各个城市协商一致，仅在戛纳、圣特罗佩、弗雷瑞斯、格拉斯等地要求供应粮食草料。这一要求在各地未遭拒绝。弗雷瑞斯的接待不但友好，而且相当离奇。主教在欢迎时表现出过度的热情：为在主教府接见公爵，他“身穿法衣，在大教堂门口摆香桌，赐圣水，唱感恩曲，赞美公爵占领城市”。读者或许会问：这有什么离奇？原因相当简单，弗雷瑞斯的这位主教后来将出任弗勒里主教，当上路易十五的辎师，并依仗其学生的宠信，于1726至1740年间执掌法国的政柄。这个被圣西门称之为“自欺欺人的可怜虫”后来卸掉“通敌”的恶名，好像不算过分费劲。

这一切都让胜利者花费了时间。台赛写道：“萨瓦公爵就在他所占领的普罗旺斯部分地区发号施令，让当地对他宣誓尽忠和提供食物，各项布置井井有条，甚至比国王的巡按使治理得更好……百姓没有武器和火药，赤手空拳；他们忠心未变，只是逆来顺受，缴纳粮食而不提供现金，萨瓦公爵则至今装模做样，似乎不想要拿现金。”²⁴³萨瓦部队陆续向土伦开拔；直到7月21日，第一支小分队终于抵达距城三里的最后宿站——屈埃尔。土伦海军摸黑进行的一次小规模偷袭，竟使已经熟睡的几名萨瓦士兵措手不及²⁴⁴。萨瓦部队只是在24日才直逼城下。他们花14天时间走完了150公里路

程：不是创记录的速度²⁴⁵。

在土伦方面，台赛派出的援军也一批又一批地开到：21日有11营，共4 000人；22日有8营；23日9营；25日有13或14营²⁴⁶。从瓦尔河沿岸撤退的萨伊侯爵的部队也于22日抵达，在城外的橄榄树下扎营。8月7日，德·姆达维伯爵带领6营步兵和42连骑兵和龙骑兵从萨瓦赶到²⁴⁷，被派在圣马克西曼驻扎，以便骚扰萨瓦部队及其军需供应。法军因此在这场赛跑中占了上风。德·台赛元帅身不离鞍、马不停蹄地往返于锡斯特龙、土伦和艾克斯之间，并在锡斯特龙因飞马狂奔而让自己吃尽了苦头。

早在援军赶到以前，土伦对有关进攻普罗旺斯的传闻远比凡尔赛更加重视，并且自动加强了海陆两方面的防务。陆军和海军历来总是配合较差，但双方对修筑工事却都十分起劲。他们在开战前剩下的三星期时间内拚命抢修，竟使要塞的面目为之一新。格里尼昂伯爵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在土伦和周围村庄深得民心，民兵和志愿兵都竭尽全力为加强城市防御出力。在城防工事前方的开阔地上，妨碍视野的民房一概拆毁；紧贴城墙的掩蔽通路修整完工；200门炮从军械库中拉出，进入阵地布防。其实，这些铁炮即使少装火药，也有爆炸的危险。果然，后来铁炮爆炸给防卫者造成的损失竟比敌人的炮弹更大。最重要的工程是在城北圣安娜小教堂周围，位于城墙和法隆山之间的高地上，临时构筑一座坚固堡垒，并配以大炮。只要堡垒掌握在守卫者手里，敌军的炮火和进攻就不能靠近城市。

在这些工事建成前，“土伦几乎无险可守”²⁴⁸。换句话说，城市的防御仅仅针对海上，几乎完全不顾陆上；萨瓦公爵对此早已了解清楚。因此，当他发现要塞守军众多，四周炮台林立，火枪、投石器、刺刀和火药等武器供应十分充足，另有强大海军支援时，不禁感到气馁，几乎立即丧失勇气²⁴⁹。无论面包、咸肉、鲜肉（仅供军

官食用)或葡萄酒,城里全都应有尽有。唯独缺少的是鞋子,但在普罗旺斯的炎热夏季,人们可以不用穿鞋。总之,守城的士兵吃得很饱²⁵⁰;由于葡萄酒的售价在城里为每坛2苏,士兵们更加心情舒畅:一名鼓手改吹竖笛²⁵¹,每天晚上为舞会伴奏。军官见状也信心十足,志在必胜。台赛断言将把萨瓦公爵逐回卢瓦尔河对岸。

公爵的军队不断来到土伦城下,直到8月2日上午才夺取圣卡特琳娜小教堂所在的高地²⁵²。当时重炮尚未架设完毕。实际上,他们只是围而不攻,在东线则尚未完全合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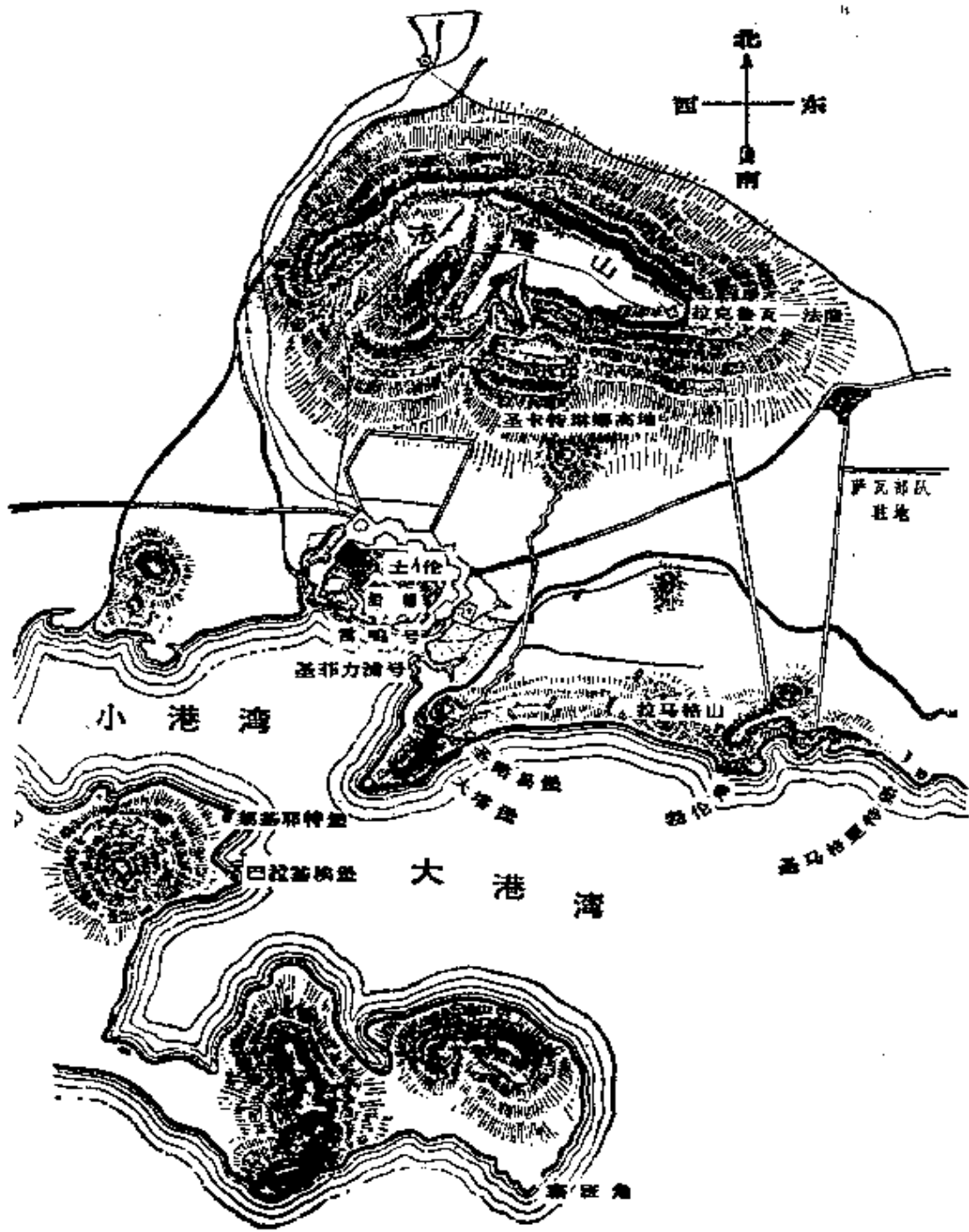
然而,英荷联合舰队却走在前面,于7月10日在耶尔群岛进入阵地。等到萨瓦部队开到,舰队即卸下粮食辎重,供应萨瓦部队;猛烈的北风接连刮了几天,使舰队不能进入土伦水域。

土伦海军面对强敌,处处谨慎小心。它害怕的正是敌军海陆会师。一旦陆上炮兵开火,而敌人的舰队又拦住出海口,停在港内的船舶又该怎样保护?如果让它们冲出港湾,那就必须给船只装备武器,这将是一件费钱费时的事。其次,怎样保护军械库中存放的大批物资?海军的主管军官朗日龙侯爵敢作敢为,精明善断,甚至不惜推翻其他负责人的意见;他有时嘟嘟囔囔,有时声色俱厉,到处埋怨怪罪,大发特发其坏脾气。其实,从他6月23日到达土伦那天起,他不相信城市能够守住。他首先关心的事因此就是尽可能快地把铸铁炮、臼炮、桅具、船帆、绳索等部分物资从城里撤走;这批物资用72条木船赶紧送往阿尔勒。一些大炮和缆绳被沉入水下,必要时再捞出使用;守卫港湾的炮台全都整装待命;卸下桅桅的船只在敌人逼近土伦时也沉到海底,以免被敌人炮火击中起火或更糟糕地落入敌手。从意大利沿海返回的7艘帆桨战船,不顾其指挥官德·罗伊侯爵的抗议,被勒令驶往马赛。否则,在土伦港湾内,这些战船会是极易击中的目标。可是,由于这项决定,土伦

失去了可以调动的防卫手段：装在战船船首的大炮火力甚强，尤其船上的苦役犯本是可以利用的人力。这些措施引起了众多的争议，实际上也是利害参半，但毕竟是有益的和明智的。关于这个问题，我隔一会再谈。其中的一项措施是巧妙地使用了分别装有90门炮的两艘头等大船²⁵³。搁浅在一片滩涂上的“雷鸣”号与莫里永隔水相望，四周由故意沉在海岸边上的旧船保护，可用猛烈炮火把城市同从东边的尼斯大路推进的敌军隔开。这条大船的船身已用硬木加固，使劲牵引绳缆，可使船体在原地转身：左舷发炮后，利用再装弹药的时间，转身从右舷发炮。漂浮水面的“圣菲利普”号位于偏西的卡斯蒂尼亚克一线，必要时可朝莫里永方向移动。该船在海战过程中果真移动了位置。

读者如果在图上查找到土伦的海岸防御工事——在大港湾的入口，有位于南面塞班角的炮兵阵地，有位于北面勃伦角的圣马格丽特和圣路易堡垒——，将能了解敌人的强大舰队进行的第一场小规模战斗的经过。敌人此次作战满足于夺取外围阵地。他们首先攻下了塞班角的炮台，随后因毫无用处而放弃。接着，他们又向勃伦角进攻。8月16日占领了圣马格丽特城堡（守军共48人）；约有100人防守的圣路易堡垒经长时间的轰击后，守军于18日从海上撤出，停止了抵抗。以上战果其实很小：圣马格丽特城堡的守军因缺水而投降²⁵⁴。要攻进位于要塞中央的小港湾，舰队就必须攻克大塔堡（这个旧炮楼已经翻修一新，并配置了大炮），以及南面的巴拉基埃堡和莱基耶特堡，但因萨瓦军队的陆上进攻过早失败，舰队也就丧失勇气，并知难而退。

萨瓦军队在南面的马尔格山和北面的圣卡特琳娜高地之间占领了两条平行的直线，从而切断了土伦通往尼斯的大路。8月的最初几天，由于没完没了地挖掘工事，双方的战斗仅限于打上几枪或开上几炮。攻城一方的士兵尽管受督战队严密监视，却因伙食



1707年的土伦市及其防御



1707年土伦围城战

过差和劳务过累而不断出现临阵脱逃，不少士兵甚至跑到法国防线的一边。投降过来的这些所谓“降兵”总共达几千人之多，他们的衣着相当整齐，长得也很精神，只是诉说吃不饱饭。他们受到热情的收容和仔细的盘问，在接受一埃居的奖励后，便被送往马赛。公爵的军队由于耽搁了时间和错过了机会，终于不战自败。正是在以上情况下，8月15日“黎明时分”，守城部队的一次出击在位于拉克鲁瓦—法隆和圣卡特琳娜之间的第一条战线上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打死、打伤或俘虏敌军达1 000多人。法方的损失相反却很小，约在40人左右。攻占的阵地于14小时后立即撤出。可见这至多只算是给敌军一个小小的教训。但在萨瓦方面，却受了很重的打击，丢失的阵地也不重新占领。第二天，萨瓦炮兵纯粹为了报复对城市大肆轰炸：8所房屋被夷为平地，“主教大人当晚差一点被压死在床上”。居民惊恐万状，几乎全跑光了。

实际上，战争已接近尾声：从19日开始，根据围城部队的建议，双方交换了战俘。代表法方的军官应邀与欧仁亲王一起进餐；萨瓦公爵“彬彬有礼地”接见了他们，并设宴款待。席间谈到了前几天的战斗以及“雷鸣”号和“圣菲利普”两艘“旧船”，但历史文献并未说明这样命名的原因。公爵取出他的香巴尼葡萄酒待客，并谦虚地说，与以精于饮食闻名的土伦驻军司令德·沃弗累的酒相比，他的酒还稍逊一筹。可见，在作战之余，军官们仍保持着娴雅的风度。两天过后，萨瓦军队业已决定撤兵，为了减轻负担，便把辎重、大炮和伤兵交托联合舰队运输。

敌人的海军还将演出一场压轴戏，但终究也未能挽回面子。21日夜晚，5艘圆头帆船炮轰土伦，直到22日晨5时，然后与在当晚扬帆启程的舰队会合。这次炮轰造成的损害远比陆上发射的炮弹严重得多，因为圆头帆船一直深入到圣路易堡的小海湾内。两艘旧船被炮弹击中起火，当即被拖到船槽之中，以免引燃其他船只，但

火光却为敌人的射击提供了极好的目标。两艘三桅战舰接着受创，一发炮弹在“钻石”号引起的火灾幸而及时扑灭。“许多房屋也该炸塌，不过三分之二的炮弹并未爆炸或在空中爆炸；不然的话，损失将更加可观。”

与此同时，萨瓦公爵在把大炮和伤兵扔下以后，沿着入侵普罗旺斯的原路仓促后退。在这“慌忙的”撤退途中，一些村庄被抢掠和焚毁，一些城市受逼犒劳，甚至被劫掠一空。德·台赛元帅在后尾随，但不能追得太紧，约比溃军落后七、八个小时。他所缺少的并不是部队，而是车辆和马匹，敌军后撤途中又不留下丝毫的粮食和草料。反而是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农民，在贵族、民兵乃至本堂神甫的组织下，对从事抢劫的溃兵进行围堵拦截，“以至到处都有埋伏，不断受到攻击，随时听到枪声；敌人花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翻越莱斯特莱尔高地，遭到六、七千名民兵的伏击，死伤甚众。民兵方面也并非没有损失，敌人把抓住的民兵全都挂在树上吊死，但这既吓不倒其他人，也阻止不了民兵的袭击”²⁵⁶。敌军在入侵普罗旺斯期间损失了一半兵员。接着，他们又抢掠了公爵属下的尼斯伯爵领地，其野蛮程度与在普罗旺斯一模一样，最后经唐德山口退到皮埃蒙特地区。萨瓦公爵于8月26日喟然长叹：“我干了多么可笑的蠢事。”

有何教训？

土伦攻防战是法国的胜利吗？这样说未免夸张。入侵已经挫败，但损失相当可观。据说，萨瓦公爵不过抢走了20万里佛，但他在占领区却制造了极大的破坏。毫无疑问，在恢复和平以后，普罗旺斯照例将弥合战争的创伤，生活将逐渐转入正常。第二年，当省三级会议通过议案，决定向国王缴纳100万税收时，居民们甘心情愿地予以接受，或如普罗旺斯驻军司令德·格里尼昂伯爵所说，对

国王表示“一片忠心”。1709年冬季的寒潮肯定要比1707年的抢掠在当地造成更加严重的破坏，单是被冻死的橄榄树就成千上万。

另一方面，敌人在土伦战败后又卷土重来。德·台赛的军队取道阿尔卑斯山返回到在多菲内和萨瓦早先放弃了阵地，但它行动十分缓慢。这一次却是敌军行动更加迅速。欧仁亲王以皮埃蒙特为基地偷袭了法军在阿尔卑斯山东侧占领的苏塞。经过长时间的抵抗后，堡垒于10月3日陷落。法国因此丧失了自由进入皮埃蒙特地区的一道方便的门户（虽然仍占有皮内罗洛和费内斯特雷莱）。由于这次失败，也许还因为遭人告发——陆军不断出现内讧——，德·台赛元帅终于失宠，并被解除军职。

苏塞的失陷毕竟是件小事。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判断的问题还是土伦攻防战对海军造成的后果。人们照例对土伦的海军指挥官滥加指责，甚至把德·朗日龙侯爵当作嘲弄的对象。我却不打算这么做，因为路易十四的海军并不因土伦攻防战而一蹶不振。

在敌人的围困解除以后，我愿承认，土伦港真是满目疮痍。“港口原先引以为骄傲的那些漂亮船只如今断了桅杆，或左歪右斜，或前倾后倒，不禁让人怀疑它们是否还能组成一支舰队。”船只出水后，发现“它们损伤极其严重；由于船位倾斜，接缝处出现脱卸，渗水的裂口难以修复，从而加速了船只各部位的腐蚀”²⁵⁷。

朗日龙侯爵牺牲这些船只，难道没有必要吗？但谁又会预见到围城战竟如此短暂，如此令人可笑？根据他的设想，土伦将进行一场真正的围城战，城市将长期被封锁，港湾将对敌军敞开门户，陆上的炮火将随意射击集中在船槽中的船舶。在这种可预见的情况下，他采取的措施也就完全合乎经验得出的常规。其道理与土伦在即将被围困时把市内街道的铺路石挖除，以免出现飞石伤人的事故，没有任何不同。船舶在清除了压舱物以后（为加快作业，压舱物在原地抛弃）将被水淹没，而并非真正凿沉。等到敌人撤退

后，可让船重新浮上水面。德·朗日龙在他的信中把这些打捞行动说成是伟大的成功；读者或许会认为，这是他的自我辩解。

1707年8月30日，他给蓬夏特兰写信说：“我今晨开始为‘霹雳’号抽水，这是你从马赛方面获悉的所谓惨不忍睹的几艘船中的一艘；该船在中午前已经浮出水面。”²⁵⁸

9月6日：一些心怀叵测之人“散布流言，说他〔指朗日龙〕把国王的大船凿沉”²⁵⁹。这是无稽之谈，“他只是在大炮开火后才向大船中灌水。他虽然不得不凿沉了一条大船，但他将在四天内让该船浮上水面”。

9月15日：“‘霹雳’号、‘太阳王’号、‘胜利’号和‘神奇’号已把积水抽得点滴不剩”……“狂暴”号和“勇士”号即将浮上水面……至于为攻防战立下了大功的“圣菲利普”号和“雷鸣”号，前者并未凿沉，后者业已浮起，“国王的这两艘船已腐烂不堪，因而我不能保证它们可以参加夏季战役”²⁶⁰。10月9日，终于“大功告成”，欢庆胜利²⁶¹。

这不等于说，一支壮观的舰队竟失而复得。问题在于土伦在围城战以前是否拥有一支壮观的舰队。8月11日²⁶²，在围困尚未解除前，阿尔努写给蓬夏特兰的一封信使人对此有所怀疑。他写道：“诚如大人所说，若派30至40条船前来援救土伦，效果或许会比派遣地面部队更好。因为只要萨瓦公爵看到海上将有20条战船拦截为他的部队输送给养、弹药和大炮的船只，他就不会制订进攻土伦的计划。可惜的是，我们不能不为海军所处的现状感到悲叹，更何况海军目前离全军覆没仅一步之差。”阿尔努曾以“巡视员”的身份整顿了布列斯特港的秩序；他当时正在土伦，尽管不在海军任职，却扮演督察的角色，但不直接参与有关防务的决策。此人聪明、细心，但不太宽容。他的见解与其说针对着土伦的海军，其实是对凡尔赛政府的总体政策提出异议，这个政府因重视陆军而牺牲海军，

自从1692年拉乌格之战以后，把赌注押在海盗战上，几乎放弃了昂贵的舰队战。国王难道迫不得已才作此选择？可能是的，因为唯有弱者才在海上采取私掠行动。可见，无论人员（水手或造船工人）和物资（包括又粗又长的桅杆），土伦都不虞匮乏；桅杆木排可从伊泽尔河和罗纳河上游顺水漂送土伦。真正缺少的是钱，是经费；船只的整修和装备都因缺少资金而不能进行²⁶³。

在围城战后，土伦的财政困难更显而易见；市内百业萧条。由苦役犯日以继夜地抽水而浮上水面的船舶又搁浅在港湾的泥滩上。这无疑是把它们送往坟地，准备拆毁后回收作烧火的木柴。当然，在欧洲的所有港口，都有一些旧船在死水一潭的港湾中等待毙命。在大革命和帝国期间运送法国俘虏的英国运输船不正是这些已经报废了的船只吗？但在土伦，兵工厂的活计日渐减少，工人纷纷失业，景况岌岌可危。新船还在陆续制造，用以保护法国的东地中海沿岸地区贸易，或在北非运载粮食。土伦此外也装备一些海盗船，由国家租给私人使用，装备费由私人承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是国有经济向私有经济的过渡。例如，3艘主力舰、3艘护卫舰和2艘战列舰于1712年3月底从土伦启航，指挥官卡萨尔是法国最干练的海军军官之一，但执行军纪极其严格，因而为船员所深恶痛绝。舰队出直布罗陀海峡，抵达佛得角群岛，攻占和劫掠葡属圣地亚哥小岛。接着又前往马提尼克，袭击荷兰的殖民地苏里南、埃塞奎博和伯比斯，勒索巨额赎金；随后转而进攻英属蒙塞拉特岛和圣克里斯托弗岛，两地被洗劫一空。舰队最后回到了土伦。

我们不要因此造成错觉；这种海盗行径有时干得确实漂亮，却并不始终有利可图。正是在1708年，英国人从西班牙手里夺得了梅诺卡和马翁港。自从1707年在巴塞罗那登陆后，英国人一直窥伺着地中海上这个最可靠的冬季避风港，马翁港之得以巍然屹立，恰恰就靠法国人从土伦为它提供军需补给。英国舰队在马翁港建

立基地后，从此就能在地中海过冬，甚至于1711年劫掠了塞特岛。相比之下，法国的海军却无所作为。

这里有一份调查材料，为我们提供了证据。调查的日期是1713年3月11日，在乌特勒支和约签字（1713年4月11日）前一个月，材料列举了当时停在土伦港内的船舶名单：共有分属四个等级的大船32艘，装有大炮2318门，火力相当强大，可惜都是些旧船。最老的“海马”号建于1664年，已近50岁的高龄；如果中间不在布列斯特经过大修，恐怕早就不能再航行了。另有22艘，船龄在20至29年之间；8艘在5至19年之间。唯有“征服者”号在土伦围城战后，于1712年经过大修，还是一艘二等船（设炮74门）。3条船已宣布退役，准备拆毁，可偏偏载重吨位较大。它们平均已有20年船龄。而在当时，船舶越大，损坏便越快。例如，“路易王”号²⁶⁴是当时舰队设备最好的一条船，装有110门炮，于1704年一度退役。这条大船建于1692年，12年后进行过大修²⁶⁵。

根据1713年的文件提供的“情况”，如果我没有搞错，当时仅有7艘船还在海上游弋²⁶⁶。

撇开这些军舰不谈，真正的问题还在于当时法国经济的整体实力。说到底，经济决定一切。就在18世纪初，法国经济状况难道正如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竟是十分虚弱？在我看来，到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末年，法国内地的经济其实比人们所说的要更加活跃。在地中海方面，马赛及普罗旺斯其他港口的贸易仍照常进行，东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棉花、小麦和皮革，北非的谷物和皮革正源源不断地穿过这一海域。那么，法国没有大力发展海军，难道只是主观意志起了作用？路易十四的法国大体上有这个能力，却不继续向海上发展，而是希望仅仅依靠陆军取胜（土伦围城战便是如此），这难道不是作出了错误的选择？

五 空间和历史：本卷结束语

在结束土伦之行后，我们对法国地理的历史考察也告一段落。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画出法国历史的基本框架，显现其多样性（第一章），展示不同地域之间的联络系统（第二章），看到地理环境为法兰西统一提供的条件，以及边界——边界把法国的各个部分粘合在一起，但并不使法国陷于孤立——所起的作用（第三章）。我为此一再重申了多样性和单一性之间的永恒对立。所谓单一性，是指有待慢慢建设起来的法兰西统一，但法兰西又必定要在其领土的边沿地带显现、展示自己的力量。法国在获得这些边缘省区后，难道就不要加以消化和驯化，并经过长期的训练，使它们终于俯首帖耳吗？难道在漫长的边界沿线，法国不要据守、监视和向前挺进吗？它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陆上和海上向外扩张。

我们顺便指出，这些努力本身就是实现统一的手段，它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全国的力量，并不仅限于边境地带。

我强调了我国海上活动的缺陷，指出这一缺陷原是应该的。但向海上扩张是件复杂的事，往往受到可能条件的限制，法国在这方面毕竟作出了巨大而不懈的努力。重要的江河无不运输或漂送海船所需的木材和桅杆。兵工厂无不为海军供应火炮或炮弹。军港无不制造战舰：在科尔倍尔时代，法国舰队的实力已与欧洲最出色的英国舰队不相上下。荷兰造船业的辉煌时代终告结束！而为建设法国海军，显然必须在诺曼底、布列塔尼、朗格多克、普罗旺斯等沿海地区不断招募水手……由于招募遇到困难，黎塞留于1632年实行了“拉夫制”²⁶⁷，但船上的海员仍然不敷使用。无论英国或荷兰，单靠本国都不可能拥有充足的海军兵源，因而有时便强征外国水手服役。法国自然也无从招募到足够数量的船员。被强征入伍的

海员利用看守不严而潜逃²⁶⁸。路易十六统治期间，又征集内河水手充数。至于苦役犯，他们一旦被解送土伦，也就等于进了地狱。人们或许认为这不失为处理犯人的一个办法，但苦役犯并不增强海军的实力，由他们充任桨手的帆桨战船即使在地中海也已经过时了。

兵员不足的问题在陆军方面却并不存在。法国人口众多，兵源和军需历来相当充裕。在旧制度下，即使贝里、利穆赞、奥弗涅、沃莱、波旁等边远省份也无不征兵纳粮，保证部队的需求。各省每年都有部队调防，过境兵马总为宿营而使居民不胜其烦，冬季整训更令人心惊胆颤。

集结部队并不是为了应付国内的危险，镇压一般骚乱很少动用部队。不论在任何城市或省份，只要部队一开到，秩序便立即恢复平静；即便如此，巡按使也总是顾虑重重。这样做往往会带来副作用：有可能捣乱分子见到士兵固然赶紧溜走，而当地却因部队开到而要冒民穷财尽的危险。所以，调动和留驻部队必须谨慎小心。法国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为了日后演变成为民族国家，注定要保持笨重的战争机器。

法国为此不得不使用其本土的人力物力。各支部队都随省份命名，如布雷斯团、昂古穆瓦团等等。但是，团队很快与各自的同名省份失去一切实际联系，招收的新兵来自全国各地，由于实行混合编制，势必使操不同方言的人共同生活，并打破乡土的格局²⁶⁹。

除了王国的行政机构以外，军队已成为促进法兰西统一的重要工具。据19世纪初的粗略计算，法国各地的流动人口，包括杂工和季节工在内，约在15万人上下，他们也对人口混杂起着推动作用。但是，以1709至1713年间为例，军队调动则在50万到100万人之间²⁷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将以法国失败而告终，但这场战争在法国产生的影响堪与共和二年的大举征兵相比拟。在19世纪和

20世纪的民族战争中,法国军队的胃口之大更超出了一切限度。

可见,互相掺杂在一起的各种历史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国家、文化乃至法语(产生于法兰西岛,充当统一政令的行政工具)在内,在法兰西统一过程中都助了一臂之力。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着重考察它们的实际作用,以正确认识法国由来已久的、漫长的和规模巨大的统一进程。

注 释

导 言

1. Jean-Paul SARTRE,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I, p. 29.
2. Charles PÉGUY, *Advertissement aux «Petites garnisons, La France vue de Laval»*, in: *Cahiers de la Quinzaine*, 12^e cahier, 5^e série, 1904, P. 9, cité par Eugen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1977, p. 3; publié en français sous le titre, *La Fin des terroirs, la modernisation de la France rurale, 1870-1914*, 1983.
3. 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1949, 1966, 1979;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 1967;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 1979, 3 vol.
4. Hippolyte TAINÉ, *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1875, rééd. 1972, P. 6 : «J'étais devant mon sujet comme devant la métamorphose d'un insecte.»
5. Alexis de TOCQUEVILL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re} éd. 1856, 1952-1953, rééd. 1960, 1963.
6. Jules MICHELET, *Histoire de France, 1853-1867*, 17 vol., rééd. Flammarion, 1893-1898, 40 vol.
7. Ernest LAVISSE,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la Révolution*, 9 tomes en 18 vol., 1903-1911
8. Ernest LAVISSE, *Louis XIV*, Tallandier, 1978, 2 vol.
9.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llection dirigée par Robert PHILIPPE, 1970-1973.
10. Jacques MADAULE, *Histoire de France*, 3 vol., 1943, 1945, 1966.
11. Lucien ROMIER, *L'Ancienne France, des origines à la Révolution*, 1948; *Explication de notre temps*, 1923.
12. Nicolas IORGA, *Histoire du peuple français*, éd. en roumain, 1919.
13. Ernst Robert CURTIUS, *Essai sur la France*, traduction française, 1941.
14. Eugène CAVAIGNAC, *Esquisse d'une histoire de France*, 1910.
15. Claude-Frédéric LÉVY, lettre du 14 septembre 1981.
16. Jean-Paul SARTRE, *Les Temps modernes*, oct, 1957, p. 681.

17. Pierre GOUBERT, *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de 1600 à 1730*, 1960, p. 359.
18. Paul LEUILLIOT, *L'Alsace au début du XIX^e siècle*, III, 1960, p. 340.
19. Jean LESTOCQUOY, *Histoire du patriotisme français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1968, p. 14. Sur la tardive apparition du concept de nation, voir Eugen WEBER, *La Fin des terroirs* éd. française, chapitres VII et XVIII.
20. Jules MICHELET, *Œuvres complètes*, rééd., op. cit., IV, 1974, p. 383.
21. Jacques BLOCH-MORHANGE, in *Informations et conjoncture*; Henri MENDRAS écrit, pour son compte, «Les éléments de la saga nationale apprise à l'école primaire. (In: *La Sagesse et le désordre, France 1980*, 1980, p. 35.)
22. MALET et ISAAC, réédité sous le titre *L'Histoire*, Marabout, 1980, 4 vol.
23. Arnold TOYNBEE, *La Civilisation à l'épreuve*, 3^e éd., 1951, p. 75.
24. Cité par Roger BASTIDE, *Sociologie et psychanalyse*, 1972, p. 162.
25. Théodore ZELDIN, *Histoire des passions françaises, 1848-1945*, 5 vol., traduction française, 1978-1979.
26. Robert FOSSAERT, *La Société*, II, *Les Structures économiques*, 1977, p. 447.
27. M. BORDEAUX, «Voies ouvertes à l'histoire des coutumes par l'hématologie géographique», in: *Annales E.S.C.*, nov. déc. 1969, pp. 1275-1286.
28. Marc BLOCH, *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 1949.
29. Cité par Emile CALLOT, *Ambiguïtés et antinomies de l'histoire et de sa philosophie*, 1962, p. 121.
30. Paul MORAND, *Venises*, 1971, p. 101.
31. Edgar QUINET, Introduction à Johann G. von HERDER, *Idées sur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de l'humanité*, I, 1827, p. 7.
32. Théodore ZELDIN, «Français, vous êtes comme ça!» *Paris-Match*, 30 mai 1980.
33. D. LANDES et C. FOHLEN, «Formation du capital dans les premières étapes de l'industrialisation», Introduction, in: *Deu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économique*, 1962, p. 565.
34. Jean-Paul-SARTRE,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op. cit., II, *Du groupe à l'histoire*, 1960, pp. 557, 755. cité par Georges GURVITCH, *Dialectique et sociologie*, 1962, p. 163.
35. Emile DURKHEIM, «Sociologie et sciences sociales», in: *De la méthode*

- dans les sciences, Paris, 1909, republié par Jean-Claude FILLoux, *La Science sociale et l'action*, 1970, p. 137, note 1.
36. Robert FOSSAERT, *La société*, I, *Une théorie générale*, 1977, p. 32.
 37. Fernand DUMONT, *Anthropologie*, 1981, p. 17.
 38. Raymond RUDORFF, *Le Mythe de la France*, 1971.
 39. Miguel de UNAMUNO, *L'Essence de l'Espagne*, trad. par Marcel BATAILLON, 1923.
 40. Angel GANIVET GARCIA *Obras completas*, I, *Granada la Bella, Idearium español*, 1943.
 41. José ORTEGA y GASSET, *España invertebrada*, 1934.
 42. Georges GURVITCH, *La Vocation actuelle de la sociologie*, 1963, I, pp. 73 ss.
 43. Ferdinand LOT, *La Gaule*, 1947, p. 170.
 44. Julien GRACQ, *Lettrines*, 1974, II, p. 71.
 45. Jean-Paul SARTRE, in: *Temps modernes*, sept, 1957, p. 403, note 3.
 46. J'ai emprunté cette belle expression à Michel Laran, sympathique et remarquable spécialiste de la Russie ancienne et moderne, disparu trop tôt... mais je ne retrouve pas la référence de cette expression dans son oeuvre.
 47. Joseph CHAPPEY,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en Occident*, I, *La Crise de l'histoire et la mort de l'idée de civilisation*, 1958, p. 38.
 48. Peter KRIEDTE, Hans MEDICK, Jürgen SCHLUMBOHM, *Industrialisierung vor der Industrialisierung*, 1977, p. 21.

第 一 編

1. Marguerite GONON, *Les Institutions et la société en Forez au XIV^e siècle d'après les testaments*, 1960; *La vie familiale en Forez au XIV^e siècle et son vocabulaire d'après les testaments*, 1961.
2. Maurice BERTHE, *Le Comté de Bigorre, un milieu rural au bas Moyen Age*, 1976.
3. Roger BÉTEILLE, *La Vie quotidienne en Rouergue au XIX^e siècle*, 1973.
4. Louis MERLE, *La Métairie et l'évolution agraire de la Gâtine poitevine*, 1958.
5. Michel BELOTTE, *La Région de Bar-sur-Seine à la fin du Moyen Age, du début du XIII^e siècle au milieu du XVI^e siècle*, 1973.
6. Lucien FEBVRE, «Que la France se nomme diversité, A propos de quelques études jurassiennes», in: *Annales E.S.C.*, 1946, pp. 271-274.

第一章

1. René MUSSET, «La géographie de l'histoire», in: *Histoire de France*, p.p. Marcel REINHARD, 1954, I, p.36.
2. Pierre GASCAR, *La France*, 1971, p.11.
3. Jean Robert PITTE, *Histoire du paysage français*, 1983, I, p.14.
4. *Ibid.*, p. 13.
5. Hervé LE BRAS, Emmanuel TODD, *L'Invention de la France*, 1981, p. 7.
6. A.N., F¹⁰, 1c.
7. A.N., G⁷ 449, Poitiers, 23 novembre 1684.
8. Alain CROIX, *La Bretagn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I, 1981, p. 33.
9. E. BOGROS, *A travers le Morvan*, 1878, p. 108.
10. G. DUHEM, «Un petit village du Haut-Jura, Lamoura» in: *A travers les villes du Jura*, 1963, p. 541
11. Mgr LUSFIGER, in: *Paris-Match*, 24 avril 1981; p. 9.
12. L. FEBVRE, art. cit.
13. E. WEBER, *op. cit.*, *passim* et pp. 689 sq.
14. Dans le décret du 21 septembre 1792, il s'agit de la République une et indivisible, on peut avec un peu d'excès parler de la France une et indivisible.
15. Selon l'expression de Jean FOURASTIÉ, *Les Trente Glorieuses ou la Révolution invisible de 1946 à 1975*, 1979.
16. H. LE BRAS et E. TODD, *op. cit.*, p. 7.
17. Yves FLORENNE, *Le Monde*, 9 avril 1981.
18. Jean GIONO, *Ennemonde et autres caractères*, 1968, p. 8.
19. Henry DEBRAYE, *Avec Stendhal sur les bords du Rhône*, 1944, p.86.
20. Pierre AUMOINE et Charles DANGEAU, *La France a cent ans... Sommes-nous nés en 1865?* 1965, p. 297.
21. Henri SPADE, *Et pourquoi pas la patrie?*, 1974, p. 107.
22. Daniel ROCHE, *Le Peuple de Paris*, 1981, p.6.
23. André MAREZ, professeur au lycée de Perpignan, mort en 1978.
24. Lucien FEBVRE, *Philippe II et la Franche-Comté*, 1970, p.29.
25. Ernest BÉNÉVENT, «La vieille économie provençale», in: *Revue de géographie alpine*, 1938, p. 533.
26. *Ibid.*, p. 535.
27. Pierre GOUROU, lettre du 27 juin 1978.
28. J. CHAPELOT, R. FOSSIER, *Le Village et la maison au Moyen Age*, 1980, p. 161, à propos du village de Pélissane (Bouches-du-Rhône).

29. E. BÈNÈVENT, art. cit., p. 542.
30. J. GIONO, *Ennemonde*, op. cit., p. 14.
31. Frédéric GAUSSEN rend compte du livre d'Armand FRÉMONT, *Paysans de Normandie*, 1981, in: *Le Monde*, 4 octobre 1981.
32. F. GAUSSEN, *ibid.*
33. Hervé FILLIPETTI, *Maisons paysannes de l'ancienne France*, 1979, p. 79.
34. M. BERTHE, op. cit., p. 43.
35. Cité par Pierre FRANCASTEL, *L'Humanisme roman*, 1942, p. 26.
36. Ces pays décrits avec attention par Henri VINCENOT, *La Vie quotidienne des paysans bourguignons au temps de Lamartine*, 1976.
37. Roland BARTHES, *Michelet par lui-même*, 1^{re} éd. 1954, 2^e éd. 1965.
38. H. FILLIPETTI, op. cit., p. 10.
39. J. GRACQ, *Lettrines*, op. cit., II, p. 35.
40. Henry de ROUVIÈRE, *Voyage du tour de la France*, 1713, pp. 11-12.
41. H. FILLIPETTI, op. cit., p. 84.
42. E. MEILLET, 1963, p. 157, cité par Muriel JEAN-BRUHNS DELAMARRE, *Le Berger dans la France des villages*, 1970, p. 213.
43. *Savart, Savaret*, noms donnés dans les Ardennes et dans la Champagne pouilleuse aux terres élevées et incultes réservées presque exclusivement au pâturage des moutons et ne fournissant, surtout par suite du manque d'humidité, qu'une herbe peu abondante.
Holée, criée. Certaines ventes ou locations annuelles de terres incultes se faisaient «à la criée», la limite de la portée de la voix servant de mesure du sol (G. CROUVEZIER, *Petit Vocabulaire du langage champenois*, 1975).
- Sur la transformation de la Champagne pouilleuse, le «miracle champenois», cf. l'ouvrage de Joseph GARNOTEL, *L'Ascension d'une grande agriculture - Champagne pouilleuse - Champagne crayeuse*, 1985.
44. Marcel POÈTE, *Une première manifestation d'union sacrée. Paris devant la menace étrangère en 1636*, 1916.
45. Jaëqueline BONNAMOUR, *Le Morvan, la terre et les hommes. Essai de géographie agricole*, 1968, p. 243.
46. Jacques LEVAINVILLE, *Le Morvan, étude de géographie humaine*, 1909.
47. Ernest RENAN, *Œuvres complètes*, 1960, IX, p. 1344.
48. J. GIONO, *Ennemonde*, op. cit., p. 127.
49. Jean ANGLADE, *L'Auvergne et le Massif Central d'hier et de demain*, 1981, p. 16.
50. L. GACHON, *La Vie rurale en France*, 3^e éd. 1976, p. 11.

51. Jean ANGLADE, *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 Massif Central*, 1971, p. 37 (la sapinière est un bateau qui descend la Loire et l'Allier), Voir *infra*, chapitre II.
52. A. LEROUX, *Le Massif Central*, I, 1898, p. XV.
53. Pierre DEFFONTAINES, et Jean-François GRAVIER, «La France», in,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Larousse*, p. p. Pierre Deffontaines et Muriel Jean-Brunhes Delamarre, I, 1959, p. 129.
54. Albert DEMANGEON, *La France économique et humaine*, 1946, I, pp. 81-107.
55. Désiré PASQUET, *Histoire politique et sociale du peuple américain*, I, *Des origines à 1825*, 1924, p. 74.
56. A Soyons, rive droite du Rhône, Daniel FAUCHER, *L'Homme et le Rhône*, 1969, carte de la p. 49.
57. Arthur YOUNG, *Voyages en France*, 1937, II, p. 529. Le *paliurus* est un buisson épineux de Méditerranée, de la famille des rhamnacées.
58. Jean RACINE, *Lettres d'Uzès*, éd. de 1929, p. 57.
59. J.-C. MASANELLI, *Gaufac à l'époque de Louis XIV*, 1981, p. 83.
60. Maximilien SORRE, *Les Fondements biologiques de la géographie humaine*, 1943, I, p. 14.
61. Paul VIDAL DE LA BLACHE, *Tableau de la géographie de la France*, 1913, rééd. 1979, p. 226.
62. P. VIDAL DE LA BLACHE, *ibid.*, p. 131.
63. Marie-Hélène JOUAN, «Les originalités démographiques d'un bourg artisanal normand au XIII^e siècle, Villedieu-les-Poêles (1711-1790)», in, *Annales de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1969, pp. 87-124.
64.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op cit.*, II, p. 278.
65. Abel POITRINEAU, *La Vie rurale en Basse-Auvergne au XVIII^e siècle (1726-1789)*, 1966, rééd. 1979.
66. Henri BAUD, Jean-Yves MARIOTTE, *Histoire des communes savoyardes*, II, *Le Faucigny*, 1980, pp. 392-393.
67. Nicole LEMAITRE, «Ussel ou la difficulté de vivre, familles urbaines et rurales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in, *Entre faim et loup... Les problèmes de la vie et de l'émigration sur les hautes terres françaises au XVIII^e siècle*, 1976, pp. 11 et 16.
68. Nicole LEMAITRE, *Un horizon bloqué, Ussel et la montagne limousin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1978, pp. 86 sq.
69. Abel CHATELAIN, *Les Migrants temporaires en France de 1800 à 1914*, 1976, p. 73.
70. Gustave SCHELLE, *Ceuvres de Turgot et documents le concernant*, II, 1914, pp. 4-5.

71. Fonds du docteur MORAND, Bonne-sur-Ménoge (Haute-Savoie).
72. Alain REYNAUD, Georges CAZES, *Les Mutations, récentes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De la croissance à l'aménagement*, 1973, p. 9.
73. A. DEMANGEON, *La France économique et humaine, op. cit.*, I, p. 40.
74. Paul ETCHEMENDY, *Les Paysans d'Espelette (Pays Basque) du XIX^e siècle à nos jours*, 1981, p. 21.
75. *Le Quotidien de Paris*, 3 février 1982.
76. Georges GURVITCH, *Déterminismes sociaux et liberté humaine. Vers l'étude sociologique des cheminements de la liberté*, 1955, *passim*.
77. Nicolas-Edme RÉTIF DE LA BRETONNE, *La Vie de mon père, 1779*, rééd. 1963, p. 143.
78. H. TAINE, *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op. cit.*, p. 11.
79. A. N., G⁷ 101; Murat, 26 mai 1683.
80. Pierre GOUBET, *L'Ancien Régime*, 1969, I, p. 110.
81. Voir *infra*, deuxième chapitre, le développement sur Gondrecourt.
82. A. N., H 1515; Metz, 21 avril 1768; état indicatif du nombre de laboureurs et de manoeuvres qu'il y a dans les différents bourgs et villages du département des Trois Evêchés;

Subdélégation	Laboureurs	Manouvriers
Metz	789	3750
Toul	1921	1924
Verdun	1395	2679
Sedan	429	1787
Montmédy	836	1767
Longwy	145	442
Thionville	954	2706
Sarrelouis	452	729
Vic	1192	2707
Sarrebourog	448	1177
Phalsbourg	91	236
	8852	19904

83. Paul VIDAL DE LA BLACHE, *La France de l'Est*, 1917, p. 18. «Les diverses statistiques tentées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s'accordent à

reconnaître qu'il [le nombre des manouvriers par rapport à celui des laboureurs] dépasse de beaucoup, de plus de la moitié certainement, celui des laboureurs fixés au sol.»

84. H. TAINÉ, *op. cit.*, p. 16.
85. Jules-Marie RICHARD, *La Vie privée dans une province de l'Ouest, Laval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1922, pp. 355 sq.
86. *Ibid.*, pp. 4-5.
87. A.N., H 2933; *Mémoire sur les péages*, pp. 9-20.
88. A.N., G⁷ 449; 29 mai 1683.
89. A.N., G⁷ 347, 29; 6 août 1695.
90. J.-M. RICHARD, *op. cit.*, pp. 3-4.
91. A.N., G⁷ 356.
92. Jacques TENEUR, «Les commerçants dunkerquois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et les problèmes économiques de leur temps», in: *Revue du Nord*, 1966, pp. 18 sq.
93. Cité par Marcel MARION, *Dictionnaire d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1923, rééd. 1976, p. 296.
94. Henri TRÉVILLE, *L'Intendance de Bretagne (1689-1790), essai sur l'histoire d'une intendance en pays d'états au XVIII^e siècle*, 1953, I, p. 96.
95. A.N., G⁷ 382; Metz, 29 août 1708.
96. A.N., F¹⁴ 158, Navigation du Rhône.
97. A. POITRINEAU, *op. cit.*, p. 38.
98. Jean SIGMANN, *La Révolution de Maupeou en Bourgogne, 1771-1776*, D.E.S Dijon, 1935 dactyl., notamment p. 30.
99. A.N., G⁷ 239; Grenoble, 31 juillet 1679.
100. Pierre DUBOIS, *Histoire de la campagne de 1707 dans le Sud-Est de la France*, dactyl., pp. 28-29.
101. M. MARION, *op. cit.*, p. 429.
102. Pour Lyon, F. BRAUDEL, *Civ. mat.*, *op. cit.*, II p. 418. Pour Montpellier, Guy CHAUSSINAND-NOGARET, *Les Financiers du Languedoc au XVIII^e siècle*, 1970, pp. 235 sq.
103. Dans toutes les grandes phases, une opposition se décèle, ainsi à propos des guerres de Religion, voir J. HURSTFIELD et H. G. KOENIGSBERGER i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I,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1968, pp. 131 et 290.
104. J. RACINE, *Lettres d'Uzès*, *op. cit.*, p. 3; lettre à La Fontaine, 11 novembre 1661. *Ibid.*, p. 7, lettre à M. Vitart, 15 novembre 1661.
105. *Documents de l'histoire du Languedoc*, 1969, p. 239.
106. T. ZELDIN, *op. cit.*, II, *Orgueil et intelligence*, 1978, p. 52.

107. Allusion au livre d'Albert THIBAUDET, *Les Princes lorrains*, 1924.
108. Alain KIMMEL, Jacques POUJOL, *Certaines idées de la France*, 1982, p. 67.
109. Ernest RENAN, *La Réforme intellectuelle et morale*, in: *Œuvres complètes*, I, 1947, p. 349.
110. STENDHAL, *Mémoires d'un touriste*, 1838, rééd. 1927, I, p. 185.
111. H. DEBRAYE, *op. cit.*, p. V.
112. Vincent VAN GOGH, *Lettres à son frère Théo*, 1956, pp. 384, 374, 394, 403, 412, 393-394, 368; Eric DARRAGON, «Van Gogh, Tartarin et la diligence de Tarascon», in: *Critique*, janvier 1982, pp. 42-60.
113. F. BRAUDEL, *Méditerranée...*, I, p. 217.
114. A. d. S. Gênes, *Lettere Consoli*, 28; 20 juin-10 juillet 1673.
115. Philippe MARTEL, «Les Occitans face à leur histoire, Mary-Lafon, le grand ancêtre», in: *Amiras/Repères occitans*, I, janvier 1982, p. 10.
116. H. DEBRAYE, *op. cit.*, pp. 39, 76, 77, 79; les italiques sont dans le texte.
117. Augustin GAZIER, *Lettres à Grégoire sur les patois de la France (1790-1794)...*, 1880, p. 292.
118. Michel de CERTEAU, Dominique JULIA, Jacques REVEL, *Une politique de la langu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s patois. L'enquête de Grégoire*, 1975, p. 162.
119. A. GAZIER, *op. cit.*, p. 128.
120. *Ibid.*, p. 107.
121. *Ibid.*, pp. 137-139.
122. *Ibid.*, p. 222.
123. *Ibid.*, pp. 213 et 224.
124. *Ibid.*, pp. 282, et 287.
125. *L'Encyclopédie*, article «Patois», XII, 1765, p. 174.
126. Joachim TROTTE de la CHÊTARDIE, 1636-1714, auteur d'un *Catéchisme de Bourges*, 1708.
127. M. de CERTEAU, D. JULIA, J. REVEL, *op. cit.*, p. 163.
128. A. GAZIER, *op. cit.*, p. 57.
129. *Ibid.*, p. 91.
130. *Ibid.*, p. 90.
131. Abbé Antoine ALBERT, *Histoire géographique, naturelle, ecclésiastique et civile du diocèse d'Embrun*, 1783, I, p. 93.
132. Louis STOUFF, in: *Habiter la ville*, p. p. Maurice GARDEN et Yves LEQUIN, 1984, p. 11.
133. *Ibid.*

134. A. GAZIER, *op. cit.*, p. 137.
135. Pierre BONNAUD, *Terres et langages, Peuples et régions*, I, 1981, p. 44.
136. Robert Louis STEVENSON, *Voyage avec un âne dans les Cevennes*, 1879, rééd. 1978, p. 205.
137. P. BONNAUD, *op. cit.*, pp. 2-4, 8, et 408 sq.
138. *Ibid.*, P63.
139. Robert SPECKLIN, «Etudes sur les origines», in: *Acta geographica*, 1982.
140. François SIGAUT, «Formes et évolution des techniques», multigr., 70 p. (Rapport au Congrès d'Histoire Economique de Budapest, arrêté 1982, section «grand domaine et petite exploitation»), p. 63.
141. Jean-Louis FLANDRIN, *Familles, parenté, maison, sexualité dans l'ancienne société*, 1976, p. 7.
142. H. LE BRAS, E. TODD, *op. cit.*, pp. 23-28.
143. *Ibid.*, pp. 40-45.
144. *Ibid.*, pp. 53-54.
145. Jean-Pierre GUTTON, *Villages du Lyonnais sous la monarchie XVI^e-XVIII^e siècles*, 1978, p. 9.
146. H. LE BRAS, E. TODD, *op. cit.*, pp. 107-108.
147. Micheline BAULANT, «La famille en miettes, sur un aspect de la démographie du XVII^e siècle», in: *Annales E.S.C.*, 1972, pp. 959-968.
148. *Ibid.*, p. 967.
149. Peter LASLETT, *Un monde que nous avons perdu, Les structures sociales préindustrielles*, 1969, pp. 26-27.
150. Alan MACFARLANE, *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The Family 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 1978, pp. 138 sq.
151. Ce que souligne fortement le dernier livre, encore manuscrit, d'Hervé Le Bras, *Les Trois France*. La grande famille patriarcale y est présentée comme la force essentielle opposée par le Midi à la puissance unificatrice du pouvoir central.
- 152 et 153. *Le Monde*, 24 mai 1981.
154. *Mémoires de Jean MAILLEFER, marchand bourgeois de Reims (1611-1668)*, 1890, p. 15.
155. H. LE BRAS, E. TODD, *op. cit.*, p. 76.
156. Paul-Marie DUVAL, «Archéologie et histoire de la Gaule», in: *Annuaire du Collège de France*, 1967, p. 453.
157. Karl BRANDI, *Kaiser Karl V*, 1937, p. 326.
158. *Ibid.*, pp. 443-444.
159. Le 18 septembre 1544.

160. K. BRANDI, *op. cit.*, p. 448.
161. Marquise de la TOUR DU PIN, *Journal d'une femme de cinquante ans*, II, 1778-1815, 1923, p. 339.
162. Léo MOUTON, *Le Duc et le Roi; d'Epéron, Henri IV, Louis XIII*, 1924, pp. 133 sq.
163. A. N., G⁷ 1691, 85.
164. René HÉRON DE VILLEFOSSE, *Histoire des grandes routes de France*, 1975, p. 185.
165. Marcellin de MARBOT, *Mémoires*.
166. A. N., F¹⁰ 226, 23 ventôse an II.
167. M. DE MARBOT, *op. cit.*, I, 1891, pp. 45-56.
168. François LEBRUN, *op. cit.*, I, p. 163 et II pp. 143-144.
169. Henriette DUSSOURD, *Les Hommes de la Loire*, 1985, p. 89.
170. STENDHAL, *Journal de voyage de Bordeaux à Valence en 1838*, rééd. 1927, p. 3.
171. R. HÉRON DE VILLEFOSSE, *op. cit.*, p. 230.
172. Pierre de la GORCE, *Histoire du Second Empire*, I, 1894, p. 223.
173. Francesco FADINI, *Caporetto dalla parte del vincitore*, 1974, p. 449.
174. Roger DION, «La part de la géographie et celle de l'histoire dans l'explication de l'habitat rural du Bassin Parisien», in: *Publications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s de Lille*, 1946, p. 32.
175. François MIREUR, *Etats Généraux de 1789. Cahiers des doléances des communautés de la sénéchaussée de Draguignan*, 1889, p. 118.
176. *Assemblée provinciale de l'Ile-de-France*, 1787, p. 212.
177. Abbé A. ALBERT, *op. cit.*, pp. 91-92.
178. A. GAZIER, *op. cit.*, p. 287.
179. Jean et Renée NICOLAS, *La Vie quotidienne en Savoi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1979, pp. 313-315.
180. A. GAZIER, *op. cit.*, p. 278.
181. A. DEMANGEON, *op. cit.*, p. 398.
182. Robert MUCHEMBLED, *Culture populaire et culture des élites dans la France moderne (XV^e-XVIII^e siècles)*, 1978, p. 54.
183. Robert PHILIPPE, tome III, citation non retrouvée.
184. R. MUCHEMBLED, *op. cit.*, p. 22.
185. Jacques DUPAQUIER, *La Population rurale du Bassin Parisien à l'époque de Louis XIV*, 1979, p. 204.
186. Nicolas-Edme RÉTIF DE LA BRETONNE, *Monseigneur Nicolas*, éd. 1959, pp. 179-180.
187. Elena FASANO GUARINI, «Città soggette e contadi nel dominio fiorentino tra Quattro e Cinquecento, il caso pisano», in: *Ricerche di*

- storia moderna*, I, 1976, pp. 1-94.
188. Giovanni ZELDIN, référence égarée.
189. Sanche DE GRAMONT, *Les Français, portrait d'un peuple*, 1970, p. 454.
190. Marc FERRO, *La Grande Guerre, 1914-1918*, 1969, p. 24.
191. Jules MICHELET, note égarée.
192. François BOURRICAUD, *Le Bricolage idéologique. Essai sur les intellectuels et les passions démocratiques*, 1980, p. 24.
193. Jean GUÉHENNO, *La Mort des autres*, 1968, pp. 178 et 184.
194. Il s'agit d'Antoine de Bourbon.
195. François DE LA NOUE, *Mémoires*, 1838, pp. 593-594.
196. *Ibid.*, p. 605.
197. Alexandre DE TILLY, *Mémoires*, éd. de 1965, p. 228.

第 二 章

1. Jean-Paul SARTRE, *Journal*, p. 22.
2. P. BONNAUD, *op. cit.*, I, p. 24.
3. Jean BUVAT, *Journal de la Régence*, 1865, II, p. 287.
4. A. N., K 1219, n° 62.
5. J. BUVAT, *op. cit.*, II, p. 332.
6. Cf.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op. cit.*, II, p. 98.
7. Paul GAULTIER, *L'Âme française*, 1936, p. 9.
8. André DELEAGE, *La Vi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Bourgogne dans le Haut Moyen Âge*, 1941, I, p. 101.
9. Carl LAMPRECHT, *Études sur l'état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pendant la première partie du Moyen Âge*, éd. fr., 1889.
10. J'entends par là, dans tout le présent texte, l'exploitation rurale réduite à un seul corps de bâtiments.
11. C. LAMPRECHT, *op. cit.*, p. 9.
12. *Résultats statistiques du recensement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1891, pp. 64 et 86.
13. Christian ZARKA, «Évolution de l'habitat champenois», in, *Actes du colloque de Châteauroux, Bouges-le-Château, Levroux, 27-29 octobre 1978*, p. p. Olivier BUCHSENSCHUTZ, 2^e partie, *L'Évolution de l'habitat en Berry*, 1981, p. 251.
14. P. BONNAUD, *op. cit.*, II, p. 93.
15. Fernand BENOIT, *La Provence et le Comtat Venaissin*, 1949, p. 41.
16. Marie TAY, *Une commune de l'ancienne France, monographie du village de Rognes*, 1985, p. 5, et E. BARATIER, G. DUBY, E.

- HILDESHEIMER, *Atlas historique de Provence*, 1969, pp. 78-79 et carte 230.
17. L. MERLE, *op. cit.*, pp. 63 sq.
 18. Paulette LECLERCQ, *Gortault, un village de Provenc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1979.
 19. André CHAMSON, *Castanet*, 1979, p. 68.
 20. A. N., Flo III, Finistère I.
 21. A. N., F20 187; Mémoire sur la statistique du département du Finistère, 1789 et An-9.
 22. Robert LATOUCHE, «Un aspect de la vie rurale dans le Maine au XI^e et au XII^e siècle, l'établissement des bourgs», in: *Le Moyen Age*, 1937, n° 1-2, p. 21.
 23. *Ibid.*, p. 18, note 62.
 24. *Ibid.*, p. 17.
 25. Roger DION, «La part de la géographie et celle de l'histoire dans l'habitat rural du Bassin Parisien», in: *Publications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e Lille*, 1946, pp. 49-50.
 26. A. CROIX, I, p. 23.
 27. R. DION, *art. cit.*, p. 50.
 28. A. CROIX, *op. cit.*, I, pp. 147 et 153.
 29. Aimé PERPILLOU, *Cartographie...*, p. 93.
 30. Alain CORBIN, *Archaïsme et modernité en Limousin au XIX^e siècle, 1845-1880*, 1975, I, p. 247.
 31. *Ibid.*, I, pp. 287-300.
 32.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et André ZYSBERG, «Géographie des hagiotoponymes en France», in: *Annales*, 1983, pp. 1304 sq.
 33. Jean GUILAINE, *La France d'avant la France*, pp. 36-42.
 34. Pierre de SAINT-JACOB, «Etudes sur l'ancienne communauté rurale en Bourgogne. III, La banlieue du village», in: *Annales de Bourgogne*, XVIII, déc. 1946, p. 239 note 2.
 35. André PIATIER, *Radioscopie des communes de France, Ruralité et relations villes-campagnes. Une recherche pour l'action*, 1979, p. 55.
 36. Voir la remarquable communication de Noël COULET, «La survie des communautés d'habitants des villages disparus, l'exemple d'Aix et du pays d'Aix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in: *Villes d'Europe*, colloque de Nice, 1969, in: *Annales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Nice*, 1969, n° 9-10, pp. 81-91.
 37. J. H. von THÜNEN, *Der isolierte Staat in Beziehung auf Landwirtschaft und Nationalökonomie*, 1826.

38. R. DION, art. cit., p. 21.
39. Paul DUFOURNET, *Une communauté agraire secrète et organise son territoire à Bassy (Province de Gènevois, Haute-Savoie)*, 1975, p. 422.
40. Albert DEMANGEON, *Géographi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I, p. 192.
41. A. N., H 1514; 1787.
42. Blé de printemps et grains (orge, avoine, millet, etc.) semés au mois de mars.
43. Ange GOUDAR, *Les Intérêts de la France mal entendus...*, I, 1756, p. 90.
44. Lucien GACHON, *La Vie rurale en France*, 1967, p. 58.
45. Michel ROUCHE, *L'Aquitaine des Wisigoths aux Arabes, 418-781. Naissance d'une région*, 1979, p. 184.
46. P. DUFOURNET, *op. cit.*, p. 72. Murger, pierrier, Teppe, terrain improductif par sa nature ou par le manque de culture.
47. J. CHAPELOT, R. FOSSIER, *op. cit.*, p. 33.
48. A. D. Meuse, C 1480, I v^o; 27 octobre 1789.
49. Il y en avait en d'autres antérieurement, bien entendu. Ainsi, pour retenir un exemple, en 1652, entre les paroisses de Martigné et de Saint-Berthevin, dans la Mayenne actuelle.
50. Maurice AGULHON, *La Vie sociale en Provence intérieure au lendemain de la Révolution*, 1970, p. 33.
51. A. N., G⁷ 1649, 53.
52. J. BONNAMOUR, *op. cit.*, p. 235.
53. Lucien GACHON, «France rurale d'aujourd'hui, I. Dans les massifs cristallins d'Auvergne. La ruine du paysage rural et ses causes», in, *Annales E. S. C.*, 1950, p. 452.
54. L'Escandorgue, plateau volcanique, dans l'arrière-pays de Montpellier
55. Réfèronec égarée.
56. Abbé Alexandre TOLLEMER, *Journal manuscrit d'un sire de Gouberville et du Masnil-au-Val, gentilhomme campagnard... Etude publiée dans le Journal de Valognes du 17 février 1870 au 20 mars 1872*, p. 384.
57. A. N., MM 928...
58. J. ANGLADE, *L'Auvergne et le Massif Central...*, *op. cit.*, p. 54.
59. A. N., G⁷ 434.
60. *Mémoires des intendants sur l'état des généralités dressé pour l'instruction du duc de Bourgogne*, I, *Mémoire de la généralité de Paris*, p. p. A. M. de BOISLILE, 1881 p. VI, note 5, lettres des 29 juillet 1704, 1^{er} et 22 mai 1706, et 13 juin 1707.

61. Marquis d'ARGENSON, *Journal et Mémoires*, 1861, VI, p. 181.
62. A.N., H 1462; Versailles, 13 mars 1787.
63. F. MIREUR, *op. cit.*, p. 79.
64. Cité Par René DUMONT, *Nouveaux Voyages dans les campagnes françaises*, 1977, p. 385.
65. François DORNIC, *L'Industrie textile dans le Maine et ses débouchés internationaux (1650-1815)*, 1955, p. 20.
66. Henri VINCENOT, *La Billebaude*, 1978, p. 48.
67. Denis RICHEL, *Une famille de robe, les Séguier avant le chancelier* (thèse manuscrite), p. 91.
68. Sur la place du bois dans l'économie, voir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op. cit.*, I, p. 321 et note.
69. P. BONNAUD, *op. cit.*, I, p. 51.
70. François JEANNIN, «L'industrie du verre en Argonne», in: *Patrimoine et culture en Lorraine*, p.p. Yves LEMOINE, 1980, p. 84.
71. Donatien-Alphons-François, marquis de SADE, *Justine, ou les malheurs de la vertu*, 1791.
72. A.N., G⁷ 237; Châlons, 31 janvier 1715.
73. A.N., G⁷ 432, 20 novembre 1740.
74. A.N., G⁷ 501; Rouen, 6 juin 1712.
75. A. N., G⁷ 419.
76. A. N., G⁷ 433; juillet 1706.
77. A.N., MM 928, f^o 15; 1698.
78. Marcel REINHARD, André ARMENGAUD, Jacques DUPAQUIE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 1960, p. 268.
79. R. DION, *art. cit.*, p. 62.
80. André BURGUIÈRE, «Endogamia e comunità contadina sulla pratica matrimoniale a Romainville nel XVIII secolo», in: *Quaderni storici*, sept.-déc. 1976, pp. 1073-1094.
81. Jean SUTTER, Léon TABAH, «Les notions d'isolat et de population minimum», in *Population*, n^o 3, juil.-sept. 1951, pp. 486-489.
82. Michel-Hilaire CLEMENT-JANIN, *Sobriquets de villes et des villages de la Côte d'Or*, 1876, *passim*.
83. P.M. JONES, «Political Commitment and Rural Society in the Southern Massif Central», in: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1980, pp. 343-344.
84. A. CROIX, *La Bretagn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op. cit.*, I, p. 33.
85. Souvenir personnel, Luméville (Meuse), 1907.
86. Joseph CRESSOT, *Le Pain au lièvre*, 1973, p. 113.
87. *Ibid.*, p. 117.

88. Jacques-Joseph JUGE SAINT-MARTIN, *Changemens survenus dans les mœurs des habitans de Limoges depuis une cinquantaine d'années...*, 1817, p. 14.
89. Yves-Marie BERCE, *Histoire des croquants, Etudes d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au XVII^e siècle dans le Sud-Ouest de la France*, 1974, p. 29.
90. A. CORBIN, *op. Cit.*, I, P. 98.
91. André VAQUIER, *Ermont... I. Des origines à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65, pp. 144 *sp.*
92. Jean PETIT, *Un registre, un village, une poque...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sociale et économique du monde rural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1980.
93. A. N., F10 222.
94.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III, p. 240, note 13.
95. Abbé CHALAND, *Mémoires de Saint-Julien-Molin-Molette*, 1852, pp. 5-6.
96. Emile COORNAERT, *Un centre industriel d'autrefois. La draperie-sayerie d'Hondschoote (XIV^e-XVIII^e siècle)*, 1930, p. 249 note 2.
97. Pour Orgelet, *cf.*, A. CORBIN, *op. cit.* I, p. 298, note 136. Pour les Hautes-Pyrénées, *cf.*, Jean-Pierre POUSSOU, «Sur le rôle des transports terrestres au XVIII^e siècle», in, *Hommage à P. Wolff, Annales du Midi*, 1978, pp. 407-408.
98. Richard GASCON, *Grand Commerce et vie urbaine au XVI^e siècle. Lyon et ses marchands (environs de 1520-environs de 1580)*, 1971, I, pp. 327-328.
99. Propos recueillis auprès de Michel Granjacques, de Saint-Nicolas (Haute-Savoie), né en 1896, qui fut lui-même barlotier, comme son père, Jean-Euchariste.
100. A. N., G⁷ 377; Metz, 1^{er} juillet 1695.
101. A. N., G⁷ 1651; Soissons, 4 juin 1709.
102. Jean-Pierre FILIPPINI, *Les Conséquences économiques de la guerre de Succession d'Autriche*, thèse dactyl., pp. 58-62.
103. Henri RAMEAU, *A l'orée des plateaux de la Haute-Saône, le village d'Andelorre*, 1974, pp. 32-33.
104. Dominique DINET, «Quatre paroisses du Tonnerrois», in, *Annales de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1969, pp. 62-84.
105. Pierre GAXOTTE, *Mon village et moi*, 1988, p. 129.
106. Séverine BEAUMIER, «Un homme, un village-les travaux et les jours dans le Haut-Diois au XIX^e siècle», in, *Le Monde alpin et rhoda-*

- nien, 1978, pp. 1-2.
107. Jean PETIT, *Le Chant de mon enfance*, dactylogramme, p. 31.
108. R. CHAPUIS, «Une vallée franc-comtoise, la Haute Loue», in: *Annales littéraires de l'Université de Besançon*, vol. 23, 1958. pp. 105-106.
109. Henri VINCENOT, *La Vie quotidienne des paysans bourguignons au temps de Lamartine*, 1976 pp. 397-401.
110. Fernand DUPUY, *L'Albine*, 1977, p. 11.
111. S. BEAUMIER, art. cit., p. 41.
112. Jean-Pierre LAVERRIÈRE, *Un village entre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Viry-en-Savoie (1792-1815)*, 1980, pp. 23-24.
113. *Théâtre d'agriculture et ménage des champs*, 1875, p. 113, cité par Michel LUTFALLA, *Aux origines de la pensée économique*, 1981, p. 22.
114. *Les Mille Visages de la campagne française*, 3^e éd. 1976, p. 242.
115. Bernard BONNIN, «Les caractères des migrations dans les régions de montagne du Dauphiné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in: *Entre faim et loup, op. cit.*, 1976, p. 19.
116. Père Pierre-Jean-Baptiste LEGRAND D'AUSSY, *Voyage fait, en 1787 et 1788, dans la ci-devant Haute et Basse Auvergne...*, au III, I, pp. 474-483.
117. Cet exemple est un rappel. N'imaginons pas trop vite que ce soit une exception. En fait, les familles ont été les premières cellules vivantes, les plus obstinées à vivre, à proliférer. Les frêcheries ont peuplé de vastes régions, s'y sont maintenues. Nous les retrouvons tardivement, mais il y a longtemps qu'elles existent. Dans les contrats notariaux de Ginestas (Paul CAYLA, *Essai sur la vie des populations rurales à Ginestas... au début du XVI^e siècle (1519-1536)*, 1938, pp. 12-13) se rencontrent, au début du XVI^e siècle, des contrats d'*effrayamentum* (affrèrement), c'est-à-dire la «mise en commun entre deux familles de tous les biens, de tous les droits juridiques, de tous les travaux et de toutes les charges». Ceux que le sang n'unissait pas pouvaient ainsi devenir frères par contrat. Et, bien entendu, la pratique est antérieure au XVI^e siècle.
118.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Les masses profondes, la paysannerie»,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I, De 1450 à 1660, Second volume, *Paysannerie et croissance*, p.p. Fernand BRAUDEL et Ernest LABROUSSE, 1977, p. 669.
119. Georges DUBY, *La Société aux XI^e et XII^e siècles dans la région mâconnaise*, 1971, p. 99.

120. Lucien ROMIGR, *Explication de notre temps*, 1925, pp. 41-42.
121. Jacques CARORGNY, *Mémoires 1582-1595*, 1880, p. 3.
122. A.N. F 20 206.
123. S. BEAUMIER, art., cit., pp. 121-122.
124. Claude CHÉREAU, *Huillé, une paroisse rurale angevine de 1600 à 1836*, s. d., I, p. 2.
125. Marc DROUDOT, *Thann à l'époque mazarine (1658-1789), histoire politique et administrative*, 1961, pp. 8-9.
126. A.N., G⁷ 501; 19 octobre 1711.
127. Voir *infra*.
128. A.N., G⁷ 237.
129. Robert BICHET, *Un village comtois au début du siècle*, 1980, pp. 130-132.
130. Voir *infra*.
131. Laurence WYLIE, *Un village du Vaucluse*, 1968, pp. 30-31.
132. A.N. G⁷ 158.
133. H. LEMOINE, *Département de la Meuse, géographie, physique, économique, historique et administrative*, 1909, p. 287.
134. Valentin JAMERAI-DUVAL, *Œuvres*, I, 1784, p. 58 (automne 1709).
135. A.N., F²⁰ 119.
136. A.D. Meuse, L 343; 1790.
137. D'après le registre d'état civil, Luméville-en-Ornois--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la Meuse.
138. A.N., H 1515. Voir note 82 du premier chapitre.
139. Varcolier, varcollier, bourrellier ou sellier, F. CODEFROY, *Dictionnaire de l'ancienne langue française*, t. 8, 189,5
140. *Histoire des villes de France*, recueil, *op. cit.*
141. A.E. M. et D., France, 815.
142. Victor-Eugène ARDOINDUMAZET, *Voyages en France*, 2^e série, 1906, p. 270.
143. Référence égarée.
144. F. BENOIT de TOUL, *Pouillé, ecclésiastique du diocèse de Toul*, 1911, II, pp. 265-284.
145. Alfred IOUVIN, *Le Voyageur d'Europe*, 1672, pp. 31-32.
146. A.N., F²⁰, 177, Statistique de la Côte-d'Or. Aujourd'hui, Nuits compte 21 700 habitants.
147. P. CAYLA, *op. cit.*, p. 217.
148. Raymond BIERRY, *Rouvray. Un relais sur le grand chemin*, 448-1976, 1976, p. 57.
149. Voir *infra*.

150. A. GOUDAR, *op. cit.*, p. 37.
151. A.N., F le III Vaucluse, 9, 1733; 7 pluviôse an IV.
152. Evelyn ACKERMAN, The Commune of Bonnière-sur-Sein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Annales de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1977.
153. M. AGULHON, *op. cit.*, p. 20.
154. Michel HÉBERT, *Tarascon au XIX^e siècle*, 1979, pp. 28-32.
155.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La destruction du monde plein», i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1977, p. 499, *op. cit.*
156. Noël COULET, «Population et société à Pourrières, 1368-1430. Premier bilan d'une enquête», in: *Etudes rurales*, n° 51, 1973, pp. 86-111.
157. Eckart SCHREMMER, *Die Wirtschaft Bayerns*, 1970, p. 21.
158. Rudolf HÄPKE, *Brügges Entwicklung zum mittelalterlichen Weltmarkt*, 1908, in: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conomie et Capitalisme*, *op. cit.*, t. I, p. 444.
159. André LACROIX, *Romans et le Bourg de Péage*, 1897, p. 296.
160. A.N., G¹ 415-416; Nancy, 9 mai 1693.
161. Jean-Marie DUNOYER, «7 milliards d'hommes pour l'an 2000», in: *Diagrammes* 33, nov. 1959, p. 3.
162. Georges DUBY, *Histoire de la France urbaine*, 1980, II, p. 478.
163. Henri BAUD, in: *Dictionnaire des communes savoyardes*, 1981, II, p. 37.
164. Charles-Edmond PERRIN, article publié dans *Annales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et d'archéologie de Lorraine*, 370 année, t. 33, 1924.
165. *Histoire de Besançon*, p.p. Claude FOHLEN, 1964, I, p. 145.
166. *Ibid.*, p. 39.
167. P.-M. DUVAL, *art. cit.*, p. 453.
168. *Histoire de Besançon op. cit.*, II, p. 10.
169. Loys GOLLUT,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la république séquanoise et des princes de la Franche-Comté de Bourgogne*, 1592, édit. Duvernoy, 1846, p. 272.
170. Jean BRELOT, in: *Histoire de Besançon, op. cit.*, II, p. 10.
171. L. GOLLUT, *op. cit.*, 1592, cité par Roland FIETIER, *Recherches sur la banlieue de Besançon*, 1973, p. 39.
172. *Histoire de Besançon, op. cit.*, 1964, I, p. 468; la citation provient d'édits municipaux qui datent du XVI^e siècle.
173. 300 clos et jardins en tout, d'église ou de laïcs. J. BRELOT, in: *Histoire de Besançon, op. cit.*, I, p. 585.
174. *Histoire de Besançon, op. cit.*, I, p. 587.
175. 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op. cit.*, I, p. 458.

176. *Histoire de Besançon, op. cit.*, I, pp. 494-495.
177. *Ibid.*, II, pp. 41-43.
178. Maurice GRESSET, «Les débuts du régime français en Franche-Comté (1674-1675)», in: *Provinces et états dans la France de l'Est*, Colloque de Besançon, 3 et 4 octobre 1977, publié en 1979, pp. 19-37.
179. Maurice GRESSET, *Le Monde judiciaire à Besançon de la conquête par Louis XIV à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674-1789)*, 1975, p. 235.
180. *Histoire de Besançon, op. cit.*, II, pp. 147-149.
181. A. N., KK 944.
182. *Histoire de Besançon, op. cit.*, II, p. 147.
183. Marius POUCHENOT, *Le Budget communal de Besançon au début du XVIII^e siècle*, 1910, p. 3.
184. A. N., D IV bis 47.
185. *Histoire de Besançon, op. cit.*, II, p. 337.
186. *Ibid.*, p. 299.
187. *Ibid.*, fig. 113, p. 584.
188. Honoré d'URFÈ, *Œuvres complètes*.
189. *Annuaire statistique du département de la Loire*, 1809, p. 187.
190. C'est ce qui arrive en 1705 à l'étang de Boisy, propriété du duc de Feuillade où l'on retrouve le poisson à sec, A. D. Loire, balliage ducal de Roanne, B 460.
191. *Annuaire statistique du département de la Loire, op. cit.*, p. 187.
192. *Ibid.*
193. Denis LUYA, *L'axe ligérien (Loire-Allier) dans les pays hauts, 1682-1858*, (thèse) 1980, p. 46.
194. A. N., H 1510¹, vers 1788. Observations sur les deffauts de la culture employée dans la plaine de Forez.
195. D. LUYA, *op. cit.*, p. 205.
196. Elie BRACKENHOFFER, *Voyage en France, 1643-1644*, p.p. Henry LERR, 1925, pp. 141-142.
197. A. N., 406, 14 août 1687.
198. A. D. Loire, balliage ducal de Roanne, B 455, 1704.
199. A. N., F² 206, an IX.
200. Système dit du métayage ou du grangeage aux quatre grains, froment, seigle, orge, avoine.
201. F. TOMAS, «Problèmes de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Le Forez au XVIII^e siècle», in: *Cahiers d'histoire*, 1968, p. 395, n° 47.
202. Christophe EXTRAT, *Images et réalités de la vie coopérative agricole dans la Loire de 1946 à 1979*, dactylogramme, 1981, p. 16.
203. F. TOMAS, art. cit. et *Annuaire statistique du département de la Loire*.

204. Le barrage de Villeret a été inauguré le 11 septembre 1982. Régis GUYOTAT, in: *Le Monde*, «La Loire apaisée», 11 septembre 1982.
205. Serge DONTENWILL, «Rapports ville-campagne et espace économique microrégional; Charlieu et son plat pays au XVIII^e siècle» in: *Villes et campagnes XV^e-XX^e siècle*, 1977, p. 162.
206. Marcel GONIVET, *Histoire de Roanne et de sa région*, III, 1975, p. 131.
207. Bandolier, «voleur de campagne qui vole en troupes et avec armes à feu» (Dictionnaire de Furetière).
208. Chanoine REURE, «Le vin de Garambeau et la question des vins du Roannais au XVII^e siècle», in: *Bulletin de la Diana*, 1908, pp. 5et6.
209. *Annuaire statistique du département de la Loire*, 1809, p. 181.
210. *Mémoire de l'intendant de Lyon*, 1762, cité par Maurice LABOURÉ *Roanne et le Roannais. Etudes historiques*, 1957, p. 466.
211. *Annuaire statistique du département de la Loire*, op. cit.
212. D. LUYA, op. cit., p. 91.
213. Marcel GONIVET, *Histoire de Roanne op. cit.*, I, p. 21.
214. D. LUYA, op. cit., p. 14.
215. Paul BONNAUD, *Essai d'histoire locale. La navigation à Roanne*, 1944, p. 27.
216. Etienne FOURNIAL, *Roanne au Moyen Age, essai d'histoire urbaine*, 1964, pp. 70, 73 et carte p. 72.
217. Albert DEMANGEON,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p.p. P. VIDAL de la BLACHE et L. GALLOIS, t. VI *La France*, 2^e partie, *France économique et humaine*, 1958, p. 769.
218. E. ERACKENHOFFER, op. cit., pp. 137-138 n. 1.
219. M. LYONNET, *Gens du métier à Nevers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1941, p. 367 cité par François BILLACOIS, «La batellerie de la Loire au XVII^e siècle», in: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juillet-sept. 1964, p. 67.
220. D. LUYA, op. cit., p. 75, note 35.
221. *Histoire de la navigation sur l'Allier en Bourbonnais*, 1983, passim, et pp. 34-35.
222. M. LABOURÉ, op. cit., p. 354.
223. R. GASCON, op. cit., I, p. 140.
224. A.N., G¹ 1646, 373, 7 avril 1709.
225. A.N., G¹ 1647, 335; 11 juin 1710.
226. A Paris, la livre poids de marc, 2 marcs. La livre était considérée comme le double du marc et se divisait en 16 onces.
227. A.N., G¹ 1647.

228. D. LUYA, *op. cit.*, pp. 280-281.
229. Thomas REGAZZOL, Jacques LEFEBVRE, *la Domestication en mouvement*, 1981 pp. 149 et 152-153.
230. Auguste MAHAUT, *L'Idée de la Loire navigable combattue*, 1909, cité par Henriette DUSSOURD, *Les Hommes de Loire*, 1985, p. 27.
231. G. BITON, *Bateaux de Loire*, 1972, pp. 2 et 3.
232. H. DUSSOURD, *op. cit.*, pp. 36 et 56-57; G. BITON, *op. cit.*, p. 5.
233. A. N., G⁷ 1651, 336; 14 septembre 1709.
234. H. DUSSOURD, *op. cit.*, p. 26.
235. J. A. DULAURE, *Description des principaux lieux de France*, 1789, t. 6, p. 107.
236. A. N., F 14, 1199 A, année 1761.
237. Jeanne et Camille FRAYSSE, *Les Mariniers de la Loire en Anjou-Le Thoureil*, 1978, p. 47, cité par D. LUYA, *op. cit.*, p. 18, note 27.
238. A. D. Loire, bailliage ducal de Roanne.
239. A. N., F¹⁴ 559²; Nevers, 18 mai 1813.
240. E. BRACKENHÖFFER, *op. cit.*, p. 140.
241. G. LEFEBVRE, *Etudes orléannaises*, I, 1962, p. 84.
242. René I^{er} le Bon, 1409-1480, duc de Bar, duc d'Anjou et comte de Provence, roi en titre du royaume de Naples, hérité de sa femme, qu'il essaya en vain de conquérir.
243. P. CHAUSSARD, *Marine de Loire et marins digonnais*, 1970, p. 26.
244. M. GONINET, *op. cit.*, I, pp. 181-182.
245. P. CHAUSSARD, *op. cit.*, p. 27.
246. *Ibid.*
247. A. N., F¹⁴ 1199 A.
248. D. LUYA, *op. cit.*, p. 34.
249. *Ibid.*, p. 223.
250. A. N., F¹⁰ 243.
251. J. A. DULAURE, *op. cit.*, pp. 106-107.
251. A. N., G⁷ 360, 21; 8 juillet 1705.
252. A. N., G⁷ 360, 21; 8 juillet 1750.
253. A. N., F¹⁴, 1200; Moulins, 11 novembre 1756.
254.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op. cit.*, II, 1979, p. 317.
255. *Ibid.*, p. 327.
256. D. LUYA, *op. cit.*, p. 232.
257. A. N., F¹⁴ 1200.
258.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techniques*, pp. Maurice DAUMAS, t. 3;

- L'Expansion du machinisme*, 1968, pp. 30 *sp.*, pp. 68-69.
259. D. LUYA, *op. cit.*, p. 237.
260. M. LABOURÉ, *op. cit.*, pp. 377-378.
261. Serge DONTENWILL, «Roanne au dernier siècle de L'Ancien Régime, Aspects démographiques et sociaux», in: *Etudes foréziennes*, 1971, pp. 49-73.
262. S. DONTENWILL, *art. cit.*, p. 72, note 61.
263. Jean-Pierre HOUSSEL, *le Roannais et le Haut-Beaufonais*, 1978.
264. D. LUYA, *op. cit.*, p. 11.
265. A.N., H 1510', vers 1788.
266. F. BRAUDEL, *Civil, matérielle*, I.
267. P. VIDAL de la BLACHE, *Tableau de la géographie de la France*, *op. cit.*, p. 324.
268. Référence égarée.
269. A.N., K 1516; 28 décembre 1788.
270. A la différence, si la documentation est juste, d'une ville comme Saumur; car, pour le sel de contrebande, la voie de la Loire est sans doute prioritaire.
271. A.N., G⁷ 521; 1682.
272. A.N. G⁷ 521; Mayenne, 19 et 29 novembre 1693; Saumur, 14 janvier 1693; Laval, 1^{er} mars 1693.
273. A.N., G⁷ 521; Laval, 24 mai et 3 juin 1693.
274. E. LAURAIN, «Le département de la Mayenne à la fin de l'an VII^e», in: *Bulletin de la Commission historique et archéologique de la Mayenne*, 1938-1939, p. 118.
275. A.N., F¹⁰ 242.
276. J.-M. RICHARD, *La Vie privée dans une province de l'Ouest, Laval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op. cit.*, p. 126.
277. A.N., F¹⁰ 242.
278. *Ibid.*
279. René MUSSET, *Le Bas-Maine*, 1917, pp. 320-321.
280. *Ibid.*, p. 323.
281. A.N., F¹⁴ 1207, 234; 20 septembre 1769.
282. A.N., K 1252.
283. A.N., F¹² 1259 D.
284. A.N., F¹² 1259 D; 27 Brumaire an IX.
285. E. LAURAIN, *art. cit.*, p. 119.
286. J. SAVARY DES BRULONS, *Dictionnaire du commerce*, V, colonne 163.
287. *Ibid.*, col. 163, d'après le *Journal de commerce*, mars 1762, p. 112.

288. F. DORNIC, *op. cit.*, pp. 1-5.
289. J.-M. RICHARD, *op. cit.*, pp. 289-290.
290. *Ibid.*, p. 291.
291. *Ibid.*, p. 301.
292. *Ibid.*, pp. 259 sq.
293. *Ibid.*, p. 298.
294. *Ibid.*, pp. 301 sq.
295. *Ibid.*, pp. 344 et 345, note 2.
269. *Ibid.*, p. 114.
297. F. DORNIC, *op. cit.*, p. 44.
298. J.-M. RICCARD, *op. cit.*, p. 289
299. Jean-Claude PERROT, *Genèse d'une ville moderne, Caen au XVIII^e siècle*, 1975, I, p. 145.
300. *Ibid.*, I, p. 211.
301. A. DEMANGEON,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pp. P. VIDAL de la BLACHE et L. GALLOIS, t. VI, *La France*, 2^e partie, *France économique et humaine*, *op. cit.*, P. 591.
302. *Op. cit.*
303. Pour les explications qui suivent, J.-C. PERROT, *op. cit.*, I, pp. 181 sq.
304. *Ibid.*, I, pp. 185 sq.
305. *Ibid.*, I, p. 213.
306. *Ibid.*, I, p. 218.
307. *Ibid.*, I, p. 217.
308. *Ibid.*, I, pp. 217-218, note 159.
309. *Ibid.*, I, p. 219.
310. *Ibid.*, I, p. 241.
311. M.-H. IOUAN, art. cit., pp. 87-124.
312. J.-C. PERROT, *op. cit.*, I, p. 359. Cette richesse a bel et bien détourné l'agriculture normande de se faire servante de l'industrie.
313. *Ibid.*, I, p. 359, note 55.
314. *Ibid.*, I, p. 360 (suite de la note 55).
315. *Ibid.*, I, pp. 360-366.
316. *Ibid.*, I, p. 8.
317. *Ibid.*, I, pp. 518-519.
318. *Ibid.*, II, p. 948.
319. A.N., DIV bis 47.
320. Voir *infra*.
321. A.N. G⁷ 360, 10 février 1706.
322. Andrea METRA, *Il Mentore perfetto de'negozianti*, 1977.

323. A.N., F²⁰ 198, 130, Châteauroux.
324. Christian ROMON, *Mendiants et vagabonds à Paris, d'après les archives des Commissaires du Châtelet (1700-1784)*, dactylogramme.
325. Raymonde MONNIER, *le Faubourg Saint-Antoine, 1783-1815*, 1981, pp. 195-201.
326. D. ROCHE, *op.cit.*, p. 18.
327. *Ibid.*, p. 31.
328. A.N., G⁷ 432; 6 février 1704.
329. *Journal du voyage de deux Hollandais à Paris en 1656-1658*, p.p. A.P. FAUGERE, 1899, p. 29.
330. *Voyages promenades aux environs de Paris avec Caroline Tullié*, n° 29, 1790-1792.
331. Cuy FOURQUIN, *Les Compagnes de la région parisienne à la fin du Moyen Age*, 1964, p. 220.
332. A.M. de BOISLISLE, I, p. 285.
333. Les italiques sont de moi.
334. Comte d'HERISSON, *Souvenirs intimes et notes du baron Mounier*, 1896, p. 35.
335. *Mémoires de la comtesse de BOIGNE*, 1971, I, p. 215.
336. Ch. ACHARD, *La Confession d'un vieil homme du siècle*, 1943, p. 24.
337. A.N., K 1252.
338. André PIATIER, *Radioscopie des communes de France*, 1979, pp. 23-25 et 253 sq.
339. P. BONNAUD, *passim*.
340. H. MENDRAS, *op.cit.*, p. 37.
341. *Ibid.*, p. 19.
342. Roger BÉTEILLE, *La France du vide*, 1981; J. GRAVIER, *Paris et le désert français*, 1^{re} éd. 1947; 2^e éd. 1972.
343. H. MENDRAS, *op.cit.*, pp. 19-20.
344. Michel ROCHEFORT, cité par A. PIATIER, *op.cit.*, p. 8.
345. A. PIATIER, *op.cit.*, p. 6.
346. *Ibid.*, p. 56.
347. *Ibid.*, p. 6.
348. *Ibid.*

第三章

1. P. VIDAL de la BLACHE, *Tableau de la géographie de la France*, *op.cit.*, p. 7.
2. P. VIDAL de la BLACHE, *op.cit.*, p. 8.

3. Lucien FEBVRE, *La Terre et l'évolution humaine*, 1949, p. 25.
4. Emmanuel de MARTONNE, «La France physique», in: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1942, p. 1.
5. E. R. CURTIUS, *op. cit.*, p. 70, p. 205.
6. Maurice LE LANNOU, «Les sols et les climats», in: *La France et les Français*, pp. Michel FRANÇOIS, 1972, p. 3.
7. Yves RENOARD, *Etudes d'histoire médiévale*, 1968, II, pp. 721-724.
8. Henri DUBOIS, *Les Foires de Chalon et le commerce dans la vallée de la Saône à la fin du Moyen Age (vers 1280-vers 1430)*, 1976.
9. Thourout située en Belgique entre Gand et la mer.
10. P. VIDAL de la BLACHE, *op. cit.*, p. 52.
11. M. PAREÉ, cité par D. FAUCHER, *op. cit.*, p. 64.
12. Charles LENTHÉRIC, *Le Rhône, histoire d'un fleuve*, 1892, II, p. 505.
13. Mouille, creux compris entre les bancs d'alluvions dans le lit d'une rivière.
14. Pierre BAYLE, *Histoire de la navigation fluviale à Lyon et le long de sa Majesté la «Vallée Impériale»*, 1980, p. 35. La toue, nous l'avons vu à propos de la Loire, est une petite barque qui précède le bateau, en vérifiant les fonds.
15. A.N., G⁷ 359, vers 1701.
16. H. de ROUVIÈRE, *Voyage du Tour de la France*, *op. cit.*, pp. 232-233.
17. D. FAUCHER, *op. cit.*, p. 187.
18. Mémoires du général MARBOT, *op. cit.*, I, p. 51.
19. Cécile PERROUD, *Le Rhône de nos pères*, 1974, p. 47.
20. *Ibid.*
21. P. BAYLE, *op. cit.*, p. 17.
22. C. PERROUD, *op. cit.*, pp. 50-51.
23. D. FAUCHER, *op. cit.*, p. 189.
24. *Ibid.*, p. 189.
25. C. PERROUD, *op. cit.*, p. 70.
26. D. FAUCHER, *op. cit.*, p. 193.
27. A.N., référence égarée.
28. D. FAUCHER, *op. cit.*, p. 190.
29. *Ibid.*, p. 199.
30. *Ibid.*, p. 197.
31. C. LENTHÉRIC, *op. cit.*, p. 512.
32. D. FAUCHER, *op. cit.*, p. 196.

33. C. LENTHÉRIC, *op. cit.*, p. 512.
34. P. BAYLE, *op. cit.*, p. 17.
35. A.N. F¹² 1512 B.
36. Le minot de sel est de cent livres pesant.
37. Henri FESQUET, *Le Monde*, 5 juin 1980.
38. P. BONNAUD, *op. cit.*, I, p. 431.
39. C. FERROUD, *op. cit.*, p. 73.
40. D. FAUCHER, *op. cit.*, p. 90.
41. C. LENTHÉRIC, *Le Littoral d'Aigues Mortes au XIII^e et au XIV^e siècle*, 1870, pp. 29-30.
42. Pierre GOUROU, lettre, avril 1980.
43. F. BRAUDEL, *Civ. matérielle*, *op. cit.*, III, p. 93, et *Méd...*, *op. cit.*, I, pp. p. 188-189
44. Renée DOEHAERD, «Les galères génoises dans la Manche et la mer du Nord à la fin du XIII^e et au début du XIV^e siècle», in *Bulletin de l'Institut historique belge de Rome*, 1938, pp. 5-76.
45. D. FAUCHER *op. cit.*, p. 84.
46. Traille, cable goudronné qui sert à diriger le bac et à le protéger du courant.
47. Pierre ESTIENNE, *La France. Les montagnes françaises et l'axe Rhône-Rhin*, 1978, p. 189.
48. Abel CHATELAIN, «Les fondements de la région historique», in *Revue de géographie de Lyon*, n° 1, 1955, p. 45.
49. Pierre DUBOIS, *Histoire de la campagne de 1707 dans le Sud-Est de la France*, p. 67.
50. D. FAUCHER, *op. cit.*, p. 184.
51. D. FAUCHER, *op. cit.*, p. 178.
52. Lettres patentes de Charles VI, 1380, cité in, A.N. K 1219, 37, p. 6.
53. D. FAUCHER, *op. cit.*, p. 157.
54. DE BASVILLE,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Languedoc*, 1734, p. 279.
55. André ALLIX, «Le trafic en Dauphiné à la fin du Moyen Age», in *Revue de géographie alpine*, 1923, pp. 373-408.
56. A.N., K 1219, n°37.
57. A.N., K 1219, 37, p. 27.
58. A.N., G⁷ 300.
59. *Ibid.*
60. *Ibid.* La Roche-Saint-André était à l'époque en bordure du Rhône.
61. D. FAUCHER, *op. cit.*, reprend le même thème p. 199.

62. R. GASCON, *Grand Commerce et vie urbaine au XVI^e siècle*, *op. cit.*, à propos de la lyonnaise de 1575-1580, qui ne correspond ni à celle de Nantes, ni à celle de La Rochelle.
63. P. ESTIENNE, *La France. Les montagnes françaises et l'axe Rhône-Rhin*, *op. cit.*, p. 147.
64. Jean LABASSE, «Lyon, Ville internationale» Rapport destiné à la Datar, 1982; Yves LERIDON, «Lyon, la place du second marché» in: *Le Point*, 26 novembre 1984
65. P. BONNAUD, *op. cit.*, I., pp. 430-431.
66. Jean-François BERGIER, *Les Foires de Genève et l'économie internationale de la Renaissance*, 1963, pp. 369 et 374-387.
67. R. GASCON, *op. cit.*, pp. 287-288.
68. Louis BOURGEOIS, *Quand la Cour de France vivait à Lyon (1491-1155)*, 1980, p. 143.
69. L. BOURGEOIS, *op. cit.*, p. 155.
70. Maurice GARDEN, *Lyon et les Lyonnais au XVIII^e siècle*, 1975.
71. Carlo PONI, «Compétition monopoliste, mode et et capital, le "marché" international des tissus de soie au XVIII^e siècle», communication au colloque de Bellagio.
72. A.N. G⁷ 360, Anisson, député de Lyon, 5 mai 1750.
73. J. LABASSE, art. cit., f. 20.
74. François GROSCHARD, «Rotterdam dans la bataille des conteneurs-la mer scellée au fleuve», in: *Le Monde*, 23 sept. 1982, p. 37.
75. Pour l'équipement hydroélectrique du Haut-Rhône, cf., «La polémique sur l'aménagement du Rhône, décision prochaine du gouvernement», in: *Le Monde*, 28 août 1982, p. 13; pour le projet de liaison Rhône-Rhin, cf., Claude RÉGENT «Rhône-Alpes, inquiétude au conseil régional, le canal mer du Nord-Méditerranée à tout petits pas» in: *Le Monde*, 15 sept. 1982.
76. F. GROSCHARD, *are. cité.*
77. P. ESTIENNE, *op. cit.*, p. 148.
78. Jules MICHELET, *Journal*, I, p. 76; 28 avril 1830.
79. Théodore ZELDIN, *Histoire des passions françaises*, 1978, II, p. 8.
80. Francis HURÉ, *Le Monde*, 23 juillet 1980.
81. Cité par Lucien FEBVRE, *Michelet et la Renaissance*, ouvrage inédit, à paraître prochainement, p. 131.
82. Papiers Florimond, A.N.K 1242, 1^{re} liasse, in: A. M. de BOISLISLE (P.P.), *Mémoire de la généralité de Paris*, 1881, I, p. 284.
83. DAVITY (1625), *Etats de l'Europe*, pp. 64-65 et 81-82, cité par A. M. de BOISLISLE, *op. cit.*, p. 558.

84. R. DION, «Le part du milieu...», art. cité, p. 9.
85. Michel ROBLIN, «L'époque franque», in: *Histoire de l'Île-de-France et de Paris*, p.p. Michel MOLLAT, 1971, p. 56.
86. Edouard W. FOX, *L'Autre France*, 1973, p. 52.
87. Roger DION, «A propos du traité de Verdun», in: *Annales E. S. C.*, 1950, P463
88. E.W. Fox, *op. cit.*, p. 52.
89. William H. McNEILL, *Venice, the Hinge of Europe, 1081-1787*, 1974, p. 1.
90. P. BONNAUD, *op. cit.*, II, p. 28.
91. Jean Robert PITTE, *Histoire du paysage français*, I, pp. 41-42 et 47-48.
92. J. MICHELET, *Histoire de France*, *op. cit.*, IV, p. 33.
93. Pierre GOUROU, lettre, 1980 et *Pour une géographie humaine*, 1973, p. 290.
94. L. MUSSET, «La géographie de l'histoire» in: *Histoire de France*, p.p. Marcel REINHARD, I, 1954, p. 32.
95. P. BONNAUD, *op. cit.*, I, p. 438.
96. J. MICHELET, *Journal*, *op. cit.*, I, p. 82.
97. Immanuel WALLERSTEIN, *Le Système du monde du XV^e siècle à nos jours*, I, *Capitalism et Economie-monde, 1450-1640*, 1980, p. 34.
98. A. GOUDAR, *Les Intérêts de la France mal entendus*, *op. cit.*, III, pp. 34.
99. *Ibid.*, p. 35.
100. On appelle troupes réglées, celles qui sont enrôlées en opposition à des milices de bourgeois et des communes, de paysans armés qui ne servent qu'en certaines occasions. A. GOUDAR, *op. cit.*, III, pp. 72-73.
101. André CORVISIER, *La France de Louis XIV, 1643-1715*, 1979, p. 61.
102. G. PARKER, *El Ejercito de Flandes y el camino español, 1576-1659*, 1976, pp. 48-49, cité par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op. cit.*, III, p. 170.
103. Lucien FEBVRE, «Frontière», in: *Bulletin du Centre International de Synthèse*, 1928, p. 32.
104. *Ibid.*, pp. 31 sq.
105. A.N. G 337, f° 65; cité par DE ROCHAS, II, 89, in: Gaston ZELLER, *L'Organisation défensive des frontières du Nord et de l'Est au XVI^e siècle*, 1928, p. 60.
106. R. DION, «A propos du traité de Verdun», art. cité, p. 462.
107. Bernard GUENÉE, «Les limites», in: *La France et les Français*, *op. cit.*, 1972, p. 52.
108. Gaston ZELLER, *La France et l'Allemagne depuis dix siècles*, 1932,

- P. 6.
109. Yves RENOARD, «1212-1216. Comment les traits durables de l'Europe occidentale se sont définis au début du XIII^e siècle», in *Annal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1958, pp. 5-21, reproduit dans, Yves RENOARD, *Etudes d'histoire médiévale, op. cit.*, I, pp. 77 sq.
 110. Walther KIENAST, *Die Anfänge des europäischen Staaten Systems im späteren Mittelalter*, 1936, in F.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op. cit.*, III, p. 43, note 87.
 111. Chrétiens d'Espagne qui conservèrent leur religion sous la domination musulmane.
 112. Henri MARTIN, cité par Georges LEFEBVRE, *La Naissance de l'historiographie moderne*, 1971, p. 186.
 113. F. LOT, *La Gaule, op. cit.*, p. 7.
 114. A ce sujet, voir Georges HUPPERT, *L'Idée de l'histoire parfaite*, trad. française, 1972. Alors que ces lignes sont déjà à l'impression, je prends connaissance du beau livre de Colette BEAUNE, *Naissance de la nation France*, 1985, nous y reviendrons.
 115. Le mot est de LA POPELINIÈRE, cité par G. HUPPERT, *op. cit.*, p. 177, note 2.
 116. *Ibid.*, pp. 78 et 91.
 117. *Ordonnances des rois de France*, XIII, p. 408, cité par Ernest BABELON, *Le Rhin dans l'histoire*, II, 1917, p. 207.
 118. G. PARIS, *Histoire poétique de Charlemagne*, p. 62, cité par E. BABELON, *op. cit.*, II, p. 219.
 119. Cité par E. BABELON, *op. cit.*, p. 240.
 120. Jean LE BON, *Adages*, 1577, cité par A. BENOIT, *Notice sur Jean Le Bon*, 1879, p. LXVII.
 121. Auguste LONGNON, *La Formation de l'unité française*, 1922, p. 325.
 122. Bernard GUENÉE, art. cit. in: *La France et les Français, op. cit.*, p. 59.
 123. Michel ARIBAUD, *Céret autrefois*, 1932, pp. 199 sp.
 124. 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 manuscrit 4574, f^o 205.
 125. Abbé GRÉGOIRE, cité par Charles ROUSSEAU, *Les Frontières de la France*, 1954, p. 12.
 126. Frédéric II, cité par Ch. ROUSSEAU, *op. cit.*, p. 10.
 127. Ernst Moritz ARNDT, cité par Ch. ROUSSEAU, *op. cit.*, p. 13.
 128. P. VIDAL de la BLACHE, cité par M. SORRE, *Les Fondements de la géographie humaine*, II, *op. cit.*, p. 461.
 129. Charles DARWIN, cité par M. SORRE, *op. cit.*, II, p. 461.
 130. Geoffroi de VILLEHARDOUIN,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éd.

- de 1872, p. 90, cité par Ch. de la RONCIÈRE, *Histoire de la marine française*, 1899, I, pp. 2-3.
131. Noël COLLET, «Le malheur des temps 1348-1440», in: Georges DUBY, *Histoire de France, dynasties et révolutions de 1348 à 1852*, II, 1971, p. 23.
132. Note égarée.
133. Alain GUILLERM, *La Pierre et le Vent. Fortifications et marine en Occident*, 1985, p. 166.
134. A. GUILLERM, *op. cit.*
135. Pierre GOUROU, lettre du 4, février 1982.
136. Emile BOURGEOIS, *Manuel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
137. Charles de la RONCIÈRE, *op. cit.*, pp. 14-15; B.N., Fr 17 308, f° 21, pour les 30 000 marins français rapatriés, cf. F. BRAUDEL, *Civ. mat.*, *op. cit.*, III, p. 151.
138. Pierre-Victor MALOUEU, *Mémoires publiées par son petit-fils*, 1868, I, p. 173.
139. *Ibid.*, pp. 173-174.
140. A. GOUDAR, *op. cit.*, III, p. 31.
141. A.N., Marine D² 45. S'agit-il d'un certain Gagnier? Je ne saurais en décider.
142. E. PLAN, Eric LEFEVRE, *La Bataille des Alpes 10-25 juin 1940*, 1982.
143. Les armées alliées cessent d'occuper la rive gauche du Rhin le 30 juin 1930.
144. Ernest LAVISSE, cité par C. ROUSSEAU, *op. cit.*, p. 7.
145. Camille VALLAUX, *Le sol et l'Etat*, 1911, p. 364.
146. Nelly GIRARD d'ALBISSIN, *Genèse de la frontière franco-belge. Les variations des limites septentrionales de la France de 1659 à 1789*, 1970 p. 313.
147. A.N., G⁷ 269; Ypres, 3 novembre 1682.
148. A.N., G⁷ 256; Lille, 5 décembre 1689.
149. Nelly GIRARD d'ALBISSIN, *op. cit.*, p. 26.
150. Colonel ROCOLLE, *2 000 ans de fortification française*, t. I, 1973, pp. 214. sq.
151. *Ibid.*, II, croquis n° 134.
152. E. LAVISSE, *Histoire de France, op. cit.*, VIII, 1, 1908, p. 131.
153. A.N., G⁷ 377; 28 mars 1694.
154. Thionville, cédée à la France en 1659 par l'Espagne. Son célèbre pont couvert sur la Moselle, 1673.
155. A.N., G⁷ 381, Metz 3 mai 1707.
156. André BELLARD, *Deux siècles de vie française, Metz, 1648-1848*,

- 1948, p. 5.
157. *Ibid.*, p. 6.
158. Louis TRÉNARD, *Histoire de Lille*, II, 1981, p. 420; Maurice BRAURE, *Lille et la Flandre wallonne au XVIII^e siècle*, 1932, pp. 87 sq.
159.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1 1583, Gauttier d'Aulnot, Metz, 17 décembre 1701.
160. J. ANCILLON, *Recueil journalier de ce qui s'est passé de plus mémorable dans la cité de Metz, pays Messin, et aux environs depuis le mois de juin 1674 jusqu' à 1683 inclusivement*, éd. de 1866, II, p. 138.
161. A. BELLARD, *op. cit.*, p. 31.
162. A. N., G⁷ 381; 15 juillet 1706.
163. A. N., G⁷ 376; mai 1693.
164. A. N., G⁷ 375; 7 septembre 1691.
165. A. N., G⁷ 378; 21 août 1697.
166. A. N., G⁷ 382; 22 novembre 1709.
167.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1 2243, 147; 16 juillet 1710.
168.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1 2395, 12; 14 janvier 1712.
169.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1 1583, 116; 16 juin 1702.
170. Fonds Dubrowski FR 144^o f^o 30 et 30 verso, 1698, B. Lénine Léninegrad.
171. Groupe de montagnes du Palatinat.
172. Ebernburg, au sud de Bad Kreuznach.
173. Nom actuel, Kayserslautern, ville de Rhénanie-Palatinat.
174.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1 967, 78; 22 janvier 1690.
175.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1 469, 188; 13 octobre 1675.
176.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1 1574, 143 et 146; 25 et 26 août 1702.
177. J. ANCILLON, *op. cit.*, II, pp. 4, 10.
178. A. N., G⁷ 382; Metz, 21 juin 1710.
179. A. N., G⁷ 376; 25 février 1693.
180.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1 1955, 16; 19 mars 1706.
181.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1 1583 88; 18 mai 1702.
182.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1 1583; 141, 1^{er} juillet 1702.
183. A. N., G⁷ 379; 20 juillet 1699.
184. A. N., G⁷ 378; 31 octobre 1698.
185. A. N., G⁷ 378; 9 octobre 1698.
186. A. N., G⁷ 377; 13 décembre 1695.
187. 15 731 setiers de blé sont ainsi transportés durant le siège de Namur, A. N., G⁷ 376; 27 décembre 1692.
188.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1 1583, 89; 22 mai 1702.

189. A.N., G⁷ 1633, 194; 7 mars 1694.
190. A. N., G⁷ 377; 27 juillet 1695.
191.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1 1559, 104 bis; 11 janvier 1702; A.N., G⁷ 376, 383.
192. A.N., G⁷ 415-416; 20 mars 1692.
193. A.N., G⁷ 381, Saint-Contest n'est pas d'accord avec cette proposition.
194.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1 2395.104, 16 juin 1712.
195. A.N., G⁷ 378, 16 mars 1697.
196. Juifs de Cour, financiers des princes allemands au XVIII^e siècle.
197. A.N., G⁷ 378; 16 mars 1697.
198.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1 1583, 68; 14 avril 1702.
199. En 1670, à signaler un soi-disant meurtre rituel d'un enfant chrétien, assurément accusation fautive. J. ANCILLON, *op. cit.*, I, 63.
- 200 *Ibid*, II, p. 16.
201. L'étape est l'ensemble du logement et des vivres alloués aux troupes pour une journée de marche.
202. Vitry-le-François (Marne).
203. J. ANCILLON, *op. cit.*, II, pp. 19-20.
204. A.N., G⁷ 375; 7 septembre 1691.
205. A.N., G⁷ 375; 27 octobre 1691.
206. A.N., G⁷ 377; 18 mars 1695.
207. A.N., G⁷ 375; 2 février 1691.
208. A.N., G⁷ 376; 1693.
209. Archives de Guerre, A 1 1955,
239. juillet 1706.
210. «Religion prétendument réformée».
211. A.N., G⁷ 375; 8 avril 1691.
212. A.N., G⁷ 382; 24 novembre 1708, 5 juillet 1709.
213. Ainsi Marange, A.N., G⁷ 377; 1691.
214. A.N., G⁷ 378; 26 octobre 1697.
215. A.N., G⁷ 377; 18 novembre 1696.
216. A.N., G⁷ 379; 3 janvier 1699.
217. J. ANCILLON, *op. cit.*, II, pp. 37-38.
218. A. GUILLERM, *op. cit.*, p. 152.
219. Cet ouvrage était déjà composé lorsque j'ai eu communication du manuscrit d'un ouvrage remarquable et très détaillé d'un érudit du Var, Pierre DUBOIS, *Histoire de la campagne de 1707 dans le Sud-Est de la France*, Je n'ai malheureusement pu utiliser cet ouvrage que pour ajouter ou rectifier quelques détails dans mon texte.

220. Octave TEISSIER, *Histoire des divers agrandissements et des fortifications de la ville de Toulon*, 1873, pp. 12-14.
221. *Ibid.*, p. 17.
222.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I 2041, 271.
223.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I 2041 235; 20 juillet 1707.
224. O. TEISSIER, *op. cit.*, p. 146.
225. Allusion au procédé de terre brûlée, de destruction des récoltes sur pied avant l'arrivée de l'ennemi.
226.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I 2042, 121.
227. *Ibid.*, A I 2041 235; 20 juillet.
228. *Ibid.*
229. Pierre DUBOIS, *op. cit.*, dactyl, p. 53.
230. A.N., G⁷ 469; 1^{er} janvier 1706.
231. Archives de la Guerre., 15 mars 1706.
232. Archives de la Guerre., 26 mars 1706.
233. E. LAVISSE, *Histoire de France, op. cit.*, VIII, pp. 103 et 106.
234. *Mémoires et Lettres du Maréchal de Tessé*, II, 1806, p. 235.
235. Arrêtés en Savoie, certains avec la collaboration rémunérée des paysans.
236. A.N., Marine B 3 150.
237. Archives de Turin, *Materie Militari*, 1707.
238. Port italien situé près de la frontière française.
239. Maréchal de TESSÉ, *op. cit.*, II, p. 239.
240. Louis de SAINT-SIMON, *Mémoires (1702-1708)*, éd. Pléiade, 1969, II, pp. 906-907.
241. De livres.
242. L. de SAINT-SIMON, *op. cit.*, II, p. 907.
243.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I 2041, 279; Aix, 26 juillet 1707.
244.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I 2041; A.N., Marine, B 3 150.
245.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I 2041, 266.
246. A.N., Marine, B 3 149.
247. TESSÉ, *op. cit.*, II, p. 258.
248. L. de SAINT-SIMON, *op. cit.*, II, p. 906.
249.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I 2041, 233; 31 juillet 1707.
250.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I 2042 49, 5 août 1707.
251.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I 2042, 51; 4 août 1707.
252.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I 2042, 14; 2 août 1707.
253. Rang, ancienne classification des vaisseaux d'après leur taille et leur armement.
254. P. DUBOIS, *op. cit.*, dactyl, p. 193.
255.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I 2042 170; 6 août 1707.

256.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1 2042, 366; Grignan, Marseille, 31 août 1707.
257. V. BRUN, *Guerres maritimes de la France; port de Toulon, ses armements*, I, 1861, pp. 125-126.
258. A.N., Marine B 3 149; 30 août 1707.
259.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1 2042 6 septembre 1707.
260. Archives de la Guerre, *ibid.*, 20 octobre 1707
261. Archives de la Guerre, *ibid.*, 9 octobre 1707.
262. Archives de la Guerre, A 1 2042 116 bis; 11 août 1707.
263. Pour deux mois en cette année 1707, 6 navires comptant 2 460 hommes d'équipage représentent une dépense prévue de 158 566 livres (soldes, 88 200; vivres, 70 366). A quoi il faut ajouter les frais de matériel.
264. A ne pas confondre avec cet autre *Royal Louis* construit à Toulon, en 1667, et qui avait été le premier vaisseau à porter 120 canons, Paul MAUREL, *Histoire de Toulon*, 1943, p. 102.
265. V. BRUN, *op. cit.*, I, 110.
266. *Ibid.*, I, pp. 145-146.
267. La «presse», enrôlement forcé des matelots.
268. Moseon, *Affaires étrangères anciennes*, 93/6-497-34V^o; Bordeaux, 27 août 1787.
269. André CORVISIER, *L'Armée française de la fin du XVII^e siècle au ministère de Choiseul*, I, 1964, pp. 241-242.
270. A. CORVISIER, communication au Colloque de Prato, à paraître.